

1949 年 11 月～1950 年 12 月

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

1949 年 11 月 23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

在此以前,11 月 7 日,毛泽东关于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在给贺龙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刘、邓的电报中提出,为了统一指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的部队,领导川西北地方的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在与中共中央西南局会合前,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在执行中,这个机关名“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主任,王维舟、李井泉为副主任。以后,该委员会在完成工作任务后撤销。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

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为副主席,并任命委员 87 人。1952 年 8 月,又任命宋任穷、卢汉为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行使大区人民政府职

权,辖云南、贵州、西康 3 省,川东、川南、川西、川北 4 个行署区,重庆直辖市及西藏。

建立军管会,进行接管

全省各地相继解放以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旧政权及其所属一切公共机构、事业单位,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维持社会治安。

1949 年 12 月 3 日,成立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张际春,副主任为陈锡联、张霖之。

1949 年 12 月 15 日,成立泸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主任为王其梅,第二主任为王晓。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李井泉,副主任为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

1950 年 1 月 8 日,成立南充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赵林,副主任为孙先余。

1950 年 2 月 1 日,成立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廖志高,副主任为刘忠、白认。

各军管会入城之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对当地社会情况进行

了调查,作好了人员、组织、纪律、物资等各项准备。入城后,以多种方式向各阶层人员广泛宣传人民解放军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军管人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廉洁奉公,待人和蔼,依靠群众,分系统进行归口接管。接管工作在两个月内基本完成。

重庆市军管会共接管机关、工厂、银行、仓库、公共机构等单位 374 个,接收员工 100 647 人,接收的主要物资有:黄金 10 972 两^①、白银 777 公斤零 8555 两、银元 12.42 万元、美钞 5.02 万元、大米 7155 石^①、稻谷 1.56 万石、食盐 9.58 万担、汽车 2045 辆、机械设备 2385 部、飞机 30 架、轮船 20 艘、房屋 16 538 间、收发报机和电话机 7584 台。成都市军管会共接管大小单位 284 个,接收员工 56 437 人;接收的主要物资有:黄金 10 433 两、银元 82 603 元、本币 77 066 825 元、大米 38 599 斤、枪枝 15 271 支、炮 386 门、汽车 2367 辆、飞机 28 架、汽油、酒精等 72 927 加仑零 53 558 磅。重庆市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48 家,固定资产共 12 728 万元,占全市工业企业总资产的 79%。全川共没收以原国民政府“四行、两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

金库)为主的金融机构 158 家。原西康省政府所属机构、人员、资产、档案等,由康定军管会接收,移交雅安军管会。

同时,各军管会宣布解散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中统、军统等反动组织,没收其所有财产,令所属人员立即登记自新;收容散兵游勇,收缴非法武器、电台。至 1950 年 1 月下旬,重庆市军管会共收容国民党军将、校、尉级军官及家属 6700 余名;至 3 月中旬,成都市军管会共收容散兵游勇 5700 余名。各军管会先后颁布《交通管理暂行办法》、《汽车登记暂行办法》、《船舶管理暂行办法》、《无线电台登记及管理暂行办法》等,逐步建立交通、通讯秩序。

各地军管会的工作一般至 1950 年 2~3 月间告一段落。此后,仅对个别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事项施行军管。

各省、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成立

四川解放之初,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 4 个行署区,重庆为中央直辖市,西康仍为一个省,共 6 个省级行政区域。

1949 年 12 月 11 日,奉中央人民政府令,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为陈锡联,副市长为曹荻秋(后增罗士高、胡子昂),辖原 18 个区和北碚管理

^① 均为旧制计量单位。“两”为 16 进制市两,1 两 = 31.25 克;“石”为市制,1 石 = 50 公斤;“加仑”、“磅”为英制计量单位,1 加仑 = 4.546 升;1 磅 = 0.45 公斤。

处,1950年4月合并为8个区,其中一、二、三、四、八区为相当于地专级的行政区,五、六、七区为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区。

1950年1月1日,川东行政公署成立,驻地初设重庆南岸黄桷桠,1952年2月移驻北碚市,主任为阎红彦,副主任为魏思文、余际唐,辖万县市璧山专区(1951年1月改称江津专区)、大竹专区、万县专区、涪陵专区、酉阳专区,共34个县。

1950年1月1日,川南行政公署在自贡市成立,同年1月31日迁泸县,主任为张国华(1950年2月后为李大章),副主任为郭影秋、刘披云(后增罗忠信),辖自贡市、泸县专区、内江专区、宜宾专区、乐山专区,共34个县、市。

1950年2月7日,川西行政公署成立,驻地成都市,主任为李井泉,副主任为阎秀峰(后增钟体乾),辖成都市、温江专区、绵阳专区、眉山专区、茂县专区,共38个县。

1950年2月24日,川北行政公署成立,驻地南充市,主任为胡耀邦,副主任为秦仲方(后增刘聚奎、裴昌会),辖南充市、南充专区、遂宁专区、剑阁专区、达县专区,共35个县。

1950年8月后,各行政公署改称“人民行政公署”。

1950年4月11日,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省会驻雅安县,主席为廖志

高,副主席为张为炯、鲁瑞林(后增格达、夏克刀登、果基木古、刘聚奎、白认、康乃尔),辖雅安专区、西昌专区、康定专区(年底改为西康藏族自治区)共49个县、4个设治局;原西康省所属金沙江以西地区,解放后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以后划归西藏自治区。

与此同时,中共各省、市、区委员会相继成立。

1949年12月,中共重庆市委成立,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1949年12月26日,中共川东区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为书记,阎红彦为第一副书记,魏思文为第二副书记。

1949年2月19日,中共川南区委员会成立,李大章为书记,彭涛为第二书记。

1950年1月,中共川西区委员会成立,李井泉、王新亭、龚逢春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1950年2月,中共川北区委员会成立,胡耀邦、赵林分任第一、第二书记。

1950年1月,中共西康区委员会(1953年2月改称省委)在成都成立,廖志高为书记,秦力生为副书记。

统一金融,发行人民币

1950年1月7日,西南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禁用银元的命令。同月1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西

南区金银管理办法》，宣布人民币为全国统一流通的单一货币，禁止以黄金白银进行计价、流通与私相买卖，宣布废除国民政府发行的银元券，但为照顾人民困难，准予限期兑换；同时宣布其他解放区所发行的带区域性的货币不得流通，各机关部队必须到银行兑换人民币。重庆市自1月12日起禁用银元。成都市军管会、川西行署先后于2月6日和8日发布布告，禁止金银和外币流通。2月22日，《西南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公布，规定私人资本经营的银行、钱庄、银号等，只能通过正当存款为生产建设服务，不得进行金融投机。各地均采取措施，加强金融管理与缉私工作，打击以高价收买银元、金银黑市交易。在各地允许以人民币抵交公粮。至3月份，金融混乱状况基本结束。

抢修都江堰

1950年1月，成都市军管会组织力量，紧急抢修都江堰。

成都平原的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按历史惯例，每五年要进行一次大修，每年要进行岁修。可是截至1949年，已有10余年未进行过大修，当年岁修工程至12月份尚未动工。由于多年失修，1949年灌区先发生旱情，继又遭洪水，堤坝垮塌，滩口淤塞，随着春耕日益临近，灌区人民忧心如焚。

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的第二天，即对抢修都江堰进行了研究。1950年元旦，即成都市军管会成立的当天，李井泉主任即约见原水利局代局长邵从燊，问询有关情况，并决定拨5万银元，以后又改拨大米300万斤以垫作抢修经费，成立都江堰临时督修处。川西行署发出第8号通令，要求：①勘安人员未到之前，各县即先行开工；②受益田亩，依旧例征粮5升；③各县县长必须亲临督察；④务须按时完工，3月底断流，保证春耕。人民解放军一八四师指战员1500余人奉令参加抢修工程。

抢修工程开始不久，发生大规模匪特骚乱，成都至灌县交通不时被截断。修堰军民一边战斗，一边施工，克服困难，加快施工。经过两个多月努力，较历年缩短工期两个多月完成岁修任务，于4月2日（清明节前三天）举行盛大开闸典礼，保证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耕的用水。

岁修工程完工后，川西行署决定动员力量继续整修堰渠，以提高防洪抗涝能力，当年夏季在32个县修建了729处工程，使灌区平稳度过夏秋洪水。当年秋后，川西行署又召开川西堰工会议，制订水利工程计划，重点安排都江堰大修工程，挖河填土45.5万余市方，使都江堰受益面积由近200万亩扩大到450余万亩。1公顷=15亩，下同

征收 1949 年度和 1950 年度公粮

1950 年 1 月 12 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发出征粮指示,指出:“成都解放,川局初定,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多,但最中心而又最重要的就是粮食供应;迅速的征到粮食,就是我们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

1949 年,国民党政府节节溃退,大部分地区均未征粮,加以战争消耗,截至解放时为止,全川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田粮机构的存粮及缴获的粮食,仅有 1.75 万吨,而当时在川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即有近 200 万人,还有大量城镇居民需要供粮,因此征收公粮(农业税)是一项极为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1950 年 1 月中旬,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分别颁发《1949 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3 月 7 日,雅安军管会发布布告:“从即日起开始征收 1949 年旧欠”,并成立西康省粮食委员会。各省政府及行署均规定:1949 年度农业税改为统一征收公粮(包括各级军费、政费及地方建设费在内),以户为征收单位,一次缴足;在田粮制度未彻底改造前,当年度暂按旧赋普遍征收及大户加征两种办法进行;随公粮附征 20% 的地方粮,以作为地方公教人员、城镇居民及公益和建设之需;废除国民党政府的各项杂项粮款。

同时规定,国民党政府在溃灭前所征之粮食,凡持有正式赋串者,经登记审查后,准予抵缴公粮。《川西区 1949 年度公粮合理负担暂行办法》规定,公粮税率为:地主 40%~50%,富农 25%~35%,佃富农 20%,中农 10%~15%,贫农 5%,赤贫者免征,寺庙、祠堂土地依地主比例计征。

征粮工作开始不久,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土匪暴乱,加以农村基层政权尚未改造,粮食主要掌握在恶霸、地主手中,征粮工作历经了艰苦的斗争。各省、区以县为单位,组织由解放军官兵、地方干部、青年学生参加的征粮工作队奔赴农村,结合开展剿匪斗争,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征粮。简阳县在“三·三”(1950 年 3 月 3 日)土匪暴乱中,征粮工作队员被匪特杀害达 159 人。据《四川省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此期为征粮牺牲的四川籍烈士即达 1078 人,其中地方干部 560 人,军队指战员 518 人。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农民在运粮、护粮中被匪特杀害的有 257 人,重伤 325 人。

川东区由于起步较早,抓紧了刚解放时相对平静的时期开展征粮工作,至 2 月中旬已完成近半征粮任务。其他区由于土匪暴乱,征粮工作受到严重阻滞。至 7 月份,各地 1949 年度征粮工作基本结束。

1950 年 6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决定:由于 1949 年度公粮开征较

迟,为照顾人民困难,1950年夏季不再分派公粮任务,秋收之后,按中央人民政府《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依率计征当年公粮。各省、区颁布实施细则,改变了按旧赋征收的办法,实行按常年产量计征,规定超产不增加负担,并对种植经济作物实施奖励。各征粮工作队进行查田亩、查人口、评产量等工作,使计征工作有了较可靠依据,加以减租退押后农民积极性大增,当年秋征工作按期顺利完成。

据各省政府、行署财政厅统计,川西区总计完成1949年度公粮7.47亿市斤,1950年度公粮8.8亿市斤;川北区完成1949年度公粮3.54亿市斤,1950年度公粮7.2亿市斤;川南区完成1949年度公粮6.37亿市斤;川东区完成1950年度公粮10.9亿市斤;西康省完成1949年度公粮约2000万市斤,1950年度公粮4356万市斤。各阶层人均负担情况,据川东区调查为:贫农15市斤,中农45市斤,富裕中农92市斤,富农223市斤,地主780市斤;农业人口人均负担公粮111.5市斤。

征粮任务的完成,对保障军需民用、市场供应和平抑物价起了重大作用。川东、川北、川南3区1950年还向受灾的华东地区及上海市调出大米7.5万吨,川西区供应进军西藏部队的粮食1950年和1951年共有5.5万余吨。

王陵基被捕获

1950年2月,在逃的原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被捕获。

王陵基于1948年4月初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上任后的第二天即制造了震惊全川的“四·九”血案,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极力扩充反共地方武装,加紧征兵、征粮以支持反人民内战,并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被中共中央列为战犯。1949年12月,王亲率保安团队在邛崃一带阻击人民解放军,在所部被击溃后,化装潜逃乐山、宜宾,化名戴泽民,企图伺机逃往台湾,遭到当地公安部门怀疑后,又从宜宾乘船往江安方向逃窜。2月6日,江安县公安局在“永利”号轮船上将王陵基捕获。

剿灭大规模匪特骚乱

1950年2月5日,包括1000余名起义后又叛乱的国民党军人在内的武装匪特,在成都市东北郊龙潭寺、石板滩发动暴乱,杀害军政人员40余人,揭开了匪特大规模暴乱的序幕。匪势迅速蔓延,温江专区14个县城先后被匪特围攻。3月份,川东区35个县均发生土匪暴乱,秀山县城一度被匪特劫占,重庆市处于城乡半隔绝状态。川南、川北区有百人以上的股匪100余股,在沿江、沿公路线一带大肆骚扰。简阳县匪特在国民党特务、反动军

官的指挥下,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杀害军政人员及农民积极分子 180 余人,杀害群众 1000 余人,烧毁民房 800 余间,抢劫粮食数百万斤。在西康省,大恶霸、匪首、“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程志武等,纠集近万人围攻省会雅安,起义后又叛乱的西康省保安团与土匪合谋,攻击解放军。

各地匪特大规模骚乱,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预谋。从 1949 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当局即积极部署“应变计划”,准备开展“游击战”进行骚扰,为此在全川安置了近 8 万名职业特务,举办了多次“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大批“游击战”骨干,并大肆网络各地恶霸、匪首、反动会道门头子,授以官衔,发给武器,以伺机发动暴乱。

中共中央西南局对土匪骚乱早有准备,在成都战役刚结束时,就告诫部队“要准备打第二次仗”,指出剿匪斗争的实质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反封建的斗争,决定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相结合,贯彻“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剿匪斗争在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由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西康各军区直接指挥。各级成立了剿匪委员会,吸收各阶层代表参加,实行统一领导。首先集中力量肃清交通要道及富裕地区之匪特。川西剿匪部队在迅速镇压了龙潭寺、石板滩暴乱之后,重点

进攻匪特的巢穴和据点,摧毁了温、郫、灌 3 县匪特总指挥部,歼灭土匪 4 万余人,平息了温江、眉山专区的土匪暴乱。川东军区在璧山地区打响剿匪战役后,接着组织兵力对涪(陵)、南(川)、巴(县)三角地区的土匪实行合围,获得歼匪万余名的重大战果。川南军区首先使长江北岸地区净化后,然后把剿匪斗争转向南岸山区。川北军区在渠江、涪江、嘉陵江三角地带组织围剿,并镇压了南充、射洪、中江地区的匪特暴乱。西康军区围歼了集中于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的匪特,接着在 3 月下旬配合友军解放了西昌,扫除了直接指挥全川暴乱的国民党残部最后基地。至 6、7 月份,全川大部分地区的土匪暴乱基本平息,城乡交通基本沟通。到 1950 年底,全川共歼国民党土匪武装 46 万余人。剿匪斗争的重点转向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及与邻省结合部位。

平抑物价

1950 年 2 月前后,由于土匪骚乱,城乡交通受阻,部分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许多私营工商业者也惜货保值,闭门拒售,造成物价大幅度波动。以 1949 年 12 月为基数,粮、油、棉、纱、布、糖等 25 种主要商品的平均价格,1950 年 1 月上涨 35.2%,2 月份上涨 66%,其中大米上涨 1.8 倍,棉纱上涨 70.5%。成渝两

市涨幅更大,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人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黑市交易,积极加强市场管理,努力宣传政策,消除私营工商业者的顾虑,并加强剿匪,武装押运粮食、食盐、纱布等供应市场,还从上海、武汉、宝鸡等地赶运物资入川供应,以平抑物价。至3月份,主要城市市场的批发物价指数较2月份下降28.2%,4月份又较3月份下降28.7%,至5月份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并趋于稳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一时谣言四起,物价再次发生波动。当月重庆市物价上涨23%。这次物价波动的特点是:国营贸易公司货源充足的粮食、花纱布等物资,价格基本稳定;而国营公司尚不经营的商品,如西药、五金器材、电料、汽油等,上涨幅度较大。人民政府及时增设专业国营贸易机构,扩大经营范围,并打击造谣破坏、投机倒把活动。不久,涨风即告平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痼疾基本消除。

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①,举办折实储蓄

1950年3月3日,人民胜利折实

公债在西南地区开始发行。西南军政委员会分配给重庆市的任务为300万分,川西区135万分(含成都市90万分),川南区80万分,川东区60万分,川北区45万分。通过广泛宣传,各地各阶层人民群众踊跃认购。至年底,各区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

1月9日,重庆市人民银行成立储信部,率先举办折实储蓄。接着,其他城市也相继推行。成渝两市以大米3市斤、白布1市尺、菜油1两、盐1两、煤3斤等5种定量产物合为一单位,以前5日市场价格为标准,存取均按折实单位计算。同时,对于实行薪给制的职工,其工资也按折实单位计发。

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及举办折实储蓄,对于回笼货币,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克服当时经济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宝元通公司转为国营

1950年1月,私营宝元通公司正式转为国营。由民族工商业者经营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四川较大的私营商业企业。解放前夕,该公司曾多次派人同香港、成都等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联系。1949年8月,公司派代表到北京,通过章乃器向

^①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中央人民政府为克服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采取的财政增收措施。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以实物为计算单位,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6斤、面粉1斤半、白细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平均市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每10日公布一次。

陈云提出转为国营的要求。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宝元通公司负责人黄凉尘、樊陶斋向西南财委作了详细汇报,正式提出转为国营的申请。1950年1月,西南财委批准宝元通公司的国内贸易部分,包括在重庆、成都、泸州、宜宾的分支机构,转为国营贸易,其存货、经营设施、房屋等统一售给国家,300多名职工参加国营贸易工作。宝元通公司转为国营,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并为组建国营贸易机构提供了部分人才。其后,恒义升等私营公司也通过赎买方式转为国营。

开展清匪反霸

1950年二、三月后,大部分地区股匪陆续被剿灭,不少匪首转移到农村隐蔽,其中许多人是当地有名的恶霸。他们制造谣言,迫胁农民,严重阻碍各项工作的开展。按照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各行署区、省、市层层成立了清匪委员会,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斗争,重点打击发动武装暴乱,负有血债的惯匪及恶霸分子。各县、市人民法院均组织了临时人民法庭,下乡进行巡回审判,直接受理群众的检举揭发,及时召开公审大会,大张旗鼓地打击和镇压首恶分子。川西区各县、区、乡在短时期内,即捕获逃窜

及潜伏的匪特、恶霸分子4000余名。清匪反霸斗争的进行,拔除了地方恶霸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征粮工作、减租退押扫除了障碍。清匪、反霸与减租、退押,合称为当时农村的“四大运动”。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①

自1950年1月下旬起,各地相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1月23~29日,重庆市举行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刘伯承作《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施政报告,陈锡联作《关于重庆市接管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总结报告。会议讨论了重庆的大政方针,通过了有关建设新重庆的212件提案,选举产生了重庆市首届协商委员会。

同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出《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责成各县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指出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团结新区各界人民,克服困难,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至4月份,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行署所辖地区,除个别少数民族聚居县外,已有133个县(市)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通过推选和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新解放区尚不具备马上普选的条件下,应先召开各界各业座谈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协商产生,包括了各民主阶级、各行各业相当广泛的人士,非党代表占很大比重。各界代表发挥高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政议政,努力宣传贯彻会议的决定,与匪特破坏活动展开斗争,使各地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各项工作迅速开展。

在此基础上,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上半年,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区相继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西康省召开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分别选举产生了省、区协商委员会。1950年内,多数县召开了3至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的常设机构——各级协商委员会,负责处理代表的提案,协调与政府的工作。

召开农代会,建立农民协会

1950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中,要求各省、区、市在县以上地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同时,区乡两级应召开农民代表会议,筹备建立农民协会。6月7日,西南局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凡是尚未建立农民协会的地方,“应于本月内一律建立。”

各地自1950年春季起,首先在区乡组建农民协会,发展农协会员,然后产生代表,自下而上地召开乡、区、县、行署区(省、市)农民代表会议,成立各

级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各地培训了数十万农民积极分子,成立了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自卫队,实行“枪换肩”^①。至1950年底,全川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一千万人以上,有武装自卫队员百万人以上。

各级农民代表会议及其产生的农民协会,成为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区乡农民协会在土地改革完成、区乡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前,一直代行基层政权的职能。

严禁鸦片烟毒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接着,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禁绝烟毒的实施办法》及《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禁烟斗争在全川迅速展开。

自清末以来,鸦片烟毒即在川、康两省泛滥,成为社会一大公害。种植鸦片尤以西康省的宁、雅两属,川西北的松、理、茂、汶一带,川南地区的雷、马、屏、峨一带最为严重,久已形成制毒、贩毒、吸毒渠道,祸及川康,为害甚广。

禁毒斗争首先从禁种烟开始。规定汉族地区种植鸦片者,当年必须铲除。西康省为帮助汉族地区的种烟农民改种粮食,向他们发放种子250余吨、贷款5万多元,使烟田全部改种,

^① 即指对原旧政权组织之民众自卫队武装从领导到武器的掌握权的转移。

当年粮食产量就较 1949 年增产 30% 以上。对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发动各阶层人民层层订立“禁烟公约”，自觉缩小种植面积，以至达到不种。对制毒、贩毒者，各地进行了严厉打击，公开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砒子大王”，当众焚烧烟土。当年各地取缔烟馆共 2 万余家。对吸毒者，实行“劝戒与勒戒相结合”的办法，在城市和集镇进行瘾民登记，举办各种形式的戒烟所及劳动习艺所，由卫生部门免费发给戒烟药品，实行集中勒戒，至脱瘾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由政府集中在戒烟所的瘾民有 65 万余人。重庆市设有戒烟所 729 所，戒毒后由民政部门帮助谋得正当职业者有 61755 人。綦江县戒烟所收容烟民 401 人，脱瘾后上街集体游行，欢呼脱离苦海。

至 1950 年底，种植鸦片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吸毒者大部分戒掉，贩毒、制毒者受到严厉打击后，基本销声匿迹，少数转入地下。以后两年又继续进行了这一斗争。流毒川、康百余年的烟毒公害基本禁绝。

进行减租退押

1950 年 3 月 10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9 月 1 日，又颁布《西南区退押实施办法》。规定“凡地主、旧式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所出租之土地，其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

25%”，“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年产物的 35%，超过者应减低至 35%”。“凡出租土地者，均不得预收地租或地租以外的任何变相剥削”。“所有押金须于 1951 年秋收前全部退完，退押不计利息，但应保值计算。”

减租退押于 1950 年秋在各地普遍展开。各行署区及省、市均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颁布了相应补充规定，有计划地培训了大量农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积极组织和发展农民协会，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各地减退工作团、队通过“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等方式，启发农民提高阶级觉悟，组织起来向抵抗减租退押，或明减暗不减、先加租后减租等现象展开斗争。

为使各阶层人民支持减租退押，重庆市协商委员会组织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减租退押协助委员会，川西行署和成都市组织各阶层代表 5000 余人参加劝说小组，协助进行减租退押工作。重庆市及川东地区地主兼营工商业或工商业者兼地主较多，当地部分农民一度纷纷进城算账，有的甚至提出要将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抵作押金。中共中央西南局及时发现并通报各地注意保护工商业，组织了川东区农民协会驻渝办事处，城乡联合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华阳、双流、成都、温江、广汉、眉山、绵阳等七县农民协会也在成都市设立了联合办事处，使减

租退押得以顺利进行。

减租退押工作到1950年底在大部分地区告一段落,至1951年春末普遍结束。川东区农民通过减租获得稻谷约18亿斤,川西区农民从减租中获得大米7亿斤;全川退押金折合大米共约150万吨,平均每户农民得益159公斤。

减租退押运动改变了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树立了农民群众在农村的政治优势,为开展土地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统一财经制度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解放初期,财经制度尚不统一,多沿用战争时期的办法,由各专区、县实行自收自支,缺乏通盘筹划,收入拮据,财政经济状况困难。中央人民政府的规定下达后,各行政公署及西康省、重庆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掌管所辖地区的财经工作,负责拟订计划并监督其执行。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有省、市、行署相关负责人参加的财经专业会议,强调确立统一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4月,各行署及西康省、重庆市政

府分别召开财经会议,作出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的各项决定,还分别制订出《区、市、县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地方粮款开支暂行标准》、《事业费支拨和审议办法》等具体规定。7月至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财政专门会议和银行、税收、贸易联席会议,进一步解决财政业务的统一问题。会后,各行署及省、市政府分别就调整1949年度公粮、征收工商业税的具体政策及统一税率、征收1950年度农业税等问题制订了具体规定或暂行条例。财经管理逐步步入正轨,财政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川北区3月份税收仅占全年概算的6%,到7月份已上升到41.2%,加以执行整顿编制,紧缩开支的决定,使收支紧张的状况大为缓和。

统一财经制度的工作到1951年继续进行,至当年夏季,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基本形成。

修筑康藏公路^①,支援进军西藏

1950年4月,修筑康藏公路的工程全面动工。

西南军区工程兵司令谭善和率领6个工兵团及3个步兵团和工兵营、侦察营近2万人,首先投入雅安至甘孜路段的施工,西南公路局两个工程队的技术人员和大量民工也加入施

^① 康藏公路起于西康省会雅安,止于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后改称川藏公路,以成都为起点)。这条公路在西康境内的部分线路(二郎山段除外)利用了原康青公路废弃的路基,带有修复性质。

工。筑路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仅用 4 个多月时间,就在陡峭的二郎山上开山修出公路,并打通海拔 4 千余米的折多山,至 8 月 26 日,西康境内的 603 公里公路建成通车,为进军西藏铺平了道路。

同时,各地人民积极支援进军西藏。川西行署于 1950 年 3 月 30 日成立支援进藏委员会,在新津设立办事处,在邛崃和雅安分设联络站,随后又在成都设办事处,在眉山专区及新津、邛崃、彭山等县建立支援委员会及柴草供应站,为进藏部队提供大量物资。在 1950~1951 年间,川西区支援进藏的粮食达 5.5 万余吨。西康省组成了康区各族各界支援委员会,支援进藏部队烧柴 1500 余万斤,草料 500 余万斤,并出动 10 余万头牲畜,为进藏部队运送物资。

赈济灾民

1950 年春后,由于上年度农业收成较差,加以匪特骚乱,破坏生产,部分地区出现较严重的灾荒。川东行署民政厅调查,全区有 25 个县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灾荒,其中尤以巫山、城口、巫溪、奉节、酉阳、秀山、黔江、武隆、石砫、彭水、南川等 11 县严重,全区有灾民 120 万人。川南区调查,全区有灾民 200 万人左右。

川东行署为此发出救灾紧急指示,规定简化手续,迅速将粮、贷款

发到应户手中;克服单纯救济观点,指导农民走发展生产的路子;专款专用;重点发放,严禁平均分发;各级政府加强检查,落实救灾措施。川南行署于 6 月 20 日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并发放农贷粮及急救粮 1.5 余吨、农贷款 560 万元。川西区发放 367.9 万公斤大米,用于解决贫苦农民缺乏肥料、耕牛的困难,又拨给川西贸易公司油菜籽 600 余万公斤,分发各地,由当地政府组织农民合作榨油取枯,以安置灾民生产自救,并解决部分肥料困难,还拨付代垫水利粮 390 万公斤大米,安排灾民参加水利建设,以工代赈。

各地实施救灾措施,使灾民平安度过灾荒,生产有所发展。

成立西南革大

5 月 14 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在重庆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兼任该校校长。到 1953 年 10 月停办时,该校及成都、川北、川南、西康、云南、贵阳分校共培养各类干部、建设人才近 10 万人。

党内领导干部整风

1950 年夏季,各行署区、省、市在党内领导干部中进行整风。这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一次整风。6 月 6 日,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要克服的倾向,“主

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此外……蜕化腐朽思想正在发展,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整风通过阅读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6~8月份,重庆市及川南、川西、川北、川东行署、西康省,相继集中县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了整风。

成渝铁路开工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领导人邓小平、贺龙等出席并发表讲话。

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盼望了40年的铁路,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兴建的第一条铁路。1950年1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的建议修建成渝、天成……等铁路的报告上批示:“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亲自部署,决定先期调拨1亿公斤大米作为第一批修建资金,并确定筑路工程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西南军政委员会旋即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由李达任主任委员,并成立西南铁路工程局,以赵健民为局长,萨福均、赵锡纯为副局长。西南军区抽调师级

干部20余人,并派出部队组成5个军工筑路队共3万余人先期投入施工。

成渝铁路的兴建,极大地鼓舞了全川人民。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区都组成了民工筑路指挥部,派出大批民工参加筑路,并积极支援筑路所需的钢材、水泥、木材、石料等原材料及工具、主副食品等。

成渝铁路的动工,增加了大批加工订货任务,从而刺激和带动了沿线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重庆市4000多家冶金、机械工厂和1000余户铁工作坊,纷纷复工,开足马力生产;泸州等地数千艘木船为运送原材料及生活用品,频繁往返于川江上。

成渝铁路开工后进展迅速。6月15日动工,8月即开始铺轨,次年9月1日,重庆至永川段即建成通车。

格达活佛遇难

1950年8月,藏族著名进步人士格达在昌都遇难。格达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系甘孜白利寺活佛,藏族著名宗教界人士。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藏区时,他积极支持红军,参与波巴政府的工作。红军北上后,他竭尽全力掩护和保护了大批红军伤病员,并编写了许多歌颂怀念红军的诗歌,在藏族人民中广为流传。解放后,格达活佛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①。他积极维护统一祖国的大业,坚决反对西藏分裂活动。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离开甘孜前往西藏。24日到达昌都,被西藏地方当局所阻。8月21日遭反动分子迫害致死。格达活佛遇难后,中央许多部门和领导人致电吊唁,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省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党报陆续创刊,人民广播电台开播

1949年在进军途中,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即要求各部,解放后要使人民群众尽快看到报纸,听到广播。

194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这是解放后西南地区最早出版的党报。《川西日报》、《川南日报》于1950年1月1日同时创刊,《川北日报》于当年3月22日创刊,《西康日报》于同年8月1日创刊。1950年四川出版发行的报纸共20种,其中13种均是各地中共机关报及中共直接领导下的报纸。

与此同时,重庆市军管会接管修复国民党政权撤退时炸毁的国际广播电台,于1950年元旦开始以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成都市军管会

接管原交通部成都广播电台、华西广播电台及两座国民党军中广播电台,1950年1月5日开始以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于1950年5月1日开始播音。其他省、区陆续创建人民广播电台,旧电台均停止播音。

整顿、改造教育事业

1949年底,全川境内有高等学校36所,其中公立学校12所,私立学校24所;中等学校(含中专)581所,小学2.4万余所。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共151.5万人。解放后,各地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保护学校的通告》,本着“维持现状,继续开学”、“宁慢勿乱,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各级各类学校予以接办、接收和改造。首先接办了所有的公立学校,组织临时校务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查封了少数政治情况复杂,社会印象恶劣的私立学校;接收一批教会学校,其余学校则准予重新备案。政府还对经费拮据、办学困难的学校给予扶持。同时,在学校建立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由人民政府任命学校的负责人,调派一批干部到学校工作,保护校产,组织复课,稳定秩序。废除反动的训导制,停止设置“公民”、“国民党义”等课程,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开展时事政策教

^① 1950年10月任命,时人民解放军未抵昌都。1951年1月,解放昌都后始知其已遇害。

育,清除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此外,还动员大批学校师生参加征粮、减租退押等中心工作,接受实际斗争锻炼。

1950年下半年,对公私立高等学校进行了初步改造与调整。先后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成立西南师范学院;将原自贡工业专科学校与泸县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成立川南工业专科学校;将原省立教育学院、华西协和大学及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农学系合并,成立西南农学院;将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私立南林学院、白屋文学院及辅成学院合并,改建为川东教育学院;以原西北艺术学院为基础,成立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将私立川北大学与私立川北文学院合并建为公立川北大学。对办学条件较好,设有国家急需的财经专业的私立成华大学及相辉学院、重华学院、中国公学大学部、求精商学院、辅成学院、正阳学院、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等,由西南文教部补助经费,设立人民助学金。

由于各种原因自动申请停办的私立高等学校有:勉仁文学院、群治学院、中华戏剧专科学校、新中国艺术专科学校等;私立汉藏教理学院、私立东方文教学院改按宗教团体对待;私立长江文理学院、大川学院等政治情况复杂,由当地军管会查封。

高等学校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有所提高。

成立文艺团体,开展文化活动

1949年12月1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分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950年1月,重庆、成都军管会分别召开文艺界座谈会、音乐界座谈会,接着成立重庆市文联筹委会、成都文艺协会、音乐协会筹委会。两市还分别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7月2日,川北区文联筹委会成立,美协、音协、剧协、曲艺界协会等筹委会也相继成立。万县市、自贡市也先后成立文联筹委会。

各地文艺团体成立后,积极开展文艺活动。各主要城市都举办了老解放区书刊展览、美术作品展览,组织文工团、队广泛演出了解放区著名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话剧《思想问题》、《红旗歌》及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同时,组织文艺工作者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创作和宣传活动。成都出版了《说唱报》、重庆出版了《说古唱今》等通俗文艺刊物,以金钱板、鼓词、剧本、诗歌、特写等形式,发表了大量讴歌新社会,鞭挞旧社会的作品。各文艺团体还组织文艺工作者开展学习,深入生活,参加中心工作,以改造思想,进行创作。

民生公司等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

1950年8月,国家交通部同民生公司签订《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

议书》。

民生实业公司是旧中国航运业中最大的私营企业,拥有轮船 96 艘,总 72000 吨位;铁驳 42 艘,总 21287 吨位,其资产除相当大一部分为官僚资本外,其余为分散的私股。1950 年 4 月 2 日,以卢作孚为首的公司领导班子,派代表何迺仁赴京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实行公私合营的恳切愿望。同年 6 月,卢作孚又赴京向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再次提出这一要求。经过多次协商,8 月 10 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同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由国家没收民生公司资产中的官僚资本股金,参与公司管理。同年 9 月 18 日,以于眉、何郝炬、张平之为首的 7 名公股代表参加民生公司董事会。经过清产核资,国家又新增投资,公股占 57.07%,私股占 14.32%,其他股占 28.61%。合营后,职工生产热情高涨,经营状况迅速好转,公司充满生机。1952 年 9 月 1 日,交通部正式批准民生公司合营,更名为民生轮船公司。

与此同时,其他由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合营的企业,在国家没收其官僚资本的股份为国有后,实行承认并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将其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自贡市的制盐业在解放初期困难重重,产品大量积压,为扶持生产,国家对主要原料实行统管统配,对原盐实

行统购包销,在此情况下,至 1950 年底到 1951 年初,也开始出现了公私合营制盐企业。

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

1950 年 4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进行全市工商业总登记。登记表明,全市工商户共有 24189 户,其中公营工业 48 户,私营工业 6958 户;公营商业和公私合营商业共 60 户,私营商业 17123 户。私营工业平均每户只有资金 0.42 万元。川西行署同时进行了工商业登记,全区有私营工商户 87100 余户。私营工商业户数虽然很多,但规模很小,此时面临重重困难,经营萧条。为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贯彻保护与发展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政府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经销代销,以解决它们在原料、资金、销售方面的困难。截至 5 月底,重庆市各国营公司即通过收购产品,向私营厂商投放资金 1284 万元(新币,下同)。其中花纱布公司收购棉纱、布匹投放现金 210 万元,解决了私营纺织业销路疲滞及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百货公司向私营厂商投放现金 164 万元,收购了新亚热水瓶厂的全部存货及永新肥皂厂 1000 余箱肥皂,使两家已停产的工厂重新恢复生产。人民银行还向私营工商户发放近 400 万元贷款。至年底,重

庆市通过加工、订货、采购，共向私营厂商投放资金 7128.9 万元，受到扶持的行业有 54 个。成都市私营申新、裕华等纱厂原料短缺难于开工，政府便与它们签订原棉交换纱布的合同，组织力量从陕西等地采购原棉供应，并收购它们的全部产品，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自贡盐场解放时原盐壅积场区，存盐达 7.2 万多吨，造成生产窒息。政府对原盐实行统购包销，并对盐运实行武装护送，使盐厂迅速恢复生产，至年底存盐全部销完。成渝铁路动工修建以后，加工订货任务迅速大量增加，重庆市 400 多家私营钢铁、机器厂全部恢复生产，1000 户以上铁工作坊得到加工订货，并带动了川北、川南、川东的许多行业。在商业方面，自 6 月份起，各地进行了调整，规定国营零售商业一般只经营粮食、煤炭、纱布、食油、食盐、石油等 6 种人民生活必需品，让出其他商品由私营商业经营，并适当扩大零批差价、地区差价，使生产者、贩运者、零售商有利可得。通过这些措施，到 1950 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大部分行业均得到恢复或有所发展。

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及经销代销，不但带动了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而且把它们逐渐引入了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

丁佑君光荣牺牲

1950 年 9 月，丁佑君光荣牺牲。丁佑君，原籍四川五通桥市人，1950 年 1 月参加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为共青团员，1950 年秋被派到西昌县盐中区任青年干事，18 日在裕隆乡征粮时，不幸落入暴乱土匪手中。土匪对她严刑拷打，百般凌辱，逼她说出盐中区存粮及武器装备情况，被她严辞拒绝。9 月 19 日，土匪围攻区公所，又逼她前往喊话投降。她高声呼叫，要同志们坚持斗争，终被土匪杀害，时年仅 19 岁。丁佑君牺牲后，被中共西昌县委追认为中共党员，朱德委员长亲笔题词，号召全国青年向党和人民的好女儿、共青团员的好榜样丁佑君学习。各地青年掀起了学习丁佑君的活动。事后，西昌地区在盐中区建立了丁佑君烈士纪念馆。

救济失业工人

1950 年 6 月 27 日，重庆市根据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接着，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行署区及西康省也先后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据统计，重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西康共有失业工人约 14 万人。

各地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对失业工人进行了普遍登记，以吸收失业工人参加修建成渝铁路、市政建设、公路

建设,鼓励还乡务农等途径解决生计问题;对生活有困难者给予救济,先后拨发救济粮 5000 余吨;并举办失业工人职业技术训练班,培训后安置工作。同时,各地对工商业进行了初步调整,对私营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发放贷款,使它们逐步恢复生产,从而使部分失业工人重新恢复工作。到年底,失业工人基本上解决了就业问题,加上解决的半失业工人,先后共安排了 22 万余人就业。

改造旧军队工作基本结束

1950 年 9 月底,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基本结束。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时,麇集于西南地区的 90 万军队大部分在四川。在四川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计有 7 个兵团、41 个军部和 113 个师部。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对起义、投诚部队实行“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的方针,指定地点进行集训,在教育改造的基础上分别情况进行整编,做到使之各得其所,不散游四方,以利于社会稳定。对起义较早的地方部队(如刘文辉部等)在政治上及其他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其部队按实有人数进行整编,不打乱其合组人员,解放军只派党政干部和指挥员参与领导和指挥。对国民党嫡系部队,则分散编入解放军各部。对游杂、土顽武装,将其武器全部集中,军官调出,士兵集中学

习后,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愿意回乡者发给遣散费,并给予适当安置。解放后,已经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先后有 27 个单位发生反叛,参加者 3 万余人,杀害军政人员 100 余人。对这些叛乱旧军队在坚决歼灭后,对首恶分子给予了严厉打击,其余人员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此外,各军管会还采取措施收容、改造散兵游勇。重庆市在解放后近两个月内,即收容国民党将校级军官 217 名,尉级军官及其家属 9000 余名,收缴各种枪支 7900 余支及大量弹药、一些电台。成都市收容散兵游勇 5700 余人,收缴枪支 2600 余支。到 1950 年 9 月底,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基本结束。

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在川发起

1950 年 11 月 30 日,广元县城天主堂神父王良佐及教徒 20 余人发起天主教革新运动,发表宣言,要“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宣言得到 500 余名天主教徒的签名。12 月,《川北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这份宣言,《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得到全国天主教徒的热烈响应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北京、绥远、南昌、武汉及重庆、成都、南充、夹江、岳池、遂宁等地天主教会纷纷响应,四川境内有数万名天

主教徒在宣言上签字。1951年7月2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对天主教革新运动作了肯定,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认真贯彻宗教政策,给予积极支持。不少地方群众纷纷举行揭露帝国主义的控诉大会,要求驱逐控制教会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取缔境内圣母军的反动活动。1957年12月,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成立,王良佐当选为主席。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

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先建立的州一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四川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即决定,把西康省藏族地区作为在西南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

西康解放以后,中共西康区委负责人即在雅安约见了藏族著名宗教界人士阿旺嘉措、日库等,征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见。康定军管会及中共康定地委在康区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及各界代表进行磋商,并随即组成了藏区民族协商筹备委员会,进一步就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地位、性质、名称、区划、人选及首府设置等问题进行充分协商。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刘格平为首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进行指导。经过充分准备,11月17~24日,全区首届各族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康定召开,宣告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成立,选举产生了自治区人民政府,以桑吉悦希(藏)为主席,夏克刀登(藏)、苗逢澍、阿旺嘉措(藏)、洛桑顿巴(藏)为副主席。政府委员33人中,藏族占73%,彝、回族占6%。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成立,对友邻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积累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其后,该区更名为甘孜藏族自治州。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1月初~12月中旬,川南、川东、川北、川西各区、重庆市及西康省相继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各级分会,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及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威胁我国安全。

1949年底~1954年,川、康两省进行大规模志愿兵征集工作,主要补充入朝作战部队。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四川省共扩军(征集)632970名。其中,1949年底~1951年,四个行署区扩军303409名(川东行署58830名;川南行署133123名;川西行署71456名;川北行署40000名);1952~1953年,扩军204510名;1954年扩军125051名。扩军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主题,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生产支前教育,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各地出现“参军热”。川西行

署 1951 年扩军任务 41300 名,报名人
数超过扩军数四五倍,其中,什邡县报
名参军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 2.1%。
1953 年,全省扩军任务 104000 名,出
现父母送子参军 88463 名,妻送夫参

军 43790 名,兄弟争先参军 68041 名。
不少专、县超额完成扩军任务。在入朝
作战部队中的川籍英烈人物为数众
多。

1951 年

府。

接管华西协合大学等文教机构

1 月 13 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对华西协合大学、仁济护士学校、华西边疆研究所、求精商学院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实行军事接管。军管会派员对以上机构进行管理,接受了所属资产。3 月,根据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对外国教会津贴的学校均进行了接管。3 月,华西协合大学改为华西大学,为公立学校;10 月,求精商学院改为西南贸易专科学校。至 1953 年,所有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均改为公立。

成渝两市选举产生人民政府

1 月 20~24 日,重庆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共 33 人,曹荻秋任市长,罗士高、胡子昂任副市长。这是四川境内第一次通过选举产生人民政

同年 9 月 20 日,成都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李宗林任市长,米建书、李勘人任副市长。

土地改革

2 月份起,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川普遍展开。1 月 21 日,川北区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2 月中旬,川南区、川西区土改委员会成立;3 月 14 日,川东区土改委员会成立;6 月 14 日,西康省土改委员会成立。

早在 1950 年 11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就同中共川东区委联合组织工作队,在长寿县渡舟乡进行土地改革试点。接着,川西区在大邑县三岔、唐场、安仁等乡及安县的何家乡试点,川南区在隆昌的三龙、新华等乡试点,重庆市在郊区观音桥乡进行试点。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各行署区及省、市分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

表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部署开展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分三期进行,每期的步骤是:宣传土地改革法及政策,划定农村阶级成份;整顿基层农会组织;深入发动贫雇农,开展调查,查实土地面积和质量,开展反对地主违反活动的斗争;没收、征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分配土地并颁发土地证;总结工作,部署生产,建立健全乡、村政权机构。

按照土地改革法,四川的土地改革进程同老解放区有所不同。除没收地主占有的土地外,执行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加以保护,不受侵犯;同时保护工商业,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在内;对小土地出租者也给以适当照顾。土地改革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只在汉族地区进行。在民族杂居地区,对出租土地给汉族农民的少数民族地主或土司、头人,实行不分不斗的政策;少数民族农民租种汉族地主土地的,则同汉族农民一道参加分配,享受同样的经济果实。

各地注意组织广泛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川西区在2月份组织首批各界民主人士到农村参观土地改革,取得很好效果,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并向全国介绍推广。川北区分三批

组织了6千余名各界人士参观或参加土地改革,形成强大的改革氛围。在此影响下,北京、天津等地也多次组织民主人士到川参观土地改革。

到1951年秋末,各地相继完成两期土地改革。计有川东区20个县(其中15个整县)、11个市、共767个乡,川南区30个县(其中5个整县)、3个市、共1150个乡,川西区32个县(无完整县)、1个市、共191个乡,川北区20个县(其中19个整县)、1个市、共1205个乡,重庆市77个乡,西康省11个县、共187个乡,均占应完成土改地区的大部分。

建立合作经济组织

2月1日,中共川南区委发出《关于建立合作社工作的指示》,要求根据西南区合作会议的精神,建立机构,培养干部,重点试办,稳步前进,并选定工矿企业较多的泸州、宜宾、自贡、乐山等市试办城市消费合作社,经济作物较多的内江、简阳等县试办农村供销合作社。

接着,其他行署区、重庆市、西康省分别发出同类指示,各行政公署及省、市政府成立合作事业指导处,重点县、市成立合作社联合会筹委会,分别建立城市消费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及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特种合作社5类合作经济组织。国营经济对合作社分别商品种类实行2%~

6%的折扣优惠，银行对合作经济实行优惠贷款。随着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有所上升。重庆市 1952 年合作经济在公私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0.04% 上升到 1.09%。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

3月13日，重庆市发布紧急戒严令，逮捕 4298 名抗拒自首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缴获隐匿的大量枪支弹药及反动文件。同月 27 日，成都市也实施大逮捕，捕获反革命分子 1232 名。这次大逮捕，是贯彻中共中央 1950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而采取的行动，事先经过周密的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

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是打击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运动采取大张旗鼓的方式进行。4月 4 日，重庆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扩大会议，由市长曹荻秋、公安局长刘明辉作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同时在全市实况广播，收听广播的市民达 30 万人。川北区各县成立“处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全区有 700 余名各阶层代表参加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实行了有各界人民代表、民主人士参加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许多地方都举办了公安展览，展出反革命破坏罪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

在“镇反”运动中，同时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在政策上将首恶分子与一般道徒区别开来。四川解放前夕，北京等地一贯道头子纷纷来川活动，仅以成都和川西为活动中心的一贯道支系就有 43 支。他们与特务组织合流，假借《谕文》、《碑文》等道书制造谣言，诋毁诬蔑人民解放事业，放火、放毒、组织或参与暴乱。成都市至 4 月份逮捕反动道首 303 人，至 7 月份，有 2.5 万余名道徒声明退道，登记自首的道首有 1100 余人。重庆市先后登记自首的反动会道门坛主以上头目有 3 千余名。

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至 10 月份告一段落。以后主要是在社会上缉拿漏网分子；在机关开展忠诚老实坦白运动，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至 1953 年上半年，各行署区及重庆市共清查出匪首 10 万余名，反动会道门头子 3 万余名。西康省共清查出各种反革命分子 2.1 万余名。

在“镇反”运动中，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首恶分子被处以死刑。其中有 1927 年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三·三一”惨案主犯王兰揖，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书记长、“较场口事件”指挥者吴人初，“较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的凶手、特务谢雨樵，杀害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王子民，“中美合作所血案”凶手刘志钦、徐贵

林,成都“十二桥血案”凶手、中统特务杨沛熊,策动起义部队302师叛变、杀害解放军代表的特务裴元俊等。

平定懋靖匪乱

3月21日和6月16日,人民解放军第三次解放懋功(今小金县),第二次解放靖化(今金川县),平定了懋靖一带匪乱。

1949年冬,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副军长傅秉勋,原四川省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何本初,“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王旭夫及特务刘野樵等,率领匪众窜入懋靖一带作乱。1950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懋靖各族人民及民族上层人士积极协助下,先后解放懋功、靖化。1950年冬~1951年1月,匪特利用解放军主力后撤,乘严冬运输困难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再度劫占懋功、靖化县城。解放军发动反击,于1月29日第二次解放懋功,但终因缺乏后援,匪情严重,被迫西撤至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丹巴县。2月,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成立懋靖前线指挥部,向股匪发动进剿。3月21日再次解放懋功县城,旋即全线出击,歼灭匪众3000余人,击毙匪首刘野樵;6月16日再度解放靖化县城,平定了这一带匪乱。

懋靖匪乱平定后,匪头目周迅予、傅秉勋等率残部窜入黑水地区继续作乱。

开展城市民主改革

4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开展城市民主改革工作。城市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清理混在厂矿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发动和依靠工人,实行管理的民主化和生产的合理化。

民主改革首先在重庆市码头行业起步,然后选择天府煤矿、威远煤矿、二十、二十九兵工厂、大溪沟电站、豫丰纱厂等重点企业进行试点。成都市在10月份成立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工厂、分散行业、建筑和搬运等3个工作委员会,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厂矿企业发动工人群众。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后,全川城市普遍开展民主改革。

在民主改革中,重庆市清理出国民党特务、封建把头2093名,其中搬运行业中就有1190人。成都市通过民主改革摧毁了建筑行业中的封建帮会制度,清理出封建把头和反革命分子211人,逮捕首恶分子22人。全川54个市、县搬运行业中,共斗争处理封建把头3004人,其中77名罪大恶极者被判处死刑,206名被判处徒刑。

通过民主改革,重庆市提拔了工人和一般职员1645人到生产领导岗位,先后建立23个产业工会、6个区

工会办事处及 1200 多个工会基层组织,发展工会会员 19.8 万余人,在私营企业,工会同资方签订了劳资集体合同。所有完成民主改革的企业和行业,都建立了新的民主管理制度,有 681 个企业参加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仅重庆市职工就提出了 4.7 万多项合理化建议。

收容、改造妓女及游民

5 月,成都市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查封妓院、收容改造妓女的决议。

旧成都社会风气腐败,妓女众多。解放后,大部分妓院被迫关闭,不少妓女结婚安家或回乡生产,因未系统改造,仍有少数妓院继续开业,社会上还有一些明娼暗妓。按照市各代会的决议,至 8 月份,全市查封了尚在营业的 40 家妓院,收容明娼、流娼、游娼 338 人,对妓院老板分别情况进行处理。同时,收容了流散于社会的无业游民,成立了劳动教养院,分别由民政、公安、卫生、妇联等部门共同负责,对有性病及其他疾病者免费给予治疗,无文化者组织识字班学习文化,并帮助其学习劳动技能,然后分别情况给予安置。

重庆市及其他城市也采取了类似办法。至 1952 年,全川共收容妓女及游民 11.5 万余人,经过改造基本都获得了正当职业。

结束学校教育混乱现象

6 月 15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指出学校中的一切工作,“均应以完成学校教学计划为基本任务”,指示:①学校内一切教育工作和行政工作均由学校行政当局统一领导;②所有在校学生,任何单位不得任意调动;③立即停止校外各种机关、人民团体各自在学校内单独布置带全面性的工作,随意动员学生参加校外活动,以致形成多头领导,妨碍教育工作的混乱现象;并规定除国家规定假日外,任何学校不得任意停课放假。同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指示《新华日报》对扰乱学校教育工作的错误作法公开进行批评。经过各地努力贯彻,学校教育的混乱现象逐步得到解决,学校教育逐步走上正轨。

西南民族学院成立

6 月 1 日,西南民族学院成立,以王维舟为院长。这是西南地区第一个民族教育的高等学校。在此前后,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成立民族干部学校和各种民族干部培训班,以多种方式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掀起抗美援朝捐献热潮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

炮,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后,全川各地积极响应,纷纷捐献,不少群众拿出多年积蓄的财物捐献。至9月份,计川北区捐献719万余元,川南区捐献796万元,川西区捐献564万元,川东区捐献561万元,重庆市捐献560万元,西康省捐献69万余元,还向志愿军发出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

同时,各地掀起爱国劳动竞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扩大招收工农子女入学

7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发出《关于本年度招收工农子女入学的通知》,要求各地扩大招收工农子女入学。规定在大城市中,高中工农子女应占15%,初中应占30%,其他地区高中应占20%,初中应占50%;在年龄和文化程度方面略微放宽,实行优先录取的方针;并决定推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减免工农子女的学杂费;对成绩差者尽量予以补习和指导。其他区、市、省也发出了类似通知。9月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西南地区高等学校1951年暑期招收工农干部办法》,要求各地选送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深造。在此前后,重庆办起了西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四川大学成立了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各地也纷纷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技术进修班等。川北区先后举办职业业余学校(包括城市居民学校)1056所(期),

有15.9万余人参加学习;参加农民业余学校学习的有230余万人;还办起干部业余学校20处,有2000人参加学习。人民解放军各部也配备了文化教员,掀起“向文化进军”的热潮。至1952年,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大为增加,与1949年比较,高等学校增加70%,中等学校增加2.7倍,小学增加2.4倍。学生中工农干部、子女增加比例较大。

利用天然气生产炭黑成功

7月,由重庆工业试验所设计,西南工业部303厂负责设备制造及安装的隆昌炭黑厂建成投产,在国内首次利用天然气生产炭黑成功。

解放军藏、彝民武装成立

1951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军区藏民团隆重举行建团大会,这支武装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成立的。1950年9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在给中共康定地委的指示中指出:“在军事上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创造一个由我党干部及先进分子掌握的藏族武装是必要的,这个武装属于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吸收藏族中的优秀青年参加,其待遇与解放军同。”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指示:组织藏民武装,其任务为战斗队、生产队,又是培养干部的学校,此事同民族上层及各界人士协商,同意则办,不同意缓

办。中共康定地委及康定军分区就此事同民族协商委员会筹委会和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多次协商，取得各界人士赞同后，派出 160 余名干部到康定、丹巴、雅江、乾宁、道孚、炉霍、甘孜等县扩军组建，任命沙纳（藏）为团长，曾却扎（藏）为副参谋长。

之后，仿照这一办法，在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了彝民团，在四川省藏族自治州成立了藏民团，在乐山专区成立了彝民营。“三团一营”的主要首长均由各该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它们在保卫民主改革，从事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地方输送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

批判“退坡”思想，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

11月上旬，《新华日报》、《川北日报》相继组织专栏文章及社论，讨论“鄧斯云退坡换班思想”，《川南日报》采取同样方法，组织讨论“周乐祥歇气换班”思想，《西康日报》组织讨论“汤荣昌退坡思想”。鄧斯云是南充县斑竹乡乡长，周乐祥是隆昌县迎祥乡村长，汤荣昌是汉源县乡干部，都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土改后存在满足于小农经济现状、停滞不前的“退坡思想”，在相当一部分农民认为“土改到了头”的思想中具有代表性。讨论持续约 3 个月，各报分别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参加讨论的有农民、乡村干部及部分行署、

专区的领导人，许多乡村都层层组织了讨论会。这次讨论实际是对农民群众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是为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所进行的思想准备。

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

年内，在成渝铁路资阳车站以西约 1.5 公里的黄鳝溪桥梁工程中，于地下 8 米的黑泥层内，发现女性人头骨化石 1 件、脊椎 1 件和大量共存的动物化石群。这是在四川首次发现人类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据研究，“资阳人”的生存时代距今约 3 万年，已具有新人（晚期智人）的特征，属新人化石阶段。“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对研究今四川地区古人类活动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开展“三反”运动

12月上旬，中共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区委及行政公署，中共重庆市委及市人民政府，中共西康区委及省人民政府，分别成立爱国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党政机关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12月 15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对“三反”运动提出了要求和规定。各行署区及省、市分别召开协商委员会与行署（政府）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对“三反”运动进行具体部署。

自12月上旬展开至次年1月,为学习、动员阶段,1952年1月中旬至2月,由领导带头,个人作自我检查,开展自上而下的调查,然后召开斗争大会、公审大会,处理大案要案,4月以后转入追赃结案,进入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7月结束。重庆市在运动中召开公审大会,将贪污巨款的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采购股长张云书及另3名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判处死刑,起到很大震慑作用。

“三反”运动初期曾出现一些过火行为。运动后期,按照中央关于“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当严者严之,当宽者宽之”的精神及有关规定,强调遵守法定手续,进行了纠正。

私营工商业出现初步繁荣

1951年底,全川私营工商业恢复元气,出现了初步繁荣景象。

解放前夕,四川私营工商业普遍

处境艰难,多数濒临倒闭。解放后,人民政府向私营工商业户有计划发放贷款,并通过委托加工、统购包销、代购代销等形式加以扶持。重庆市在解放后半年内通过银行发放贷款474万元,除极少数是贷给合作经济外,90%以上都贷给了私营工商业户。川西区1950年和1951年两年共向私营工商业户发放贷款1825万元,其中贷给私营商业、运输业1365万元,贷给私营工业、手工业460万元。重庆市通过委托加工、订货、采购等形式,仅1950年就向私营工商业户投放资金7128.9万元,受到扶持的行业有54个。经过两年的恢复与发展,1951年全川私营工业总产值达到28223万元,比1950年增长21%;私营商业总营业额达到123928万元,比1950年增长27%。川西区至1951年底共有私营商户15万户(绝大多数为个体商户),较上年增加4万多户。

1952年

开展“五反”运动

2月,重庆、成都、雅安、北碚、泸州、南充、自贡、万县、内江、宜宾等10市和乐山、隆昌、涪陵、江津、温江、绵阳、眉山、灌县、遂宁、康定、西昌等11

县开展了针对违法资本家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至5月,又有一批城镇开展“五反”运动,计有川东区11个、川南区9个、川西区12个、川

北区 4 个、西康省 4 个,连同 2 月份开展运动的 21 个市县,全川开展“五反”的城镇共 61 个。

“五反”运动大体经历了揭发检举和坦白交待、定案处理两个阶段。运动开展后,各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店员揭发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同时勒令不法资本家坦白交待,并派出检查组到私营工厂、商店进行检查。在定案处理阶段,为严格执行政策和区别对待,各地将工商户划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5 类,分别情况对待和进行处理。运动至 6 月份大体结束。

重庆市参加“五反”运动的 37115 户私营工商户中,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占 98% 以上,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共占 1.77%。成都市 31609 户私营工商户中,前 3 类占 97.7%,后两类共占 2.3%。

经过“五反”运动,打击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在国家和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私营工商业中,建立了工人店员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制度,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调整工商业政策

自 2 月下旬“五反”运动开始后,部分私营工商业者产生畏惧,消极经营,市场活动明显停滞,贸易额缩小,

税收下降,失业率有所提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3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根据这些精神,在“五反”运动中和“五反”运动后,各地采取措施调整工商业政策。首先,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调整上缴利润,降低银行贷款利息,扩大贷款数额,重点县、市建立了加工订货委员会,加强对加工订货的管理。接着,调整了商业政策,放宽零批差价,调整批发起点,将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零售业务限制在 25% 以内,增加对私营商业的贷款,并对公私商业的经营品种、经营范围加以调整,为私营商业让出地盘。各私营工厂、商店普遍订立了劳资合同,稳定了一度动荡的劳资关系。在“五反”运动后期,还对资本家违法所得的退款补税工作进行了从宽核减,允许有困难者从缓退补。重庆市当年向私营工商户加工订货投款 3200 多万元,发放贷款 3000 多万元,签订劳资合同的厂店达 1800 多户。各地对私营商业的贷款额共达 4616 万元。

市场由此迅速活跃,当年私营工业产值、加工订货额都较上年有大幅度增加,私营商业盈余额占其资本总额的 12%,私营工商业再度出现繁荣。

更改民族歧视性县名

1951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西康省人民政府征求当地藏族人民意见并报请批准更改巴安等4县县名。1952年5月9日,获政务院批复,将巴安县改为“巴塘县”,瞻化县改为“新龙县”,裹化县改为“理塘县”,定乡县改为“乡城县”。1953年后,四川省人民政府报经政务院批准,将靖化县改为“大金县”、懋功县改为“小金县”。其他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也相应作了更改。

教师思想改造

6月,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在各地逐步展开。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首先于当月开始试点,由中共川西区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宣传部长杜心源直接指导。在此之前,1951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曾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部署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强调教师思想改造是改革旧教育的关键;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改造的唯一正确途径。1952年9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大、中学教师的思想改造由省委直接掌握。当年10月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成都分校集中了全省部分大、中学教师进行思

想改造,小学则由各中共地委分别掌握,集中进行,并于当年12月召开了四川省首届小学教师代表会议,以指导这一工作。西康省于暑假期间在雅安、西昌两地集中了全省中小学教师进行思想改造。教师思想改造于1953年春季结束,全部大、中学教师及13万余名小学教师参加了学习,并结合学习进行了组织清理。

成渝铁路通车,天成铁路动工

7月1日,成都市30万人集会北门火车站,隆重举行成渝铁路通车典礼。

成渝铁路全长505.06公里,需完成土石方4200余万立方米,有隧道43座,延长6445米,大、中桥梁84座,延长5094米,此外还有小桥梁及涵渠1548座和其他附属设施。在全川人民积极支援下,几万军工和民工艰苦奋斗,筑路进度迅速。

成渝铁路所需建筑材料全部均是国产,而且做到尽量就地取材。铁路需要钢轨5.6万余吨,当时整个西南只有重庆101厂(重庆钢铁厂)有一台闲置10余年的老轧机能够轧制。该厂职工连夜清理、擦洗、安装机器,很快试车成功,终于全部完成任务。铁路全线需枕木125万根,广大群众纷纷踊跃献料售料,有的群众甚至将保存多年的寿木也献售出来,最后实收合格枕木146万根。当时尚无筑路机械,人们

便土法制造工具,开展创造发明,使工效成倍提高,涌现了许多劳动模范。

成渝铁路的通车,带动了四川经济的发展。当年即完成客运量 179.8 万人次,货运量 62.5 万吨。通车后,内江的主要百货价格下调 15%~20%,成都的煤价下调 30%。成渝铁路的修建,为四川的经济建设揭开了序幕。

7月2日,在成都火车北站举行了天成铁路开工典礼。天成铁路在施工中,因部分改线,后改称为宝成铁路。这是四川连通省外的第一条铁路。

大溪沟电厂工程竣工

7月1日,重庆大溪沟电厂扩建工程竣工,第二台 5000 千瓦机组投产发电。该厂扩建工程是从 1950 年开始的,第一台 5000 千瓦机组于 1951 年 8 月投产,全厂总装机容量 1.45 万千瓦,是当时四川境内最大的发电厂,对解决重庆市的供电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举办各级物资交流会

7月21日~8月5日,在重庆举办了西南区第一次物资交流会,有 1600 多个商户参加,其中 60% 以上是私商代表,成交总额达 11332 万元。重庆市工商联主任胡子昂说:“在西南区半月内做成这样大的交易,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土地改革陆续完成以后,农民主

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农副产品上市量显著增加。为了迎接秋冬旺季市场,活跃城乡经济,各地配合调整工商业政策,自上而下地由城市到乡镇,层层举办以国营公司为主体、有供销社、私营商户参加的各级物资交流会(乡镇交流会农民直接参加)。9月份以前,川东、川南、川西、川北 4 区共举办物资交流会 186 次,成交总金额 11962 万元,其中现款现货 2833 万元,期款期货 9129 万元。9 月以后,以举办县、乡、镇交流会、进行现款现货交易为主,至 12 月,全省又举办 689 次,在总成交额 5042 万元中,95.4% 是现款现货交易。举办各种类型物资交流会,对活跃城乡经济,鼓励私商经营,推动工业品下乡,开展农副产品城乡贩运,促进生产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全川禁绝鸦片烟毒

8月,全川各地再次开展大规模禁毒活动,给予制毒、贩毒者以沉重打击。

解放后,经过一系列工作,全川大部分地区鸦片烟毒已基本禁绝。但由于鸦片烟毒遗害甚深,仍有少数违法分子继续制毒、贩毒。他们转入地下,活动隐蔽,毒资雄厚,且多数人以一固定职业为掩护。据重庆市调查,南岸区以何治荣为首的贩毒集团,至 1952 年已制造砒子数千两。福民面粉厂经理

李茂初贩毒集团拥有毒资 100 万元（新币）。

自 6 月份起，各地层层成立禁烟办公室。8 月 11 日，全川 6 个省、市、区出动 1.5 万余公安干警，统一开始行动，首先在重点地区大举破案，然后全面展开。至 11 月，全川共逮捕各类毒犯 19748 名，其中大犯、主犯、惯犯、现行犯占 96%。搜捕行动后，各地组织力量，及时审结案件，召开公审大会，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活动。广大群众向政府递交检举揭发材料 20 余万件，揭发出毒犯 2.7 万余名，使 8.3 万余名毒犯向政府坦白登记，具结悔过，保证不再重犯。各地共收缴毒品 63 万余两、毒具 14 万件及大批毒资、176 支长短枪。

此后，各地又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禁毒和收缴农村存毒的工作，终使长期危害的鸦片烟毒在全川禁绝。

恢复四川省建制

8 月 7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决定恢复四川省建制，并在该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撤销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井泉为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大章、阎红彦、钟体乾、余际唐为副主席。接着，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157 次会议通过，任命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共 61 人。1953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又增任李筱亭为四

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四川省人民政府于 9 月 1 日正式成立，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行署即日停止行使职权。四川省人民政府辖 2 市、16 专区、135 县、7 个县级市、11 个区共 5821 万人。

同月 12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发出指示，中共四川省委已经组成，经中共中央决定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赵林、阎红彦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

开展司法改革

9 月下旬，四川省人民政府第三次行政会议决定组成以阎红彦为主任委员的司法改革委员会，随即制订计划，在全省司法系统开展了以反对、批判旧司法观点和改造、整顿司法机关为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10 月 6~13 日，举行全省司法改革工作会议，到会的司法部门领导干部开展了自我批评，检讨旧司法观点的影响。接着，各地集中司法系统干部进行学习，反对、批判旧司法观点，结合清理积案，公开改判了一批错案，并清除了司法系统队伍内的一批不合格分子。在同一期间，西康省、重庆市也开展了司法改革。至年底，司法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在此基础上，各级法院在基层普遍建立了区、乡人民调解组织，至次年上半年，全省已有 1400 多个调解委员会、10400 多名调解员。1954 年 7 月，正式

撤销各县(市)在土改、镇反中组织的临时人民法庭及其分庭。

司法改革对改进司法工作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采取搞运动的作法,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过火行为。

黑水剿匪取得胜利

9月,黑水剿匪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后国民党留在四川的最后一股武装力量终被剿灭。

懋靖匪乱平定以后,匪首傅秉勋等率残部窜入黑水一带继续作乱。台湾国民党当局十分重视这支武装力量,称之为“陆上台湾”,发给委任状及指示,先后10次组织空投,在黑水、草地投下一批派遣特务及电台、枪弹等物资。6月,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组成黑水前线指挥部,以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委郭林祥为总指挥兼政委。在松、理、茂等地藏族人民自卫武装队及群众的支援下,解放军从东西两线同时发起猛烈反击,7月24日,攻克匪特最后据点麻窝,继而乘胜追歼逃敌,于9月份结束战斗,共歼灭匪徒3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匪首傅秉勋于8月23日被当地藏民活捉,在押解途中乘隙投河自杀。北窜草地伪装潜伏的匪首周迅予、何本初、王旭夫等,于次年5月被华尔功臣烈等藏族上层人士交给人民政府。

全川汉族地区土地改革全部完成

9月,各行署区、省、市第三期土地改革相继结束。至此,除少数民族聚居区及个别山区边远乡外,全川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任务全部完成。

三期土地改革共在134个县、6786个乡进行,共没收征收土地5700余万亩,使数千万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和部分耕畜、农具、房屋等。川西区除茂县专区及8个边远乡外,共完成689个乡的土地改革,总计没收、征收土地767万亩(15亩=1公顷,以下均按此换算),没收地主的耕畜21000头、农具226万件、房屋212万间、多余粮食(合大米)1100万公斤。西康省在165.6万余人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占农民总数75%的无地少地农民每人平均分得土地1.33亩,加上农民自有土地,土改后人均占有土地1.94亩,18.8万户农民分得黄谷2486万公斤、耕畜1.23万头、农具12.7万余件、房屋1.28万余间。

土改后,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据川北潼南县典型调查,土改以前该县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的情况是:地主10.4亩,富农4.1亩,小土地出租者4.71亩,中农2.08亩,佃中农0.18亩,贫农0.53亩,雇农0.2亩。土改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的情况转变为:地主1.15亩,富农2.73亩,小土地出租者2.1亩,中农2.28

亩,佃中农1.8亩,贫农1.56亩,雇农2.6亩。

土地改革使农民分得了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

调整区乡,建立农村基层政权

至9月份,随着土地改革的分期完成,各地调整区乡区划、开展民主建政、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的工作相继结束,标志着旧保甲制度的彻底废除。

解放之初,农村仍沿用旧保甲制,由农会代行基层政权职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各行署及省、市人民政府均发布了《关于彻底废除保甲制度、改造乡村政权的指示》,改保为村,改甲为组;一般以12户左右为一组,以8~12个组为一村。同时,为了便于施政,普遍调小乡的区划,面积大体以乡人民政府所在地为基点,半径不超过15公里,人口在3000~5000人左右,最少不低于500人,最多不超过10000人。区当时作为派出政权,其区划也随着乡的划小作了相应调整。乡设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含乡长1人,副乡长1人,干事5~7人,村设正副村长,组设组长。全省(不含西康省及重庆市)调整后共有11373个乡、404个镇。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各地在当地土地改革完成后,先后召开了乡(镇)的农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选

举产生乡(镇)人民政府;召开村民大会或农民大会,民主选举村、组长。通过选举,大批土地改革中的农民积极分子担任了基层政权的领导职务。

水利建设进入全面规划阶段

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省水利厅召集原川西、川东、川南、川北4个行署水利局负责人及有关技术人员,经过多次研究,制订了全省水利工作计划。至此,四川农田水利事业由重点除害转为全面兴利,由整治原有工程转为兴修永久性工程,由局部恢复转为全面规划,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灌区。计划决定,在规划方面除大江大河查勘规划由西南水利部主管外,全省水利规划工作按地域分为9个大区进行,即:川西平原(今称成都平原)、名蒲邛高地区、青岷江间、岷沱长江间、涪沱长江间、涪凯江间、涪嘉江间、嘉渠江间、开梁垫地区;工程方面,由各县水利科负责中小渠堰堤塘工程,省水利厅负责大中型水利工程,包括都江堰闸坝改建、彭县关口水库、什邡高景关水库、绵竹清平水库、官渠堰、东山灌溉工程等及老根据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工作;勘测方面,决定组成8个测量队,集中勘测规划的大中型工程,并请求西南水利部派队协助。

这个计划得到全面实施,从而为“一五”期间农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

础。

高等学校首次院系调整

9月2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西南地区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会议，对高等学校全面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四川高校院系调整自10月份展开，到1953年基本结束。先后调整的有：在原川北大学的基础上，调入省内部分系科，成立四川师范学院（南充）；在原西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调入省内部分系科，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在原川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调入省内部分系科，成立四川化工学院（泸州）；在原乐山技艺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并入成都高级染织职业学校，成立四川纺织工业学校（内设专科部，成都）；将重庆大学的文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分别调入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和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将其工学院调入云南大学和北京铁道学院，将重庆大学由综合性大学改为多科性工科大学（重庆）；将华西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部分系科调入四川大学和四川财经学院，将华西大学由综合大学改为多科性医科大学（成都）；将四川大学的法学、教育系科调入四川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并调进重庆大学、华西大学部分系科，使四川大学成为保留的唯一一所综合性文理科大学（成都）；在西南革

大政法、政教系的基础上成立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在西南革大俄文系的基础上成立西南俄文专科学校（重庆）；撤销西南革大。接着，又撤销成都艺术专科学校、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将二校的音乐、美术系科在成、渝二地分别建立西南音乐专科学校、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将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改为西昌农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将四川纺织专科学校改为中等技术学校；将成都体育专科学校更名为西南体育学院；将华西大学更名为四川医学院；重庆土木建筑学院更名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这次调整涉及四川及云、贵、康一些高校，共调动人员1.3万余人，搬迁物资数百吨。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分别由中央业务部门、西南行政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领导，共有在校学生15176人。1954年，又成立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将四川大学工学院独立建校，将川南化工学院并入，定名为成都工学院。

冕宁发生强烈地震

9月30日，西康省冕宁县石龙一带发生6.7级地震，震中烈度9度，震源深度7000~9000米。冕宁全县8个区中有5个区遭破坏，加上邻近的喜德、西昌2县，共死亡236人，伤1076人，倒塌房屋4216间。普格、宁南、德昌、昭觉、石棉等县也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

西康省彝族自治区成立

10月7日,西康省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大、小凉山的彝族聚居区向无统一的政权。解放初期,大部分地区归西康省西昌专区管辖。1951年冬,中共西康区委和西康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共中央、政务院批准,决定将西昌专区所辖彝族聚居县和相邻彝汉杂居区的普格、喜德、普雄、美姑、金阳、布拖、昭觉等7县划出,筹建一个专区级的彝族自治区。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各地早在此以前就进行了准备。1951年1月,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直接帮助下,首先在西昌县彝族聚居的红毛玛姑区建立了第一个彝族民族自治政权(区级)。同年4月在昭觉、盐源两县建立县级自治政府和民族联合政府。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在与民族上层人士和各界代表充分协商后,于1952年9月25日召开了凉山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0月7日正式选举成立了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府委员36人中,彝族有27人,占75%,瓦渣木基(彝族)为主席,首府设于昭觉县。

1955年3月,西康省彝族自治区更名为西康省彝族自治州,同年11月更名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1978

年西昌地区撤销后,除米易、盐边两县,其余各县均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迁西昌市。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0月10日,四川省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12月,按中央人民政府指示,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此以前,各行署、重庆市及西康省均成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自1952年1月下旬起,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4个行署共培训卫生防疫人员34300多人,印发卫生传单、标语、宣传画等百万余份,发动群众层层订立了爱国防疫卫生公约。7至8月份,泸州市由市长金再光带头,动员全市职工、居民12万余人,清除长江、沱江沿岸积存上百年的垃圾7000余吨,疏浚臭水横溢的营沟头,使市区面貌焕然一新。成都市旧“皇城”后的“煤山”,累积垃圾达16万余吨,该市动员群众搬掉“煤山”,开辟为人民体育场。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各专、县、市、区、乡也陆续成立了爱卫会,以当地党政负责人为主任委员,有关部门负责人为委员,在卫生厅(局)内设办公室,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30人以上设分会,不足30人的设小组。1953年3月3日召开了全省爱国卫生模范大会,表彰了14个省级卫生模范单位和60名全省个人卫生模范。

自此,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形成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一批川剧剧本及演员获奖

10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结束,一批川剧剧本及演员获得殊荣:《柳荫记》获剧本奖,《秋江》、《评雪辩踪》、《五台会兄》获演出二等奖,演员贾培之、张德成、周慕莲获荣誉奖,陈书舫、周企何获演员一等奖,许倩云、刘成基、阳友鹤、曾荣华、袁玉堃、吴晓雷获演员二等奖;陈淡然、戴雪如、谢文新获演员三等奖。这是川剧首次推向首都北京,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此后,在调演节目中选摄了川剧舞台记录片《川剧集锦》,在各地广为上映。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起步

至10月份,全省农村已涌现53万个互助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开始起步。

自1951年秋土地改革陆续结束后,9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决议(草案),在党内传达,各地立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试点组建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到1952年10月,四川省(不包括西康省和重庆市)已有互助组53万个,大部分是由农民自发起来组建的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其中常年性互助组约

9万个,参加互助组的农业劳动力占农业总劳动力的30%左右。这些互助组不改变所有制,只是进行简单的生产协作,但对解决个体农民在劳力、农具、技术方面的困难很有补益,在农忙、抗灾中作用更大。据对分布在13个县的85个互助组的典型调查,当年临时性互助组比单干农民增产8%,常年性互助组又比临时互助组增产15%。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金堂县秀川村创建了邬纪发互助联组。该村以一个常年互助组为核心,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6个临时互助组,定期交流生产经验,在更大范围内调剂劳动力、畜力和农具,进行互助合作,很受农民欢迎。这是四川农民在互助合作中的创造,以后在全省发展到4万多个,并为省外一些农村所仿效。

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

1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不再是一级政权组织,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自即日起,四川省人民政府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重庆市仍为中央直辖市。

重庆电厂动工兴建

12月,重庆电厂动工兴建。

该厂为苏联援建 156 项之一,第一期工程安装 2×1.2 万千瓦机组,3 台 75 吨/时锅炉,由西南电力工程公司第一工程队、西南建筑公司七工程处等 40 多个单位参加建设,全国 80 多个厂矿支援会战。在 40 多名苏联专家现场指导下,职工先后提出 702 条合理化建议,制订了 48 种规章制度。经过一年多努力,1954 年 4 月和 7 月,两台机组相继发电,成为西南地区第一座具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火力发电厂。以后,重庆电厂又进行了多期扩建,到 60 年代末,装机容量达到 29.6 万千瓦,80 年代后期达到 69.6 万千瓦,为重庆地区工业、交通提供了重要能源。

省委提出发展互助合作五年计划

12 月 5 日,中共四川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制订了四川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五年发展计划,并于同月 19~28 日召开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研究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计划提出以 5 年时间,即从 1952 年到 1957 年,使全省农业劳动力基本上组织起来,其中参加常年互助的劳力要占组织起来总劳力的 70%。计划提出了试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规定所有试办的社都要由各中共地、县委亲自掌握,并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强调对建社工作要

持稳步慎重的态度。

省委的这个计划提出后,四川省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后来实际工作的发展突破了原订计划。

调整部分政区

12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撤销酉阳专署,其所辖各县划归涪陵专区;将剑阁专署更名为广元专署,从剑阁移驻广元;将隆昌专署更为泸州专署,从隆昌移驻泸州市。

次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撤销大竹、眉山、广元三个专署,其所辖各县分别划入邻近专区。

恢复国民经济取得显著成就

至 1952 年底,全川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有计划地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

1952 年,全川(包括四川省、西康省和重庆市)共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59.08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35.8%,3 年间平均年递增率为 10.73%。工业总产值较 1949 年增长 1.2 倍,年均递增 30%,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 16.8% 上升到 27.2%。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加。粮食总产量达到 164.3 亿公斤,较 1949 年增加 9.9%,年均递增 3.2%。钢产量达到 5 万吨,较 1949 年增加 4.4 倍,钢材产量增加近 15 倍。

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供销社的加工厂)和公私合营工业所占比重达到47.9%。在商业中,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占批发总额的60.4%,占社会零售总额的26%。重庆市全部公私产值中,国营占36.68%,合作社占1.09%,公私合营占21.11%,私营占30.03%,个体占11.09%。

财政金融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52年,银行存款金额达到5.3亿元,比1950年增长166%;各项贷款金额为1.08亿元,比1950年增长5.7倍。1950~1952年,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从4.42亿元增加

到8.17亿元;预算内基建投资从0.33亿元增加到2.28亿元;用于基建投资的总额达4.33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1.9%。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9.11亿元,扣除物价变动因素,比1950年增长42.2%。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广大人民从金融混乱、物价飞涨的恐慌中解脱,基本生活有了保证。

其他社会事业也取得较大发展。各类学校经过调整后配置更加合理,在校学生总数由1949年的151.49万人增加到554.50万人,卫生机构由1949年的195个发展到2953个,人员增加11倍多。

1953年

编制“一五”计划

自1952年底开始,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开始组织力量,编制四川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四川省“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从各方面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准备和创造四川进一步发展工业的条件;积极发展农业合作化,以提高农业生产;积极地发展地方工业和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积极而又稳步地对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

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四川“一五”期间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属于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的6个,国家限额以上的项目16个,再加上省的重点项目,共计93个。重点发展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开展大规模资源勘探。能源工业方面的主要项目有重庆电厂、成都热电厂、重庆长寿龙溪河梯级水电站及改建南桐煤矿,建设中梁山煤矿等。交通运输方面,继成渝铁路之后,继续修建天成铁

路(后因部分改线更名为宝成铁路),继续修筑川藏公路、成阿公路、宜西公路等。地质勘探方面,将西南地质研究所以改为西南地质局,大量扩充地质勘探人员,成立地质学校,在西昌地区、四川盆地内及川西高原开展区域普查找矿。扩充工业门类,新建一批电子、机械工业企业,改建、扩建 200 余个省、直属地方工业企业。农业方面,投资仅占基本建设总额的 1.8%,主要依靠扩大水利灌溉面积及改进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推广良种及先进技术,增加农业产量。

为执行“一五”计划,自 1952 年 9 月起,省委和省政府即陆续抽调大批领导干部加强工业战线,在在职干部中实行“技术归队”,组织理工科专业毕业的干部到工业、基建部门,在撤并的大竹、广元、眉山专区中选派干部加强工业战线,并抽调一批县级干部到省建筑公司充实业务部门领导力量。

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历时两年多,至 1955 年才全部完成,当年 11 月经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追悼黄继光、邱少云烈士

1 月 11 日,中江县各界群众 3 万余人隆重举行追悼黄继光烈士大会。黄继光,四川中江县人,1951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 年 10 月 20 日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身负 7 处

重伤,仍奋力用身体堵住敌军机枪射孔,保证了部队完成攻取高地的任务,全歼敌军两营,自己光荣牺牲,年仅 22 岁。黄继光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把黄继光家乡石马乡改为继光乡。以后中江县修建了黄继光烈士纪念馆。

8 月 4 日,铜梁县 3 千余人集会,隆重追悼邱少云烈士。邱少云,四川铜梁县人,1949 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 年入朝作战。1952 年 10 月 12 日,在朝鲜金化 391 高地的反击战中,他于潜伏处被敌弹引起的烈火烧身,为不暴露目标,他忍受剧痛坚持不动,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时年 21 岁。邱少云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把邱少云家乡关溅乡改为少云乡。以后铜梁县修建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

1 月 19 日,四川省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成立,省人民政府制订《贯彻婚姻法的方针与步骤》,发布《关于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决定自 3 月

份开始在全省除少数民族聚居区外的地区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各地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组织民政、法院、监察、妇联、青年团、工会等有关部门参加,抽调 50 余万名干部参加运动。从 3 月上旬至 4 月下旬,全省有 7510 个乡开展运动,占应开展运动地区的 92.6%。运动中,各地广泛开展宣传,举办报告、展览,发动群众,破除封建婚姻陋习,树立自由、民主、和睦、团结、平等的家庭新风。运动中共处理群众提出的婚姻纠纷案件 54320 件,其中由法院审理判决 1457 件,严惩了一批违犯《婚姻法》、虐待妇女的罪犯。

西康省人民政府规定运动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未完成土改的汉区及有饥荒的地区进行,要实行先干部、后群众的原则。全省共在 19 个县、1 个市的部分汉族地区(共 100 个乡、70 余万人口)开展运动,使这些地区 77.7% 的成年人受到了教育。经过运动,妇女因婚姻问题被虐杀和自杀的现象大为减少。

省文联成立

1 月 23 日,四川省文联筹委会召开全省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解放以来的文艺工作,讨论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选举产生了四川省首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出委员 59 人,候补委员 10 人。1 月 31 日,第一次全委会选出常委 21 人,

选举沙汀为主席,李劫人、常苏民、段可情、陈翔鹤为副主席。8 月,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在此之前,西南区、各行署区及部分市先后成立了文联筹委会及一些协会的筹委会。西康省文联于 1954 年 8 月成立。

修建官渠堰水利工程

1 月 25 日,官渠堰第一期工程动工。该堰从彭县庆兴乡引都江堰内江水系蒲阳河水源,干渠长 19.5 公里,设计流量每秒 37.7 立方米,灌溉农田 23.5 万亩。经过 1 万多民工 4 个月的努力,至 5 月 24 日全部完成,保证了当年春灌。1954 年初至 1956 年初,又进行了官渠堰的第二、三、四期工程,修建干渠总长 88 公里,使流量达到每秒 60.2 立方米,灌溉面积达到 130 万亩,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使都江堰灌区向东北面大为延伸。

以后官渠堰又进行了两期工程,跨沱江进入涪江流域,灌区范围近 6000 平方公里,控制灌溉面积近 400 万亩。1966 年,官渠堰改称人民渠。

凉山工委及凉山军政委员会成立

2 月 5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发出《关于加强大、小凉山地区工作的指示》,决定成立中

共凉山工委和人民解放军凉山地区指挥部,统一领导分属于四川、西康、云南3省的大小凉山地区的工作,以尽快肃清匪特,开辟大小凉山地区的工作。

3月5~13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专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四川省委凉山工作委员会(驻雷波),以鲁瑞林任书记,王维训任副书记,下辖乐山、昭觉、昭通3个分工委,同时成立人民解放军凉山地区指挥部,以唐兴盛任司令员,鲁瑞林任政委。不久,又成立了凉山军政委员会,以张冲为主席。

4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进行凉山工作中,必须注意彝族各方面干部的选拔和团结;对派去的汉族干部要注意质量,在数量上可以少一些。”

凉山工委及凉山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工作取得迅速进展。完成既定任务之后,凉山工委及凉山军政委员会于1956年2月撤销。

省首届体育运动会举行

2月14~24日,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成都举行。这是省内首次规模最大的体育运动会。为参加这次运动会,全省有3万多人参加选拔,由1200多名选手组成23个代表团参加角逐。运动会期间,有48万余人参观了比赛。在此以前,西南区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于1952年5月4

日在重庆举行,来自各省、区、市的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同年,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除组织竞技比赛外,还积极推广广播操、工间操制度及“劳卫制”(后改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并成立省体育工作队,分4个队赴各地巡回宣传、辅导体育运动。

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2月7~11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工作会议,除有关负责干部外,吸收了合作社长及准备办合作社的互助组组长46人参加。在这次会议之前,省委批准了新繁县(现属新都县)禾登乡罗仕发、南充县老君乡郑国友等22个互助组正式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四川的第一批初级农业社。会议确定试办初级社的方针是:稳步发展,巩固提高。会议指出不应忽视半社会主义性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私有因素,不宜过早将耕牛、农具折价归公,而应实行租赁办法,并肯定了“劳六地四”或“劳、地各半”等分配办法。会议要求要考察条件确实具备,有把握增产,方能建社,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原则。

至当年10月份,四川省共试办初级农业社46个,入社农户658户。试办的社都获得了增产,平均收入较1952年增加30.5%,在单位面积产量上,水稻平均增产18.65%,玉米增产

43.6%，棉花增产45.7%，初步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使农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西康省在汉族地区试办初级社3个，办互助组12988个，参加的农户占汉区总户数的32%。

省首届农业模范代表大会召开

2月23日～3月1日，四川省首届农业生产模范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省的模范代表1495人，其中少数民族代表21人。会议公布了第一批合符省级标准的劳动模范单位及个人名单共1331名，并进行了表彰与奖励。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农业增产问题。当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首先在会上宣布后，出席会议的代表受到很大鼓舞，消除了怕“冒尖”的顾虑，经过讨论，提出了在全省开展爱国丰产竞赛的倡议，并对当时行之有效的丰产经验进行了交流。

省政府颁布发展农业十项政策

2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规定：土地改革后凡属私人所有的土地、房屋、牲畜、林木等一切财产，均由其本人自行支配，政府予以切实保护；政府继续对农民按照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给予奖励和优待，同时保护与奖励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允许其独立经营或相互

间雇工、换工；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并得自由雇工；开展群众性的劳动模范运动，实行奖励生产的办法；贯彻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奖励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提倡饲养家禽家畜；提倡自由借贷，开展信用互助合作；严惩破坏生产力的反革命分子；监督地主劳动生产，地主劳动所得，应归其所有；鳏、寡、孤、独者因缺乏劳力无力耕种其所分得土地者，允许其出租土地。

西康省人民政府于1952年4月也曾颁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就农业税、个人节约所得、增产所得、佃耕、互助合作、借贷、雇工、塘埝、森林等作了具体规定，1953年4月又重申上述政策，并作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颁布后，受到全省农民的热烈欢迎，消除了部分农民土改后怕“冒尖”、怕致富的顾虑，调动了农村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

偿付旧银钱业存户存款

2月，四川省人民银行和有关专业银行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开始对原属“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中央储蓄会及省市县地方银行未偿付的存款和汇款，

进行清偿给付。清偿工作经过准备、登记、审查、给付等 4 个阶段,至 1954 年基本结束。据重庆、成都、万县、内江、自贡等 60 个市县(不含西康)统计,共偿付 24704 户,偿付金额 102.83 万元;报核缴库 415458 户,金额 125.6 万元。人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整顿互助合作组织

2 月以后,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规划及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各地对互助合作组织进行了整顿。整顿中,纠正了一些地方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和违反政策的做法,将确实不起作用的互助组解散,将条件不成熟勉强办起的初级社转为互助组,并纠正了歧视单干户或侵犯单干户利益的行为。经过整顿,全省互助组由近 80 万个减少为 60 万个。整组工作至 7 月份完成,保证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

卫生防疫取得显著成效

3 月 5 日,四川省卫生防疫站成立。此后各专区、县、市陆续建立防疫站,有计划地开展防治疾病工作。

早在解放初期,川、康、渝各地就开始普种牛痘,并对一些传染病进行预防注射。川西区 1951 年种痘人数达 400 万,占全区人口 60% 以上;防霍

乱、伤寒注射也达 185.3 万人次,并培养农村初级卫生员 1.6 万余名,新法接生员 1.2 万余名,产妇、婴儿死亡率大为降低。1952 年,四川省天花病发病人数由 1950 年传染病报告数的第 3 位降至第 5 位,回归热发病人数比 1951 年降低 87.2%,死亡人数降低 98.8%。至 1955 年,全省传染病死亡人数比 1950 年下降了 70%,当年天花病仅发病 7 例,无一人死亡,成都市自 1953 年起再未发生天花病。

川东北 50 余县发生旱灾

3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生产救灾办公室,领导川东、北人民抗旱救灾。当年春天,川东、川北许多地区普遍发生旱灾,53 个县发生春荒,有 162 万余人缺乏口粮。省政府立即发放救济款 300 多万元,由人民银行拨发贷款 300 万元。为照顾相当一部分农村粮食短缺的困难,省政府对 1949 年和 1950 年两个年度的农业税尾欠,全部予以豁免;对 1951 年和 1952 年两个年度的尾欠公粮,也分别情况予以减免。同时,省政府成立以赵林为主席的四川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作出建设规划,开始有计划地帮助川东北老根据地改变贫困面貌。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成立

3 月 14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地级),

并宣布撤销茂县专区。自治区人民政府驻茂县，辖松潘、茂县、理县、汶川、靖化、懋功 6 县及卓克基、松岗、党坝、绰斯甲、梭磨 5 土司、阿坝、若尔盖等 12 部落。此前，于 1952 年 11 月 27~29 日召开全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政府委员中，藏族占 64.4%，羌族、回族等占 10.6%，汉族占 25%。桑吉悦希（藏）为自治区政府主席，张承武、索观瀛（藏）、华尔功臣烈（藏）、苏新（羌）为副主席。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于 1955 年 11 月更名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

实行基层普选

4 月 4 日，重庆市选举委员会成立；同月 16 日，西康省选举委员会成立；24 日，四川省选举委员会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在除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外的地区开展了普选工作。

省、市选举委员会成立后，各级也纷纷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开展普选准备工作。四川省选举委员会调集 400 余名干部集中学习后分赴各地，协助训练了 6 万余名选举指导干部；省选举委员会除直接举办了 4 个乡的试选外，还在 130 个县、市的 137 个乡及 7 个市辖区、乡、镇约 120 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典型试选，以取得

经验。西康省训练选举指导干部 1710 人、技术干部 2482 人，分赴西昌、雅安专区协助选举工作。

普选于 7 月份开始，分两期进行，至次年 1 月基本结束。四川省在成都、自贡两市和 130 个县、7 个县级市的共 13 050 个基层单位进行了普选，共登记选民 36 855 440 人，参加投票的选民占登记选民总数的 91.08%，共选出 50 万余名基层人民代表。西康省普选在 19 个县、1 个市、513 个乡（镇）进行，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 13 848 人，其中妇女代表占 20.1%。选举中，对杂居区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及人口特少的民族给予了适当照顾。此外，在普选县内不实行普选的 137 个少数民族聚居乡，也采用协商办法，选出各族人民的代表，出席该县的人民代表大会。重庆市共选出区人民代表 1056 人，乡人民代表 1949 人。

各地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人民代表后，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然后通过间接选举办法，产生县、市，直至省人民代表大会，自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形成。

开展人口普查

3 月下旬，结合开展普选工作，川、康、渝各地开展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完整的人口普查工作。省、市及各级均成立了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事先进行了复杂的准备工作。四川省先

后训练了 10 万名工作人员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人口调查以 1953 年 6 月 30 日 24 时为标准时, 经过宣传、登记、复查 3 个阶段, 分两批进行, 基本上达到“不重复, 不遗漏, 全面确实”的要求, 于 1954 年初结束。四川省(不包括西康省、重庆市)此次调查人口总数为 60 110 605 人, 首次掌握了四川人口总数及其构成情况。

开展“新三反”运动

4 月 10 日, 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要求先省、地两级机关, 后县、区级机关, 分两步开展“新三反”运动。4 月下旬及 5 月上旬, 各地、市委先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省委指示, 揭发批判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行为。在此期间, 《新华日报》、《四川日报》对典型案件及其处理情况进行了报道。乡、镇机关的“新三反”运动结合普选工作在夏季进行, 农民群众结合选举提出了许多意见, 使部分原有的干部落选, 不少新涌现出的优秀分子当选为乡、镇人民代表或进入政府工作。全省“新三反”运动至三季度基本结束。

中共重庆市委于 3 月 6 日、中共西康省委于 3 月 19 日发出了同样指示, 在全市、全省干部中开展了“新三反”运动。

川、康、渝工青妇组织召开首届代表大会

4 月 5~15 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康省首届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康省委员会, 王一木任书记, 王夫英为副书记, 大会还选举了出席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1 月 18~24 日, 西康省召开首次妇女代表大会, 选举成立西康省民主妇女联合会, 郑瑛任主任, 李成英、降央伯姆、安登云任副主任。此前, 1 月 24~29 日, 西康省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正式选举成立了西康省总工会, 文儒祥任主席, 刘鹏飞任副主席。

4 月 13~18 日, 四川省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讨论了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选出四川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陈刚为主席, 吴子瑜、邓自力为副主席。当时全省有基层工会 4231 个, 工会会员 37.3 万人。1954 年 10 月, 陈刚不再担任省总工会主席, 由杨超代理主席。5 月 15~23 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川省首届代表大会举行, 选举产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川省委员会, 崔雄崑为第一书记, 李培根为第二书记, 彭塞为第一副书记, 王毓培为第二副书记。当时全省有青年团员 54 万余名。1954 年 3 月 8~14 日, 四川省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了四川省民主妇

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王腾波为主任，戴峻、刘云波（后增补华逸、王泽）为副主任。

重庆市于1951年3月成立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李蕴华为主任，张平江、蓝健为副主任。1953年3月召开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选举沈谷兰为第二届妇联主任，刘隆华、张平江为副主任。1951年4月重庆市总工会成立，由王维纲兼主席，邵子言任副主席。1953年4月召开第二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邵子言为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仪为副主席。1953年4月1～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首届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产生青年团重庆市委，曾德林任书记，廖伯康、黄怀甫、于克书任副书记。

在此之前，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各区及西康省、重庆市均成立了工、青、妇组织筹备委员会，进行了大量工作。

省文管会成立

6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为统一管理全省文物事业的机构。省文管会成立后，组织人力对全省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四川省文物简目提要》，为省内首次编制的较为完整的文物简目。

重钢劳模黄荣昌革新受奖

9月，重庆市工矿、交通企业开展

增产节约劳动竞赛运动，涌现出大量先进班组和个人。西南钢铁公司101厂（1955年厂与公司合并，更名为重庆钢铁公司）黄荣昌小组，从10月份起，1个月零6天的生产量就相当于1952年全年的生产量，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的嘉奖。木工出身的黄荣昌，苦心钻研技术，努力进行革新，他经过8个月的反复试验，装出一台手摇圆锯机。继而又带领全组工人，利用废料研制成功断料、钻眼、挖槽等12部机械，使劳动生产率提高400倍，每年节约90万元。在几年时间里，黄荣昌先后创造和改进了70多部木工机械，使木工活全部实现半机械化，被重庆钢铁公司、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又荣获四川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由作家根据黄荣昌事迹创作的话剧《一个木工》在省内外广泛上演，1956年荣获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三等奖。

学习、宣传总路线热潮

10月份以后，川、康、渝各地掀起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

9月下旬，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庆祝国庆四周年的口号在报刊公布。12月，中共中央又批发《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

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0月份,中共四川省委即组织大批力量奔赴农村,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总路线,推动统购统销工作的进行。11月10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由市委书记曹荻秋作关于总路线的报告。会后,市委主要领导人分赴各行业、各系统向党内外干部作关于总路线的辅导报告。次年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成都向1.3万名党员干部作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接着,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大张旗鼓地深入宣传总路线的计划》和《关于全省在职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计划》。中共西康省委于同月5日召开扩大会议学习总路线,会后,各地、市、县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或干部会议进行学习。各地还以电影、幻灯、戏剧、歌舞、说唱等形式,在城市、农村广泛宣传总路线。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川、康、渝组织也纷纷集会,表示热烈拥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累计各地共组织150余万人参加宣传总路线的活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成为人所共知的口号。

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10月20~31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4次全体(扩大)会议,认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放任自流,决定将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

方针改为“积极发展,逐步提高”。同时,会议认为对当年2月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政策》的宣传,把保护私有制放在第一位,是一个错误。这次会议同时讨论了实施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接着,在11月25日省委召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议上,认为建社工作存在停滞退缩的现象,“对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侵蚀和影响警惕与预防不够”,决定今后互助合作运动的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两次会议的背景是: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泽东主席曾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对“纠正急躁冒进”、“搞四大自由”(指土改后农民借贷、租佃、雇工、贸易自由)进行了批评,认为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并鼓励办大中小农业生产合作社。

此后,四川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度大大加快。

实施粮食统购统销

10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4次全体(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决定自11月份起,除16个少数民族县及边沿县外,在全省151个县实施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西康省同时决定,先在雅安地区的4个县及雅安市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次年在汉族地区全面推开。

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即统购）；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计划供应（即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私商一律不许自由经营粮食，只能做国家销售粮食的代销店，私营工厂不能自购原料，自销产品，只能接受国家的委托加工；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的管理。

中共四川省委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极端紧迫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在全省组织了 150 余万名干部和积极分子投入这一工作。首先，在农村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在宣传学习的基础上，由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动员农民自报售粮数，进行民主评议，定案后组织入库。1953 年度的统购工作至次年 4 月全面完成，四川省共收购粮食 340.18 万吨，比原计划超过 30.08 万吨，西康省收购粮食 2.22 万吨，完成原计划的 113.6%。

以后逐步对这种自报公议的统购方法进行了改进，自 1955 年起实行以乡为单位，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并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实行“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由此农村统购形成制度。

1953 年底，在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线实行了粮食凭证供应。1955 年 8 月

起，对城镇居民的口粮实行了分工种分等级定量供应，市镇熟食业出售的食品也凭票购买。11 月，全国通用粮票及四川省地方粮票、料票在全省范围内使用。从此，一切流动人口和临时外出的城乡居民均实行凭证购粮。粮食统购统销后不久，对油料、食油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54 年 9 月又对棉花、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对这些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延续 32 年之久，对城乡人民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至 1985 年方取消。

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切断了私营工商业同这些原料、产品的联系，实际上对有关私营行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影响到其他行业，从而推动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统购统销逐步由分散到集中，由“梳小辫子”到“梳大辫子”，从而推动了农民组织起来，加快农业互助合作的进程。因此，统购统销是国家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亦是推行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的重大举措。这一举措，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商品率很低，存在尖锐供需矛盾的情况下，对保证国计民生，安定社会，推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了不可湮没的历史作用。但这一高度集中的举措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经营和粮油市场中的作用，暴露出一些弊端，这是后来对其进行改革的依据。

达到 1600 万亩。

推广修建山湾塘经验

1953 年冬,西南农林水利局派出试点工作组,在长寿县葛兰乡葛兰村选择一处三面环山、居高临下的“锁口丘”地形,组织群众修筑土埂,建成一口大塘,占地仅 13 亩,蓄水达 1.3 万立方米,8 天便完成了工程,耗资仅 54 元,改变了四川过去平地下挖建塘的办法,达到了费省效宏的目的。这口塘被命名为“山湾塘”,吸引了附近许多群众前来参观。

接着,四川省水利厅派出工作组,在遂宁县西眉乡王家垅试建示范塘,选择一处山湾修建,在下游一方修 2.5 米高的土坝,采用石砌涵卧管放水,取得了成功。省水利厅召集各专县水利干部 187 人,以王家垅工地为课堂,举行了 48 天的培训,又在遂宁县召开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推广长寿和遂宁的经验。到 1954 年底,全省共建成山湾塘 1293 口,平均每口塘灌田 150 亩;每挖 1 立方米土可换蓄 7 立方米水;每占 0.06 亩地,可以灌田 1 亩;每灌 1 亩田,只费工 10 个,花钱 0.60 元。

山湾塘在全省逐年推广。至 1957 年“一五”期末,全省共修山湾塘 5 万多口,小型水库 309 座,控制农田灌溉面积增加到 2280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对私营工业企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政策

1953 年内,各地人民政府进一步调整了工商业政策。在重点县、市建立了加工订货委员会,对私营工业扩大加工订货,调整工缴利润,增加银行贷款和降低贷款利率;在商业方面,明确划分公私商业的经营品种和经营范围,对私营商业放宽批零差价,调整批发起点,发放贷款扶持经销代销。在劳资关系方面,帮助私营工厂、商店普遍订立了劳资合同,稳定了劳资关系。各地还在政治上对私营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进行安排,使其参加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至年底,私营工业企业接受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已占 80% 左右,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产值达 21541 万元,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 63.39%,比 1952 年增长 113%。重庆市毛巾针织、文具纸张、橡胶、搪瓷、糖业、鞋帽、皮革、皂烛火柴等 14 个行业,大小 1600 余家厂户第四季度接受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产值,已占私营工业企业总产值的 65% 以上。私营商业大小商户普遍接受了经销代销。同时,全省有 130 户私营工业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4 年

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1月10~21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国家投资135万元,将29户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扩展为公私合营企业。这29户私营企业占私营大型企业744户的3.9%,资产总值的40%,生产总值的24%,主要是钢铁冶炼、纺织、食品等企业。同时,3~10日,省工商联筹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工商界代表人物学习对私改造政策,解除思想顾虑,接着在私营工商界广泛进行了总路线、对私改造政策等宣传教育。

扩展合营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派出工作组进厂,调查企业资产情况,在此基础上,由公私双方协商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分红、人事安排等工作,为合营创造条件;第二阶段,签订协议书,呈报上级机关批准。人民政府对房屋建筑、机器设备、原材料等企业资产制定了详细的估价标准,盐井和矿洞的估价因涉及国家资源和城市地权,由省财委另制定了作价标准。与此同时,对52户规模较大的原有公私合营工业企业进行了整顿,改造企业的经营管理,处理遗留的部分股份

问题。扩展和整顿工作在1954年内结束。

接着,1955年又扩展275户私营企业为公私合营企业。由于这些企业大多规模较小,生产问题较复杂,因而分别采取了个别合营、集团合营和并厂合营等方式进行,国家投资273万元,用以改造旧企业。至当年年底,全省公私合营企业总产值达到45788万元,比1953年增长83%。

代替私营批发商,安排零售商

6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各专(市)财委主任会议,决定对私营商业按行业进行改造,首先在县以上城镇的粮食(主粮)、食油、食盐、食糖、零酒和棉布六个行业中,以经销代销等形式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与安排。各地经过试点后,于8月份普遍展开,共计安排私营商业户45503户,占纯商业总户数的14.49%;安排从业人员61083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13.55%;由国、合商业接收私营批发商的职工1052人。

接着,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各地继续抓紧大中城市,包括一些中转性大的县城的私营商业的安排与改造工作。对已被代替的私营批发商,分别采

取如下方式进行安排：国、合商业按需要吸收为职工；转为批零兼营，代购代销；转为零售，经销代销；安排经营小商品，组织城乡贩运；转向工农业生产。对资本主义零售商业的政策是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对小商小贩的政策是引导其走合作的道路。省财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与改造私营商业的意见》，提出对两万人口以上城镇私营商业的具体安排措施。各地随即对百货、文具、干杂、新药以及五金、颜料、土布等行业的私营商业进行了安排。

经过近两年工作，公私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至 1954 年底，全省只剩下私营批发商和行商 20 414 户，21 292 人，其中批发商为 154 户，618 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批发比重已由 1953 年的 54.79% 上升至 93%。在零售方面，至 1955 年，私营商业零售额所占比重已由 1953 年的 49.42% 下降到 20.95%；同时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批零总额已由 1953 年的 0.28% 上升到 10.91%。

电子工业基地建设起步

4 月，宏明无线电器材厂、新兴仪器厂、锦江电机厂、雷达探照灯厂筹备组分别成立，四川电子工业建设起步。

从 1953 年开始，国家即把成都选定为全国电子工业建设的重点城市，在 156 项重点工程中安排以上 4 个电

子工业项目在成都兴建。1953 年 11 月，承担援助设计的苏联专家一行 8 人与二机部有关负责人到达成都，选定以上 4 厂厂址。以后，雷达探照灯厂经国家批准停建，其余 3 厂先后于 1958 年 6 月、12 月建成投产，成为四川的第一批电子工业企业。

为建设电子工业基地，国家新建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和电子技术专业研究所。1958 年，成都电子工业区建设步伐加快，并向绵阳发展，建设新的电子工业群体。在成都、绵阳两地新建了 18 个项目，其中有苏联援助设计的项目 5 个：即成都的红光电子管厂、国光电子管厂、成都电机厂及绵阳的长虹机器厂和涪江机器厂。

改建扩建重庆钢铁工业基地

4 月和 6 月，重庆钢铁公司两座 50 吨炼钢平炉先后建成投产。这是改建扩建重庆钢铁公司工程最先完成的项目。

重庆钢铁公司为原国民政府兵工署第 29 兵工厂，抗战初期内迁四川。解放后改名为西南钢铁公司 101 厂，1955 年厂与公司合并，始名重庆钢铁公司。“一五”计划开始后，国家决定投资 4383 万元对重庆钢铁公司进行改造与扩建，首先新建由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平炉车间，接着扩建了大轧车间，改造和新建了两座加热炉和一台矫直

机,对中小轧钢车间和重钢三厂的450毫米轧机也进行了改造。经过改造与扩建,重钢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1957年与1952年相比,钢产量提高8.8倍,生铁产量提高1.6倍,钢材产量提高3.7倍。

与此同时,国家还投资1544万元对重庆特殊钢厂进行了改建扩建。重庆特殊钢厂为原国民政府兵工署第24兵工厂,抗战初期内迁四川。解放后重建为特殊钢厂。改建扩建工程主要是新建了冷拉车间,于1956年竣工投产,1957年冷拉钢材8446吨,大大超过了4500吨/年的原设计能力,还改造了炼钢车间,新建了热处理厂房等,使全厂钢产量由1952年的14 464吨上升到1957年的64 701吨,产品型号由57个增加到218个,钢的合金由1950年的12.89%上升到1957年的41.42%。

在改建扩建重庆钢铁公司及特殊钢厂的同时,重庆市还将6个私营冶金小厂在长寿合并成立川江电冶厂(后更名为重庆铁合金厂),主要生产炼钢所需的硅铁和锰铁。通过改造与扩建,重庆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1957年全市钢产量达到35.4万吨,钢材产量达到37.2万吨,分别比1952年增长6.4倍和2.8倍,为支援西南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造建设煤炭工业

5月,南桐煤矿一号竖井建成投产。该井设计能力为年产30万吨煤,是改造、扩建旧煤矿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一五”期间,国家共投资1.2亿多元,对南桐、东林、天府、嘉阳等煤矿进行改造与扩建,并兴建新的煤矿。经过改造工程,一大批原有矿井改手镐采煤为风镐采煤,改自然通风为机械通风,改竹箕拖煤为矿车运输,改手锤打眼掘进为风钻打眼掘进,1955年西南第一条井下架线式电车在南桐一井建成通车,同时铁路专线通到矿山,使煤矿生产向机械运输迈出一大步。

在改造旧煤矿的同时,开始了建设新煤矿。1953年,西南地质局派出中梁山煤田勘探队,对中梁山矿区开展了系统普查勘探,于1954年底提交了《中梁山煤田南井田详勘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地质工作者提交的第一份正式勘探报告。与此同时,开展了华蓥山煤田及其他煤矿的普查勘探。1956年,中梁山煤矿南北井及南桐矿区鱼田堡一号竖井破土动工,揭开了四川建设较大型煤矿的序幕。其中鱼田堡一号竖井设计能力为年产60万吨,为当时西南地区第一大竖井。承担这一工程的重庆煤矿建设局第一工程处的一万余名职工,边学习,边建设,提出革新建议2300多项,创

造月进 45 米的竖井记录,奋战两年多,于 1958 年 5 月 30 日建成投产。

经过“一五”期间的改造、扩建和兴建,全省煤炭生产能力大为提高。仅重庆市的原煤产量即由 1953 年的 166.9 万吨提高到 1958 年的 573.7 万吨。

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地方组织陆续建立

至 1954 年前后,各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在川地方组织大部分正式建立,并积极开展工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 1950 年 5 月在成都、重庆分别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1951 年春建立民革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1952 年民革成立西康省、四川省筹备委员会。1955 年 5 月,民革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正式成立民革四川省委员会,选举但懋辛为主任委员,钟体乾、余际唐、李紫翔为副主任委员,并建立了成都、重庆、南充、泸州、雅安 5 个市县委员会,至 1957 年,全省共有成员 1139 人。

中国民主同盟于解放初期先后建立重庆、川西、川北、川南及西康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1952 年底撤销川西、川北、川南 3 个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民盟四川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1954 年 2 月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正式成立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会,选举彭迪先为主任委员,

贾子群为副主任委员。1954 年底,西康、重庆民盟组织并入四川省支部,增补田一平、肖华清为副主任委员。至 1957 年,全省共有盟员 2388 人,有市、县委员会 12 个,基层支部和直属小组 185 个。

中国民主建国会于 1951 年 9 月在重庆成立以胡子昂为主主任委员,徐崇林、王磊为副主任委员的民建总会西南区办事处。1955 年 2 月,撤销西南区办事处,正式成立民建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胡子昂为主主任委员,王廷弼、徐崇林、典宪率为副主任委员(后增补何仲明、肖松立、黄鱼门为副主任委员)。至 1957 年,全省有会员 1834 人。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 1956 年在成都、重庆两市分别建立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自 1952 年先后建立成都市委员会及自贡、内江、渠县、富顺 4 个直属支部。1953 年 3 月,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夏康农任主任委员,有成员数百人。

九三学社解放初期建立重庆分社和成都小组,1954 年成立成都分社筹备委员会,1956 年成都分社正式成立,有社员 318 人。

1953 年 6 月 10 日,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产生了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由彭劭农任主任委员,肖则可任副

主任委员。在此前后,全省已先后建立 69 个市、县工商联,39 个市、县工商联筹委会,还有 40 个市、县城关工商联组织。1956 年 8 月,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行,选举成立了省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由彭劭农任主任委员,温少鹤、何仲明等 13 人为副主任委员。

成都电厂(热电厂)动工兴建

1954 年 9 月 18 日,成都电厂主厂房动工兴建。

1951 年初,政务院燃料工业部批准川西行署在成都近郊建设火电厂的报告,调拨美式 5000 千瓦机组 1 台,厂址设成都东郊跳蹬河。1955 年 5 月 1 日 1 号机并网发电。

1956 年 11 月,二期改扩建工程开工,为“一五”计划苏联援建 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安装 2×2.5 万千瓦高温高压机组。西安电力设计院、北京电力设计院、建工部西南一公司、电力工业部西安基建局、铁道部成都管理局等单位参加建设。1958 年 9 月、1959 年 1 月,2、3 号机组相继并网发电。1959 年 6 月,向成都东郊 13 厂供热,厂名改成都热电厂,为西南地区第一座高温高压电子自控、供电供热厂。至 80 年代后期,该厂先后进行多期改扩建工程,安装 6 台($5 \times 2.5 + 1 \times 20$ 万千瓦)机组,总容量 32.5 万千瓦,年发电量 20 亿千瓦,年供热量 3430 亿千

焦耳。

此期兴建的重庆电厂和成都热电厂是四川“一五”期间的重点能源建设项目。建成后为成渝地区提供了经济建设必需的能源。

四川、西康分别召开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8 月 1~8 日,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李井泉《关于四川省近两年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及今冬明春主要工作任务的报告》,批准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市的基本情况及 1954 年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并选出朱德、张澜、吴玉章、郭沫若等 87 人为四川省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次年 1 月,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李大章为省长,邓锡侯、阎红彦、任白戈、钟体乾、余际唐为副省长,王叙五等 49 人为委员;选举赵方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谷志标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此形成了省级政权机构由省人民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构成的格局。

8 月 1~7 日,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雅安举行,大会代表 123 名中,各少数民族代表占

52.3%。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廖志高《西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选举了西康省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次年1月，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选举成立西康省人民委员会，廖志高为省长，白认、桑吉悦希、康乃尔、张为炯、果基木古、夏克刀登为副省长；选举刘长健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赵朴为检察长。

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

8月，西南文教局在成都召开了高等学校教学经验交流会，总结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同时在四川大学举办了西南区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展览会。在此以前，西南文教局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进行关于教学改革的调查与试点。同一期间，国家高等教育部先后颁发了《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暂行规定》、《高等学校1954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6月份，各高等学校施行新的工资标准，各级工资标准均有所提高，部分教职工调升工资。国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委托部分高等学校编写、修订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经过召开一系列会议审定后陆续颁发。当年年内至1955年，省内各高等学校相继开始执行统一的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

撤销西南大区，重庆改为省辖市

11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行政委员会停止办公，宣布撤销。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4月27日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于6月19日通过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

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于8月31日终刊，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于9月5日停播。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7月1日，重庆市正式并入四川省建制，改为省辖市。

重庆市划归四川省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作了调整，第一书记李井泉，第二书记李大章，第三书记曹荻秋，副书记为赵林、阎红彦。

三合堰动工修建

12月1日，西河引灌工程开工修建。该工程由崇庆、大邑、邛崃三县直接修建，故又命名为“三合堰”。三合堰引都江堰外江沙沟河水源，设计灌溉面积为50万亩。为保证次年春耕，万余名民工昼夜奋战，至次年3月即完成干渠37公里，春灌47.5万亩。以后三合堰支渠完善后，灌溉面积增加到60万亩，超过原设计能力，成为都江堰四大干渠之一。

巫溪、巫山县部分地区发生暴乱

12月7日、8日，巫溪县十区青龙、西安、双河3乡和巫山县九区当阳乡境内相继发生反革命暴乱。参加暴乱的共306户、346人。暴乱历时5天，区、乡干部15人被杀害，10人受伤。暴乱随即被平息，为首的暴乱分子被依法逮捕。事后调查，暴乱为反革命分子蓄意发动，但同时与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和错误分不开。在巫溪、巫山部分地区，统购粮食过多，该减免的公粮未减免，在贯彻救济、优抚政策与干部工作作风等方面也存在问题；这些缺点和错误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导致暴乱发生。中共四川省委随即发出指示，要求从中汲取教训，说服教育县区乡干部克服报复情绪，冷静处理善后事宜；对于类似巫溪、巫山这样的边沿贫瘠山区，应长期采取扶持的政策，一般不要进行统购，公粮征收要注意群众的实际负担能力。

康藏公路全线通车

12月25日，康藏公路全线建成通车，雅安和拉萨同时举行了盛大通车典礼。

康藏公路跨越世界屋脊康藏高原，全长2255公里，沿线地质构造复杂，气候恶劣，要经过14座海拔3000～5000余米的大山，10余条陡峡大河和8条地质断裂带，还要经过冰川、沼

泽等复杂地貌。自1950年4月动工修建后，筑路各族军民艰苦奋斗，在峭壁激流上架起430多座桥梁，修建3700多座涵洞，累计挖掘土石方近3000万立方米，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有的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康藏公路通车后，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为藏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被藏族人民誉为“通向幸福的金桥”。

康藏公路以后改称川藏公路，以成都为起点，并修通了南线路段（南线自康定东俄洛至巴塘段，又称东巴公路），南北两线总长3200余公里。

根据军民修筑康藏公路事迹创作的歌曲《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1953年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会上获一等奖。

手工业合作社全面发展

1954年，手工业合作组织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川、康各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先从组织初级形式的供销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入手，然后逐步向高级形式的生产合作社发展。自1953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手工业改造问题后，至1954年，各地普遍加强了领导，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在少数行业试办进入到在多数行业普遍发展的阶段。各市、县普遍召开了手工业劳动者代表大会，重庆、成都、遂宁等40多个市、

县组织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10个专区、99个市、县建立了手工业管理机构。成都、重庆、隆昌、泸州、宜宾、乐山等市、县还建立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社。为了适应手工业合作化的需要,各地、县、市党委大都配备了专管手工业工作的干部。到年底,全省共建起手工业合作社643个、供销生产社38个、供销生产小组2617个,共有社、组员54326人,生产总值3382万元。其中手工业合作社为1953年底的三倍多。

西康省1954年上半年开始重点组织高级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到年底,发展到有手工业合作社19个,供销合作社6个,供销小组151个,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占全省手工业者的19%。

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

1954年,川、康两省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

自1953年底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广泛掀起宣传总路线高潮后,促进了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5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全省合作社

建社工作会议,作出当年至1955年春合作化规划。12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又召开第8次扩大会议,确定省委要以较大力量抓农业合作社建社工作和农业生产,各地、县委应无条件地迅速转向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进行工作。在此形势下,建社工作迅速发展。四川省在1953年底试建46个初级社的基础上,至1954年春季,初级社发展到604个,到年底,全省初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8666个,常年互助组发展到21万余个。西康省在试建3个初级社的基础上,1954年底发展到539个,并有了1个合作化乡,49个合作化村。

与此同时,农村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也有很大发展。到年底,四川省共有农村供销合作社1403个,社员130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1.5%;有信用合作社(组)3600余个,社(组)员约300万人。西康省已有15个县建立起供销社联社,有社员21万余人;有信用社(组)444个,社(组)员12.5万余人。

1955年

整顿合作社,压缩互助合作计划

1月7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

于处理目前建社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针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带来的问题,强调建社中必须贯彻

自愿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耕牛、农具、树木等带政策性的问题。

1954 年冬至 1955 年春，四川建社工作发展很快。至 1955 年春，全省农业合作社已由上年底的 8666 个发展到约 3 万个。2月 19 日，省委再次发出《关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紧急指示》，指出建社中已出现一些必须重视解决的严重问题，诸如猪只减少，社员投资过大，部分社员现金收入减少，生产计划盲目性很大等。强调把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情绪扭转过来，明确现阶段主要是举办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社。3月上旬，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决定秋季以前农业社暂缓发展，集中精力巩固现有合作社和领导好农业生产。5月，省委批转农村工作部《对自发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指出自发社必须制止，但应慎重处理，防止简单粗糙。

这一期间，省委和各地、县委均派出大批干部下乡整顿合作社。通过整顿，纠正了部分地区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和违反政策的做法，制止了自发办社的现象，巩固了合作社，使部分地区出现的宰杀牲畜、社员收入下降、农民情绪不稳等问题逐步消除。到 6 月底，全省合作社稳定在 2.8 万个左右。

西康省在同一期间也整顿了现有的合作社和互助组，但通过整顿，略有发展。至 6 月底，汉族地区共办起农业

生产合作社 1255 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9.5%；办起互助组 22966 个，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58.6%。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成立

1月 20~2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选举产生了政协四川省常务委员会。

在此以前，1950 年 6 月~1951 年 4 月，原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行政区分别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通知，各区协商委员会代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职权。1952 年秋，四个行政区撤销合并为四川省后，同年 10 月组成了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合办事处，选举李井泉为主席，阎红彦、卢子鹤、罗忠信为副主席。

1951 年 5 月，西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政协西康省委员会 1955 年 1 月经中央批复同意，但未正式成立。同年并入四川省政协。

出席政协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共 283 人，听取了卢子鹤所作的《关于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合办事处工作报告》，选举李井泉

为主席,刘文辉、赵林、张曙时、李筱亭、但懋辛、程子健、胡子昂、徐孝刚、潘大逵为副主席,选出常务委员 54 人。

“文化大革命”以前,政协四川省委员会还于 1959 年 6 月、1963 年 8 月举行过两届全体会议。三届委员会的副主席,除以上人员外,还有:廖志高、降央伯姆、徐崇林、彭劭农、果基木古、夏克刀登、龚逢春、余际唐、彭迪先、田一平、华尔功臣烈、杜心源、刘星垣、李宗林、谷志标、罗承烈等。1965 年李井泉调整职务后,廖志高被选为主席。

各届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团结各族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宗教组织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恢复国民经济,推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以及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发现“乐氏江油鱼”

3 月 21 日,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乐森筠在江油县发现 3 亿年前的古生物——节鱼类鱼化石。这种鱼被命名为“乐氏江油鱼”,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同时期古生物化石,具有重要科学研价值。

康定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4 月 14 日 9 时 29 分 02 秒,康定县折多塘发生 7.5 级地震,仪器测定震中为北纬 30.0°、东经 101.8°,震中烈度为 9 度强,震源深处 204 米。极震区在二台子—折多塘—榆林宫一带,面积约 112 平方公里。地震时山崩地裂,飞沙走石,河水上涨,泉水变色,贡嘎山、海子山积雪崩塌,电杆倾倒,公路交通阻塞。折多山垭口—二台子—折多塘一带,出现长 3 万米的裂缝。康定、泸定两县破坏严重,乾宁、雅江两县也受到破坏,丹巴、小金、石棉、自贡、荣县、威远、九龙、宜宾、内江、富顺、道孚、炉霍、理塘、甘孜及云南永胜、盐丰等地均有震感。主要受灾县康定、泸定共死亡 84 人,伤 224 人,死亡牲畜 100 余头(只),倒塌房屋 633 间,严重破坏 1083 间。

地震后,国务院、国家民委、西康省人委均发慰问电,并派代表赶赴灾区,调拨救济药品、物资,会同中共康定地委、甘孜州人委开展救灾工作。

柯召等教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6 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成立,四川大学教授柯召、四川医学院教授刘承钊、西南农学院教授侯光炯、重庆大学教授乐森筠当选为学部委员。

之后,各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响应

中共中央的号召,掀起“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四川财经学院等多次举办科学讨论会、科学报告会。各高等院校纷纷制订科研计划,提出科研课题。

高等院校再次进行调整

1955 年开始,为适应国民经济布局的需要,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将沿海一些高等学校的专业、系科迁至四川组建新校,并对省内原有高等院校进行了适当调整。这一工作至 1957 年大体结束。这一期间,新建和调整的院校有:为适应建设西南电子工业基地对人才的需求,将上海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及其他院校的电子类学科(系)的教师调成都,组建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为培养地质勘探人才,以重庆大学、西北大学和南京大学地质系的部分教师为基础,抽调北京地质学院、东北地质学院少数教师,在成都建立地质勘探学院;将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专业系及教师迁渝,成立重庆医学院;将四川大学农学院迁雅安,建立四川农学院;将四川师范学院由南充迁成都,以余下的专修科为基础建立南充师范专科学校;建立成都中医学院;建立成都城市建设学院(后撤销);将西南体育学院更名为成都体育学院。此外,还建立了一批中等专业学校。

至 1957 年,四川共有高等院校 22 所,其中综合 1 所、工科 5 所、农科 2 所、医科 3 所、师范 4 所,外语、财经、政治、民族、体育、音乐、美术各 1 所;科系设置向理工科倾斜,在校学生中,工科占 35.9%,农科占 6.9%,医科占 10.99%,师范占 29%,文科占 2.5%。

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

5 月 13 日~6 月 10 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及编者语,之后,全省开展了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重庆出版的《西南文艺》刊物,开辟《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专栏,连续发表批判文章 89 篇。宣传、文艺部门纷纷开会,开展批判和清查。一些过去曾同胡风及其朋友有过联系、或同意胡风文艺观点的人受到批判,有的甚至受到行政或刑事处分。四川省人大发表公告,宣布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定为“错案错判”,曾经受到牵连的人陆续得到平反。

开展社会镇反,清理基层组织

7 月 21 日,中共四川省委批准省公安厅《关于 1955 年下半年农村镇压反革命斗争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从秋季开始的社会镇反应以改造落后

乡村,清理混入基层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为主。落后村是指“土改、镇反、反封建不彻底,阶级敌人篡权,政策、工作不易贯彻,群众继续受压”的地方。报告估计,全省 77823 个村中,有落后村 11781 个。

从 8 月份起,全省分批开展了改造落后乡村的活动。到 12 月,对 8483 个落后村进行了清理,共逮捕基层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17459 人。在捕获的罪犯中,有国民党省党部和青年党的高层骨干;有伪装成贫农,潜伏于南充县青居乡的国民党军统局重庆集中营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亲手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杨进兴。其余落后村的改造于 1956 年继续进行。

开展肃反运动

8 月 10~20 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扩大的第十次会议,贯彻中共中央 7 月 1 日发出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对全省肃反运动作出部署。部署决定,全省肃反按省、地、县三个层次分批进行;除上层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地区非党干部暂不进行外,凡党、政、群团机关,高等学校,干部学校及中小学校教职工,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的厂矿均无例外地参加肃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在干部范围内进行。

全省肃反运动紧接清查“胡风反

革命集团”开始,至 1957 年 10 月基本结束,历时两年多。参加肃反运动的人数共为 440 余万人。运动中本着群众路线和专门工作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方面组织专案小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通过运动,全省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3.8 万余人;同时运动中澄清了不少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但在运动初期,一度存在赶时间、赶任务及诱供、逼供、串供等现象,出现了一些错案,使一些人受到误伤。1956 年后,根据中共中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各单位对案件进行了复查,一些错案得到了甄别平反。

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8 月 10~20 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 10 次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在 7 月 31 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会议认为四川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局部性的高潮已经出现。会议批判了对这一新形势估计不足,怕合作社发展多了不好巩固、会出岔子等“右倾保守思想”,否定了 1953 年、1955 年春两次对互助合作组的整顿,决定到 1956 年春耕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当时的 28000 多个发展到 10 万个,使入社农户占到全省总户的 27%,到 1958 年春天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会议还提出做好迎接合作化

的 10 项准备工作。中共西康省委于同月 22 日召开地(州)委书记会议,就实现农业合作化问题及西康省建制撤销后的工作做出了安排。

随着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报告的层层传达,各地掀起了反“右倾”、反“保守”、批“小脚女人”的浪潮,纷纷组建新的农业合作社,扩大旧社,使农业合作化的实际发展速度超出了上述计划。到 1956 年 1 月,四川全省初级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 201574 个,有 907 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占到全省总农户的 77.8%,宣告全省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合作化。

撤销西康省,并入四川省

7 月 3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西康省的决议》,将其行政区域并入四川省。

8 月 16 日,西康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西康省撤销工作简要计划》。9 月 15 日,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省长廖志高所作的《关于贯彻执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撤销西康省决议的报告》。9 月 23 日,省人委发出通知,宣布省人民委员会及所属各工作部门、办公机构于本年 10 月 1 日停止行使职权,宣布撤销;从 10 月 1 日起,所属各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和各专员公署,各市、县人民

委员会,即受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领导。西康省共辖 2 个专区、2 个自治州、45 个县、1 个自治县、1 个县级市,总面积为 24.45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953 年调查)为 338.1 万人。

西康省撤销前,组成了西康省级机关结束工作处理委员会,以康乃尔为主任,柳云为副主任,负责处理撤销后的善后事宜,并于 10 月 3 日开始办公。省级各机构也分别成立了结束工作组。

西康省撤销后,中共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书记。

成阿公路通车

11 月 10 日,成(都)阿(坝)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当天在刷金寺举行隆重典礼。

成阿公路全长 506 公里,沿岷江、杂谷脑河、梭磨河而上,穿越原始森林,三分之一以上线路要打通悬崖绝壁,工程艰巨。1951 年 3 月动工后,3 万余名军工、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 5 年艰苦奋斗,终于胜利竣工,结束了阿坝州没有公路的历史。

康藏公路、成阿公路的通车和宜(宾)西(昌)公路的施工(1957 年 1 月通车),沟通了四川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改变了四川的公路布局。

开始三州民主改革

12月初,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甘孜、阿坝、凉山三州代表的提案,通过了在三州实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同时进行民主改革的,还有西昌专区的87个彝族聚居乡及乐山专区彝族聚居的马边县。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彝、藏族地区坚持以团结上层为主的方针,以5年多时间,耐心地进行了加强各民族间及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扶持少数民族人民发展农牧业生产、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一系列工作。至1955年,广大彝、藏族人民包括部分进步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纷纷要求改革本民族社会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当年在藏族地区,先后发生农牧民群众针对农奴主的集体抗粮、抗差、抗债斗争达几百起。在凉山州,下半年仅几个彝族聚居县逃跑的奴隶就达4000多人次,他们要求人民政府保护,并集体写血书要求早日改革。

顺应彝、藏族人民的要求,1955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西康省委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在两省彝、藏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并接着在三州选择少数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1955年冬至1956年春,民主改革

在上述地区分批展开。

彝、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改革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在政策上本着从宽的精神制订,在步骤方法上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对奴隶主和封建主,除没收其耕地进行分配,解放奴隶,废除封建特权和高利贷外,对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等不予没收,若当地劳动人民缺乏而又确实需要者,由政府出钱购买再分发给农民。对奴隶主和封建主均不算老账,不挖底财,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以“保护过关”,并继续妥善安置上层人士,使之在改革后生活仍有保障。对寺庙的封建特权和财产采取更宽大的方针,政府不干涉群众对寺庙的差役负担,不动寺庙占有的耕地、枪支和高利贷,只要求不凭借这些枪支和特权去为非作歹。

但是,民主改革毕竟是一场消灭剥削制度的严重斗争,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宽大的政策,少数顽固的封建农奴主和奴隶主仍然坚持反对。1955年夏季,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索康、赤江等人,趁赴京参加全国人大返藏之机,在甘孜州逗留,召集部分上层人士秘密策划,布置在藏区发动武装叛乱。当年12月24日,凉山州普雄县申果庄的少数反动奴隶主首先发起叛乱,接着,武装叛乱在三州陆续蔓延。

武装叛乱的发生,打乱了“争取和

平改革”的部署,使党和政府被迫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平息叛乱的斗争。自此,

三州人民边平叛,边改革,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斗争。

1956 年

省内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

1月1日,四川第一个以取消土地入股分红、耕畜和大型农具入社为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繁县(现属新都县)禾登乡新民第一高级农业社成立。这个社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罗世发为社长,是在全省首批建立的新民初级农业社的基础上,联合周围4个村的6个初级农业社和几十户单干农民共同组成的。全社共731户社员,占有耕地5000余亩。这7个社在1955年均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增产。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出席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他着重讲明土地私有制是产生剥削、贫困和落后的根源,号召农民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向共同富裕。

内昆铁路内宜段动工

1月,内昆铁路内宜段动工,11月由内江开始铺轨。

内昆铁路原计划由成渝铁路的内江车站出发,跨川、黔、滇三省至昆明

市,全长824.4公里。整个线路分内江至宜宾市的安边、安边至威宁、威宁至昆明三段施工。后两段在开工后不久即停建,仅内宜段按原计划施工,并于1959年铺轨至川滇交界处的安边金沙江大桥北头。

内昆铁路内江至安边段,共长140.8公里,联系四川南部的内江、自贡、宜宾三个重要城市,对于促进川南地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钩虫病、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成立

2月,中共四川省委钩虫病、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成立,随即制订规划,积极开展防治。

钩虫病、血吸虫病是在四川相当一部分地区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疾病。领导小组成立后,建立了钩虫病防治实验所,组织专家在三台、遂宁、南充等地进行防治试点,在9个专区设立了钩虫病防治站、162个县设立了防治组,其人员、物资、经费均由省卫生厅直接调配。至1957年底的20个月内,全省治疗钩虫病人240余万人次,1958年又治疗2100万人次,治

愈了大批病人,使现症病人大为减少。对于血吸虫病,在经过几年的流行病学调查后,至1956年已基本摸清流行地区,在11个专区、77个县成立了防治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织1400余名医务人员奔赴各地工作,对消灭钉螺和治疗病人取得了经验,使防治工作迅速进展。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月30日,《四川日报》刊登全省各市、专署所在县的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的消息。

四川手工业历史悠久,1950年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2.2%。从1951年起,四川开始通过典型示范对手工业进行改造,从组织供销生产小组、供销生产社入手,逐步向生产合作社过渡,改变家长制的、师徒的、雇佣的封建关系和剥削关系为合作关系,改变个人生产产品的过程为社会生产产品的过程,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至1952年,重点城市试办了170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底以后,手工业改造进度加快。10个专区、99个市、县建立了手工业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干部,加强对手工业的改造。成都、重庆、遂宁等40多个市、县组织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10个重点城市成立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1955年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的兴起,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快进行,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作法,采取了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1956年1月16日,自贡市手工业27个行业的4300余名手工业者,宣布全部走上合作化的道路。18日,重庆、成都两市宣布实现手工业合作化。30日,全省各专区所在市县的手工业全部合作化。至年底统计,全省手工业合作组织共有1.2万余个,有职工40余万人,95%以上的城镇手工业者参加了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

社会主义改造使手工业生产面貌改观,当年产量、产值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并向现代化生产迈出了一步。但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形式单一,方法粗糙,把一些适合于个体生产、经营的手工业也纳入合作经济,造成一些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等问题。

私营工商业掀起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3月18日,《四川日报》刊登全省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消息。

1955年10月27日、29日,毛泽东主席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士谈话,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要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此,工商业的对私改造加速进行。12月,四川省工商联(筹)常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工商界掀起学习的热潮。同时,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两年时间完成全省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地、市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央指示,批判右倾思想,作出加速对私改造的决定。至1956年1月上旬,重庆、成都、自贡3市已有少数私营工商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部分私营经销、代销店经批准直接转为国营专业公司的门市部。

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全市私营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11日,重庆市工商联举行第三届第九次执、监委联席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指示,传达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精神,当晚全市金属加工等42个私营工商行业的负责人在公私合营申请书上联合签名,呈送市人民委员会。至15日,成都市43个行业(已批准合营的猪肉业在外)的一万多户私营工商业户、自贡市24个行业的近千户私营工商业户均已全部申请实行公私合营。16日下午,成都市人委举行第十三次会议(扩大),一致通过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同日,重庆、自贡市人委也宣布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分别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或组织合作商店。17日,重庆市8万余人、成都市7万余人、自贡市2万余人分别集会游

行,庆祝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

3个省辖市的对私改造,迅速推动了其他地区。1月30日,《四川日报》刊登消息:本省专区所在市、县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再隔1个多月,即到3月18日,《四川日报》发布消息:全省已有3个省辖市、8个县级市、148个县城和219个场镇的私营工商业经批准实现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累计全省私营工业共合营6863户,占总户数的91.9%;私营商业共合营43万余户,占总户数的95%以上。

由于对私改造进展迅猛,本应在合营前进行的清产核资、确定定息、处理债权债务等工作均未来得及处理,而留在下一步补做。

对公私合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经济改组及人事安排

3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三次对私改造工作会议,对企业合营后的清产核资、定息、人事安排及经济改组等问题作了研究,6月又派工作组到重庆、成都、自贡、长寿、五通桥、乐山等地全面了解情况,进一步作了部署。

按照省委前后几次的部署,各地对清产核资工作,采取了资本家自报,同业小组会议评议,职工监督,行业合营工作委员会审核,主管业务机关批准的办法进行。全省清产核资结果,私

股共为 6001 万余元。对原来私营企业的债权债务问题,实行了“从宽处理”、“尽量了结”的方针。对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以及从业人员逐步作了安排。到年底,公私合营工业方面共安排 16812 人,其中任董监事、经理和科股长的 1786 人,从事技术工作的 350 人,职员 1684 人,其他 12992 人;合营商业方面安排 32393 人,其中经理和科股长 12774 人,专职董事 146 人,职员 9267 人,其他 10206 人。在定息上,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亏,不分地区和行业,统一定为五厘。8 日,各地陆续发放了当年上半年的定息。至 10 月底统计,不包括西昌专区的工商业、达县专区的商业和五通桥盐场,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定息户共计 22623 户。

鉴于原有私营企业大都规模很小,布局分散,设备陈旧,合营后对部分企业进行了经济改组,采取带(大带小、先进带落后)、联(联营)、并(并厂、并店)、转(转变产品或经营品种)、汰(接受职工,安排资方人员,淘汰企业)的办法,进行统筹安排。据经济改组后统计,工业方面,全省以公私合营方式改造的有 2677 户,按合作化方式改造的 241 户;商业方面,实行公私合营的 50111 户,走合作化方式改造的 328784 户,由国营商业带进 3522 户。同时,各级政府对新增合营工业企业投资 230 余万元,用于改善生产条件

和兴建职工宿舍。1956 年新增合营工业企业的产值较 1955 年增长 34.32%,上缴利润增长 21.88%;新增合营商业和合作化商业的零售额较 1955 年全部私营商业零售额还增长 3.29%。

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进展过于迅猛,准备不够充分,形式过于单一,也带来一些后遗问题。在高潮中,相当部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当作资本主义工商户对待,混淆了劳动者和剥削者的界限,这些问题以后逐步得到解决。

成都量具刃具厂破土动工

5 月 15 日,成都量具刃具厂在成都市东郊破土动工。该厂重复使用并接受了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全套设计和建厂经验,采用先建生产厂房,后建生活设施的办法,是我国第二座制造现代化精密工具的工厂。1958 年 3 月,该厂建成投产,占地面积 36 万余平方米,成为生产多品种、多规格的量具、刃具、精密量仪、硬质合金刃具和数控刃具的国营大型骨干企业。

东山灌溉工程动工

3 月 4 日,东山灌溉工程(1966 年后改称东风渠)第一期工程开始施工。总干渠自郫县安靖乡府河引水,流量每秒 100 立方米。干渠穿越成渝铁路、成昆铁路、川陕公路、成渝公路,施工

难度较大。参加施工的各受益县民工 3.3 万余人,使用简陋的工具挖土,鸡公车运土,9 个月就挖土石方 160 余万方,于当年 10 月完工,使大片农田受益。

当年 10 月~1957 年 4 月,又完成了第二期工程;1958 年 2~5 月,完成了第三期工程;1959 年后进行了第四期工程。四期工程共修总干渠 54.8 公里,干渠 4 条,总长 226.3 公里,支渠 20 条,总长 580.7 公里,控制灌溉面积 102 万余亩,渠网笼罩了成都平原东南隅最后一角,直达平原边界处的龙泉山。

1970 年后,东风渠还进行了第五、第六两期工程,挖掘大隧道,穿越龙泉山,将水引到了成都平原外的仁寿、简阳等干旱丘陵区,使灌区范围扩大到 2849 平方公里,控制灌溉面积达到 223 万亩,大大扩展了都江堰灌区。

川剧剧目发掘整理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5 月,四川省川剧剧目鉴定委员会在成都进行第一期 50 个剧目的鉴定工作。此后还进行了若干次鉴定。

为贯彻戏曲改革的方针,1954 年底成立了“四川省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先后组织收集了 2000 多个川剧手抄本,抢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剧本,并组织人员逐个整理鉴定。至 1957 年,先后鉴定出剧目 321 个,编

印了《川剧剧目鉴定演出剧本选》共 11 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编印系列《川剧》共 88 辑。通过发掘整理,使川剧剧目更加丰富,剧本和演出水准有了很大提高。

川黔铁路动工修筑

4 月,川黔铁路动工修筑。川黔铁路自成渝铁路上的小南海站至贵州省贵阳市,全长 423.6 公里,是四川省的第三条出川铁路。该路自四川境内的低山缓坡丘陵地区,进入云贵高原东北部,层峦叠嶂,地势险峻,需要修筑的长 4270 米的凉风垭隧道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铁路隧道,白沙沱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的第二座铁路桥梁。四川境内的部分线路利用了改造后的綦江铁路。

川黔铁路动工后,1962 年曾一度暂停修建,1964 年复工,1965 年 7 月全线建成通车。

民航飞机试飞拉萨成功

5 月 26 日,中国民航潘国定、王珊机组驾驶北京—401 号飞机,试飞北京—成都—拉萨航线成功,突破了西藏高原的“空中禁区”。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1965 年 3 月,北京—成都—拉萨航线正式通航,对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宝成铁路南北段接轨，试办运营

7月13日，宝成铁路南段施工的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和北段施工的第四工程局在甘肃省徽县黄沙河实现接轨，至此，宝成铁路全线贯通。

宝成铁路于1952年7月2日动工（原名天成铁路，起点为甘肃天水，后因部分改线，改称宝成铁路），是四川的第一条出川铁路，全长668.2公里。沿线地质构造复杂，大部分线路穿越秦岭、剑门山区，14次跨越嘉陵江，仅四川境内的373.5公里线路，就需填挖土石2600余万方，修建隧道71座，大中型桥梁87座。参加施工的铁道部各局员工11万余人，土洋并举，机械与人工并用，学习苏联经验，广泛采用了新的爆破方法。在秦岭青石崖的施工中，一次就装填炸药334吨，爆破土石26万立方米，成为铁路建筑史上空前的大爆破。该路以甘肃黄沙河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先南后北分段施工。南段部分线路通车后，先期试办运营，发挥出显著经济效益。1954年2月成都至中坝段通车后，使旺苍、昭化等地煤炭得以大量供应成都一带，当年就使煤炭产量提高80%。1955年仅绵阳、德阳、新都等地，由火车通过广元转运余粮70余万吨出川。全线贯通后，原来经长江水路进出的物资、人员，大部分改经宝成铁路进出，沿线逐步出现了一些新兴工业城市。

宝成铁路全线贯通后，一面举办临时运营，一面针对一些不良区段及病害处进行全面整治。1958年1月1日，全线正式通车典礼在成都车站举行。

中共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

7月14~26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代表715名，由李井泉致开幕词，阎秀峰代表省委作《关于一年来主要工作概况和当前主要工作任务》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并选出朱德、王维舟、胡耀邦、李井泉等53人为四川省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由委员39名、候补委员13名组成。李井泉为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有李大章、廖志高、阎红彦、陈刚、许梦侠、阎秀峰。其后，中共中央又先后任命杜心源、赵苍璧、贾启允、杨超、杨万选、郭林祥、廖井丹、鲁大东为书记处书记，张力行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并先后调阎红彦到云南省工作，阎秀峰、陈刚到西南局工作，贾启允到贵州省工作。

本届省委任期直到1969年12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为止。

全面调整工农产品价格

7月20~25日，省人民委员会根

据国务院有关指示,对全省物价作了全面调整。通过调整,近3万种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平均降低3%,大米收购价格平均上升6%左右,其他粮种及部分经济作物的价格也相应作了调整。

这次调整物价,是考虑到宝成铁路即将全线通车、长江航运运价降低等因素,通过调整,以使本省与毗邻省区的物价进一步平衡,工农产品的比价进一步合理。

在工业品方面,调整的幅度因品种而异。百货价格平均降低4.03%,针织品降低3.25%,文化用品降低3.3%,纺织品降低2.55%,五金降低3.05%,医药降低4.54%,化工降低4.62%,海产品方面,约300个品种售价平均降低10%~15%。

农产品方面,全省158个县以上市场的大米收购价格平均上升6%左右。由于稻谷质量提高,技术改进后出米率提高,稻谷收购价的升幅高于大米,达到9.1%。小麦收购价平均上升6.54%,玉米收购价平均上升11.66%,豌豆、胡豆收购价分别上升7.1%、7.76%。

这次调整物价进行了充分准备。自本年第一季度开始,省人委有关部门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计算工作,并照顾到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如在边远山区,工业品销售价的降幅比一般地区大1%左右,农产品收购价的升

幅也较一般地区大;通过调整,工农产品之间的差价缩小10%以上。

民生、川江轮船公司实行公私改组

8月24日,公私合营民生、川江两轮船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实行公私改组,与国营航运企业合并。

民生和川江两轮船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以来,营业情况逐渐好转,由亏损转向盈利,民生公司1955年运量较1952年增加4倍。在对私改造高潮中,两公司私方人员和企业职工纷纷要求,进一步实行公私改组,加入到国营航运企业中来,以统一川江航运的制度和管理,适应运输任务不断增大的需要。这一要求得到批准。

实行公私改组的内容主要是:①取消“四马分肥”的办法,从1956年1月起实行定股定息;②民生、川江两家公司的长江总分支机构与当地国营航运部门合并,并由国营航运企业管理,但民生、川江公司名义、总经理室、董事会仍然保留;③对私方人员除量才录用外,还给以适当照顾。

实行猪肉定量供应

10月27日,成都市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扩大),决定在市内实行猪肉定量供应。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农民家庭饲养生猪量下降,加以生猪收购价格偏低,致使生猪产量有所减少。

1955年全省生猪产量较1954年减少约7.5%，1956年春季又比1955年同期减少约5%，广大群众购买力有所提高，致使城市出现猪肉供应紧张状况。成都市人委决定除采取措施增加生猪生产外，还对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等集体伙食单位，核实人口，按定量标准供应猪肉；对一般居民，采取划片定点供应的办法；对农民则采取由农业社在自养猪内自行留肉分配的办法；对饮食行业按照合理需要，编制计划，经过核定后，按计划供应。

此后不久，重庆、自贡两市及省内其他城镇也相继对猪肉实行定量供应。这一办法一直延续20余年。

全省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

1956年底，全省实现农业高级合作化，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元旦，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建立后，各地迅速发展高级农业社。1月中旬，成都市郊区宣布实现高级合作化；重庆市郊区除南桐矿区外，其他5个区的初级农业社也全部转为高级社。至3月份，全省已有1800多个以取消土地入股分红、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入社为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有不少是100户

以上的大社。

春耕后，建高级社的工作进入普遍布局阶段。各专、县纷纷作出规划，加强领导，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选择重点地区建立高级社。至7月底，全省办起6500多个高级社，基本上达到每乡一个。到9月中旬，高级社发展到13294个，入社农户达281.3万户，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30%，平均每社200余户，完成了布局的任务。

秋收后，各地由重点试办发展为全面铺开，采取联社、扩社、建社、升社、并社等形式，迅猛发展高级社。至年底统计，全省共建起17.5万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3%，超过全国87.3%的水平，较原计划提前一年多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全省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农业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9.3%，粮食产量较上年增加10%。但高级合作化的迅猛发展，使部分初级社尚未巩固，优越性还未得到发挥，就匆匆升级转社。高级社建立后，在经营管理上也过于强求单一，甚至把一些经营管理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妨碍了对合理的生产责任制的探索。这些都为以后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些遗留问题。

1957 年

宜西公路通车

1月10日，宜西公路通车。宜西公路东起宜宾，经昭觉至西昌，全长441公里。该线翻越大小凉山的分界岭——黄茅埂，横贯凉山腹地，把大、小凉山连成一体。没有公路时，每年靠人力背运至昭觉的食盐不到2500公斤，当地彝族人民长期缺盐。公路通车后，不但食盐得到解决，工农业产品差价也大为降低；凉山许多土特产品有了销路，彝族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宜西公路，连同已经通车的康藏公路、成阿公路，改变了四川的公路布局，促进了藏、彝民族聚居区的发展。

调整手工业合作组织

1月29日，中共四川省委批转内江市、广汉县、江津县等地经验，要求各地针对手工业合作化高潮中，手工业社规模过大、集中过多的问题，对手工业合作组织进行适当调整。在此以前，省手工业联合工作组在内江市、广汉县、江津县进行试点，将14个大社划分为28个小社，核算单位由15个分为43个，服务点由44个增加到120个，并有69户手工业户实行在社、组领导下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经

过推广试点经验后，各地普遍缩小了手工业合作社规模，增多核算单位和服务点，并将部分手工业户改为分散经营，自负盈亏。

2~3月，朱德到四川视察时，也强调要根据手工业特点抓好手工业生产，指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手工业生产也还会存在，这是个长期的事业。”

狮子滩水电站建成发电

3月，狮子滩水电站建成投产，装机容量 4×1.2 万千瓦。

狮子滩电站是重庆长寿龙溪河梯级电站之一，它与上洞、回龙寨、下洞共4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10.45万千瓦，其中狮子滩电站是梯级建设中的骨干工程，利用水头70米，水库集雨面积3020平方公里，总库容9亿立方米，坝高52米，坝长1104米，由北京电力勘测设计院设计，狮子滩水力发电工程局施工，于1954年6月动工修建，参加施工人数达4万余人。狮子滩电站及重庆电厂的建成，使重庆市1957年发电量比1952年增加31.06%，达到40756万度。

1958年，龙溪河梯级电站全部竣工投产，加上大洪河、桃花溪两电站共

同组成长寿电厂，总装机 14 万千瓦。当年 3 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亲临视察。周恩来对龙溪河水力资源的综合利用给予高度评价，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力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龙溪河成为我国第一条全流域开发的河流；狮子滩电站的成功建设，为新中国培养和锻炼了第一代水电设计、施工队伍。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访问成都

3 月 14 日，以威廉·西罗基总理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一行 34 人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张世杰陪同下来成都访问。正在成都视察工作的国家副主席朱德及夫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省长李大章及省、市党、政、军领导、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前往机场迎送。李大章陪同参观了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灌县都江堰、郫县犀浦第一农业社。代表团于 16 日离蓉飞往南宁。

开展整风运动

5 月 2 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 4 月 27 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确定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的初

步方案。13~16 日，中共四川省委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制定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风指示的计划。

在此以前，自 3 月份开始，四川各级组织便层层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了广泛认真的学习和讨论。省委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要求，整风运动要以毛主席的两个讲话为指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全面认真地检查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党和非党群众之间的关系，检查贯彻执行各项政策方针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通过整风，使上下级领导之间、党与政权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之间的矛盾都能发现出来，并加以很好的解决，特别要注意解决好党同知识分子及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工作上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作风，在农村工作上，更好地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计划还要求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作为整风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整风运动的方法，计划要求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开会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规定省级机关、大专学校和大型厂矿以上的党组织，从 5 月下旬开始整风，县一级从 6 月份开始。

5 月中、下旬，省委先后召集了省

级各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座谈会，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省级各机关党组织和各地市党委，也召集会议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研究。省委书记处书记分别到基层党组织中进行调查研究，为整风运动作好准备。同时，省委批准了省级各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并要求县以上党委均成立整风领导小组。

为帮助党组织整风，按照省委的指示，省委统战部于5月10日起，开始邀请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发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意见。在此影响下，成都、重庆两市委及成渝两地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教育、科技、文艺各界也纷纷召开类似座谈会，征求党外人士对党组织的意见。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派”社论《这是为什么？》。座谈会逐步发展到开展“鸣”、“放”、“大辩论”，批判错误言论。至6月21日，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共举行22次。至此，反“右派”斗争开始。

开展反“右派”斗争

6月上旬以后，反“右派”斗争在省内逐步展开，至下半年，又发展成为全民整风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中共四川省委部署开展党组织整风后不久，自5月16日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续发出内部指示，要求做好准备，在适当时机反击在整风中

暴露出的“右派”。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右派”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遂正式展开。《四川日报》随即陆续发表各界人士对“右派言论”的批判文章。14日，成都市5000余名工人积极分子，在北较场举行对“右派分子”及“右派言论”的声讨大会。23日，民盟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举行常委联席会议，号召盟员进行反右斗争及开展盟内整风。接着，民革、农工等民主党派也相继开会，发出同样号召。28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反“右派”斗争在省、市级机关、大专院校及大型企业展开。8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在中等学校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意见，各地、县机关和中学教师旋即从动员“鸣”、“放”入手开展反右，一些地方甚至将反右对象扩大到部分中学生。10~11月，省委相继发出《在全省工商界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意见》、《关于在党外上层人士中进行整风和反右斗争的意见》及《关于寒假期间集中小学教师进行整风、反右斗争的计划》，但决定对尚未进行及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进行反右斗争。

在反“右派”斗争逐步开展的同时，9月7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向全体农村人口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的计划,决定以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为中心,以举行大辩论的方式,在农村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开好各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为此,10月初省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14个工作团,分赴各专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四川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三级干部会议开好》。11月底至12月初,省委又相继发出《关于专县属工交财贸企业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部署的意见》、《关于专区新公私合营厂矿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关于手工业合作社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关于在公私合营商业、小商业、小贩中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从而使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了全民的规模和性质。

反右派斗争自6月上旬开展后,至1958年1月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批判党内高级干部57人以后逐步结束,基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于1958年春季告一段落。反右斗争开始后,就成为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运动中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进行,更加剧了政治空气的紧张,导致斗争逐步升级,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错认为敌我矛盾,把纯属工作上的问题或对领导机关、领导人员的批评意见,当作“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从而导致严重扩大化。

四川第一张地震观测图纸产出

7月1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成都光华村建立地震台,生产出解放以来四川第一张地震观测图纸,开始了有系统的地震预测研究。

李劫人重写《大波》出版

年内,作家出版社开始出版李劫人重写的长篇小说《大波》。《大波》,系李劫人30年代的旧作,1954年后,他以崭新的观点,开始重写这部作品,1957年完成上卷(后改称“第一部”),以后又陆续完成第二部、第三部,至1962年底病逝时,第四部尚未全部完成。《大波》与李劫人的旧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构成了19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四川社会史的宏伟画卷。

这一时期相继问世的文学作品,还有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小说集《夜归》,沙汀的短篇小说《卢家秀》、《过渡》等。不少青年作家也崭露头角,创作出一批诗集、散文集、短篇小说集等。

三州叛乱基本平息,民主改革基本完成

1957年10月底,凉山州的武装叛乱基本上平息,之后不久,甘孜、阿坝州的叛乱也告基本平息。与此同时,

上述地区的民主改革也相继分批基本完成。

藏、彝地区民主改革开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给予了多次指示。1956年7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四川藏、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等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1957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集会议研究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平叛和民改问题，再次肯定，“改革是完全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下得对的”，指出“人民群众同叛乱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平息叛乱是解放斗争”。指示要“边平叛边改革”；平叛中应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除对最顽固之敌进行军事打击外，主要采取开展停战和谈、进行规劝、组织军民联防等活动。

按照这些精神，三州各地干部与叛乱首领开展了和平谈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一次不成，再谈第二次，第三次，并宣布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大处理，一个不杀。凉山州雷波、喜德两县约40股叛匪中，仅1956年12月与政府达成和谈协议停止叛乱的，即有四分之三以上。各地进步上层人士、乡村干部及劳动人民，纷纷采取亲唤亲、友唤友的方式，向参加叛乱的亲友宣传党的政策，规劝他们返回家园。1956年3~4月间的20天内，凉山州即有5000余人经规劝后脱离叛匪。在平叛斗争中，三州40余万名农牧民参加了

劳动人民协会、农（牧）民协会，20余万名青年参加武装自卫队，与人民解放军一道开展联防，村村订立联防公约，使叛匪愈来愈陷于孤立的境地。凉山州于1957年10月底（甘孜、阿坝两州稍后）相继基本平息叛乱，共解除近7万名叛乱分子的武装，收缴各种枪支6.4万余支及大量弹药。在平叛中，不少彝、藏、汉及其他民族的干部、战士、积极分子为彝、藏族人民的解放献出了生命。

同时，民主改革先后分三期进行亦基本完成。100多万名奴隶和农奴获得了解放，大批耕地、牧场、森林、牲畜等生产资料回到了劳动人民手里，奴隶主和农奴主阶级的特权被废除，许多孤苦的奴隶和农奴得到安置。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为彝、藏族人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由于部分寺庙凭借封建特权进行叛乱，有的甚至成为叛乱的指挥中心，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党和政府决定于1958年冬至1959年上半年，在甘孜、阿坝两州开展以废除喇嘛寺庙封建特权为中心的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四反”斗争。

全省消灭天花病

解放以后，四川各地建立各种卫生机构，针对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开展大规模的预防接种工作。1951年春季，仅川西区种牛痘人数即达400多

万人次,占全区人口的 60%以上。在西康省边远山区,至 1952 年种牛痘人數达到 131.7 万余人,并培养了 4800 多名种痘员。至 1955 年,全省传染病死亡人数比 1950 年下降了 70%;天花从 1951 年报告发病 11584 人、死亡 2233 人,下降到仅发病 7 人,且无死亡。1957 年,布拖县发生全省最后一次天花病情(发病 108 例,死亡 2 例),此后省内再未发生天花病例。^①

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访问成都

12 月 31 日,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一行 15 人在外交部有关人员陪同下抵达成都访问,正在成都的国务院副总理贺龙,省长李大章及省、市党、政、军领导、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前往机场欢迎。吴觉迎一行参加了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典礼,游览了成都市内名胜。1958 年 1 月 4 日飞往昆明。

川粮外调进入高峰期

1957 年,四川粮食外调进入历史高峰时期。

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规定全国公粮和贸易粮中属于中央掌握的粮食,由中央

统一调度,地方负责保管。当年,四川首次调出大米,支援上海、华东等地。进入“一五”期间后,四川外调粮食逐年增加。1953 年调出粮食 5.49 亿公斤(贸易粮,下同);1954 年调出 8.67 亿公斤,当年全省参加粮食集运、加工的民工达 2000 多万人次;1955 年调出 15.80 亿公斤;1956 年调出 22.18 亿公斤;1957 年达到历史高峰,调出 29.22 亿公斤,占当年粮食征购量的 58.3%。四川调出粮食占全国调粮总量的比重也逐渐上升,1953 年仅占 7.9%,1955 年上升到 18.4%,1957 年则占到 34.7%。1959 年和 1960 年四川粮食减产,仍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外省(1959 年外调 24.65 亿公斤,1960 年调出 14.34 亿公斤)。从 1950 年到 1960 年,四川共调出粮食 148.75 亿公斤,供区遍及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

四川调出大量粮食,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调粮过多,省内农村留粮水平和城市口粮定量水平长期低于全国。

地质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1957 年,四川地质勘探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取得重大成果。

1950 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

^① 世界卫生组织于 1979 年宣布“全世界消灭天花”,四川省提前 20 年消灭了这一长期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疾病。

庆建立西南地质调查所,任命著名地质专家黄汲清为所长,乐森珥、常隆庆为副所长,当时只有地质职工 209 名。以后,西南地质调查所改为西南地质局,1954 年建立重庆地质学校,并成建制地将大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转业到地质战线。1956 年 9 月西南地质局划分为四川、云南、贵州 3 个省地质局。至 1957 年底,四川已有地质勘探单位 23 个,全省地质职工达到 2 万多名。

各地质队伍在四川盆地、攀枝花—西昌地区及川西北高原广泛进行了区域普查,相继完成了对攀枝花铁矿的勘探,发现了红格、白马、太和等大型和特大型矿床,构成了以后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基地和西南大型钢铁基地的宏大格局;探明了盆地内中梁山等一批煤田;完成了卧龙河、黄瓜山、龙女寺等石油、天然气重点构造的调查;探明了会理力马河镍矿,彭县白水河和会理大铜厂、通安等铜矿,汉源团宝山、会理天宝山、会东大梁子、宁南银厂沟等铅锌矿,天全硫铁矿,雷波磷矿,丹巴云母矿和石棉县的石棉矿。总计探明储量的矿种达到 13 种,矿产地 40 处,提交正式地质报告 43 份,发现一批新的矿产地和找矿远景区,同时进行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的勘察。

上述地质勘探在规模上是四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仅保证了“一五”

计划的需要,还为以后的更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

1956 年底,四川粮食产量和地方工业总产值,均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的指标。至 1957 年底,全面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

五年期间,全省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26.77 亿元,新建、改建、扩建了一批现代化的工厂、矿山、交通线路、车站码头和文化教育设施。其中属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项目共 22 个,其投资占全省投资总额的 68.1%。

1957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08.19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83.1%,平均每年递增 12.86%。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 1952 年的 27.2% 上升到 43.9%,其中重工业的发展最快。1957 年钢产量达到 35.4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6.08 倍;原煤产量 773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29 倍;发电量 6.78 亿度,比 1952 年增长 1.72 倍;水泥 22.1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4.02 倍;金属切削机床 586 台,比 1952 年增长 13.29 倍。工业门类有所增多,一些过去完全没有或基础甚为薄弱的工业门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在农业方面,这一时期的投资仅

占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1.8%，低于全国的水平，但依靠挖掘自身潜力，改进耕作技术，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取得较好成绩。“一五”期间，全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 1952 年的 1500 余万亩增加到 3200 余万亩，复种指数大为提高，粮食亩产提高 12.3%。1957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2130.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9.7%，平均年递增率为 5.3%。大部分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幅度增产，棉花增产 41.8%，油菜增产 45.8%，甘蔗增产 36.8%，水果增产 177.3%。由于限制过紧，农村副业生产未得到相应发展，个别品种甚至略有减产。

文教科技卫生事业有所发展。1957 年，高等学校发展到 22 所，在校学生由 1.5 万人发展到 3.8 万人，添置了许多新的科系；新建了一批中等专科学校，使中专在校学生较 1952 年增加约 4 倍；普通中学在校学生由 1952 年的 21.98 万人发展到 49.72 万人；小学由 4.79 万所发展到 6 万所

以上，在校学生由 526 万人发展到 648 万人。文化事业机构发展到 1000 余个，延伸到所有县及大部分区、乡。卫生机构发展到 9000 余个，较 1952 年增长两倍，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防治流行病、地方病的工作。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1957 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7.5 元，全民所有制职工人均年工资达到 498 元，扣除物价因素，分别增长 41.1% 和 36.3%。农业居民消费品购买力由 1952 年的人均 17.45 元上升到 27.84 元。非农业居民消费品购买力由人均 115.08 元上升到 136.97 元。城乡居民棉布消费量由人均 3.4 米增加到 5.7 米，猪肉由人均 6.6 公斤增加到 8 公斤。城镇人民储蓄总额年平均增长 28.1%。

到 1957 年末，全省人口总数已增至 7081 万人，较 1949 年末增长约 23.5%。

1958 年

批判领导干部中的“右派”和传达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

1月 21 日～2月 13 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前期继

续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反右派”斗争，以“攻击省委”或省委主要领导人等为由，批判了省级及成都、重庆等市、地和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领导干部 57 人，其中有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张文澄，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石，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贺惠君，四川大学副校长谢文炳等，他们在会期前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会议后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1月11～22日）精神，批判“反冒进”。2月12日，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向会议的报告中，根据八届三中全会和南宁会议的精神，否定了1956年7月四川省一届一次党代会上对工作中曾出现“急躁冒进情绪”的正确判断，指责这种判断“反映了党内少数同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对省委的“冲击”，是“否定成绩，不要集中”。会议根据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两本帐”的方法，要求在经济计划上实行“三本帐”，即计划指标分为公布的、内部要求的和少数领导干部“心里想的”。以后省、地、县层层实行这套方法，为向下递增的高指标开辟了道路。

北川地震

2月8日7时23分36秒，川西北北川县发生6.2级地震，震中北纬31°30'，东经104°00'，震中烈度7度，震源深度18公里。极震区在县城至苏保乡一带，面积约50平方公里，房屋有倒塌，人员有伤亡。茂县、安县、绵阳、江油等地屋瓦有震落，河堰有震裂。汶川、成都、崇庆、邛崃、广元、平武、黑水、小金及甘肃文县等地均有震

感。震后一月内相继发生8次有感余震。

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根据中央南宁会议和其后召开的中央工业会议的精神，中共四川省委于2月26日召开省级机关负责干部和部分地（市）委书记、工交部长会议，布置在全省厂矿企业中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次日，省委通知要求各条战线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这一运动。到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以后，运动达到高潮。各工矿企业纷纷提出生产新指标、高指标，并在“打破陈规”、“反对技术私有”等口号下，修改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制度，有的工厂还把这些制度作为“必须攻破的堡垒”，实行“凡是工人能管的交给工人，凡是车间能管的交给车间，凡是不可以合并的业务予以合并，凡是不可以简化的业务加以简化”，大量必要的管理制度被废弛。3月8日，在成都市召开省、市反浪费反保守促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7万多名职工参加。这次“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实际上成为四川“大跃进”运动的开端。

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

3月8～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

会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决定以“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通过了当年的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等37个文件。会期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视察了成都、重庆等地的一些工厂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川中发现油田

3月10日,历时约两年的川中石油勘探取得突破性成果,在横跨武胜、岳池两县的龙女寺构造上,龙二井于凌晨3时开始喷油,龙女寺以西的蓬一井和南充构造上的充三井也相继出油。4月,石油部在南充召开石油工作现场会,决定加强川中石油开发,并提出“有油要油,有气要气”的方针。10月,石油部决定成立川中石油会战指挥部,从新疆、玉门和陕北油田抽调大批钻井队入川,从当年到1966年,开展了三次找油找气“会战”,获得油田7个,气田26个,气井102口,并对四川油、气构造获得了新的认识。从1965年起决定在川勘探“以气为主”。

制订“大跃进”指标

4月16~21日,中共四川省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通过

《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而奋斗》的决议和《四川省实现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修正稿)》。大会全面贯彻中央成都会议的精神,集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争取提前3年或更早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争取5年内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要求5~7年内,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900万吨,农副业总产值达到97亿~103亿元,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127亿~145亿元。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已经远远脱离了现实的可能。^①

设置茂汶羌族自治县

4月2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茂县、汶川^②两县,设置茂汶羌族自治县。

农村工业大量涌现

为了实现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省一届二次党代会提出“大中小结合,以小型为主”、“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县县办厂,乡乡办厂”的方针,各地自4月份起开始“大办地方工业”,县、区、乡、社先后兴

^① 四川的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实际达到这些指标的时间,分别为1983年、1971年和1975年。

^② 汶川县于1963年2月恢复建制。

办起了农具厂、化肥厂、小煤窑等。据当时统计,到5月底,全省兴办企业14.8万个,到7月底就超过了42万个。由于各地县乡小工业企业的纷纷崛起,增加了工业总产值,改变了各地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其中少数基础较好、原料和技术条件比较具备的企业,以后发展成为当地地方工业的骨干;而大多数则由于仓促上马,受资金、原料、能源、技术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后来都未能继续办下去。

开展“文化大普及”

5月19日,《四川日报》发表题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促进文化大普及》的社论,指出:文化革命已经到来,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促进文化大普及,提倡生产到那里,文化到那里;中心工作做什么,文化工作就宣传什么;生产越紧张,文化越活跃。在此前后,城乡文化活动空前活跃,各种“赛诗会”、“赛歌会”层出不穷;新“诗人”、“作家”不断涌现,从事民歌和诗歌创作。仅叙永县群众就创作民歌1万首,而古蔺县竟达10万首之多。这种产生于“大跃进”运动中而又直接服务于当时政治需要的作品,其中也确有少数构思精巧且有一定技巧的创作,但其绝大多数只是以文艺形式出现的、反映左倾指导思想的政治宣传品,生命极其短暂。

中央在川企事业单位下放省管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下放企、事业和技术力量管理权限的要求,国务院于6月15日前将各部管理的在川企、事业46个和大专院校9所下放给四川省管理。

省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召开

6月26日~7月2日,四川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了李大章所作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张呼晨所作四川省1957年财政决算和1958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通过《四川省实现(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修正稿)》。会议听取并审议了赵方所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贺文玳所作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朱德、邓小平等117人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李大章为四川省省长,阎红彦、邓锡侯、赵苍璧、吴克坚(后未到任)、李斌、桑吉悦希(天宝)、钟体乾、张秀熟、张韶方、康乃尔、童少生为副省长;选举省人委委员41人。还选举赵方为四川省高级法院院长和14名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谷志标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会议根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精神，号召全省人民在更短期内把四川建设成中国工业基地之一，建成中国的农业高产区之一。会后制定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和第二个五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要求到1962年全省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赶上或超过全国1957年的产量；其中产钢800万吨，发电220亿度，生产机床5万台，分别约为1957年全国总产量的1.5、1.1和1.8倍；工业总产值达到460亿元～500亿元。

《上游》杂志创刊

7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理论刊物《上游》创刊，刘文珍任总编辑。《上游》出版至1961年1月停刊，共出版41期。

一批铁路开工兴建

从7月份起，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成昆铁路、川黔铁路和川豫铁路成都(都)达(县)段动工兴建。7月开工的有成昆铁路成都至峨眉段、峨眉至西昌间的几个重点工程和川豫铁路的成都青白江至达县段；9月开工的有川黔铁路的小南海至五岔段新线工程和五岔至赶水的旧线改造工程以及白沙沱长江大桥工程。本年全省先后上马的铁路干线和地方铁路支线共达100多条。由于项目过多，资金分散，上述工程除川黔路的珞璜至五岔段和白沙

沱大桥于1959年12月建成，以及1956年始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工程于1960年从内江通车到安边外，均于1960年经铁道部决定下马。成昆铁路1960年停工时已建成成都至青龙场61.5公里线路，其收尾工程和沙木拉达隧道工程仍继续施工，1962年全线停工。

农村中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次第出现

7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争取实现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八百斤的紧急通知》，认为“根据各地委预计，今年全省粮食作物可能比去年增产160多亿公斤，这样，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规定的粮食亩产400公斤的指标，我省今年就可能实现。”要求各地采取措施，保证达到这一指标。据事后统计，当年产粮还不到该通知估计的总产量的60%，实产粮食2245.5万吨，比1957年的实际产粮仅增长5.4%。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和要求，来源于从年初起对于农业生产层层下达的高指标。本年1月“南宁会议”以后，四川于2月要求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12%。3月“成都会议”以后，省委于4月提出争取三年或更早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全省亩产粮食超过400公斤。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省委于6月要求到1959年即

实现平均亩产粮食 550 公斤。到了 7 月,省委又发出这一紧急指示,要求在当年即实现亩产 600 公斤的任务。这些任务又层层以“第二本帐”的形式加码下达,推动农业“大跃进”。在层层高指标的压力下,全省上下普遍出现了浮夸风,在全国各地竞相争放“高产”卫星之际,四川新闻媒介也陆续宣传早稻亩产破千斤、双千斤的社、队、县,宣传“早稻跨过千斤点,中稻力争翻一番,晚稻亩产赶早稻,晚秋增产十倍半”等竞赛口号,“卫星”越放越大。9 月 29 日,《四川日报》报道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中稻并秧移栽亩产 82525 斤(41262.5 公斤),是为“大跃进”期间四川所放的最大“卫星”。瞎指挥也普遍出现,冬季小春播种开始,传统的耕作制度被随意改变,越深越好的“深耕”、越密越好的“密植”等措施在很多地区划一地推行。

钩端螺旋体病首次流行

7 月 12 日,温江县清平乡发现钩端螺旋体病例,并迅即蔓延至毗邻 14 个县(区),两周内发病率 17.5‰,病死率 1.3%。这是钩端螺旋体病在四川的首次大流行,由于未见历史记载,初期未能确诊。后经省内医务工作者和卫生部专派赴川的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会诊,确认为钩端螺旋体病后,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于 10 月制止了该病的流行。

建立西昌工业区和德阳工业区

8 月 15 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西昌成立西昌工业区建设委员会,以杨超为主任。西昌工业区的设立,最初由冶金工业部向中央成都会议所作发展钢铁工业的建议中提出,并列入国家“二五”计划项目,其目的为开发攀西地区钢铁资源,建设以钢铁、有色金属为中心的西昌工业基地。从内江、温江等地调集劳动力 6 万名以上,进行了广泛的地质勘察和规划设计,开展包括成昆铁路在区内的重要工程和西昌钢铁公司的建设,并开始生产一批成果。在 1962 年的经济调整中,西昌工业区下马,但它为 60 年代中期的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做了许多前期工作。

鉴于国家决定在德阳建立我国重型机械基地,中共德阳工业区委员会于 8 月 23 日成立,彭华为书记;次年 7 月 21 日,又成立德阳工业区建设委员会,以程占彪为主主任。新设德阳工业区的任务,为建设以西南重型机械厂(1959 年 5 月改称德阳重型机械厂,1960 年 12 月改称第二重型机械厂)为中心的机械工业基地。10 月 13 日,在德阳举行工业区建设动员大会,宣布西南重机厂和水力发电设备厂(1965 年改称东方电机厂)开工建设。至 1960 年 7 月,德阳工业区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1.75 亿元,重机厂厂房完成

45%，厂区 15 个施工项目基本完成 8 个，有 5 个车间局部投入生产。参加建设的有省内外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民工约 6 万人。1960 年因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国家削减基建投资，到 1961 年 5 月，中央决定德阳重机厂缓建，东方电机厂停建。1964 年“三线建设”开始以后，德阳基地的建设重新上马。1964 年 9 月 14 日成立德阳建厂指挥部，以白坚为总指挥，先后建成东方电机厂（1966 年）、第二重机厂（1971 年）、东方汽轮机厂（1974 年），使德阳成为我国重型机械和发电设备制造的重要基地。

除七害

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委于 9 月联合发出《关于深入开展除七害运动的通知》，进一步动员开展除害灭病运动，在 1956 年中央公布的《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消灭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之外，又加上钉螺、蟑螂和臭虫，要求通过运动限期消灭。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于 1956 年初公布以后，“除四害”已在全省逐步形成声势，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各地均成立除害指挥部，有的专、县还增加豹子、乌鸦、野猪等为“八害”、“九害”、“十害”，召开誓师大会，提出“突击十天，实现八无专区”一类口号，搞突击灭害。这场运动，由于动员群众广泛，消灭了大量老鼠和蚊蝇等疾病传染

源；但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提出极不切实的指标，特别是为了消灭本应保护的麻雀，不惜停工停课，在大范围内统一时间和行动，用“人海战术”轰打，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而且有害生态环境。据 1959 年 10 月统计，全省共消灭麻雀 4 亿余只。

传达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

9 月 7～11 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扩大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精神。会议通过《关于 1958 年钢铁生产的紧急指示》和《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的决定》。关于钢铁生产的紧急指示，把完成钢铁生产指标规定为“全党当前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有铁矿的县以上机关工厂等单位都要搞钢铁试验田；原有高炉区应在高炉周围加建一批小高炉，土高炉较多区应增加一些有机械设备的高炉，作为骨干，组织无数的高炉群；争取到年底建成 1000～1500 个有机械设备的高炉。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要求立即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月搭好人民公社的架子，10 月 1 日全省统一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会后，全省立即掀起全民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开展全民大办钢铁运动

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前夕和会议中间，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国家经委召开的电话会议精神，连续三次召开电话会议，检查钢铁生产情况。在第三次电话会议上，要求各地立即动员，像1956年领导合作化那样，全力以赴生产钢铁；地、市、州委书记要亲自挂帅，着重抓“土高炉”的建设和炼铁出铁。省委为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作出《关于1958年钢铁生产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全省大建土高炉、小高炉，掀起了全民炼钢炼铁运动。土高炉数量从9月中旬的1.5万多座上升到7万座以上，还建成“洋高炉”306座、平炉2座、电炉21座、大小转炉118座；全省的大小冶金企业由139个猛增到689个。全省上山炼铁的劳动力达800多万个。还发动了以群众“献废铁”为主要内容的“工业抗旱”运动。9月29日夜，根据各地上报当天产量的总计，加上“预借”次日的部分产量，凑成日产铁1.02万吨，产钢5500吨的“新纪录”。新华社于次日报道说，四川已成为全国第九个日产生铁“万吨省”。到12月12日，四川即宣布钢铁生产提前完成全年计划。据1959年初公布的全年产量：钢为70.29万吨，铁为88.88万吨。按国家下达的计划检查，分别超额4%和23.4%。后经核实，当年实产钢47万吨，铁56万吨，虽未完

成年计划，但比1957年分别增产32.8%和97.2%。

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虽然使当年的工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但在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一味追求高速度、高产量，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土法炼铁的成本极高，质量极次，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并且由于遍布全省的小高炉砍树炼铁和61万个公共食堂砍树煮饭，全省林木资源锐减，农业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由于各行各业“为钢铁元帅让路”，全社会人力物力大量超常投入矿业冶金部门，使直接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日用品工业部门发展受阻，群众生活直接受到影响；同时，大量农民参加炼铁和各种“大办”，直接影响当年秋收，不少地方粮食未能收起。并使城镇人口剧增100万左右，全民所有制职工增加280多万，工业劳动生产率则下降1/4以上。从1959年起，多数“土高炉”相继停炉，大批炼铁的农民陆续回到农村。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一直坚持到1960年。

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

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和省委八次全会的相应决议，四川广大农村掀起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到9月30日，全省除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共建立人民公社4821个，入社农户占

总农户的 96.69%，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到 10 月中旬，各公社共建立了 61 万多个公共食堂，95%以上的社员已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公共食堂化”。阿坝、甘孜、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虽然此时合作化运动刚刚起步，凉山、甘孜两州内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尚未彻底平息，但也受到公社化运动的强烈冲击。汉族聚居区迅即建立了公社；少数民族聚居的农业地区，初级社很快转为高级社，高级社又纷纷并社变大社，并且建立了近百个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牧区个体牧民有的办起“直升（高级）社”，有的也办人民公社。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各异，各州最终实现“公社化”的时间，也有很大不同。阿坝州在 1960 年，凉山州在 1961 年，而甘孜州则迟至 1972 年。

人民公社化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乡政权和公社的集体经济组织合而为一。相当于一乡或数乡规模的人民公社成为基本核算单位，把原来合作社的公共财产、公共积累和储备粮一律收归公社，实行“多不退少不补”；农民的自留地收归公社，自养猪只也折价（大部分记帐）入社。从而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集体财物，无偿调拨社员个人财物）”的“共产风”。大炼钢铁抽调大量农村劳动力，规定自带口粮，不发工资，只记工分，回社分配；大办钢铁和

办食堂又无偿砍伐集体和社员的林木；搞集体饲养场无偿调用社员的木料，牵走社员私养的家畜；搞“大协作”无偿调用人力、口粮、农具和车辆；搞公共食堂无偿调用家具、厨具和餐具等。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劳动力按军队建制组成班、排、连、营，在生产劳动中实行“大兵团作战”。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办法，“工资”部分不仅比例很小，而且多数公社很快就无力兑现；特别是规定社员必须在公共食堂吃饭，社员家庭的基本生活完全仰赖于集体经济。所有这些，都在事实上形成土地、粮食、资金、劳动统一拉平，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从而否定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为以后四川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川运动员首次打破亚洲纪录

9月13日，四川运动员刘兴玉在罗马尼亚国际田径赛上以 5.83 米的成绩打破女子跳远亚洲纪录。这是四川运动员首次打破亚洲纪录。

大办教育

到本年秋，四川新建高等学校 40 所，其中规模在 200 人以下的 25 所，不少是专区、厂矿和医院等兴办的。县

及县以下大搞“文化县”，实行“公办民办同时并举”的方针，兴办学校甚至高等学校。各地还办了 800 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农村兴办的职业中学招生达 25 万余人。全年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上年的 709 万人猛增到 1044 多万人，其中中等学校学生增加近一倍。中等专业学校也急剧膨胀，1960 年比 1957 年增长了 3 倍。部分专业学校还开办大专班，以后又升格为专科学校。全省教育事业的畸形膨胀，导致教育质量下降，财政负担加重，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当年普通教育经费减少 1300 万元，到 1960 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在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从 1957 年的 29.5% 下降到 9.7%。

至 1960 年，四川又新建一批高等学校。主要有：

为配合川中油区的开发，于 1958 年 11 月 1 日在南充成立四川石油学院，为石油工业部直属院校。当年招生 643 名，设 3 个系、7 个专业。学院后改名为西南石油学院。

1959 年 5 月 4 日，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扩建为四川外语学院，为省属外语高等院校。俄文专科学校的前身为 1950 年建立的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俄文训练团，1952 年改建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俄文系，1953 年改为俄文专科学校。四川外语学院除俄文外，增设英、法、西班牙语专业，1978 年又增设日语专业。

重庆邮电学院，为邮电部直属高等院校。学院前身为 1953 年 3 月 1 日川东邮政局开办的邮政及邮电人员训练班，1951 年改为西南邮电分校，1953 年改为重庆电信学校。学院本年 9 月招生 150 人，设 2 个专业。

四川音乐学院，为文化部直属高等院校。学院前身为 1939 年开办于郫县的戏剧音乐实验学校，1940 年并入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53 年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合并，改称西南音乐专科学校。设 6 个系，27 个专业。

西南美术学院，为省属高等院校。前身为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于 1953 年由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和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合并建成。设 4 个系，9 个专业。

1960 年 3 月 10 日，四川农业机械学院建校，当年招生 300 名，设两个专业，学生借读于西南农学院。1961 年定校址于郫县。1983 年更名四川工业学院，为省属高等院校。设 6 系、1 基础部、1 分部、7 本科专业、4 本科专业班。

重庆交通学院也于本年建校，直属交通部。学院前身是 1951 年 11 月成立的西南交通专科学校，1954 年改为重庆公路工程学校。1973 年并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78 年 12 月恢复。设 4 系、9 专业和基础科学部。

举办第二届全省体育运动会

10月2~9日,四川省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在成都举行,21个代表团的1605名运动员参加了10个项目的比赛。

撤消遂宁专区

10月18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遂宁专区,辖县分别划给绵阳、内江两专区。

在成都建设飞机和无缝钢管工业

10月18日,峨眉机器厂和新都机器厂在成都举行开工典礼。两厂分别为生产歼击机和歼击机发动机的大型骨干企业,于1964年基本建成投产。从当年制造出第一架亚音速歼击机和第一台涡喷—6型发动机以后,到1985年制造出第一架全天候歼击机,使四川具备生产多种型号歼击机和飞机发动机的能力。

10月19日,成都无缝钢管厂动工兴建。1961年后,各主要车间陆续投产。到1985年,该厂生产能力钢29.8万吨,热轧无缝钢管20万吨,冷轧冷拔无缝钢管2.5万吨,热扩无缝钢管1万~3万吨,是国家重点钢铁企业之一。

试验“工会消亡”

10月26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李颉白在川考察工作时提出,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工会的工作将被公社所取代,应该“为工会消亡而奋斗”。31日,省委批转成都三个工厂的劳动制度试行简章,其中规定工会不再吸收固定会员,停收会费,工会工作主要通过职代会进行。12月31日,省工会又提出《关于县以下工会消亡的意见》,要求县以下工会根据不同情况,或“立即消亡”,或“自然消亡”,或准备条件消亡。此后,省内一些县工会宣布撤销,一些县工会与其它机构合并,一些县保留少数干部准备结束工作。不少县以上工会也受到影响,有的停止了活动。这一变动引起广大工会会员和干部的不满,到1959年2月,省委批转省工会的处理意见,规定工会组织已建立的不撤销,未建立的不建立,已撤销的不恢复。到全总于6月开始检查纠正这一问题后,省工会于7月召开会议,决定直属以上厂矿和县属地方国营企业可以建立工会,工矿企业和职工人数较多的县可以建立或恢复工会。

商业部门实行“大购大销”

10月,四川省商业厅发出《关于适应新形势,开展大购大销,组织商业工作再跃进的意见》。此后,商业部门就对农产品就社收购,就社加工,就社保管,对工业品就厂收购,有产即收。同时大量压缩紧俏商品库存,实行“大

销”。这个方针实际上推行到 1960 年。一方面加剧了“大跃进”中生产萎缩而形成的商品短缺，一方面又积压了大量无法销售的产品，还形成大量有帐无物的“死帐”。

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到 1962 年 7 月，四川分院和云南分院、贵州分院合并为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1978 年 3 月，又改建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

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成立

11 月 13 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

1959 年

传达贯彻两次郑州会议精神

1 月，中共四川省委继上年年底的四级干部会议后，召开第一届第九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1958 年 11 月）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1958 年 11～12 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定用五个月的时间，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对干部群众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澄清错误思想，明确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同时规定 1958 年的收益分配仍以原来的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全会通过的关于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在全面肯定“大跃进”的同时，承认经济战线的某些环节出现过失调，要求当年作好国民经济的衔接平衡，避免过分紧张和长期经济失调。

3 月 13～22 日，省委又召开六级

干部会议，贯彻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2～3 月）精神，集中讨论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作出《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修正草案）》，根据中央精神确定了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对基本核算单位，规定由公社放到管理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此以后，全省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从建社初期的由公社“共产”过渡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4 月，省委又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作出《关于人民公社算帐退赔的指示》，规定对公社建立以来的旧帐，原则上都要算，平调社员的财物要退赔。此后，农村中的“共产风”受到一定抵制。

川粮紧急外调

从年初起，四川即按照中央部署，紧急向省外调运粮食。自 1 月 17 日～

3月6日,省委三次召开电话会议,布置组织运输大军,突击调运粮食。到3月底,全省有调粮任务的11个专区及所属各县均成立调粮指挥部或办公室,组织调粮。5月18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又令沈阳、成都、武汉三大军区(8月又增加济南、南京军区)抽调军车协助四川调粮。1960年夏季,全国粮食进一步紧张,中央于5月份起一再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包括四川在内的粮食调出省抓紧突击抢运,确保主要城市的供应。四川为此千方百计筹集粮食,从1958~1960年三年中,向中央上交粮食587万吨,超过同期全省购销余额233.6万吨。

推行“少种、高产、多收”

小春播种以来,各地按照1958年11月省委《关于开展1959年农业大面积高产运动的指示》,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6月,省长李大章在省二届二次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贯彻执行多种多收和少种高产多收同时并举的方针”,实际上收回了前一口号,但已影响了粮食特别是薯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4176万亩,比上年少种2481万亩。

开展“保钢协作竞赛”

从2月起,乐山龙池煤矿为保证附近强华钢厂产钢所需焦炭,提出“坑

井保焦场,焦场保强钢”的口号,实行突击增产,取得短期缓解焦炭供应的效果。地区立即推广这一经验,开展以钢铁厂为中心,把煤矿、铁矿、交通运输等部门联合起来的综合协作竞赛。4月8日,四川省召开广播动员大会,动员全省职工开展“以钢为纲,大力保钢大联合协作竞赛”,把这一运动推广到全省。4月27日,又发布《关于立即开展钢铁战役的指示》,从5月到7月开展三次“钢铁战役”。由于作为“龙头”的钢铁生产指标虽从年初省委一届九次全会要求的140万吨下降到9月省委十次全会的100万吨,仍然为上年实绩47万吨的两倍以上,使作为“龙身”、“龙尾”的其它相关行业持续紧张,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当年实际产钢62.6万吨,比上年增长33.2%,社会总产值增长14.3%,而国民收入则下降5.1%,农业总产值下降11%,粮食产量下降29.5%。

撤销五通桥市和雅安市

3月22日,国务院决定撤销五通桥市和雅安市,其行政区分别由乐山县和雅安县管辖。

发布农业生产八条规定

4月19日,省委发布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八项规定,严格规定了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和密植规格,以确保实现当年农业指标的实

现。指示要求各地“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亩产万斤（5000 公斤）粮食的高产竞赛推向高潮。中共中央于 4 月 26 日把这个文件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并在批语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八条规定”的推行，使农村中“瞎指挥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害。

泸州等地实行解散公共食堂等恢复经济措施

5 月，中共泸州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决定解散公共食堂。会后，全地区的公共食堂大部分解散。泸州解散公共食堂的措施，来源于年初中共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等对于农村情况的调查。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公共食堂和当时实行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严重影响群众生活和挫伤生产热情，因而先在富顺县，后在全地区，支持了农民的要求，同意停办了食堂，并把猪只一律退给私人喂养，把食堂的蔬菜地、饲料地下放给社员作自留地。在农业生产上，降低了不切实际的包产指标，划小承包单位，在生产队下设固定性的生产小队，每队一般 8~10 户，有的 3~5 户，实际上成

了核算单位。同时在纳溪县还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

类似泸州的措施，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出现。中共江津地委书记张凤伍于 4 月批准颁发了一份推行两个县关于生产小队职权范围规定的文件，把生产队下面的临时作业组固定为一级，形成了公社体制的“四级所有”。全专区 8 个县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这种改革，在实施中又把这种作业组从生产任务承包单位发展为对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实行“两固定”、“三固定”、“四固定”的核算单位。

泸州的措施在本年开展的“反右倾”中受到严厉批判。江津的作法则于 1960 年才被发现，江津地委于当年 12 月在省委领导下召开会议，把它定为“右倾倒退错误”。

讨论毛泽东《党内通信》

4 月 29 日，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写信（即《党内通信》），鲜明而坚决地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上面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5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此信用电话传达到中共四川省委。4 日和 9 日，省委在重庆和成都分别召开了地、市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党内通信》。对于如何传达《党内通信》，李井泉书面指示说：“主席六条

指示,可以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变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嗣后,省委于5月16日把两次座谈会的记录稿印发各地。其中说,四川省1959年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中规定的密植规格不拟再改,《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我省今年630亿公斤粮食的计划指标不能动摇”。

其时,带领中央工作组在新繁县(于1962年并入新都县,为新繁镇)大丰公社驻点调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仍将毛泽东的这封信传达到公社社员,并让农民在插秧时不顾上面的密植规定,自行决定如何裁插。

决定下放家畜家禽饲养权但不再恢复自留地

5月7日和6月11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紧急指示和通知,规定下放猪只和三类农副业产品经营权,恢复社员自留地。6月17日,省委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必须认真把几项权力下放到生产队的规定》,指出本省已给公共食堂和专业养猪基地留了一定数量的菜地和饲料地,如果恢复自留地,会影响公共食堂的巩固,因而决定只下放猪只所有权和三类农副产品的经营权,不再恢复自留地。由于没有给农民

恢复自留地,上述下放家庭养猪和经营农副产品等权力的决定,实际上未能落实。四川农民的自留地,到1961年2月开始调整农村政策时才重新划给。

省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召开

政协四川省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于6月23日~7月2日召开。会议选举李井泉为主席,廖志高、但懋辛、程子健、张曙时、李筱亭、徐崇林、彭劭农、果基木古、夏克刀登、龚逢春、余际唐、彭迪先、田一平、华尔功臣烈为副主席。

四川男女运动员首破世界纪录

6月27日,四川运动员王建业在六省区跳伞比赛中与两名省外运动员合作,以平均距靶心2.99米的成绩,打破男子1000米集体定点跳伞的世界纪录。这是四川运动员首次打破世界纪录,也是中国运动员首次打破这项世界纪录。

6月29日,在同一比赛中,四川运动员王素珍、赵成英与另一省外运动员合作,以平均距靶心7.003米的成绩,打破女子600米集体定点跳伞的世界纪录。这是四川女运动员首次打破世界纪录。

川剧团出访东欧

7月30日,以著名川剧演员陈书

舫为团长的中国川剧团启程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访问历时 124 天，在 40 个城市演出 69 场，首次把川剧艺术介绍给欧洲观众。

水旱灾害袭击全川

7 月～9 月，盆地东部江津、重庆、涪陵、万县、达县等市地和南充地区、宜宾地区东部、绵阳地区南部出现严重伏旱，共 56 县受灾。

8 月 9～21 日，盆地西部、南部 35 个县连降暴雨，暴雨中心雅安降雨量达 397 毫米，岷江、沱江水位暴涨，金堂县赵镇被淹没。

开展“反右倾”运动

8 月 30 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举行第一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9 月 13 日会议移至重庆继续召开，9 月 26 日结束。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对中共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和省计委副主任张戟等 50 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揭发批判，并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关于泸州地委以邓自力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反右倾”运动在全省普遍展开，各专区和县市层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长一级约

16 万多名干部。11 月，四川省委又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并连续发出指示，进一步扩大了“反右倾”运动的范围。12 月，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在全省农村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群众运动，要求召开社员大会，对“农业是否增产”、“公共食堂好不好”和养猪、自留地等问题，组织讨论和辩论，并确定重点对象进行揭发批判。与此同时，省委又发出《关于在工矿交通企业继续深入开展反右倾斗争、准备迎接 1960 年工业生产大跃进的指示》，指出在一些工交部门中和企业中，反右倾不得力、不彻底，生产、工作没有起色。因此，必须对所有工矿企业和大企业的车间以上的领导班子中的右倾思想活动，彻底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工交企业的一般干部和职工中，则开展以总路线和两条道路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贯彻执行四川省委上述指示的过程中，很多干部、群众受到冲击，特别是很多基层干部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在省、地（市）、县三级机关，直属以上厂矿和中等以上学校党员干部中，受到重点批判的有 2951 人，其中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有 102 人。11 月 12 日，省委书面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情况称：“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

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所没有的”。 “反右倾”运动中断了本年年初开始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大跃进”的错误继续扩大和发展。

杜心源、赵苍璧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杜心源、赵苍璧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同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副省长阎红彦调云南工作。

四川运动员在全运会上获10枚金牌

在9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会上,四川运动员获得男子篮球、滑翔乙组两项集体冠军和8个单项冠军。男子排球获亚军。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访问成都

10月10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道比·伊斯特万一行10人,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邀请,由国

家副主席董必武、农垦部长王震陪同,乘专机来成都访问。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大章、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及省、市党政军领导到机场欢迎。伊斯特万在董必武、王震、李大章等陪同下参观了由匈牙利援建、正在施工中的成都无缝钢管厂工地及灌县都江堰等。13日离蓉飞昆明。

《红旗》杂志发表李井泉文章

10月16日出版的《红旗》20期,刊载李井泉的文章《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根据当时四川实行人民公社化的调查材料,批驳“右倾机会主义”。

少年英雄刘文学遇害

11月18日,合川县少先队员刘文学在与偷盗公共财物的地主分子搏斗时遇害牺牲,时年14岁。他被追认为优秀少先队员,他的事迹在省内外受到广泛宣传。

1960年

制订规划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1月7~17日)关于八年完成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要求,

中共四川省委于1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发展公社经济,为逐步过渡到基本公社所有制创造条件。规划当年公社一级经济的比重,由上年的15%左右上升到25%左右,三年达

到 40% 左右, 五年达到 60% 左右。通知预计, 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约需五年到十年时间(在 2 月召开的省一届三次党代会上, 又把这个时间改为“五年左右”)。此后, 农村再次刮起了“共产风”。

规定农村粮食由管理区统一管理和废除旧粮票

2 月 8 日, 粮食部在南充召开南方各省农村安排群众生活经验交流会, 总结推广南充地区由管理区集中管理粮食的经验。4 月 26 日, 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粮食由管理区(生产大队)统一管理的十项规定》, 规定从当年小春粮食收获时起, 凡属管理区所有制范围内的所有粮食(包括薯类), 一律由管理区统一验收, 统一管理, 统一分配, 任何个人不得擅自食用。《十项规定》嗣后以各县人民委员会的布告张贴发布。管理区统一管理粮食的规定, 强化了公共食堂制度, 使农民完全没有机动支配粮食的权力, 加剧了农村的粮食困难。

为了减少城市粮食消费, 经省人委批准, 省粮食厅于 9 月 1 日发布关于发行新的四川省粮票和废除旧粮票的通告。四川省原有地方粮票开始发行于 1955 年 11 月 1 日, 至作废时止, 还有 4800 万公斤在居民手中。作废粮票的规定, 实际上否定了粮食“节余归己”的政策, 失信于民, 并且削弱了居

民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自救的能力。

提出“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持续跃进口号

2 月 25 日 ~ 3 月 2 日, 中共四川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当年继续“大跃进”的精神, 提出了“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 为实现 1960 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的口号, 要求全省所有的县和所有的生产单位迅速赶上“先进县”和“先进单位”的生产水平, 实现“生产建设的持续跃进”。会议制订了 1960 ~ 1962 年全省工农业生产发展目标, 提出“再战三年, 为把四川建设成为国家的后方基地打下基础”, “力争二三年内, 为国家建立一个粮食储备基地打下基础”。要求到 1962 年, 钢的年产量达到 230 万 ~ 250 万吨, 粮食年产量达到 4150 万 ~ 5000 万吨。要求当年产钢 135 万吨, 产粮 4000 万吨(1959 年实际产钢 62.6 万吨, 产粮 1582 万吨)。会后, 全省即在会议制订的高指标的督促下掀起“持续跃进”的高潮。

朱德到川视察

3 月 4 ~ 18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到四川视察。他在重庆、成都、南充等地视察了工厂和学校, 听取四川省和当地负责人的汇报。9 ~ 11

日,他回故乡仪陇县,在旧居对地方负责人说:“不要办我的展览,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好不好?现在就改!”

开始《四川省志》编修工作

3月,第二届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根据程子建、张秀熟、康乃尔等的建议,决定成立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负责编纂《四川省志》。6月1日,省志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大章任主任委员,程子建、张秀熟、康乃尔任副主任委员。在省级各部门抽调工作人员近200人,开展大规模的地方志编修工作。《四川省志》尚未及成稿,即逢“文化大革命”,四川省的地方志工作从此中辍。1972年12月,省革委批准撤销省志编辑委员会,工作人员大部分遣散。

部署“整顿落后”

3月26日~4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南充(后移重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改变落后县、区、社的面貌”问题。决定开展工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公共食堂普遍化等“六大群众运动”,坚持“持续跃进”。3月26日,省委在中共江津地委关于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报告批示中指出,全省约有10%的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处于落后状态,应当采取批判或撤换这些单位“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干部的办法,予以整顿。三级干部会后,

各地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实行“整顿落后”。6月11~21日,省委又在重庆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5月发布的在农村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布置在农村基层组织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纠正“共产风”;15日又发出关于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的指示。为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省委于11月24日~12月5日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再次“整顿落后”,重点对约占公社总数20%的“三类社”进行整顿。

上述运动,特别是春冬两次“整顿落后”的斗争,都在那些被认为“坏人当权”的单位,“揭开盖子,夺回政权”,大批“集训”并撤换农村基层干部,在县以上的干部中也处理了一批“死官僚主义分子”,使大批干部遭受错误打击。

采取措施增加农村劳动力

鉴于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省委于4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暂停县、区、社基建工程,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至9月,约有400多万人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再次号召“大办钢铁”

4月14~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万人规模的全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六级干部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代表省委作《大办钢、铁、煤、运，大力支援农业，大搞技术革命，把工业生产推向更高峰》的报告。布置当年产钢150万吨的任务，紧急动员，准备再一次开展1958年那样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要求年内全省一百多个有煤、铁资源的县都建起小高炉和小煤窑，没有资源的则采取划“飞地”的办法，跨县办钢铁。在5月召开的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省长李大章又向全省正式动员“继续开展和提高钢、铁、煤炭、交通运输小洋（土）群的群众运动”，还要求包括轻工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都要办煤矿、办铁厂。但是，从5月起，全省钢铁生产继续下降，省委于7月16日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共抽调15万名劳动力到铁、煤和短途运输部门，并于次日起发起“夺钢大会战”。至年底，全省钢产量达68万吨，比上年增长86%。

在4月的六级干部会上，还对生产未达指标的重庆钢铁公司等一批企业、车间、班组的负责人进行严厉批判，重钢党委书记安以文等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停职或调离。

刘少奇到川视察

国家主席刘少奇于4月底至5月上旬到四川视察，听取了李井泉等对于四川经济情况的汇报。李井泉在汇报农业问题时，着重报告了蔓延于农村的“肿病”和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组织调查和部署治疗“水肿病”

4月5~11日，省委除害灭病小组召开地、市、州委文教书记会议，提出“限期消灭肿病”的任务。1958年，眉山等地农村发生“水肿病”（亦称“肿病”），1959年春，各地时有发生，当年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加。到1960年初，在全省140个县流行，当年人口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其中65个县超过-50%，41个县超过-60%，23个县超过-70%，17个县超过-80%，8个县超过-90%，石柱、荣县、涪陵、秀山、酉阳、荣经、资阳七县超过-100%。4月会后，省卫生厅厅长潘阳泰奉省委指示，带领专家小组到“发病”严重地区进行为期一月的调查，确认“水肿病”的病因是“营养不良”（即食物不足）。省委于6月6日批转了潘阳泰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地注意解决。但是由于全省粮食形势继续紧张，“水肿病”直到1962年才停止蔓延，1963年以后，再无新发。

成都电视台建成

5月1日,成都电视台建成试播。成都电视台筹建于1958年,由成都市负责牵头,组织有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单位参加的筹备组。1971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电视广播实行中央和省两级覆盖后,成都电视台于同年7月划归四川省广播事业局领导。1973年10月1日,播出彩色电视成功,以黑白和彩色兼容播出节目。1978年7月,成都电视台更名为四川电视台。

屈银华登上珠穆朗玛峰

5月25日4时20分,中国登山队首创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世界纪录。登山三人中,有四川林业工人屈银华。

撤销泸州专区

7月14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泸州专区,所辖市县划归宜宾专区管辖。

全省遭受旱涝虫灾

7月中旬,盆地东部江津、重庆、涪陵、万县、达县及南充、宜宾等地、市出现严重伏旱,46县受灾。旱象至9月中旬开始解除。

7月29日~8月2日,盆地西部34个县连续5天下阻塞型大暴雨,暴雨中心在安县、绵竹、什邡一带,降雨

量300毫米以上。大渡河出现特大洪水,乐山一带低洼地区受淹。天全县沙坪因暴雨引起泥石流,冲走学校一所,脚基坪硫磺厂因泥石流死亡200人。

本年内,省内还遭受大面积螟虫灾害,江津地区受灾面积在50%以上,宜宾、温江地区分别达到40%和60%左右。受灾的46.7万公顷迟中稻、33万公顷双季晚稻和1667公顷一季晚稻,成灾面积均达50%,共损失稻谷26.9万吨。

决定公共食堂“不能散伙”

8月12日~9月14日,中共四川省委举行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当月10日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全省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会议针对当时各地公共食堂陷于瘫痪的问题,继续提出“反对右倾畏难情绪”的口号,决定公共食堂“不能散伙”。

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成都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中共中央西南局9月在成都成立,李井泉为第一书记,李大章、廖志高、阎红彦、周林、张国华、于江震、陈刚、阎秀峰为书记。

推广“火线整风”

鉴于多数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冶金、煤炭企业生产进度远远落后于生

产指标,中共四川省委于 10 月 4 日发出文件,推广重庆钢铁公司、鱼田堡煤矿实行“火线整风”的经验。重钢自 4 月省六级干部会受到批评以后,在本公司处级以上干部中继续开展以检查批判“右倾思想”为内容的整风,旋即推广鱼田堡煤矿的经验,广泛开展“火线整风”,实行“班班反,炉炉反,哪里上不去就在哪里反”。“火线整风”在全省推行以后,大批企业干部甚至工人受到错误批判,仅重庆钢铁公司受到批判的工人就有 691 人。

在农村清查“瞒产”

10 月 25 日,中共四川省委批转中共苍溪县委的报告,指示在全省开展对粮食的“一查、二定、三补”^① 运动。四川农村粮食困难的情况,自 1959 年起即逐渐暴露,与当时显示粮食大增产的浮夸统计形成尖锐矛盾。当年“反右倾”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即按照对粮食“高产”的主观估计,在很多地方开展了“反瞒产”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以“瞒产私分”为由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而且由于经过斗争“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当年产粮数量虽然仅有 1528 万吨,比 1958 年下降约 30%,当时竟公布为 3500 万吨,夸大

了 1.2 倍。按照夸大了的产量征购的结果,使当年征购数占实际产量的 48.9%,比 1953~1958 年平均征购率高出 18 个百分点。在此次“一查二定三补”运动中,全省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工作队,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实际上是搞更大规模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再次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并使当年粮食征购率维持在 46.2% 的极高水平上,从而加剧了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困难。

松潘地震

11 月 9 日 18 时 43 分 42 秒,松潘县樟腊发生 6.7 级地震,震中为北纬 32°47'、东经 103°40',震中烈度大于 9 度,震源深 5 公里。极震区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房屋倒塌 733 间。大屯后山地裂缝带长 400 米以上,宽约 5 米。松潘、平武、黑水、北川等县有震感。

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从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四川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基本建设。总计基建投资 57.3 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 2.1 倍。三年间,工业总产值递增 31%,其中重工业总产值递增 58.8%;而由于农业政策的

^① 查,即查面积、比总产,查苗稼、比亩产,查入库、比落实;定,即按查出的存粮数字落实征购任务后,定口粮、饲料粮和种子粮;补,即发动群众搞代食品等弥补不足。

失误，同期农业总产值却递降 5.4%，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到 1960 年底，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总产值较 1957 年分别增长 2.8 倍和 2.6 倍，食品工业则下降 2.5%，日用生活必需品灯泡、火柴、肥皂、保温瓶产量大幅度下降。由于几年来强调“以钢为纲”，工业各部门都“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加上只抓产值，不顾市场需要，不少企业设备超负荷运转，管理制度废弛，大批小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造成大量工业品质量下降，滞销积压。三年来滞留在工商环节，最后不得不降价或报废的损失工业品达 11 亿元。钢铁工业经营亏损达 15 亿元。基本建设由于布点设计失误和施工的错误而停建或废弃的工程损失达 12 亿元。上述损失占 3 年积累资金的 52%，财政收入的 50.2%。

1958 年以后，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估产、高征购，产生一系列破坏性后果。1958 年产粮 224.6 亿公斤，估产高达 390 亿公斤，征购入库占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

1959 年秋，开展反右倾斗争，浮夸风复炽。这时全省和农民家底已空，浮夸风再加强迫命令，后果更为严重。1959 年减产 66 亿公斤，征购了高达 60 亿公斤贸易粮，占（原粮）产量一半。1960 年和 1961 年，粮食产量降至最低点，征购量仍居高不下。从 1959 年起，农村留粮节节下降，每人年平均留粮（原粮）100 余公斤。在省内粮食情况急剧恶化的同时，中央要求外调粮食的指示又急如星火。为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四川省在降低农村留粮和仓库存粮的同时，还降低城市居民和机关干部的口粮定量，最低时每月仅有 9.5 公斤，食油仅 50 克，市场用粮基本压光。1960 年 9 月，又宣布粮票作废。粮食的全面紧张造成多种疾病发生，农村人口出现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由于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四川人口从 1958 年起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到 1961 年底，全省人口数为 6459.2 万人，较 1957 年的 7081 万人减少 621.8 万人。

1961 年

调整教育事业

1 月 28 日～2 月 6 日，四川省召开中等专业教育工作会议，按照国家

计委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决定大幅度停办“大跃进”期间发展起来的中等专业学校。

在“大跃进”中超高速发展起来的四川教育事业,由于师资不济,经费支绌,特别是大量学生的口粮供应发生困难,从上年年末开始,即先于其它领域开始调整,用撤销学校、清理“超龄生”、停课“放假”、减少招生人数等办法,大量压缩学校和学生。本年内停办学校 4 万多所,减少学生 473 万多人,其中高等学校从 73 所、472 个专业调整为 47 所、335 个专业。1962 年,高校又调整为 28 所、208 个专业;小学在校生压减了 41.9%,中等学校在校生压减了 52.9%,其中农业职业中学学生由 9 万余人减到 1000 人。“大跃进”以来新建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撤销,“业余红专大学”和其他职工业余学校、技工学校、农民学校也相继停办。教育事业的大收缩,是当时客观形势下不得不为的举措,但超常大起大落,导致大批学生辍学,教师转业,学校、专业减少,对四川教育带来众多不利影响。本年 9 月,中央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高教六十条”)以后,四川着手调整高教政策,1963 年 2 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发布以后,政策调整工作进一步推向整个教育领域。在调整中,重新肯定学校以教学为主,注意整顿教学秩序,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并对“大跃进”以来批判处理错了的部分教师作了甄别平反。

贾启允、杨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中共中央于 2 月 3 日批准贾启允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于 3 月 27 日批准杨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同时调阎秀峰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免去其四川省委书记职务。

开始总结“大跃进”教训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且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共四川省委为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于 2 月 11 ~13 日召开第十四次全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给农民划自留地和大幅度压缩基建规模,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3 月中下旬,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省委为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着手解决社员与社员、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并于 4 月 8 日通过《关于贯彻“六十条(草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会后,省委负责干部部分赴基层进行调查研究。4 月 21 日,省委又将会议情况向中央作书面报告,承认对于人民公社“过去只看到它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而没有明确认识到它又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往往

以对待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办法来对待集体所有制,例如硬性向生产队下达生产计划、技术措施,强制执行,管得过多过死;任意平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物资和劳力等”。报告说,1959年“因为反右,妨碍了郑州会议精神的贯彻”,因而“从1959年秋季起,在农村方面就比较突出地暴露了高估产、高征购和对严重旱灾估计不足的缺点,在一般地区反右后则再度刮起了‘共产风’”,这是“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农村政策和钢产指标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实行甄别平反。省委为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与6月20日~7月8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再次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的讲话指出,四川两年多来一再刮“共产风”,“造成农业减产,工业和其它方面也搞不上去的严重恶果”;“农业落后,有天灾、人祸和阶级问题,但从全局来说‘共产风’是主要的”;1959年“反右”不应该扩大到县以下,应……主要反左”;“一部分地区反右倾后,又反瞒产私分,造成了损失”;在厂矿“不应采取‘火线整风’的办法”。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四川工作的批评:“见事迟,转得慢。”会议要求对于两年来处分不当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

农村退赔“平调”财物

3~4月,省委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三干会以后,全省农村工作的重点迅即转向“退赔”(即解决公社化运动以来无偿平调农民和生产队的财物)的问题。在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中,四川农村先后于1958年和1959年秋冬至1960年两度出现“共产风”,农民私人和集体的财产,被大量拉平分配和无偿调用(“平调”)。据本年计算,被平调的财物金额约13亿元,其中各级政府调用的占7亿元;全省被无偿占用的农田达400余万亩;农民私有房屋被无偿占用或拆毁的,仅据资中一个县的调查,即有27万多间,占原有房屋40%以上。但是,尽管省委自年初起就先后根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规定,多次作出彻底退赔平调财物的指示,并拨出2亿元专款补助部分公社和水利、交通等部门退赔,但是直到年中,进展极为迟缓。因此,在6~7月为传达中央“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工作会议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来反复讨论彻底退赔的问题,严肃规定,政府部门和集体单位,只有把本部门、本单位可以退赔的财物“全部退光、赔光”(即当时所谓“破产还债”)以后,才能动用国家补助款。由于省委领导的坚决态度,基本上排除了种种思想障碍,退赔工作在下半年取得较

大进展。到年底,共退赔农民 6.2 亿元(包括“期票”2.69 亿元),约占平调金额的一半。

初步压缩城镇人口

3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继续压缩城镇劳动力。规定县及县以上各系统及部门在3月底以前压缩50万人,区以下压缩50万人。从1958年以来,四川的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连年急剧增长,到本年达到最高峰,共有城镇人口843.9万人,全民所有制职工有486万人,分别比1957年增长25.8%和1.6倍;而1960年粮食产量仅为1958年的60%。本年初起的压缩城镇人口和工业人口,压缩对象主要是农村的工业和学校,所以尽管全年压缩了职工101万,城镇人口实际只减少了66万多人,年末人数仍比1957年多16%。

朱德到川调查

3月29日,朱德抵成都,在四川调查研究。他视察了成都、宜宾、自贡、内江等地的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并派一调查组去灌县调查手工业情况。5月1日在成都接见了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后去陕西。他认为四川的手工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比较快,农民很高兴。但是公共食堂则浪费人力物力不少,省委对此尚远远没有深入了解。关于后一情况,他返京后于5

月9日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制度

4月2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工业书记会议,讨论煤炭、钢铁生产问题。会议介绍和推广重庆鱼田堡煤矿、永川煤矿等七个企业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和包产相结合的经验。四川工矿企业的奖励制度,在“大跃进”中受到很大冲击,平均主义盛行。鱼田堡煤矿等企业的经验是对上述问题的初步纠正,得到职工拥护。5月7日,省委转发了李井泉就工业方面试行鱼田堡等企业经验给毛泽东的信,报告了这个办法的主要内容。17日,省委批转鱼田堡煤矿党委、永川煤矿党委和荣县臭水河煤矿党委关于试行这一制度的三个报告,要求首先在矿山、冶炼、运输等行业迅速推行。

盆地旱涝成灾

从5月上旬起,夏旱遍及整个盆地,114县受灾,尤以绵阳、乐山、内江三地区为最重。盆地东部涪陵、万县、江津从6月上旬出现旱象,持续至8月份,形成夏伏连旱。旱期雨量较常年同期减少七至九成,成灾面积2165万公顷,为1949年以来首见。

盆地西部的旱象持续至6月23日,当日起又遇连续7天的阻塞型大暴雨,暴雨中心在绵阳、江油一带,一日最大降雨量达250毫米。涪江、沱江

和岷江同时发生特大洪水，共有 106 县受灾，死亡 1000 多人。

公共食堂散伙

5月16日，省委召集各市、地委负责公社食堂工作的干部，讨论公共食堂问题。四川农村的很多公共食堂，由于1960年秋后农村大片地区饥馑形势日趋严重，已经无力开伙。但是，公共食堂自1958年秋建立以后，即被当作维护集体投劳、集体出工、集体生活，消除“私有制影响”的有力工具，还能避免农户分散掌握粮食，以维护“高征购”，所以被称为“人民公社的心脏”，办不办食堂被提到搞不搞社会主义的高度，大批干部因此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央“十二条”指示彻底纠正“共产风”、“六十条”规定对食堂“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按照条件，多种多样”的方针下达以后，省委对食堂性质的判断有所改变，并于3月下旬派出工作组到彭县大宝山公社的四、十两个管区进行调整食堂的试点，划小了食堂，并允许一些社员（约占10%）“领米退堂”。4月中旬，省委在南充火花公社和内江交通公社的各一个生产队内，再次就食堂问题进行试点。4月29日，两队同时向社员宣布：一、办不办和参加不参加公共食堂完全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二、如果群众要求不办或退出公共食堂，可以允许。在分析了

立即垮掉和尚未垮台的食堂情况以后，李井泉于5月8日和5月11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主张应即把粮食分配到食堂的办法改为分期分配到户；“对于那些妨碍生产的官办食堂来说，实行粮食分配到户的办法，促使它垮台也是应该的”，“群众要求散伙的，应该坚决帮助他们散好”。因此，5月16日会议在其纪要里，专门提出了“对食堂的认识问题”。指出：“食堂是群众生活消费的一种形式。生活消费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自由选择。办不办食堂，办什么形式的食堂，应当完全按照社员的意见和是否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来决定。”从而取消了多年来对食堂设置性质的政治界定，领导和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省委于5月26日转发了这个纪要。7月12日，省委正式发出指示，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给制，不办食堂。全省公共食堂随即全部解体。

调整手工业所有制

7月13日，中共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手工业35条”的精神，制订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修正稿），纠正“大跃进”中手工业过多过早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错误。次年5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又决定凡是1958年以后由集体和个体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一般都改回集体或个体经营。全省全民所有制手工

业企业,自本年的 7.2 万个迅速下降为 1962 年的 1.7 万个、1963 年的 3400 个。

收缩工业战线,压缩基建指标

7月 21~29 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市、州委工业书记会议。会议鉴于年初省委第 14 次全会安排的全年钢、煤生产指标依然畸高,导致经济形势继续紧张,决定分别将钢、煤指标调整为 70 万吨和 3200 万吨,11 月再调整为 55 万吨和 2300 万吨(全年钢、煤实际产量分别为 35.3 万吨和 2600 万吨)。9月 23 日,省冶金厅召开有关地、市冶金局长座谈会,安排冶金企业的调整,关、停、并、转、撤销一批企业。至年底,全省冶金企业由年初的 263 个减为 123 个,铁矿山由 243 个减为 99 个,小钢厂由 20 个减为 3 个,有色金属企业撤销了 70 个。全省基本建设也大幅度收缩,除国家安排的若干重点项目分别于 1960 年和本年缓建、停建以外,9 月 21 日,省委决定将当年安排的 460 个基建项目,再停、缓建 222 个。全年基本建设投资从 1960 年的 22.53 亿元下降到 8.40 亿元。

调整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10 月 25 日~11 月 8 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庐山会议精神,讨论经济调整问题和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问

题。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四川从当年秋起在 533 个公社、2889 个大队作了调查和试点,李井泉和省委书记处的领导干部也分别在南充等地作调查研究。根据当时调查的结论,会议作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讨论纪要》,确定以基本上维持管理区(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包干”办法,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12 月 11 日,省委又对“大包干”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即由生产队向大队承包粮、棉、油料等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总产量、总收入和主要副业产品收入,在农产品方面定国家对粮、棉、油的征购任务,定大队提留的机动粮,在总收入方面定农业税和上缴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行政管理费,在完成这些定包任务后,剩下的粮食和现金归生产队支配。按照这个办法,生产队的分配权力比过去有所扩大,但依然不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之间贫富拉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权力也不在生产队手里。当时称这一政策为核算单位既不放在脚上,也不放在腰上,而“放在膝盖上”。到 1962 年 2 月 17 日,省委才根据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不再坚持核算单位只放到“膝盖上”的主张。

长篇小说《红岩》出版

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军统局重庆集中营所进行的坚贞不屈的斗争的长篇小说《红岩》于10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均为集中营所囚政治犯中的幸存者。小说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扬,被誉为青年的生活教科书。

开展“工业整风”

根据省委10月三级干部会议的讨论,省委于11月10日发出《关于以“五定”为中心,整顿企业,开展工业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工业企业根据中共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的精神,开展“工业整风运动”以实行“五定”,即“工业七十条”所规定的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

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这次整风的开展,使被“大跃进”打乱的生产秩序开始得到恢复。

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根据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商业四十条”)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规定,从本年下半年起,在全省农村恢复集市贸易,到年底已基本上恢复到公社化以前的状况。据成都市商业局统计,全市到年底在郊区恢复了36个农村贸易市场,建立了26个农村集市贸易服务部,恢复了32个供销社;在市区建立了3个专业性、4个综合性服务行站,并同22个省、市及省内14个专区(州)的56个县、市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

1962年

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四川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多人。由于大会突出地提出了总

结经验教训和健全民主生活的问题,很多干部多年来首次敢于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并对主要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李井泉、李大章、陈刚在四川组的会议上作了检讨。3月23日~4月5日,召开扩大的省委工作会议,全面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廖志高

代表省委作《关于健全党的生活，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报告，李井泉对几年来省委的领导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检查，会议还印发了李井泉、李大章、陈刚在“七千人大会”四川组的检查发言。会议着重检查和纠正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缺点和错误。从“大跃进”开始的几年间，由于推行“左”的政策，四川连续处分了一大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各级干部，据当时统计，受到打击应予甄别的干部全省约 38 万人。会议否定了在“反右倾”和两次“改造落后”运动中对各级干部的错误批判，重申否定“火线整风”。在为干部甄别平反的同时，7 月 21 日省委批转了宣传部的报告，指示各地做好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历次运动中错误批判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甄别工作。8 月 15~23 日，省委召开全省甄别工作会议，检查部署甄别工作；10 月 3 日，省委发文要求对于基层干部受到的错误批判要坚决“一风吹”，但对省管以上干部的甄别则不应“不加区别地‘一风吹’”。在甄别干部的同时，还根据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决定，于 7 月 27 日通知对于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小商贩、乡以下基层干部、武装民警、学生和营业员、售货员等在 1957、1958 年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一律取消。

在这次会议上，省委把几年来工作

中的主要经验教训概括为：“一、在一个时期对工作的成绩有自满情绪，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性和严重后果，以及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二、在大跃进中确有生产指标过高，粮食征购过多，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运动要求过急，党内斗争过火等方面错误；三、对一些问题，认识迟，转得慢，例如高指标和公共食堂问题；四、党内斗争有扩大化和过火的偏向，其原因除了为了完成高指标、高征购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外，还有对两类矛盾缺乏严格的区分。在纠‘左’的斗争中，对落后地区被敌人篡夺的面估计偏大，在反右的斗争中，对于当时在形势估计和对具体政策问题上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及处分，受到错误批评、处分的面，反右又比纠‘左’更大一些。”这是自“大跃进”开始以来省委就领导工作首次正式向下所作的全面的自我批评。

贯彻执行“科研十四条”

1 月 14 日，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省委主管科技工作的负责人及三省科委、中国科学院三省分院负责人在成都举行西南地区科学工作会议，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批示》交换了意见。上述批示是中央于 1961 年 7 月发出的，批示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

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科研十四条”)。到本年11月,四川省又召开省市(专州)两级科技工作会议,检查自“大跃进”以来科研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贯彻执行“科研十四条”,决定在全省先行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分期分批全面贯彻执行。

召开工农业劳模代表会议

2月20日~3月6日,四川省举行工农业劳模代表会议,省长李大章向大会致辞。会议号召工农群众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根本方针,以调整为中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加生产,精简机构,安排生活,稳定市场。

开展“清仓核资”

由于“大跃进”期间工商企业管理制度废弛,财物帐目不清,加以盲目生产,盲目进货,造成大量积压和浪费。为清理和利用库存商品、落实实际损失,四川于3月起开始进行“清仓核资”,在工交企业清理积压物资并核定库存产品的质差、量差、价差(“三差”),在商贸企业清理商品、清理资金、清理帐目(“三清”)。清仓核资工作于年底基本结束,又于1963年组织了复查。在清仓核资中,又大力组织积压物资的处理利用,挽回了部分损失。全省最后核定“三差”损失4.82亿元,

“三清”损失6.08亿元,总计10.9亿元。

决定加大经济调整力度

5月26~31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根据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精神,着重分析全省的经济形势,认为过去对困难的估计仍然不足,四川在全国已属处境很困难的少数地区之一。会议估计,全省农业的恢复,大约需要5年;工业由于原料、燃料缺乏,内部关系严重失调,还需关闭或合并大批企业,继续降低发展速度;根据当时农业的承受能力,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还须大量压缩,直到低于1957年的水平。省委6月1日制订的精简方案规定,除重点工业部门和骨干工业较多的地区以外,全民所有制职工一般应当精简到低于1957年的水平,城镇人口一般应压缩到接近1957年的水平,常年吃商品粮的人数一般地应减少到低于1957年的水平。7月9日,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工业调整问题,认为工业上的严重困难尚未过去,决定继续调整企业,精简职工,继续缩短工业战线;重新组织产、供、销平衡;加速处理积压物资;整顿企业财务,解决企业必须的流动资金;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亏损;全面贯彻《工业七十条》,整顿企业。两次会后,全省经济调整的步

伐和规模均较前增大。

大量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6月1日,省委制定缩短工业战线,继续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方案。四川的城镇人口和全民所有制职工,虽经1961年的大量压缩,当年年底仍比1957年分别多出106万人和194万人,而粮食产量则减少975.5万吨,油料减少3.9万吨,棉花减少4.4万吨,猪肉减少46.6万吨,供需矛盾极为突出。为了把吃商品粮的人数压缩到农业能够承受的程度,规定对于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除重点煤矿的井下工种、重点企业的主要工种和一般企业的关键工种可以保留少数骨干以外,其余一律动员返回农村,随同他们进城的家属也都动员回乡。而在实际执行中,有些1958年以前从农村参加工作的老职工,也被动员回乡。到年底,城镇人口比上年减少116.8万人,比最高峰的1960年减少21.7%。全民所有制职工则比上年减少126.4万人,比1960年减少38.6%。

停办大批工业企业

本年在压缩大批城镇人口到农村的同时,基本建设和工业的收缩力度也大为增强。全年基本建设投资仅为1960年的14.8%。工业企业压缩的重点也从县、社工业扩大到专、县工业和

钢铁、机械工业。全省约3000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当年压缩了1200余个。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钢从88万吨压缩到40万吨,铁从160万吨压缩到20万吨,钢铁企业除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和成都无缝钢管厂以外,只剩下万福铁厂、威远钢铁厂和后山铁厂3个地方企业炼铁。年产生铁2万多吨,退到了1951年的水平。有色金属冶炼的190多个小企业全部撤销。发电设备容量从1961年底的57.4万千瓦下降到47.6万千瓦。8个水泥厂保留了1个,14个肥皂厂保留了3个。通过这些调整,原燃材料的使用开始集中,煤、电供应情况显著好转,交通运输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为保留企业的正常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支援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一些轻化工产品的生产,都有所加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厂,原料安排也比较落实,生产走向稳定。工业和农业以及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都在较低的水平上趋向协调。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之比,从1960年、1961年的1:0.53、1:0.81变为1962年的1:1.25,轻、重工业之比,也从前两年的1:1.68、1:1.43变为1:1.12。

加强农业生产队

6月19日,省委发出文件,规定缩小公社、大队两级的权力,加强农业

生产队的权力。规定在一个时期以内，公社一级不办工业，一般也不办企业；大队一级不管钱粮，不直接经营副业；在生产恢复到 1957 年水平以前，公社一般不提积累；大队不再提公积金、公益金和机动粮；公社、大队占用的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全部退回生产队使用，使生产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基层原来由国家经营的手工业，除了酒坊以外，也转给生产队经营。为了迅速充实生产队的骨干，又对公社和生产队的机构精简压缩，并规定凡是原来高级社的干部（正副社长、社委、生产队长等），原则上一律调回本生产队工作，使 1958 年以后从生产队调出的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得以回队领导生产。同时，抓紧了对“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的数十万农村干部的甄别平反，其中很多人重新担起了领导社、队的担子。由于生产队骨干的加强，合作社时行之有效的一套经营管理制度，如评工记分制度、生产责任制等，也逐步恢复。

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

10月17日～11月10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1月12日，省委举行一届十七次全会，分别就农业、工业、商业方面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通过了三个文件，决定在全省城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会后，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先后开展。在农村，开展了“以阶级教育为纲，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省委于 12 月召开的计划、工业、交通工作会议，进一步决定在职工中开展“以巩固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全省国民经济出现转机

经过 1961 年以来的经济调整，到本年年底，“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趋势，已经受到遏制。一度畸形发展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生产以及过度膨胀的城镇人口，已经调整到最低水平；受害最重的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 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不变价，下同）84.86 亿元，工业总产值 37.77 亿元，重工业总产值 20.13 亿元，分别比上年下降 10.4%、27.9% 和 34.8%，比 1960 年下降 42.3%、60.7% 和 66.6%；而农业总产值从上年的 42.39 亿元上升到 47.09 亿元，粮食产量从 1155 万吨上升为 1435 万吨。加以两年间大幅度调低粮食征购量，从 1959 年征购 77.4 万公斤（占产量的 48.9%）减为 1961 年的 44.77 万公斤（占产量的 38.8%）、1962 年的 41.9 万公斤（占产量的 29.2%）。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市场农产品显著增多，物价涨幅从上

年的 23.7% 降为 7.2%。农业生产的复苏,为四川经济的恢复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

1963 年

实行机电提灌为主、提蓄并举的水利建设方针

1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批转《关于我省农业技术改革问题的几个调查材料》,提出“电力和机械化提水灌溉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代表着多数丘陵地区实现农业水利化的方向”,要求“实行以电力和机械化提水灌溉为主,提蓄并举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全省迅即大力发展提灌机械,建立电力提灌站。若干机械、冶金企业也随之调整了产品方向和协作关系,专门为农村生产机电提灌和农产品加工的设备和材料。到1965年,全省拥有机电提灌设备1.5万多台、35.5万多匹马力。为了给提灌设备提供动力,一批地方电站陆续兴建。到1966年办起装机4000~7000千瓦的重点电站43座。地方电站的建设,实行国家投资、地方投资和社队投劳相结合的“三三制”,一般都收到费省效宏的结果。水利建设的成就使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连年增加。1965年比1962年增加16.7%,比1957年增加50%。但在重视机电提灌的同时,曾一度轻视蓄水

引水工程建设,并把发展水库建设和引水工程的主张指责为“水库派”予以批判。这种指导思想,直到6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所转变。

开展城市“五反运动”

3月12~28日,中共四川省委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讨论贯彻2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在城市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指示。29日,省委举行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就开展运动的部署和步骤、作法作出具体规定。此后,根据上年12月全省计划、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和县以上机关以及县属区、乡财贸单位开展的“以巩固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转为“五反”运动,主要的城市还在一些企业搞试点。从4月到8月,开展“五反”的单位达到9244个,占同类单位总数的71.4%;参加运动的职工人数达到102.7万,占67.8%。这场运动,把企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向市场谋求出路的某些措施,包括一些曾经受到

上级支持和鼓励的自救措施,与确实存在的违法行为,一并归结为非计划生产、变相提价加价、单干活动等问题,当成动摇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同时,在运动中,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于4月8日作出规定,严格管理大中城市的集市贸易,要求成都、重庆两市的集市贸易成交额不得超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四川城乡的集市贸易,自1961年重新开放以来,生气勃勃。开展“五反”以后,它的发展也再度受到重重限制。

建成我国第一条长距离输气管道

3月,在重庆市建成国内第一条天然气长距离输气管道,管径426毫米,管长54公里。管道(800米)首次实现水下穿越长江,将巴县石油沟气田的天然气输往重庆市,这也是四川气田首次向城市工业供气。1967年,又建成空中横跨长江的输气管道复线。

朱德到川视察

3月21日~4月28日,朱德视察成都、隆昌、泸州、永川、重庆、乐山等地,听取四川省和各地负责人的汇报。他在听取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陈刚、省委书记处书记杜心源汇报时说:四川原来是很富庶的地方,为什么这几年穷了?除天灾之外,在政策上也存在一

些问题。自“大跃进”以来,这也不准搞,那也不准搞,限制太死,收购价格也不合理。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能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

农村进行“社教”试点并开始“四清”

5月29日~6月18日,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分析当时农村形势,认为虽经去冬今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有20%的队走了过场或搞得不深不透;阶级路线教育很差,绝大多数地方的阶级队伍还未建立起来;干部中有多占、私分、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等问题;还有基层组织被敌对势力篡夺领导权的问题。会期中间,省委即派工作团到郫县试点,同时训练大批“四清”工作干部。此后,四川农村的“社教”即以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四清”)的形式逐步开展。9月,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后十条)下达以后,“四清”即在农村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全省从省、地、县级机关抽调干部6.6万多名下去领导运动。10月9日,由李井泉亲自带领的西南局、省委、地委四清工作队200余人,进驻南充市火花公社搞试点。根据试点经验,省委于11

月 23 日发文对农村“四清”运动作出具体部署,认为目前全省农村中大约有 10%~20% 左右的生产队、15% 左右的党支部,已被阶级敌对分子操纵和篡夺了领导权;在人民内部,有百分之几的人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有些发展成为敌我性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社会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此后,农村“四清”即在这种对于阶级状况的不实估计的基础上,更为激烈地进行。在全省 7000 余个公社中,当年冬季开展运动的约 4000 个。

省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召开

8 月 27 日~9 月 7 日,四川省人大召开三届一次会议。李大章在向大会所作的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四川的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会议选举 46 名委员组成第三届省人民委员会,以李大章为省长,赵苍璧、邓锡侯、杨超、邓华、桑吉悦希、杨万选、张秀熟、童少生为副省长;选举赵方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谷志标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省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召开

8 月 28 日~9 月 9 日,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召开三届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政协省第三届常委会,李井泉为主席,廖志高、杜心源、但懋辛、程子健、

张曙时、彭迪先、徐崇林、彭劭农、阿旺嘉措、果基木古、余际唐、田一平、华尔功臣烈为副主席。

成都—拉萨有线通讯线路开通

10 月 1 日,成都至拉萨有线通信线路正式通话。这项工程从本年 1 月动工,国家调动十多个省、市的人力和物资参加修建,于 9 月底竣工。

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10 月,中共四川省委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卫生厅内设专人办公。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1962 年 12 月发出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四川省于本年年初起组成由卫生厅、商业厅、妇联、共青团派人参加的联合工作组,在彭县进行计划生育工作试点。11 月 10 日,省委批准下发了《关于开展计划生育的意见》,废除了原来规定的多子女补助办法,提倡实行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要求此项工作以大中城市的厂矿、机关和学校为重点,在农村则先搞试点再稳步推广。四川省以城市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工作从此开始。四川人口在 1958~1961 年大幅度下降以后,于 1962 年起开始快速回升。历经上述工作,1963 年至 1965 年间形成人口增长高峰,年平均出生率 46.49‰,自然增长率 33.77‰,总人口从 1962 年的 6485 万人增至 7136.7 万人。

讨论彝族族源等学术问题

10月18日,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成都召开学术讨论会,讨论凉山彝族的族源、奴隶制形成及民主改革以前彝族社会性质问题。

设立盐源彝族自治县

10月23日,国务院决定撤销盐源县,设立盐源彝族自治县。

在工交部门开展“三基”工作

11月20~23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工业、交通专业会议。会议针对“大跃进”中脱离实际、大轰大嗡的干部作风问题,要求参加工交专业会议的500余名厂矿领导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抓好“三基”即基层建设、基础工作及基本功训练,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三基”工作的开展,成为四川企业干部转向深入踏实的工作之风的重要一环。

四川运动员获国际比赛7枚金牌

11月,代表中国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四川运动员刘兴玉、邓国银、邓若曾、陈蜀琦、余廷鶴、蔡希秦夺得田径、举重和男女排球冠军,共获金牌7枚。

调整地方财政管理体制

12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批准财政厅分党组的报告,从次年起对地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地方各项收入不再采取多种比例分成的办法,一律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定”。万县、泸州、宜宾、内江、南充5市的房地产税,比照成都、重庆两市的办法,全部划归市财政留作城市维护费用。除工商税、农业税、商业收入外,其余各项收入允许各地、市自行调剂使用。财政支出中除教育支出、优抚救济和专项拨款外,其余各项可由各地统筹安排。

1964年

推广“二五制”和“三定一顶”的干部劳动制度

1月24日,中共四川省委印发眉山县委关于各级干部实行“二五制”大种试验田的报告。眉山县委为转变干

部作风,深入领导生产,设立了3块“试验田”,分别由县的局(科)长和农技站共同管理,干部轮流参加劳动。试验地的庄稼,当前需要生产什么就种什么,远景规划什么就试验什么,周围的生产队都看试验田干嘛就跟着干

啥,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2月10日,省委根据眉山的经验发出《关于农村各级领导干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大种试验田的指示》,要求地、县及以下的农村各级领导干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种“试验田”,实行每周两天处理机关事务、五天蹲点劳动的“二五”工作制。

3月23日,省委批转重庆水轮机厂、永川煤矿、成都红旗机器厂、重钢小平炉车间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四个文件,要求各地、各厂矿通过试点推行干部“三定一顶”的劳动制度,即企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去劳动固定时间、固定岗位、固定职责,在能够独立操作以后顶替班组成员。4月,各地即进行试验,5月全省普遍推广,出现了一个高潮。

“二五制”、“三定一顶”以及1963年底“三基工作”的普遍推行,是省委领导力图根据四川特点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创造,后来被称为四川的“折子戏”。^①在调整期间,李井泉多次提议四川工作要从本省的特点出发,有所创新,“唱川戏”。到1965年,四川在工作内容或具体形式上具有这种特点的工作,当时认为主要的有五种,称为“五本折子戏”(包括“二五制”和“三定一顶”的干部劳动制度、“三基工作”,还有在此前后推行的计时工资加奖励

和包产相结合的工资制度,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以及试行厂社结合的制度)。四川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这些经验,在国内有相当影响。196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大章的文章《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同年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又刊载杨超的专文《一件新事物——四川推行“三定一顶”劳动制度的经验》。

改造旧戏曲

2月15日,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戏曲、曲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根据省委宣传部的调查,在全省252个艺术表演团体中,旧戏曲表演团体有222个,占88%;全省每天约有二十多万观众观看旧戏。文件认为旧戏曲对于广大观众和曲艺队伍本身特别是青年演员,“起着严重的腐蚀作用”,因此要求对旧戏曲、曲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提倡演现代戏。此后,大批表演团体转演现代戏,表演团体数目也开始下降,自当年年底的258个,降为次年的242个,再降为1966年的236个。

成都至昆明、上海、广州通航

3月18日,北京—成都—昆明航空线试航成功,旋即正式通航。另据

^① “折子戏”是川剧中的独幕短剧。

《四川日报》4月8日报道,成都—武汉—南京—上海和成都—重庆—贵阳—广州两条航空线已通航。

开始进行三线建设

根据国家进行“三线建设”的部署,四川以“两基一线”(即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线)为重点的建设于本年中开始。6月26日,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率领由国务院所属十多个部委办和四川、云南两省负责人及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对于拟建的成昆铁路和攀枝花基地,进行为期一月的实地调查,揭开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序幕。9月11日,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基本建设筹备小组,具体组织和指挥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12月25日,四川省成立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至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以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为副主任。从1964年9月开始,在筹备小组领导下,对四川三线建设项目和布局进行了全面规划,成昆铁路及德阳重型机器厂等重点工程重新开工,攀枝花基地开始前期施工,大批沿海企事业单位向重庆地区内迁。

9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成昆铁路建设为中心的西南铁路建设

指挥部,以李井泉为总指挥,吕正操、刘建章、郭维城、彭敏为副总指挥。由铁道兵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局、大桥工程局、电务工程局和各地民工组成的施工队伍约30万人,自8月起即进入长达1000公里的施工线路,开展“大会战”。铁路至1970年7月1日全线建成通车,全长1090.9公里,其中在四川境内809公里。

以重庆为中心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始于从沿海迁入重要的工业企业。本年9月,成立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10月提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10月20日,国家计委、经委同意从四川、贵州两省在“大跃进”后“下马”的工厂拨给国防工业47个,作为沿海工厂迁建的基础。经踏勘、选址后,迁建工作即于本年秋后开始,至次年形成高潮。

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规划工作组于9月成立,制订基地和城市综合规划。11月5日,李富春、薄一波据联合工作组和他们实地考察的意见,就拟建的钢铁厂厂址问题向中共中央写报告,经中央决定设于攀枝花的弄弄坪。与此同时,建设队伍进入攀枝花地区,开始前期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由攀枝花钢铁公司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为主体组成,是一个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轧钢的钢铁联合企业。

唐山铁道学院迁川

1964 年,为配合三线建设,唐山铁道学院按照国务院决定迁建四川峨眉。1971 年,正式迁来。唐山铁道学院创建于 1896 年,1960 年定为全国重点院校。1972 年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建成以工为主,工、理、管、文多学科重点院校。1983 年,在成都市北九里堤设总校,峨眉改设分校。1985 年,设有 15 个系,25 个本科专业,29 个研究生专业,5 个研究所,25 个研究室,62 个实验室;教职工 23417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93 人,在校生 5135 人。

1965 年,根据中央指示,清华大学、上海化工学院分别在绵阳、自贡建立分校,以配合三线建设。

试办半工(农)半读

四川农学院从 6 月起开始举办半农半读。四川根据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早在 1958 年即进行举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试验,部分高校开办了函授教育和夜大学。1964 年以后,半工(农)半读有所发展,西南农学院、重庆师范学院和四川医学院药学系也于 1965 年起陆续开办半工(农)半读。部分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和中学改为半工(农)半读学校,部分工厂和农村也兴办了这类学校。到 1965 年,全省这类学校达 4000 多所,学生近 40 万人。

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以 1964 年 7 月 1 日 0 时为调查标准时间,全省于 7 月 1~15 日开展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全省总人口 67 956 490 人。

试行“亦工亦农”制度

8 月,四川省劳动工作会议确定,扩大“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试点。四川省于本年初开始在个别矿山和森林工业企业进行试点,8 月以后,试点扩大到 35 个单位,约 4 万人。试点形式主要是轮换工、季节工和临时工三种。

四川化工厂建成投产

1951 年,西南工业部酝酿在四川建设氮肥厂。1953 年 11 月编制完成建厂方案,1954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批准计划任务书。1956 年 4 月,国家计委、建委批准在金堂县华严乡(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建厂,当年开工建设。主要设备由前捷克、苏联等国进口。1958 年 5 月厂房及设备基础土建工程完成,1964 年 9 月,全部工程建成投产。工程总投资 16388 万元,年生产能力:合成氨 7.2 万吨、硫酸 8 万吨、硫氨 10 万吨、硝酸 9.9 万吨,硝氮 12.4 万吨。

四川省农科院成立

9月1日,四川省农科所改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杨允奎任院长。农科所前身为1938年建立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省农科院以应用研究为主,兼顾应用基础研究。

“五反”“四清”掀起高潮

9月13~29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根据5月~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及9月发布的《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后十条”),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四川多数农村超过1/3,工厂也接近或超过1/3。会议确定,每个专区(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除外)集中先搞一个县的运动,“四清”、“五反”统一安排。从10月起,又在已经开展过“四清”运动的数千个公社搞“复查”,并且要求工作团“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要先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政策”。在工矿企业中,结合运动整顿工会组织。10月29日,四川省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在大会发言的38人揭发了48个基层工会组织的“严重阶级斗争问题”。此后,通过整顿工会组织,重新登记会员,调整或改组了工会领导班子,有些“问题严重”的工会还被指定

的“临时委员会”所取代;“不纯分子”逐个被清洗或劝退。11月18日,省委又发出文件,对于开展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出重新部署,要求先在成都、重庆、自贡以大型企业为重点,分别进行社教运动,各市组成若干社教工作团下去开展工作;专、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城镇居民的社教运动,由农村社教工作团统一安排和领导。与此同时,在城乡普遍查阶级、查来历、查去向,更多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受到了打击,而且层层向上查“根子”,打击锋芒逐步指向乡、区、县的干部。11月18日,省委批转南充、温江、绵阳三个地委关于南充、郫县、三台3县委书记“反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错误”的报告,要求“在县以上干部中坚决明确地开展反右倾斗争”。次日,又发出指示要求认真解决区、社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整顿领导核心”、“把已露头的阶级敌人及其代理人、代言人清理出来”。“四清”运动由此发展得更为剧烈。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0月10日,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孙传琪、巫方安等400余名城市青年到大、小凉山和西昌专区落户。四川组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始于1954年,当时限于个别动员。1957年以后开始成批组织;1961年以后,动员的市、县增多,下乡的数量增大。据

共青团四川省委本年年初统计,从1954年到1963年间共有47 589人下到农村,其中插场(国营农场)的6950人,插队(生产队)的40 339人。

省人大三届二次会议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并增选副省长

10月12~20日,四川省人大举行三届二次会议。会议关于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四川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会议选举朱德等236人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增选张为炳、张力行、张呼晨为副省长。

1965年

扩建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始建于1964年8月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经国务院批准扩建,分别从英国和荷兰引进年产10万吨合成氨装置和年产10万吨尿素装置,于1月开始施工,1966年10月1日建成投产。是四川第一个利用天然气作原料的大型化肥工厂。

传达贯彻社教“二十三条”

1965年1月20日,李井泉在南充召开从专区到生产队干部2万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宣讲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这个讲话的录音旋即在全省城乡播放。20~29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学习和贯彻“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四川农村的“四清”运动,先在约400个公社中进行,至1965年5月结

束,是为运动的第一期。同年4月底至5月初,省委连续召开工作会议和全会,规划全省运动于1967年分批搞完;8月上旬的工作会议又决定把这个期限推迟到1968年上半年。从1965年5月到11月,第二期运动在约730个公社中结束;旋即在约1300个公社中开展第三期运动,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第三期运动在很多公社并未完成,第四期则有的刚开了头,有的根本未能开展。总计一至三期运动涉及2300余个公社,占当时全省公社数的32%。几年来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击和遏制了经济调整时期出现的一些社会消极现象,整顿了基层干部的作风,改善了一些基层单位的财务、保管制度,也打击了确实出现的一些反革命活动。但是,由于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对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伤害过多,而且由于把经济调

整期间很多有利于发展生产的积极探索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再一次地造成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也为“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极端行为种下了祸根。虽然“二十三条”规定了比过去较为宽松的政策，一些遭到错误打击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较快得以解脱。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四清”运动“左”的势头的抑制范围和认识程度都极为有限。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查实，全省在“四清”运动中仍有6.2万人受到各种处分，错案率高达66.5%。不过，在“四清”的进程中，特别是贯彻“二十三条”以后，执行把“四清”落实在建设上面，把增产作为搞好“四清”的标准之一，所以经济调整和生产恢复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加以四川在1964年下半年准备开展三线建设，本年进入大规模实施阶段，领导人员的注意力更加侧重于经济建设，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四清”的消极影响。

以重庆为中心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展开

1月25日，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向中央报告：本年四川地区计划以重庆为中心常规兵器配套项目为主，在12个工业部门本年拟建的项目中选择48个项目作为“打歼灭战”的重点项目。中共中央于2月21日批示同意。从年初起，以重庆为中心常规兵器

基地的建设进入高潮，大批沿海企事业单位迁至重庆地区。到1966年，共从12个省市迁入15个系统、59个单位、43488名职工。重庆地区原有的7个兵器工厂也进行扩建，并用老厂包建新厂和独立新建的方式建成14个机械厂和两个研究所。与兵器工业的建设同时，从本年起，在重庆地区还开始建设船舶工业、航天工业、电子工业以及其它配套工业。第六机械工业部从年初起抽调上海、大连、武汉等地老厂技术人员入川，组成六机部四川建设筹备处，组织船舶工业建设。到80年代，共建成大型造船厂2个、大型柴油机总厂和配套厂7个、重型铸锻厂1个，以及一批中、小型企业，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船舶工业基地。最初筹建于1959年的西南铝加工厂，也于本年大规模动工兴建，至1971年3月一期工程结束。该厂是“三线建设”中重庆地区兴建的最大的冶金企业。

廖志高任省委第一书记，杨万选等任书记

中共中央2月决定，主持西南局工作的李井泉不再兼任四川省委书记，批准廖志高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同时批准杨万选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贾启允调贵州工作，免去其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11月，又批准郭林祥、廖井丹、鲁大东任省委书记

处书记，张力行任候补书记。

“合川马门溪龙”正式命名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古人类研究所于 2 月将 1957 年在合川发现的恐龙化石装架成功，定名为“合川马门溪龙”。经专家鉴定，这是当时在我国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恐龙化石。合川马门溪龙的生活时间距今约 1.4 亿年。

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

3 月 20 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通报宣布：根据原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原中共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所犯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错误，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刘、张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

设立渡口市，攀钢建设速度加快

1965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攀枝花特区。3 月 22 日，中共攀枝花特区委员会和特区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徐驰任党委书记、总指挥，李非平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和第一副总指挥。4 月 22 日，特区更名为渡口市，为四川省辖地级市（至 1987 年 1 月 23 日更名为攀枝花市）。从 1964 年秋至 1965 年，建设队伍在攀枝花地区开展了“三通（通路、通电、通水）一住（住房）”的“会战”。从 1966 年起，相继开始矿山、动力、建材和主

体工程施工，施工人员有冶金、建工、交通、电力、煤炭、矿山、铁道等部门的 8 万余人。1969 年 6 月 29 日，一号高炉出铁。1971 年 10 月 1 日，炼出第一炉钢。1972 年 12 月 7 日，开始轧出钢坯。攀钢二期工程于 1978 年开始，中间一度缓建，1986 年正式复工。

映秀湾电厂动工兴建

位于岷江上游汶川县境的映秀湾电厂于 3 月动工兴建。该厂包括映秀湾和渔子溪一级两个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29.5 万千瓦。映秀湾水电站于 1972 年 4 月 30 日竣工，7 月 1 日交付运行。渔子溪于 1966 年开工，1975 年 12 月 26 日竣工投产。

迁建一批科研院所

3 月，化工部第八设计院在成都成立。该院是由大连化学工业公司研究院、锦西化学工业公司设计研究院的设计部分合并建立的。7 月，四川汽车研究所在重庆成立，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中型汽车研究机构。9 月，邮电部第九研究所从北京迁成都，该所从 1977 年起开始研究光纤通讯技术与设备。11 月，由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抗菌素研究室迁建的四川抗菌素研究所在成都成立。12 月，西南化工研究院成立，它的前身是 1958 年 8 月建立的化工部化工设计院西南分院。同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自天津迁

简阳县建所。

川黔铁路全线通车

7月8日,川黔铁路南北两段在贵州省桐梓县接轨,全线建成通车。铁路全长423.6公里,其中四川境内139公里。铁路始建于1958年9月,1962年3月停建,1964年6月全面复工。

成都举行西南区话剧、地方戏剧观摹演出

9月1日~10月10日,西南区话剧、地方戏剧观摹演出大会在成都举行。参加演出的有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和解放军昆明部队、成都部队及西南铁路工程局等共30个单位的戏剧工作者,以及中央和各大区的观摹代表,共1700多人。四川省通过调演选出部分优秀节目参加大会演出。

四川运动员获9项全运会冠军,平一项世界纪录

在9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体育运动会上,四川体育代表团夺得女子排球和女子网球两项集体冠军以及女子100米、女子300米、女子铁饼等7个单项冠军。在10月24日于重庆举行的田径汇报赛中,四川短跑运动员陈家全以10秒的成绩平当时世界纪录。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访问四

川

9月22日,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庆典途中,顺访成都。随行人员有王室成员、王家军队将领等34人。柬皇家芭蕾舞团、体育代表团亦随同前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及夫人专程到成都迎接。省长李大章及夫人、成都部队负责人郭林祥及夫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及夫人,省、市党政军领导到机场迎接,成都市各界10万人夹道欢迎。西哈努克参观了杜甫草堂、西南民院,观看了柬体育代表团与成都市乒乓球队的比赛,24日乘专机前往重庆访问。25日,周恩来专程从北京抵渝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同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及随行人员由周恩来、陈毅陪同,乘船离渝前往武汉。重庆市各界10万人夹道欢送。

改造低产田土

9月25~27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南充召开改土现场会,介绍南充火花、舞凤、木老公社改造低产田土的经验,要求各地掀起改田改土高潮。入冬以后,以治山治水、改田改土为中心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即在全省兴起。省委及市、地委主要负责人也都下去参加劳动,省级机关干部1000余人自带行李、工具,到简阳、仁寿、中江、

双流、新都等县和农民同劳动。

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成都

11月30日,以柬埔寨王国副首相兼国防大臣、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中将为首的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一行7人,在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陪同下来蓉访问。省长李大章、成都部队司令员黄新廷等迎送。代表团12月3日离蓉。

国民经济在调整期中全面恢复

按照国家计划,本年为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四川省于上年基本完成了调整任务,全年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均已恢复到1957年水平。本年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上升,同时

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全年实现社会总产值183.23亿元、国民收入101.1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7年分别增长29.6%和4.9%,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957年不变价)126.95亿元,比1957年增长23.5%。由于“三线建设”的开展,全年实现基本建设投资19.78亿元,比前三年基本建设投资总和多出30%。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分别比调整时期最低数上升2%和12.4%。市场繁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57年增长48%,零售物价总指数则较最高的1962年回落22.9。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回升,达到1214万人,比最低的1961年增长98.5%;比1957年增长71.2%。

1966年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炼铁获得成功

1月29日,西昌试验厂建成投产。30日,用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砂炼出第一炉铁水。这一成功,标志着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

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矿石,炉渣中含二氧化钛高达25%以上,大大高于16%的临界线,铁水流流动性差,渣铁难分,是世界尚未解决

的难题。1964年,冶金部任命鞍钢炼铁厂厂长周传典主持用普通高炉炼钒钛磁铁矿的实验,组织了东北工学院、重庆大学、西南钢铁研究院、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鞍钢、包钢、首钢及承德钢铁厂、邯郸钢铁厂、宣化钢铁厂、四一〇厂、重庆钢铁设计院、北京黑色冶金设计院等单位的学者、专家、高炉炉长、工长、技术人员108人的科研队伍攻关。从1964年开始,研究组先在承德进行了模拟实验,经过8个月努力,

取得了初步成功。1964年10月～1966年6月,又用一年多时间,在西昌钢铁试验厂用攀枝花的矿石做了验证实验,再次获得成功。1967年4～6月,又在首钢516立方米的高炉上进行了生产性实验,摸索出用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方法。1979年,这项冶炼技术获国家重大发明一等奖。

龚嘴水电站动工兴建

3月15日,龚嘴水电站动工兴建。龚嘴电站位于大渡河下游乐山市与峨边县交界处,为三线建设布局中的重要能源工程,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水力发电厂,我国五大水电站之一。由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设计,水电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承建施工,主要设备均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原规划装机210万千瓦,年发电量101亿度,正常高水位590米,坝高146米,形成的河床峡谷型水库总库容18.8亿立方米。因规划高水位淹没成昆铁路,后将正常水位降到528米,采取高坝设计、分期建设的方式,第一期先建低坝发电。龚嘴电站低坝坝高85.5米,坝长447米,控制流域面积7.6万平方公里,占大渡河全流域的98%,总库容3.45亿立方米;安装7台10千瓦机组,总容量为70万千瓦,年发电量34.3亿度。主要建筑有混凝土重力坝、左岸地下厂房、右岸坝后厂房,河中溢流坝和漂木道等。土石方开挖

227万多立方米,浇注混凝土155万多立方米,工程总投资5.57亿元。1966年3月动工建设。1971年11月30日第一台机组发电,1973年4月4台机组全部投产;1977年10月五、六号机组发电,1978年12月30日最后一台机组投产,电站至此建成。整个工程施工速度快,造价低,质量好。1974年,与电站配套的7回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全部安装就绪,投入运行,向成都、乐山、自贡、宜宾、重庆等地供电,四川主力电网至此初步形成。该电站是四川电网的骨干电源,承担了电网四分之一的负荷,并担负调峰、调相和全网调频任务,对保持电网电压和周波的稳定起主要作用。电厂总投资5.2亿元,平均每千瓦造价746元,发电成本每千度6.61元。1985年,发电量已达到36.26亿度。到1985年底,已累计发电390多亿度,创造价值近30亿元,每年为国家积累资金1.5亿元左右。

1988年,龚嘴水力发电总厂成立,成为四川第一个流域管理水电总厂。总厂管理龚嘴和铜街子两个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30万千瓦。铜街子电站1985年开工建设,1990年建成发电。设计装机4台,容量6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66.278亿千瓦时。

全省出现严重旱情

3月17日,中共四川省委就全省

出现旱情向中央作了报告。上年入冬以后,全川出现解放以来所未有过的春旱。自小春作物播种以后,全省大部分地区降雨很少,19个地、市、州中,除万县、涪陵、达县专区的部分县外,普遍出现旱情,受灾面积达6648万亩,其中有9个专区的50多个县特别严重。这50多个县虽只占全省184个县的30%多,但上年粮食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43%以上。这些地区,自1965年1月以来,降雨量比上年同期少30%~40%,严重的地区少70%以上。涪江、嘉陵江水位大幅度下降,不少支流断流。由于持续干旱,小春作物的生长和水稻栽插及其他大春作物的播种已受到严重影响。

李伏伽等被点名批判

4月,全省开展“学术批判”。

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成员有李大章、刘植岩、杜心源、刘文珍、张守愚、任白戈、廖井丹7人。3月17日,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杜心源为组长的学术批判领导小组。

学术批判小组成立后,于3月下旬按照《二月提纲》精神组织学术批判,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批判、斗争。《四川日报》等报刊和电台连续以大量篇幅转载、转播批判文章,批判翦伯赞的《史学纲领》,吴晗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批判夏衍的“资

产阶级文艺路线”,并组织本省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电台上广播。同时,大专院校及机关单位也开始大规模地批判所谓的“三家村”和“30年代的文艺黑线”。

4月中旬,“文化革命七人小组”提出的《西南局、四川省委文化革命七人小组关于四川开展学术批判的意见》(即四月意见)在西南局第六次委员会(有各省管宣传的书记参加)通过,并以西南局的名义发西南各省执行。会议还决定将李伏伽(前乐山地区文教局副局长)、徐中舒(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卿希泰(四川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作为学术批判的对象。省委还决定直接抓成都晚报、省文联、四川大学三个单位,先摸底排队,弄清情况,再以点带面,逐步开展(四川大学实际未曾进入)。18~19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等问题的指示。会议进行过程中,省委得知《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批评,立即撤销尚未发出的《四月意见》,并指示按中央新的精神重新组织“学术批判”。

从4月26日起,《四川日报》在“彻底粉碎李伏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等通栏标题下,连续刊登批判李伏伽的文章(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师道》、《曲折的路》、《凌云、大佛、苏东坡》、

《夏三虫》、《灯》等),指责李伏伽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作了恶毒的歪曲,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号召大家,特别是工农兵,踊跃参加批判。

机关单位和大专院校随即展开对李伏伽的批判,其中大专院校文科停课(外语专业只上专业课),其他系科利用政治学习和党团活动时间进行学术批判。5月下旬斗争矛头转向批判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等人。

邓国银破举重世界纪录

5月23日,四川举重运动员邓国银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新兴力量举重邀请赛上,以144.5公斤的成绩破轻量级推举的世界纪录。

一批领导干部被点名批判

6月1~28日,中共四川省委先后4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级各大口汇报会议等,分别决定点名批判张黎群(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时任绵阳地委副书记)、马识途(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作家)、李亚群(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沙汀(省文联负责人、作家)、陈伯林(前《成都晚报》总编辑)、肖泽宽(原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

主任)、廖伯康(原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等近30人。《四川日报》、《重庆日报》等党报和广播电台立即连续刊载、播送了大量批判文章,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把他们称为“周扬黑线上的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称张黎群《夜谈》和《巴山漫话》同邓拓的《三家村夜话》一样,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贯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与此同时,省级机关内也进行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省委有关领导提出要“普遍揭发,突出重点”,“全面揭发,党内党外都可以揭,群众想揭谁就揭谁,不怕烧的面宽”。并重点抓1962年前后的问题。到21日,省直机关参加运动的2500多名干部中,被点名的达一半以上,其中定为“三、四类”的干部200多名。地、市、州委也开展了对文教队伍的摸底排队,为开展运动作准备。

大专院校全面停课,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4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改组北大校党委的消息公布后,成、渝两地一些大专院校中的学生,开始张贴党委和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无端指责他们害怕“文化大革命”,不敢“引火烧身”,学校气氛骤然紧张。10日,省委发出文件,要求所有大专院校

一律停课参加运动。每所大专院校在全校范围内公开批判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也要选择重点进行批判。

10月，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中、小学陆续复课，高等学校由于受派性影响较深，直到学生毕业分配，基本上未能实现复课。

郑思群、赵力受到处分

6月22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为维护学校正常秩序所采取的措施，被指责为“压制重庆大学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严重压抑和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受到停职检查处分。郑思群不堪错误路线迫害，于8月2日凌晨自杀身亡。24日，成都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力也以“压制群众运动，攻击革命的大字报，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被撤销成都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并被停止党委副书记和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职务。在公布处分的同时，中共重庆市委和成都市委分别派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代行党委职权。

江津一口气井井喷引起大火

6月22日，四川省石油管理局32111钻井队在江津县塘河气田测试第一口气井时，因气井气压太高，井口出气钢管爆裂，造成井喷，引起大火。

经奋力扑救，保住了气井。在灭火过程中，井队职工有6人牺牲，21人受伤。该队后被石油部命名为“32111英雄钻井队”。

以重庆为中心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基本建成

7月1日，双溪机械厂基本建成，并试制出产品。该厂的投产标志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已基本建成。

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于1964年秋开始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内部配套项目以及为兵器工业服务的基础工业和机械工业配套项目的建设。按照1965年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计划纲要，主要包括第五机械工业部新建和迁建56个项目；扩大重庆钢铁公司的生产能力，加强重庆第二钢铁厂的技术改造，新建长城钢铁厂等；第一机械工业部安排的项目；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配套所需的国防化学工业项目的建设。以上几个方面共安排建设项目84个，投资14.1亿元。这些项目中，除少数是老厂改造外，绝大多数是新建和迁建项目。

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组成了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五机部组建了重庆地区建设筹备处，统筹该部在四川地区新建和迁建项目的基本建设工作。五机部五院、六院、勘测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队、

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中南三公司以及四川省、重庆市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和人民，都为基地建设作出了艰苦努力。

基地建设以迁建、新建工程开始，采取老厂包新厂和独立新建等形式，建成了红山、庆岩、红泉、晋江、青江、华川、红宇、青山、华江、长风、益民、虎溪、庆江、渝州齿轮厂 14 个机械厂和 62、54 两个研究所；内迁陵川机器厂、平山机器厂、双溪机器厂、晋林机械厂、明光仪器厂、华光仪器厂、金光仪器厂、红光仪器厂、益民仪器厂、宁江机器厂、川南工业学校等工厂、研究单位和学校。共拥有建筑面积 300 余万平方米，各类设备 1.42 万台套。

冶金工业配套建设了金属材料生产，如钢材、铝材、炮钢、矽钢片、镀锌板、镀锡板、优质合金等项目；化学工业安排了化学矿、酸、碱、有机化工原料基础的建设和专业化工产品的配套建设；机械工业安排了动力机械、通用机械、仪器、仪表的生产和科研基地的建设。

与此同时，加快了重庆原有的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嘉陵机器厂、长江电工厂 7 个老厂的改扩建。新增一批生产线，研制、开发了新设备、新工艺、新产品，提高了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器工业基地，

范围涉及 14 个县，包括 46 个企业和 8 个科研、学校等事业单位。拥有固定资产 24.63 亿元；有职工 16 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1.3 万人；设备近 3 万台。能成批生产各种枪支、高射武器、迫击炮、大口径炮、坦克车辆及其配套的光学仪器、弹药和炸药等常规轻重武器装备。

小宝鼎煤矿建成投产

7 月，与攀枝花钢铁公司配套建设的小宝鼎煤矿建成投产。该矿曾于 1958 年动工建设年产 3 万吨的矿井，1962 年因经济困难停建。三线建设会战开始后，1965 年 1 月，重新开始大规模建设，先后从全国 9 个省 28 个地区抽调了 4000 多人参加建设。建成后的煤矿生产能力 15 万吨/年。1972 年进行扩建，1978 年 7 月扩建工程竣工，生产能力达到 45 万吨/年。1964 年 11 月，宝鼎山煤炭建设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小宝鼎煤矿及其他攀钢配套煤矿的建设。1965 年 10 月，宝鼎山煤炭建设指挥部更名为渡口第四指挥部，1970 年再更名为渡口煤炭建设指挥部。在建设小宝鼎煤矿的同时，指挥部又相继组织了太平、花山、大宝鼎、沿江煤矿及巴关河选矿厂的建设等工程。太平矿于 1965 年 6 月开工，1969 年 10 月投产，设计能力为 75 万吨/年；花山煤矿于 1966 年 3 月开工，1970 年 10 月投产，设计能力为 60 万

吨/年；大宝鼎煤矿于 1967 年 5 月开工，1971 年 9 月投产，设计能力为 90 吨/年；沿江煤矿 1969 年开工，1972 年 12 月投产，设计能力为 45 万吨/年。巴关河选矿厂于 1966 年 8 月开工，1970 年投产，设计能力为 180 万吨/年。这些煤矿和选矿厂的原煤和洗精煤主要供应攀枝花钢铁公司、攀枝花各热电厂、攀枝花水泥厂。

任白戈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7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点名批判周扬，并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30 年代曾任“左联”秘书长）是周扬的追随者，说他“竟然攻击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在重庆干部群众中引起震动。事件发生后，省委书记廖志高赶到重庆，肯定任白戈“这十几年的工作还好”。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任白戈很快就“靠边站”，无法继续工作了。翌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中，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

7 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抽调上

千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及一些中学。省委的这一决定是在一些大专院校出现部分学生撇开党委，擅自批斗所谓的“学术权威”以及被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教职工，学校秩序日益混乱的情况下，参照北京新市委的办法作出的。工作组进校后，学生迅速分裂为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8 月上旬，毛泽东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命令“通通驱逐之”。中共四川省委立即撤销工作组，改派廖志高等人担任一些重点院校的联络员。不久，联络员也相继撤出。工作组撤销后，部分工作组负责人仍被“造反”学生成长期羁留在学校接受批判。

重庆、成都发生学生“造反”事件^①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学生的斗争矛头迅速转向各级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干部。8 月 15 日，重庆大学、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中、重庆第六中学学生 4000 余人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声援该校“造反派”，与该校不支持“造反”的学生发生摩擦。“造反”学生派代表赴中共重庆市委要求给予支持。市委书记辛易之受指派到场接见学生，处理问题。因其未表态承认学生“造反”是“革命行动”，“造反”学生不肯散

^① 1966 年 6 月 2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8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称赞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8 月 18 日，又在天安门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接受红卫兵袖章。从此，“造反”成为“革命”的代表，风行于全国。

去，一直坚持到深夜。次日，重大、重师和六中学生将批判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千余张大字报贴在市委大门内外，并要求上京“告状”。与此同时，“造反”学生开始四处串连、“煽风点火”。这就是所谓的“八·一五”事件。事后，重庆地区的学生、干部、群众发生分裂，认为“八·一五”事件是“革命行动”的学生、群众，被统称为“八·一五派”。8月26日，重庆大学“造反”学生组织成立后，定名为“八·一五战斗团”。

8月26日，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安排，四川大学6000余名师生，在成都锦江大礼堂听取原工作组组长黄流就工作组“压制学生造反”问题进行的检讨。省委和军区负责人以及出席省委会议的各地委书记参加了会议。大会开始后，川大“造反”学生在来川串连的“首都红卫兵”的支持下，高呼“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等口号，冲击会场讲台，并围攻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等至27日拂晓。这一事件后被称为“八·二六”事件。四川大学学生随后成立“造反”红卫兵组织，定名为“八·二六战斗团”。

红卫兵大破“四旧”^①

8月23日，成都红卫兵分赴街头、工厂、企业，开展所谓的“破四旧”

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春熙路、提督街、总府街、五世同堂等街道，均被改换成“革命”的名字；老字号招牌，如同仁堂、夫妻肺片等被摘下砸烂；群众的发型、着装也受到无理干预；大多数社会科学类图书被认为是有“封、资、修”毒素，被收缴、烧毁、封存。次日，成都市人委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并为一批街道、公园、影剧院易名。重庆和省内其他城镇的红卫兵，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四川的第一批红卫兵是受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于8月中旬从中学开始成立。

一批骨干纺织企业动工兴建

从8月起，四川省陆续在南充、达县、遂宁等地建设了一批纺织企业。这批企业的设计生产能力合计棉纺锭18.5万枚，织机4216台；绢纺锭5000枚及配套织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批企业直到1976年才全部建成。

学校师生大串连

10月初，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知，组织高等院校师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接受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大串连由此开始。根据中央的部署，中

^① 指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共四川省委一方面在各地组织接待站,免费为各地串连学生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又开始有组织地安排学生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9月、10月两个月四川共开出400多趟运送串连师生的专列;平均每天抽出600多辆汽车,共转运去北京串连的师生近100万人次。大串连使交通运输不堪重负,车站、港口严重堵塞。10月底,组织学生赴京参观运动的工作根据中央指示暂时停止,但是形势已经完全失控,几乎所有大中学生,甚至一些小学生,都自行参加到串连的行列。由于相互串连,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一部分学生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串连,鼓动工人起来造反,揪斗企业领导干部,使一部分企业处于无人管理或停工半停工的状态。次年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大串连,并要求外出串连师生于3月20日前返校,串连学生的数量才逐渐减少。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成立

10月初,四川厂矿企业中开始出现“造反组织”。下旬,成都各“造反组织”召开联络会议,筹建成立全市性的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筹备小组,当时仅有成员400余人。“兵团”成立后,人数迅速增加,成为成都及周围地区一支最大的群众组织。到1967年初,已有100多个分团和数十

万成员。“造反兵团”以省、市工交系统的职工为主体,工交系统各大口均设有分团。“兵团”成立前后,省、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开始成立“造反组织”。自此,群众“造反组织”已遍及各行各业,扩大到整个社会。11月下旬“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八一兵团”等宣布成立。这两个组织是以工厂的“工人纠察队”、“工人赤卫队”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员中产业工人、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复原转业军人人数较多,成立时有30余万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等被视为“保守组织”。在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红十条”)下达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瓦解。

“一一·一三”大会召开

11月13日,成都各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主持召开批判李井泉、廖志高的大会。参加群众约20万人。大会按红卫兵与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事先商定的议程,由李井泉作检查。但是,一部分红卫兵在会议进行中,高呼“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冲击主席台,阻止会议进行,致使大会中断。事后,省委在征得李井泉同意后,贴出省、市委的大字报《我们对13日大会的几点看法》,表示支持“一一·一三”大会。李井泉向中央提出请假养病,并指定

程子华主持西南局工作。事后，成都地区“造反组织”因对这次大会的看法不同而分裂为两大派。

四川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

11月，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邓国银、陈家全、贺祖芬、刘德翠4人夺得田径、举重冠军；中国男排获冠军，队员有四川运动员邓若曾。四川运动员共获金牌9枚。

“造反派”包围、进驻西南局、省委机关

8月31日起，“造反”学生组织连续3日包围西南局机关，并一度冲进办公大楼，使机关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以后又陆续发生“造反派”冲击西南局和省委机关的事件。面对学生的冲击，省委召开省部、委、厅、局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要做好串连学生的接待工作，并指出可以同串连学生辩论，但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11月4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受到“造反”学生的严重干扰，一直拖到12月2日才结束。11月底，成都地区

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陆续进驻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强占办公大楼，并将西南局和省委主要领导干部拉上街头，轮流批斗。与此同时，李井泉在“一一·一三”大会后离开成都，后经中央同意到外省养病。省委书记中，廖志高被“造反派”挟持到北京“告状”，回成都后，被扣留在东郊；许梦侠、杜心源被“造反学生”挟持到北京；杨超被“造反派”扣留；赵苍璧被“造反派”看管；其余领导人大多被“造反组织”扣留，轮番批斗。至此西南局和省委再无法正常工作。

《四川日报》被“造反派”封闭

12月17日，成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封闭了《四川日报》社，《四川日报》停刊。自31日起发行《红色电讯》，只转载新华社电讯稿，不再发自己采、编的地方稿件。次年1月12日《红色电讯》停刊，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出版两种不同版本的“《四川日报》新一号”。2月25日报社实行军管后，军管会再出版《四川日报》。4月18日《四川日报》重新改为《红色电讯》。1968年8月14日，省革筹接管《四川日报》社，重新出版《四川日报》，《红色电讯》停刊。

1967 年

省委被“造反派”夺权

1月19日，在上海“一月风暴”^①影响下，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的支持、配合下，封了省委的印，宣布夺权。紧接着，成都市的党政机关也被“造反派”夺权。24日，重庆市40多个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简称“革联会”）夺了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在省内各市、地、州以及省级单位相继发生“造反派”夺权事件。

“造反派”夺权以后，由于相互争权，已经分裂的两派，更加对立。

驻川部队奉命支左

1月23日，根据中央决定，驻川部队派出大批干部和成建制连队分赴各部门、各地区和各单位支左，代行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的党委的职权，对部分重要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省革筹成

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7848部队奉命于6月入川支左，部队领导机关入驻成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驻川部队在极其复杂、艰难的条件下，为缓和紧张局势，保证城乡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秩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文革”期间局势十分复杂，军队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派性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干扰。特别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缺点和错误，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2月28日～3月2日，在成都军区党委领导下，四川省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要迅速建立生产领导班子，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生产队要开好全体社员会，讨论部署春耕工作。要求工交财贸等部门以实际行动支援春耕生产。会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组成9个工作组下到春耕第一线。3月1日，成都军区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成都部队大力支援地方春耕生产。紧接着，又于3月20～

^①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根据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6日，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名义，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8日，毛泽东肯定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说：《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上海夺权又称“一月风暴”。此后，全国掀起夺权高潮，许多地方并发展为武斗，造成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半瘫痪，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遭到进一步破坏的严重局面。

25日，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会议，动员工交战线的干部群众积极抓生产、促革命。

3月4日，由成都军区副政委余洪远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等组成的生产委员会成立，负责领导和组织全省的工农业生产。接着各市、地（州）、县也相继成立了由军队、地方和群众代表组成的各级生产委员会。4月1日，生产委员会更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下设政治部、办公室和工交、农林、财贸、文卫办公室，并从省人委各厅局抽少数人参加工作。全省一时出现局势相对稳定，生产工作秩序迅速恢复发展的形势。“二月镇反”被否定后，生产委员会被造反派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凑合”，再难发挥作用。省革筹成立后，该委员会工作无人过问，遂于9月30日呈文自行撤销。

全省展开“镇反”

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以查抄“黑材料”为名，冲击成都市公安局，并扣押公安局长等公安人员。次日，成都军区出动军队，协助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3人，将其游街示众后，关进监狱。成都地区军内“造反组织”对地方“造反派”冲击市公安局的行动表示声援并对军区“镇压造反派”提出抗议。2月11日，军区逮捕军内

“造反派”50余人。当天下午，地方“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军区“无理逮捕革命造反派战士”，并在军区营门口静坐示威。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通告，宣布不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外来人员必须迅速离开。但是，“造反派”组织不听劝阻，静坐持续了7天7夜。

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出《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要求上述组织的群众支持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的行动，不要介入，不要干预军队内部的事情。信中警告，如果“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成都军区把这封信印成传单，用直升飞机在全省各地散发。经过几天的工作，对成都军区机关的围攻始得以解除。28日，四川省公安厅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并开始在全省各地逮捕“造反派”头头、骨干及其“后台”，史称“二月镇反”。在此次行动中被逮捕的“造反派”以及被视为支持“造反派”的省、地、县领导干部共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万人，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

4月1日，中央在《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的批语中提出，“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击军区和对军

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四川的“二月镇反”因此遭到否定。从4月中旬开始,被关押的人陆续释放并平反,被取缔的组织重新恢复活动。整个平反工作在6月20日成都军区发布《平反公告》后,基本结束。

发现威西盐矿

2月,四川石油局钻井大队在犍为县罗城地段发现盐层,后定名为“威西”盐矿。该盐矿后经地质部第七普查大队勘探查明,盐体分布在犍为、荣县、井研三县境内,南起犍为金井,东至荣县双古,西至井研马踏、双凤,埋深在地下800~1800米之间。岩盐矿体呈现层状产出,厚度为6.32~44.48米。矿体主要是岩盐,次为硬石膏,含氯化钠平均品位大于95%,全为I级品,适于水溶法开采。圈定面积720平方公里,总储量174.63亿吨,按年产100万吨盐,以30%的回采率计算,可开采4000年,是四川规模大、埋藏浅、保存好、品位高,靠近自贡和五通桥老盐业生产基地的特大型岩盐矿床。矿区已建成长山、罗城两个大型采卤矿山,实际年产量已超过135万吨。长山盐矿位于荣县长山镇,1969年冬筹建,1970年春正式开工建设,1971年10月1日建成投产,生产规模为年产卤折盐30万吨。1978年第

二期年产卤折盐40万吨扩建工程开工。1984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068万元,所有主体工程及附属工程基本完工。该矿是全国唯一的生产岩盐卤水的专业化厂家,产品用63公里长管道长途输送,定点供应18家制盐厂,扭转了自贡老采区黄黑卤水逐年下降,即将导致盐业生产萎缩的局面。80年代,开始续建第二期年产折盐40万吨工程。全矿经过挖潜改造,已达到年产折盐80万吨的生产能力,成为自贡盐场的主要原料基地。罗城矿山,位于犍为县罗城镇。1973年开始建设,1978年底建成投产,工程投资1101万元,生产规模为年产卤折盐10万吨。岩盐卤水,专供五通桥盐厂。

中央召开解决宜宾问题的会议

4月1~3日,中央连续三次召开会议解决宜宾问题。四川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杨超,成都军区司令员韦杰,政委甘渭汉,宜宾地、市委部分负责人牟海秀、沈学理等及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议上,江青、王力等人表示坚决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对省委和宜宾地区的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通知》认为:刘结挺等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完全颠倒了黑白”的“冤案”,“应予平反”。受陷害的刘结

挺、张西挺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通知公布后，宜宾地区支持刘、张的一派取得压倒优势，反对刘、张的一派，受到打击和迫害，在宜宾地区造成极大的混乱。

刘、张分别系原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和原中共宜宾市委书记，他们在1955~1960年的任职期间，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对敢于揭发批评他们的人，利用政治运动和种种机会，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多起冤案，在宜宾地区和军队干部中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给党造成严重损失。此前，刘、张已于1963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5年2月23日经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刘结挺、张西挺被正式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结挺跑到北京，开始翻案活动以后，宜宾地区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为支持和反对刘、张的两派。江青、王力等人为培植亲信，插手四川，竭力为刘、张翻案。

成都国营峨眉机械厂（132厂）发生重大流血事件

5月6日，成都两派群众数万人在132厂武斗，造成重大流血事件，共死亡48人，伤629人，因伤致残40余人。

“二月镇反”被否定以后，在“镇反”中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被释放，“造反派”组织很快恢复

活动，并与支持“二月镇反”的群众组织尖锐对立，不断发生摩擦，并于5月初升级为武装械斗。4日，四川第一棉纺厂发生成都地区首次大规模武斗，双方各从厂外调来数千人增援，造成2人死亡，260余人受伤，该厂支持“二月镇反”派组织被打垮。至此成都地区“造反派”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已渐占上风，持对立观点的群众组织在强大政治压力和武斗潮中相继垮掉。“造反派”为取得对成都及全川的控制，选择了对立派力量较强的132厂作为“决战”之地，蓄意挑起武斗。5日晚，132厂“造反派”头头到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策划、组织武斗队伍，6日上午11时左右，数万名“造反派”人员陆续抵达132厂，对立派组织成员退守厂区，在后撤无路的情况下，逼迫在场领导“发枪护厂”，领出各种枪械200余支。持枪人员在警告无效后开枪，酿成重大流血事件。

在两次武斗之后，“造反派”组织在成都取得压倒优势，使武力夺权的既成事实演进为“一派掌权”，成为全川社会动荡、久乱不治的主要根源之一。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红十条”），宣布“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和刘结挺、张西挺负责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为副组长。

《决定》全盘否定了从四川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所做的一切工作，由此株连了一大批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决定》实际上否定了支左部队的大方向，使刚刚建立的领导班子完全陷于瘫痪。同时，《决定》还把成都地区的一些群众组织定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使这些群众组织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迅速瓦解，其中一些人受到批斗和迫害，身心受到摧残。与此同时，把另一些群众组织的一部分定为“坚定的左派”，一部分列为其团结的对象，致使成都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分裂为对立的两派，长期争斗不息。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重庆问题的意见》，决定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由驻军7788部队副政委兰亦农、副部长白斌、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组成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重庆市筹革成立后，一派群众支持，一派群众反对，两派冲突不断发生，重庆地区局势更加混乱。5月23日，石油学校两派武斗，动用了钢钎、铁棍、匕首。

“武装支泸”

宜宾地区是四川最早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地区之一。5月13日，得到刘、张支持的一派，就用武力把另一派赶出了宜宾城。7月20日，又企图用武力“统一”宜宾地区（当时泸州属宜宾地区），组织第一次“武装支泸”，在泸州挑起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打死4人，伤数十人，击沉船只1艘。9月初，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支泸”，挑起武斗。次年7月，发动第三次“武装支泸”，组织上万人的武斗队伍攻打纳溪、合江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三次“武装支泸”先后有3万多人卷入武斗，动用了枪炮、电台、炮艇，武斗中死亡近千人，非法抓捕、关押、揪斗的群众数以万计，致死的群众则达900余人，国家财产损失数千万元，仅泸州化工厂江边船舶就被击毁21只，损失达

46.5万元。

1967年8月～1969年8月，江津、中江、涪陵、西昌、云阳、达县等地相继发生武斗，死亡数千人。

重庆武斗

8月，重庆武斗达到高潮。6月5～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7月8日，两派群众组织在红岩机器厂发生武斗，打死9人，抓走近200人，并首次使用枪弹。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群众组织代表讲话中，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致使重庆武斗进一步升级。7月25日，两派组织在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使用枪支。其后全市各地相继发生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8月，武斗达到高潮。5日，重庆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打死22人，打伤多人。7～8日重庆望江机床厂武斗组织动用改装炮船3艘，沿长江进攻唐家沱、朝天门码头地区，炮击东风造船厂、码头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群众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12日～13日，重庆嘉陵机器厂发生直接参战人员500～600人、支援人员上万人的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枪炮及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357万元。13日，重庆望江厂造反派进攻设在郭家沱中学

的驻厂部队指挥部，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两名战士和一名工人。14日，两派在重庆嘉陵江大桥武斗，打死11人，打伤多人，烧毁重庆市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重庆六中学生宿舍一幢和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直接经济损失50余万元。18～20日，两派在重庆潘家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上百人，打坏房屋7幢，潘家坪招待所遭到严重破坏。武斗人员还抄、砸、抢走物资，抓捕、关押、迫害另一派群众。22日，重庆南岸区武斗，打死22人，打伤数十人。28日，两派群众3000余人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发生武斗，死亡40人。中下旬，杨家坪地区大规模武斗，两派组织参与人员上千人，持续时间一周左右，双方死亡上百，杨家坪街道房屋将近一半被毁。9月上旬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两派武斗队陆续向解放军上缴武器、弹药，武斗才暂时缓和下来。

在重庆发生武斗的同时，成都地区也发生“造反派”组织有组织地抢夺民兵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对立派别也是长期武斗不止，形成武装割据、对峙的局面。东郊和西南郊与市区的交通被截断，市区因武斗被毁坏的楼房达100多幢。

省革筹举办干部学习队

8月14日～10月25日，省革筹在成都锦江宾馆举办了西南局、四川

省、成都市干部学习队。部、委、厅、局级以上干部 1000 多人参加。这个学习队以是否支持“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为标准，来衡量干部是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学习期间，强迫干部揭批“走资派李井泉”。一些被认为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肯支持刘、张的人，多次受到大、中、小型批斗会的批斗。学习队结束前夕，成都大学副校长庄顷、四川医学院党委书记孙毅华不堪折磨，跳楼自杀；接着，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植岩也自杀身亡。

1969 年 3 月和 6 月间，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分别举办了类似的“转向”学习班，参加人数均在 1000 人以上；地、市、州机关负责人和省属以上厂矿省管干部 1800 多人也参加了“学习”。

炉霍朱倭发生强烈地震

8 月 30 日 12 时 22 分 03 秒，炉霍朱倭发生 6.8 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31^{\circ}36'$ ，东经 $100^{\circ}18'$ 。震中烈度为 9 度，震源深度 8 公里。炉霍全县房屋倒塌 325 户，严重破坏 313 户，人畜有伤

亡。极震区内山崩地裂，公路阻塞。甘孜县境有破坏，德格、白玉、色达、新龙、康定有震感。

四川汽车制造厂建成

10 月，四川汽车制造厂在重庆双桥区基本建成。该厂始建于 1965 年 10 月，1966 年 7 月试制出第一辆样车。到 1985 年，生产建筑面积达到 12 万平方米，有各类设备 2068 台，已形成年产 2000 辆各类汽车的能力。四川汽车制造厂的建成，标志着三线建设重点项目重庆重型汽车制造公司已形成生产能力。重型汽车制造公司除了四川汽车制造厂外，主要配套厂还有重庆油泵厂（新建）、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钢板弹簧厂和重庆汽车配件制造厂。到 1985 年，公司累计投资 1.64 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1.1 亿元；职工 530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550 人；各类设备 2000 多台；其中高、大、精重型设备 132 台，主要是从法国等 8 个国家引进的；已为部队和各单位提供重型载货汽车近 500 辆。

1968 年

杜灵遇害

1 月 22 日晚 8 时许，成都军区独

立师师长杜灵乘车公出途经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时，遭到枪击，杜灵中弹身亡，同车的副师长李文受伤。23 日，

张西挺在独立师向杜灵遗体告别时，被群众殴打。

中央为四川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3月，为了稳定四川局势，尽快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央在北京举办“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抽调四川支左部队和地方干部代表、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共5000余人参加学习。学习班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于6月结束。

中央作出“三·一五”、“四·二七”指示

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了四川省筹革、成都军区、四川驻军领导人和李大章，听取了张国华的汇报。汇报中，江青、康生等人不时插话，强调要按1967年5月7日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办事，不许打倒刘结挺、张西挺，并指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这些插话，经整理形成“三·一五指示”。

“三·一五指示”下达后，一派组织乘机展开“战备反攻”，大举批判“右倾翻案风”。各地掀起了抓“黑干将”、“变色龙”、“小爬虫”的浪潮，持续时间达两个月之久，一大批反对刘张的干部和群众被挂黑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飞机”，罚跪，甚至被毒打致残，迫害致死。

4月27日，针对“三·一五指示”公布以后，出现一派群众组织贴大字报批判驻军部队领导人谢家祥的情况，周恩来等接见了四川在京的军政领导人，指出打倒谢家祥是错误的；反对某某部队，说某某军是刘少奇的兵、“黑部队”是错误的，要顶回去。这次接见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被称作“四·二七指示”。“四·二七指示”不再强调反对刘、张就是反对“红十条”，“三·一五”指示公布后受到压抑的一派，又趁机发起反攻。

周恩来总理要求坚决制止重庆武斗

3月3日，长寿县云台川东北石油处两派发生武斗，持续6天7夜，死亡42余人；15日，重庆特殊钢厂武斗，全厂再次全面停产。4月7日，重庆长安机器厂发生了动用轻、重机枪及大炮等武器的大规模武斗。12日重庆电力学校发生武斗。28日，市消防大队前往重庆长安厂救火，在重钢三厂受到武斗组织枪击，消防干警被打死9人，17人受重伤。

4月28、29日，周恩来总理两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3月发生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强硬指示，要张国华等立即找重庆造反派头头谈话，要求立即停止抢武器，抢去的武器统统交回，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严办。他还说，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

痪了。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重庆市革委和警备区采取了坚决措施制止武斗。5月2日,重庆警备区发出《通告》,严令造反派组织于7日18时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将强制取缔。6月6日,市革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维护革命秩序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坚决制止武斗,一切群众组织必须解散武斗组织,召回到外区搞武斗的人员;在6月10日18时前,将所有武器、弹药,全部无条件上缴。原各级领导干部擅自离开本单位者,限6月底以前一律返回;一切外出人员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但是,两派组织头头对上述通告和决定置若罔闻,继续抢夺武器,抢劫各种车辆,挑起大规模武斗。7月1~9日,重庆大坪、建设厂、空压机厂、江陵机器厂、重庆医学院、五一技校等处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水陆两用坦克、三七高炮、四联高机、野炮等重武器。8月,重庆警备区开始采取强硬措施,逮捕了两派主要的武斗头目。9月23日,开始收缴武斗组织的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全部武斗组织。10月15日,两派组织宣布各自撤销总部,重庆武斗始告结束。

襄渝铁路开工

4月,襄渝铁路开始分段建设,主

要由铁道兵负责施工,川、陕、鄂三省抽调民工配合。当时中央决定先修渝达段,缓建原川豫铁路的成达段。1969年,中央指示这条铁路从襄樊修到重庆并定名为襄渝铁路。中央同时还指示,先修北头的莫家营至十堰段,并要求1970年通车。西头达县至重庆段要求一年内建成。整个襄渝铁路要求在1972年建成。

1958年,铁道部曾计划修建川豫铁路,拟从宝成线上的青白江出轨,东行至达县北上,出大巴山入陕西,再沿汉水至襄樊接河南信阳。当年7月,四川成立川豫铁路指挥部,调集12万人修建青白江至达县段。1959年因国家经济困难停工。1960年成都铁路局再次组织6万人复工,同时开凿大巴山隧道。1961年初再度下马。两次施工投入资金4500万元。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职务。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省革筹),以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为副组长。此时,由“文化大革

命”造成的动乱加剧,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乱,全省社会和国民经济处于半无政府和半瘫痪状态。

196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负责人在北京接见省革筹、成都军区、驻川部队负责人,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四川举办约500人参加的学习班,要求解决实现四川群众组织大联合、“三结合”^①和尽快成立省革命委员会问题。

5月28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张国华任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女)、徐驰、邓兴国、江海云(女)、王恒霖、彭家治、张泗洲、冯玉德、蔡文彬、杨忠诚、但坤蓉(女)任副主任。5月31日,在成都召开50万人群众大会,宣告省革委成立。

5月4日、6月2日,成都、重庆两市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

当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省内一些地区长期武斗,生产大度下降,交通运输严重受阻,不少工业停工停产。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已基本陷于停顿,城乡市场供应紧张,肉、食糖、食用油严重匮乏,连食盐都曾一度脱销。人民群众处于困苦之中。

“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

8月27日和28日,省革委组织

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分两批进驻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等13所院校,参加学校斗、批、改,并且领导学校。接着,又相继向全省各地各类学校及文艺、卫生、新闻等部门派驻了“工宣队”。此后不久,农村的学校也进驻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贫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立即解散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至此结束。“工宣队”在校期间,为整顿和稳定学校秩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工宣队”、“贫宣队”本身就是“左”的路线的产物,不可能完成教育改革的任务。1973年,部分高等院校先后出现过抵制“工宣队”的领导,要求“工宣队”撤出学校的情况。为此中共四川省委于12月29日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工宣队的通知》,并在此前后,分别向各校“工宣队”增派了人员。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工宣队”和“贫宣队”于1977年12月退出学校。

长沙坝、葫芦口水库相继动工兴建

10月,长沙坝水库动工兴建。该水库位于威远县威远河水口寺上游,库容3640万立方米,1971年10月建成蓄水。

葫芦口水库位于威远河水口寺下游,最大坝高71米,最大坝长206米,总库容7580万立方米,有效库容5730万立方米。坝址以上蓄水面积,

^① 即工农兵、革命干部、群众组织的简称。

包括长沙坝水库在内,共计 228 平方公里。1972 年开始施工,1973 年因技术问题停工。1977 年恢复施工。1979 年 9 月,水库建成蓄水,与长沙坝水库联合运行,灌溉威远河下游两岸威远县 31 万亩农田,并通过明渠向自贡市

输送生活用水。水库总投资 2161.6 万元。开挖土石方 16.65 万立方米,浇注混凝土 7.05 万立方米。1986 年 9 月 25 日以后,输水改用管线,不仅输水能力大提高,水质也大为改善。该水库设计、施工优良,获国家优质奖。

1969 年

全省开展整党建党工作

1 月 29 日~2 月 1 日,省革委召开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着手恢复“文革”以来实际已经中断的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2 月 28 日,省革委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整党建工作,通过了会议纪要,并下发各地执行。与此同时,全省在 6 个地区进行了整党的试点工作。随后开展的整党建党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极左,强调由造反派领导,依靠造反派,强调整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和深入,而两派严重对立,派性严重,在开展整党的地方,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破坏,一些党员干部受到打击迫害,造成党的组织严重不纯。“一二·二五批示”^① 下发以后,这些做法受到批判。

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关于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四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当年 1 月 7 日,省革委发出“关于分配城市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通知”,要求 1966、1967、1968 届的初、高中生,一律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经过反复动员,全省一大批城镇知识青年陆续离开城镇。到 10 月,全省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 20 万人。此后每年都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 1967 年到 1979 年,全省累计有 135 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为了落实这项工作,各市、地、州、县建立了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机构,区、社、队也安排专人分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受了锻炼,为农村的发展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一运动中断了青年学生的正常学业教育,造成了人才成长的断层,给知识青年和接受插队青年的社队都带来很大困难,也出现了很多严重问题,

^① 详见本年《贯彻一二·二五批示》条。

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反复旧”掀起高潮

2月~5月,四川的“反复旧”运动达到高潮。

省革委成立后,开始在原省委、省人委各部门中抽调干部建立业务班子,同时各地、市、州、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委会。刘、张便把所有自己一派没有掌握控制的地区、单位统统说成是“复旧”。1968年10月中旬,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批判“二月逆流”的问题,刘、张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以批“二月逆流”、批判“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名义,在全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把反对他们的地区和单位说成是“独立王国”;指责刚被结合进革委会而又反对他们的老干部是“穿新鞋,走老路”,搞“复旧”。2月11日,《四川日报》发表《击溃“二月逆流”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反复旧”运动在全省迅速展开。5月7日,成都一些群众组织在体育场召开“反复旧”大会,动用了一百多辆汽车载着一些群众在市内游行、示威并砸抄了《新成都日报》社。在

“反复旧”运动中,全省不少单位出现反复,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有的单位革委会会被搞垮;两派实现了联合的单位再度陷于分裂;西昌、达县、江津地区和成昆铁路北段、宜珙铁路、宜珙公路建设工地以及永荣、广旺、芙蓉煤矿和电力部门出现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三线建设。6月,毛泽东对“反复旧”进行批评后,这一运动才逐步收场。

干部下放“五·七干校”^①

4月26日,原省级机关第一批干部赴米易湾丘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到年底,原省级机关9000多名干部基本上下放完毕。有的省级部门,如公安、检察、法院单独开办了“五七”干校安排下放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共举办县以上机关“五七”干校102所,下放干部共2.3万名。干校名为一面劳动,一面搞“斗、批、改”,实际上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斗争所谓的“走资派”。干校的权力主要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后期有部队干部和“解放”出来的地方干部参加),成为继续打击迫害干部的场所。1970~1971年,省“五七”干校4000多人陆续分配工作。

^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军队是一个大学校”的观点。1968年,黑龙江省革委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送去劳动改造。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干校经验和毛泽东的“广大干部要分批下放劳动”的批示。从此开始,干部下放劳动之风席卷全国。

1972年12月以后，其余5000多人，大体按业务归口，按系统、按单位对口基本分配完毕，尚未“解放”的干部转入郫县的新“五七”干校。此后，各地干校陆续解散，到1978年才宣告结束。

四川中共党员代表会议在成都召开

5月12日～6月3日，省革委、成都军区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在成都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省各地、市（州）、县，成都部队各单位，以及各条战线的代表共5042人。会议传达学习了“九大”文件。要求认真搞好斗、批、改，抓紧搞好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强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不允许另立山头，重拉队伍。

省革委制止急于改变所有制的倾向

6月20日，省革委召开二轻工业工作会议，要求对转变所有制采取慎重态度，在中央未作出新的规定之前集体所有制不要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27日，省革委又发出通知，指出部分县、社出现了急于合并生产队，搞大队核算和收自留地等偏差，强调对政策性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所有制的问

题，必须慎重对待。农村人民公社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对自留地一般不要动，也不要搞捐献。省革委这些措施是针对年初以来，受“左”的思潮的影响，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急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部分县、社急于改变所有制，影响了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也使生产受到影响的情况采取的。上述措施落实后，各地急于改变所有制的倾向得到制止。

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7月25日～8月8日，省革委召开了全省性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座谈会。“清队”开始于上年10月，但未全面铺开，各地发展也很不平衡。座谈会后，“清队”工作全面展开。清理的对象，主要是所谓“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各地区、各单位都按照“六厂一校”^①的经验，把认为是“清理对象”的人揪出来“示众”，并设置“牛棚”进行监管。这次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贯彻“六·二六”指示

10月20～31日，全省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布置落实毛泽东发出的“把

^① “六厂一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清华大学。

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动员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大办合作医疗,大力培养“赤脚医生”。这项工作持续时间长,到1976年底,全省有90.1%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发展到19.2万多人;国家重点装备农村区、社卫生院所3000多个,农村病床由1965年的3500多张,增加到1.89万张。全省1286个区和8508个公社办起了卫生院(所),形成了以区、社卫生院为基地,上联县级医院,下联大队合作医疗站的三级卫生网。有5000多名城市卫生工作人员和1.7万名大、中医药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从1968年起,每年平均有6000名以上的城市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巡回医疗。

高等院校下放给省领导

根据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高等院校下放的通知》,国务院各部和教育部所属在川高等院校交由四川省革委会领导。次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由国防科委划归四机部,由四机部和四川省实行双重领导。

玉溪河引水工程动工兴建

11月中旬,青衣江玉溪河引水工程动工兴建。该工程位于芦山县金鸡峡下游1公里处。进口设计引水流量为每秒32.5立方米。主干渠过芦山、

邛崃县境,尾部入名山百丈水库,再从百丈水库分左右两干渠输水入灌区。规划灌溉面积86.6万亩。工程于1966年着手查勘、测量、规划、设计。1969年10月开始设立办事机构,开挖渠首镇西山隧洞。1976年底前后渠首拦河坝建成,镇西山、天台山、曾家山3条隧洞贯通。1976年4月,主干渠前段通水,12月底全部干渠完工并开始通水,当年实灌农田6万亩。1978年3月,开始向百丈水库送水,使包括邛崃、蒲江、名山、芦山4县的灌区灌溉面积达到50余万亩。

贯彻“一二·二五”批示

11月5日~12月27日,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和驻川部队、省军区、军分区及各地区主要负责人在北京举行了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了10天,参加的有省革委和驻川部队主要领导人共9人。第二阶段扩大到143人,包括军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地区革委会主任和一部分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主要解决刘结挺、张西挺搞派性的问题。会上,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向中央写了《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12月25日,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并在批示(简称“一二·二五批示”)中决定: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谢家祥等15人组成四川

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张国华任组长，梁兴初、李大章为副组长；增补谢家祥、谢正荣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胡炳云、胡继成等 4 人为省革委常委；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等 9 人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梁兴初为组长，王诚汉、谢家祥为副组长；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等 17 人组成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为副组长。刘、张被排除于领导核心。

为了进一步解决四川的问题，中央同意再为四川举办一期 5000 人左右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后来扩大到 6000 人，从 1970 年 2 月 22 日到 9 月 24 日，历时近 8 个月。

“一二·二五批示”下达后，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先军队，后地方”和“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逐级召开党委会和三结合会议传达贯彻。各级在传达中，调整领导班子，在革委会内逐步建立起核心小组。

次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全省调集 10 万名解放军和 8 万名地方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在全省范围内传达“一二·二五批示”，开始公开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的严重错误。1971 年 8 月 5 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刘结挺、张西挺的职务。

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基本建成

年底，西南物理研究所建成，四川核工业形成科研生产系统。四川的核工业系统主要包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西南反应堆研究设计院和西南物理研究所及 7 个工厂、2 个建筑安装公司和 1 所医院。

该系统主要业务为从事国防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及民用技术开发，先后建成全国最大的高通量反应堆和 5 兆瓦低功率反应堆，参与核电站设计，研制成中国最大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受控核聚变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有的科研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70 年

大邑、芦山发生地震

2 月 24 日，大邑、芦山之间发生 6.25 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30°39'，东经 103°17'。震中烈度为 7 度，震源

深度 13 公里。震区内山崩地裂，河流阻塞，泉水干涸。双河乡、快乐乡等受灾，理县、泸定、成都等地有震感。

开展“一打三反”

2月14~22日,省革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召开全省人保会议,研究在全省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会议决定,把“一打三反”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与贯彻“一二·二五批示”和“清理阶级队伍”同时进行,统一领导,统一部署。

会后进行的运动,分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三个阶段进行。运动历时两年多。据1971年统计,全省清出“反革命分子”17.5万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5万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千字号”(钱千元、粮千斤、布千尺)3.7万人,还破获了一批“老案大案”。由于对打击对象无明确的政策界定,加上受到派性影响,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错误地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受到审查、批判、斗争、打击、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与此同时,全省还展开了收缴枪支弹药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行动。到7月,全省共收缴各种炮41门,炮弹547发,土炮178门,各种枪11800多支,子弹230多万发,手榴弹13122枚,炸药2977公斤,雷管33938个,及大批其他武斗凶器。抓捕了一批刑事犯罪份子,公开审判罪犯5170名,其

中判处死刑的400名,死缓62名,无期徒刑118名。

“七〇四会议”召开

4月1~12日,省革委、成都军区召开会议(简称“七〇四会议”),安排全省当年三线建设任务。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央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决定召开的。会议要求坚决完成本年度120个三线建设项目中的40个抢建项目,狠抓260个续建项目,把一些战备急需的国防工业、科研新产品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和已基本建成能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会议强调,7月1日,成昆铁路必须通车,攀枝花钢铁基地必须年内出铁,峨眉水泥厂等必须建成投产。

为落实会议精神,省革委于4月20日成立了三线建设办公室,统一领导全省的三线建设。各地、市革委也进一步加强了原有的重点建设办公室(有的称支重小组),迅速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无人负责的现象。成都军区抽调3000名干部,并派营以上干部到地方长期支左。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成立常规兵器工业办公室,国务院其他有关部也先后在川设立专门机构。25日,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决定,动员21万民工在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修筑襄渝铁路。与此同时,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办

事机构正式成立，并分设办事、规划、指挥、政工、后勤 5 个组，统管全省的三线建设。1970 年，国家对四川三线建设也加大了投资。1970 年四川基本建设投资 41.5 亿元，国家投资就占了 40.1 亿元。在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三线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本年内一批三线建设重点企业陆续建成投产。1月，长江挖掘机厂全面投产。该厂 1965 年开工兴建，后因“文化大革命”停工，1969 年开始恢复建设，同年 10 月部分投产。5 月 1 日，泸沽铁矿露天采区建成投产，开始供应矿石。泸沽铁矿位于冕宁县内，包括大顶山和铁矿山两个矿区。后者又分露天和地下两个采区。露天采区始建于 1966 年初，设计生产规模为年产 40 万吨。6 月，渡口河门口发电厂 4 台 2.5 万千瓦机组建成投产。7 月，松藻矿区打通一矿建成投产。该矿为全国首批建成的 15 个现代化矿井之一。10 月，内迁的自贡硬质合金厂全面投产。

川北航天工业基地开工建设

3 月 1 日，川北航天工业基地正式动工建设。1966 年 3 月，中央确定将原定点在甘肃、陕西的航天工业基地搬迁到四川建设。川北航天工业基地随后定点并进行前期准备。1967 年 8 月和 1969 年 3 月，七机部先后两次调整了基地的布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基地所属的 15 个工程建

设项目到 1975 年前后才陆续建成，1977 年全面投产，1984 年 9 月，通过国家验收。施工期间，国务院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勘测、设计、土建施工、器材运输、设备安装等各专业队伍支援建设。

基地各厂全面投产，相继获得国家、部、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其中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3 项。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7 月 1 日，成昆铁路南北段在西昌礼州接轨，全线至此建成通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昆铁路建设工程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67 ~ 1968 年的 3 年间，桥梁、隧道、土石方等主体工程完成总量仅为 1966 年一年的工作量，使建设进度推迟了两年，损失资金 7.3 亿元。1969 年 8 月，中央发出“成昆铁路务必于 1970 年 7 月 1 日全线通车”的命令，并宣布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指挥施工，工程才全面恢复施工。施工单位全力以赴，经过半年的突击抢建，达到了中央的要求，于 1970 年 7 月 1 日在西昌礼州接轨。

成昆铁路是全国第一条全线使用内燃机车牵引的Ⅰ级干线，全长 1100 公里，在四川境内（成都至金江）长 809 公里；途经彭山、眉山、夹江、峨眉、峨边、甘洛、越西、喜德、西昌、德昌、米易、盐边、渡口（今攀枝花）。线路

行经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三个地理单元和三大地质构造单元。在四川境内有300公里属于7~9级地震区。沿线地质情况复杂,工程十分艰巨。长6107米的官村坝隧道、6379米的沙马拉达隧道和位于大渡河畔“一线天”的63.4米的石拱桥,以及跨越7~8级地震区、长403.8米的金沙江大桥等,在全国新建铁路中是罕见的。全线7处盘山展线,4处越岭,18次跨牛日河,8次跨安宁河,49次跨龙川江,共修建隧道427座,桥梁991座,桥隧总长452公里,占线路总长度的42%。总投资30.75亿元,平均公里造价约238.8万元;其中四川境内段投资21.5亿元,平均公里造价388.94万元。

成昆铁路建成不仅解决了攀枝花资源开发的运输问题,对攀枝花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连接成都、昆明两大城市,成为沟通川、滇两省与西北、华北地区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纽带。铁路运输的发展,促进了沿线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沿线资源也得到开发,在昔日偏僻的地区,新兴的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一大批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有重大影响的工业科研基地,如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很快建设起来。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程开工

9月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工建设。中心总部设在西昌市,发射场建在市区外的牦牛山沙坝夹谷中。这里大气透明度高,是发射地球同步卫星和航天飞机的理想场所。主体工程于1983年初竣工,以后又做了一些适应性改进。中心主要承担通讯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等的试验发射和应用发射。

205微波电路投入运行

为了提高三线建设企事业单位的通信能力,1967年1月,邮电部决定建立成都至重庆60路电子管微波电路,为此省邮电局成立了工程指挥组,并在有关市、地、县邮电局组建工程指挥组。原定1968年建成,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土建任务直到1970年上半年才完成。7月1日装机完成并试通北京电视信号。

1969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听取邮电部等6部门的汇报后指示,要大规模建设微波通信。12月,邮电部军管会召开了微波建设座谈会,就建设北京—西安—南充—重庆—贵阳—昆明—南宁600路微波干线电路,即205微波工程作了具体规划。1970年2月,四川成立了由省军区副司令员唐兴盛为组长的205微波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工程建设。3月20

日,开始施工。沿线 9 个县组成 47 个民兵连、共 13400 多人的建设队伍,由公社、大队干部或武装部长带队,会同电信工程技术人员投入建设。9 月 17 日,四川境内段全长 378.5 公里的 600 路微波省内电路接通。

1972 年 3 月,电信总局确定就该电路上的南充枢纽站经射洪、三台与成渝电路的金堂微波枢纽站连接,再延伸到成都市电信局。这一电路全长 230 公里。1973 年初工程开工,12 月 26 日全线开通,工程质量超过前两条线路。

1971 年 8 月,为了达到传输电视图象清晰,稳定可靠,力争伴音清楚,四川对微波电路进行了整治。但一年多的整治工作成效不大。1973 年 9 月,四川成立了微波工程续建整治领导小组,继续整治四川微波电路。这次经过 60 余天的整治,电路质量大大提高,基本达到要求。1975 年,全省微波技术维护工作走上正轨,完成了 300 项技术改革,设备性能进一步提高。1979~1982 年,成都至南充段、南充至重庆段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调制段。

续建整治后的 600 路微波干线电路系全国三大微波干线之一,具有大容量的电报、电话电路,可开展国际电话、电报和传真、广播、电视等业务。四川微波通信的建成沟通了北京与西南、西北、华南的重点通信并为发展多

种手段并用的、一体化电信网路奠定了基础。

扩建人民渠第七期工程开工

10 月 1 日,扩建人民渠第七期工程开工。这一期工程扩建干渠全长 183 公里,开挖土石方 2800 多万立方米。由于工程量大,先后动员民工 10 余万人。整个工程 1977 年完工。

第七期扩建工程开工后,位于人民渠七期干渠尾部,可蓄水 2.73 亿立方米的鲁班水库和 8200 立方米的继光水库同时施工。1977~1979 年,两个骨干囤蓄水库相继建成,干支渠系的全面配套到 1985 年基本结束。扩建人民渠七期工程完工后,使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引蓄灌区范围扩大到中江、三台、射洪、蓬溪等县的丘陵地带,面积约 4000 平方公里,控灌农田达到 206 万亩。

黑龙滩水库动工修建

10 月 1 日,黑龙滩大型引蓄水库动工修建。该水库地处龙泉山余脉二峨山西麓的仁寿县,是东风渠五期工程安排的囤蓄水库,是当时四川第一座大型引蓄灌溉工程。水库于 1970 年 6 月由四川省水利电力学校设计,仁寿县成立工程指挥部组织施工。参加修建的民工有近 3 万人。水库设长 271 米、高 53 米的弧形重力大坝一座,副坝 12 处,放空隧道 1 条。集雨面

积 160 平方公里,来水量只占库容的一小部分,主要通过府河引都江堰余水充囤。水面 23.6 平方公里,总库容 3.25 亿立方米。1972 年 3 月大坝建成,开始蓄水。1972 年 8 月大坝发现质量问题,1974 年 2 月对坝体进行了加固处理。1975 年 5 月加固工程结束,控灌面积达到 106 万亩。

峨眉水泥厂建成投产

10 月 1 日,峨眉水泥厂建成投产。该厂位于乐山市,距成昆铁路 2 公里,是专为解决三线建设用材,合理调整西南地区水泥工业布局而兴建的,是我国生产水泥的大型骨干企业之一。始建于 1966 年初,第一条生产线于同年 7 月 1 日建成投产。后成套引进两条丹麦湿法轮转窑生产线,设计年产能 100 万吨。两条生产线分别于 1970 年 7 月 1 日和 10 月 1 日投产。能生产硅酸盐水泥、矿渣水泥、大坝水泥、粉煤灰水泥、火山灰水泥等多种产品。附近三峨山石灰石储量丰富、质量好,有发展水泥生产的良好条件。工程总投资 8.2 亿元。到 1985 年,年工业总产值达 4633 万元,生产水泥 77.8 万吨,出厂合格率为 100%,熟料平均标号 582 号。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1.75 万元/人。

一批高等院校迁入四川

下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迁重庆,

占用西南师范学院校址,改名为重庆工业大学(1973 年迁回,恢复原校名);北京农机学院迁重庆,先后改名为四川农机学院、重庆农机学院(1975 年复迁河北邢台,改名为华北农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迁合川,改名为四川矿业学院(1978 年复迁江苏徐州,改名为中国矿业学院)。

西南师范学院校舍让给哈尔滨工业大学后迁往梁平县。1973 年 8 月以后,复迁回原址。

东风渠建成

12 月,东风渠建成。东风渠自龙泉驿界牌向南延伸,总长 77 公里的总干渠直达龙泉山脚,再沿龙泉山西麓,控溉华阳、仁寿西部,支渠直达眉山、彭山及岷江左岸,有效灌溉面积 36.2 万亩。工程原名东山灌溉工程,始建于 1959 年 11 月,第二年经济困难停工。1966 年 9 月更名为东风渠。1973 年 3 月,龙泉山引水工程(隧洞)建成通水,使灌区扩大到简阳、资阳、资中及沱江以西的大片丘陵地区。龙泉山隧洞长 6276 米,是省内最长的一条引水隧洞,流量每秒 30 立方米。

晨光化工总厂建成投产

本年,晨光化工总厂建成投产。该厂位于富顺县,始建于 1965 年 5 月,是从上海、北京、沈阳、锦西等地的 20 多个化工科研院、所抽调人员和设备

搬迁建设的。主要从事高分子合成材料的研究与生产。下设 1 个研究所、3 个工厂和 1 个医药高分子制药厂。

1979 年后更名为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

1971 年

都江堰老灌区改造的主要工程完工

1 月，都江堰渠系改造主要项目完工，工程进入治河和改渠扫尾阶段。该工程于上年 6 月作出规划，8 月 9 日，温江地区成立改渠治河灭螺会战指挥部，1970 年冬开工。施工期间，温江专区 14 个县共动用 200 多万民工，开挖干、支、斗、农、毛渠 3.1 万余条，改变了都江堰老灌区渠道因渠系不合理和长期使用，渠道不畅，影响农业生产的状况。改造后的都江堰，灌溉面积由解放时的 200 多万亩增加到了 700 多万亩。

中央和省属企业逐级下放

根据省革委 1970 年 12 月 20 日通知，中央在川企业从本年下放给四川省领导。一机部在川的 33 个企业中，重庆机床厂等 28 个下放给四川，第二重机床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方红机械厂实行以四川省为主的省部双重领导。之后，中央各部又有 106 个企业下放给四川

省。本年 6 月 8 日，省革委把 44 个省属企业下放给地区。

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三老会”

2 月 21 日，省革委召开全省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三老会”座谈会，全省批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和“三老会”(简称“批清”)的运动随即开始。“五·一六”被中央定为有组织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三老会”被“四人帮”认为是由四川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组成的反革命组织。省革委于 3 月 11 日成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成都、重庆、宜宾、绵阳、江津、西昌等地区，也在市、地革委核心小组领导下，建立了相应的专案联合调查小组和办事机构。清查一直持续到 9 月前后。在“批清”中，全省触动过的干部、群众在 10 万人以上。清查结果表明，所谓“五·一六”、“三老会”在四川实际上根本不存在。11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四川开始纠正“批清”错误。1972 年 3 月 23 日和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分别下达了关于纠正“批清”的文件，四川受到错误打击的干部、群众的

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凉山、阿坝、甘孜地区发生森林大火

从3月起,康定、雅江、丹巴、新龙、西昌、木里、马尔康、茂汶、黑水、汉源等县先后发生森林大火,烧毁森林10多万亩,损失大小林木200多万株,木材半成品8000多立方米,死亡10人,重伤11人。为此省革委、成都军区于4月8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切实加强防火护林工作。

西南铝加工厂基本建成

3月,西南铝加工厂建设工程基本结束。该厂为苏联援建的年产10万吨大型铝镁钛合金加工厂项目,于1959年筹建,原厂址在甘肃兰州红古城,1960年苏联单方面中止协议,我国决定自行设计,自己建设。1961年因国家经济困难下马缓建。1962年发现红古城地质条件不良,将厂址重新确定在重庆巴县西彭乡。1963年底,北京有色金属设计总院等15个单位联合对西彭乡厂址进行规划,作出集中布局方案,三线建设开始后,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认为该方案不符合“山、散、洞”的方针,要求就地分散,重新布置。嗣后由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提出《古城加工厂分建方案》,把全厂分成彼此相距2~3公里的压延、挤压模、机电修配和仓库4个部分。

1965年冶金部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命名为冶金部112厂。1965年工程大规模上马,由冶金部第六冶金建设公司承建。建设中,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主持成立了由冶金部第六建设公司、112厂、洛阳设计院和巴县代表共同组成的中共112厂现场工作委员会和112厂建设指挥部,统一领导该厂的基建和生产准备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建设受到严重干扰,国家对112厂现场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9月5日,国务院曾召开有国家计委、建委、科委、国防工办、冶金部、一机部、七机部、物资部、成套总局9个部、委、局参加的联席会议,专门解决112厂建设的重大问题。1970年5月熔铸车间建成投产,7月压延车间建成投产,1970年3月压模车间投产后工厂基本建成。

西南铝加工厂是我国三大铝加工基地之一,拥有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国内最大的铝加工设备,如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水压机、2.8米铝板热轧机和冷轧机,拥有从国外引进的建筑型材生产线、铝焊管生产线、铝门窗生产线、氧化上色生产线、拉弯矫直机和制模设备。主要生产板、管、棒、型、带、自由锻件、模锻件等铝及铝合金材,以及钛合金、镁合金、高温合金材共14大类、830多个品种。1985年铝材产量达到4.5万吨,工业总产值2.5亿元,实现利润

5874 万元。各项经济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其中出口数量、固定结构成品率、电单耗、劳动生产率、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等指标居全国同行业首位。有 25 种产品获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其中 3 种产品获国家金质奖,3 种产品获国家银质奖。

第二重型机器厂全面投产

3 月,第二重型机器厂全面投产。该厂是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生产军、民品相结合的大型骨干企业。1958 年 10 月动工,1961 年停建,1964 年三线建设开始后续建。主要为冶金工业提供成套设备,同时能为航天、航空、石油、水利、交通、电力、化工、轻工等部门生产专用设备和大型锻铸件。到 1985 年,总共生产各种设备 984 万吨,主要有轧钢设备、锻压设备、水泥设备、化工设备、起重设备、木材加工设备、矿山设备、制糖设备和军工专用设备等。

中共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8 月 12~16 日,中共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成都举行,出席代表 1477 名。大会听取并通过了张国华代表省革委核心小组向大会做的工作报告。选出了 106 名委员和 44 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出常委 19 名,张国华为第一书记,梁兴初为第二

书记,李大章、谢家祥、段君毅、谢正荣、徐驰、何云峰为书记。

在省党代表大会后,市、地、州和 120 个县相继召开党代会,并选举产生了新地、市、州、县委。

第二届中共四川省委和各地党委建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工作重点放在实现安定团结、做好群众工作方面,同时突出抓了解放和使用干部、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工作。到 1972 年底,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和县的党委以及 96.5% 的支部已经建立起来。原省管干部 9100 多人中,96% 已获得解放,绝大多数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

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

9 月 1 日~10 月 12 日,省革委在成都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对建国以来的教育事业提出的两个错误估计:认为解放 17 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会议研究和制定了全省贯彻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的意见,要求学校认真落实“五·七”指示,要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并选派一批工农兵到学校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在贯彻这一精神的过程中,大批教

师作为“臭老九”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同时派进一批对教学工作很不熟悉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参加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中、小学干部教师被立案审查的有 31 万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 1800 余人，被开除公职的 4800 多人。高等学校大批干部和知名教授被批斗、体罚、抄家，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各类各级学校教学设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学校校舍被毁被占，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损失惨重。

部分高等院校撤并

自 8 月起，按照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形成的《关于高等学校调整管理体制和专业设置的意见》，西南农学院的农机专业与迁到重庆的原北京农机学院合并（西南农学院实际撤销）；重庆交通学院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合并；四川农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四川林学院、西南政法学院、成都大学撤销；重庆邮电学院改为工厂；成都体育学院改为中等专业学校。在高校搬迁和撤并过程中，大批校舍被占，大量图书、仪器、设备被破坏和散失。据 1972 年 7 月的统计，省内高等院校被占

(借)用的校舍近 8 万平方米。

马边县发生地震

8 月 16 日，马边县发生 5.8 级地震，震中在马边县城东黄连山一带，震中烈度 7 度强，震源深度 17 公里。次日又发生 5.8 级余震。至 1972 年 4 月 6 日止，共发生大小余震 2675 次。这次地震的极震区在马边县城—熊家湾—黄连山一带，面积 110 平方公里。马边县城 10 人死亡，100 余人受伤，房屋倒塌和严重损坏 273 间，农田毁坏 1 万多亩。沐川、屏山两县靠近城区的地方，房屋大多局部倒塌。

盲目扩大小春面积，推广双季稻

9 月，全省小春生产会议召开。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会议把双季稻的推广提到政治的高度，认为“重大春，轻小春”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春为主，水稻为主，中稻为主”是“黑方针”，提出“小春半年粮”的口号。全省小春面积迅速扩大；双季稻也被当作“革命稻”、“路线稻”，不顾客观条件强行推广。到 1973 年，双季稻面积达到七八百万亩，但晚稻亩产始终只有 100 公斤左右。

1972 年

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大专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从 2 月起,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 19 所院校的 117 个专业恢复招生,招收工作 2 年以上的工人、农民和服役 2 年以上的军人(包括退伍军人和下乡、回乡知识青年)。4 月下旬,招生的大专院校开学,学生约 7000 余人。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不进行文化考试。为组织这项工作,全省成立了由省计委、建委、省革委政工组、省教育局、重庆市革委学校组、成都市教育局革委会负责人组成的省革委高等院校招生领导小组,由谢正荣任组长。

张国华逝世,刘兴元任省委第一书记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成都逝世。终年 58 岁。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决定调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兴元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3 月,省委、省革委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严政、陈仁麒、谢家祥、何云峰、孙洪道到北京学习《毛主席在外巡期间同沿途各地同志的谈话纪要》,听取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指示。在此期间,他们分析了形势,检查了工作,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了思想,并给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表示要认真抓好路线教育,有步骤地向军区部队指战员和全省广大群众传达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在成都地区斗争的有关情况,处理好四川在“批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纠正“批清”中的错误等。3 月 23 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发这份报告。全川的“批林整风”运动由此开始。

7 月 11 日~8 月 22 日,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在成都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8 月 9~10 日,刘兴元、李大章等 10 人到京,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讨论制定《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提纲》15 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于 17 日以中

央文件形式下达。

广元电子工业区建成

3月，广平机械厂建成投产，标志着广元地区电子工业8个协作配套企业全部建成。广元被国家选定为发展电子工业的基地。为了统一组织实施和协调该地区的三线建设工作，第四机械工业部在广元地区成立了指挥部。

广元电子工业区包括广元和青川、旺苍县在内，于1964年4月开始规划建设。第一批建成的有生产整机装备的长胜机器厂，生产天线的天源机械厂，生产高频原件的华昌机械厂，生产变压器的力源无线电厂，生产工装模具的建平工具厂，大明仪器厂，生产工作车厢的红轮机器厂、旭光电子管厂、永星无线电器材厂，生产显示器和伺服系统的广明、广平机械厂（1982年两厂合并为广明无线电厂）。以后又陆续兴建了生产金属膜电阻器的旭光电子管厂，生产电线电缆的江陵电缆厂，生产高射炮指挥仪的万众机器厂，生产集成电路的新光电工厂，生产碱性蓄电池的风雷器材厂，加上基地指挥部，两个产品设计所、一个无线电电磁计量站和两所无线电技工学校，到1977年，一共19个企事业单位。

全省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召开

3月，全省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在武胜县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县党政部门分管计划生育的领导干部。会上介绍了江苏省如东县的经验，着重讨论制定了四川省“四五”期间人口规划。要求到1975年的“四五”期末，把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6.92‰降到15‰。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级办事机构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特别是1971年以前，人口发展完全失去控制。1971年7月，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国务院批发了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同时强调各级政府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四川据此精神于当年成立了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并从1973年起，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式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每年下达给各市、地、州落实。1971年，四川医学院制药厂开始生产避孕针剂、探亲避孕药片等，免费向群众发放。

峨眉山金顶失火

4月8日，省广播事业局峨眉山电视转播台（即703台）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导致金顶华藏寺及其收藏文物同时烧毁，僧人死亡1名。703电视转播台后于1975年10月重新建成。华

藏寺后来重修。

映秀湾水电站竣工

4月30日，映秀湾水电站竣工。

映秀湾水电站位于岷江上游汶川县境内，主体工程于1965年底动工。安装3台4.5万千瓦机组，总容量13.5万千瓦。3台机组分别于1971年9月30日、10月30日和1972年4月30日竣工发电。该工程由水电部成都勘测设计院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六十一支队承担土建施工，水电部第五安装工程处承担机电设备安装任务。

映秀湾水电站是映秀湾发电厂工程的组成部分。其余部分，渔子溪一级水电站主体工程于1966年9月开工，安装4台4万千瓦机组，1975年最后一台机组竣工发电；渔子溪二级水电站位于耿达，安装4台4万千瓦机组，1979年动工，1987年底最后一台机组投产。3个水电站建成后，整个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45.5万千瓦。

全省发生大面积旱灾

7~8月，各地陆续发生伏旱。旱象由川东北蔓延至川东南，受旱面积达2190万亩，几乎覆盖全省，其中成灾面积255万亩。盆地大部分地区40多天未下过透雨，盆地东部和中部雨量仅有50~100毫米，比正常年景少7~9成。达县地区北部、南充地区西

部和绵阳地区南部旱情最为严重。遂宁、武胜、渠县三县7月降雨量仅6~9毫米，不及常年的10%。这是建国以来全省遭受伏旱面积最大的一次。

长城钢厂基本建成

年底，长城钢厂基本建成。

1964年国务院决定把长城钢厂从甘肃张掖地区迁到江油建设。同年5月，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要决策，要求冶金部在西南建设高温合金和特殊钢生产基地与之配套。由上海第五钢铁厂、上海钢管厂和带钢厂等企业搬迁一部分到江油建设第一、二分厂；由抚顺钢厂、大冶钢厂等企业支援建设第三、第四分厂。长城钢厂设计年产钢21万吨、成品钢材17.65万吨。厂区总面积538万平方米。总厂和第一分厂建在江油中坝镇，二分厂建在厚坝镇，三分厂建在含增镇，四分厂建在武都镇。其中一、三、四分厂为从冶炼到成材的专业生产厂，二分厂是管、带、丝的生产厂。

1965年1月，钢厂动工兴建。12月5日，第二分厂热带车间建成投产。接着一分厂的炼钢车间，二分厂的焊管车间，机动部的铸造、铆焊、金工车间也相继于1966年建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钢厂的建设受到严重影响。施工建设计划完全被打乱。直到1972年底，才基本建成一、二、三分厂，四分厂仍处于收尾阶段。完成投资

4.94 万元。

1985 年,实际生产能力已达到年产钢 34.85 万吨、钢材 36.75 万吨。能够生产高温合金、不锈钢、轴承钢、弹簧钢、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钢和钛合金等 10 大类 350 多个钢号,以及锻

压、热轧、冷拉、冷轧、挤压 6000 多个品种的钢材和金属制品。累计已生产钢 270 万吨,钢材 264 万吨,实现利润 5.15 亿元,试制新产品 1438 种,创部、省优质产品 22 个。

1973 年

两座岷江公路大桥建成

1月 25 日,全省最大的公路拱桥——宜宾岷江大桥建成通车。该桥长 532 米,高 43 米。31 日,乐山岷江大桥建成通车。该桥为 7 孔钢筋混凝土拱桥,长 501.9 米,宽 12 米。

炉霍发生地震

2月 6 日零时 5 分 56 秒,甘孜州炉霍县雅德一带发生 7.9 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31°18',东经 100°42'。震中烈度为 10 度,震源深度 17 公里。主震后余震不断,到 5 月底止,共发生大小余震 1070 次。甘孜至炉霍、色达、新龙、邓柯(1978 年撤销,并入石渠、德格)、石渠、白玉、德格等县电讯线路遭到破坏,通讯中断。震区房屋倒塌 1.57 万余间,死亡 2175 人,伤 2756 人,牲畜损失 4 多万头,损失粮食 2000 多吨,受灾面积 6000 余平方公里。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向灾

区发出慰问电,中央、省、州派出慰问团赴灾区进行慰问,组织领导抗震救灾。

工、青、妇三团体恢复活动

6月 27 日~7 月 4 日,共青团省委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四川省委第五届委员会,张莲花等 6 人当选为书记。7 月 23~29 日,省工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工会第五届委员会,蔡协斌当选为主席。8 月 6~12 日,省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省妇联第四届委员会,戴克宇当选为主任。

引进大型化工装置

本年 1 月,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从日本、美国和欧洲引进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7 月 3 日,国务院决定投资 12 亿元,将从日本和美国引进两套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48 万吨尿素的全套设备,从

法国、日本各引进一套年产 4.5 万吨维尼纶的纤维厂建在四川。经中共四川省委研究，把从日本引进的一套合成氨尿素设备建在四川化工厂，把从美国引进的一套建在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纤维厂建在重庆长寿县，定名为四川维尼纶厂。为了加强对这三套设备及其配套工程建设的领导，省革委专门成立了大型进口装置建设领导小组，由省计委主任何郝炬负责，统一领导建设工程。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引进的一套于 1974 年 4 月动工兴建，1977 年 7 月投产；四川化工厂引进的一套于 1974 年 5 月动工，1977 年 1 月投产。四川维尼纶厂于 1974 年 8 月动工，1983 年 5 月建成投产。

大学招生不进行文化考试

自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以来，由于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尽管学校对新学员补了文化课，开展教学活动仍然十分困难。本年 7 月，四川在高等学校招生中，根据国务院批转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 1973 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推荐入学的对象进行文化考察，以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8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说文化考察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全省当年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察被迫作废。自此至 1976 年，大专院校招生全

部实行“推荐”入学。

全省新办和恢复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等技术教育停顿数年，半数以上的学校被撤销或改办工厂。7 月 3 日，省革委批准新办攀枝花钢铁冶金工业学校、泸州天然气化工中等专业学校；恢复重庆市农业学校、成都市农业学校、内江市农业学校、四川省荣昌畜牧兽医学校、四川省南充蚕桑学校、四川省银行学校、成都第一机械工业学校、德阳机械制造学校、四川省财政学校、四川省计划统计学校、成都市财贸学校、万县地区商业学校。

次年 6 月 4 日，国务院批准恢复西南农学院、四川农学院、西南民族学院。8~12 月，省革委批准新建了四川省交通学校等 7 所中等专业学校；恢复了江津农业学校等 27 所中等专业学校。

松潘县黄龙发生地震

8 月 11 日 15 时 15 分 36 秒，松潘黄龙北发生 6.5 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32^{\circ}54'$ ，东经 $104^{\circ}06'$ 。震中烈度为 7 度，震源深度 20 公里。松潘黄龙、漳腊、红星等乡遭破坏，成都、广元、汶川、马尔康、南坪、平武和甘肃文县、武都普遍有震感。

四川重点企业汇报会在京召开

四川的工交企业内派性斗争长期不息,重点企业受害特别严重,生产陷于停顿,对全省经济影响极大。9月27日~12月27日,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四川省峨眉机械厂、重庆钢铁公司、四川汽车制造厂、永荣煤矿、嘉陵机器厂、新都机械厂、清江仪表厂、长城钢厂、望江机器厂、宜宾陶瓷原件厂、涪陵柴油机厂、芙蓉煤矿等十二个重点企业汇报会在北京召开,省委、成都军区和省、市、地的有关负责人和12个重点企业的371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要求纠正“批清”错误,搞好团结,把生产搞上去。

会议结束后,从第二年2月下旬起,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重庆、自贡三市分片召开有26个重点企业参加的会议,推广12个厂矿企业在北京学习解决问题的经验。4月4~8日,中共四川省委又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推广12个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的经验,力图解决“老大难”企业的问题。由于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这些措施都未达到扭转企业停工停产局面的目的。

襄渝铁路全线通车

10月19日,襄渝铁路东西段在陕西省棕溪站接轨,全线至此建成。

襄渝线是横贯我国中南和西南地区的最重要铁路干线,东起湖北襄樊,在

四川途经万源、达县、渠县,西抵重庆,全线新建897公里,其中襄樊到莫家营57公里与汉丹铁路共轨。由铁道部第二、第四设计院完成初测、定测和施工设计。7座大桥由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设计。全线电气化工程由第三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设计。工程累计投资36.18亿元,完成土石方1.1亿立方米,挡护墙230万立方米,隧道716座287.1延长公里,桥梁405座113.2延长公里。襄渝铁路地质情况复杂,工程非常艰巨,全线桥隧总长度占全线的45%,有36个车站建在桥梁上或隧道内。其中四川境内占铁路总长度的19%,有长3000米以上的隧道2座,长300米以上的桥梁11座。

襄渝铁路在四川境内有395公里,占全线的44%,共设39个车站。主要运输煤、金属矿石、钢铁、木材、粮食、土特产品等物资。铁路通车以后,省内沿线经济交通面貌迅速改观,对川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长征制药厂基本建成

12月,长征制药厂在乐山基本建成。该厂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是医药工业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主要承担抗生素和西南地区医药化工设备的生产。1969年6月动工,1971年投产,年生产抗生素总产

量 368 吨，产品 34 种。1984 年，该厂生产的土霉素盐、土霉素碱、力复霉素、庆大霉素、碱酸链霉素等已进入美

国市场。出口产品达到全厂产值的 20% 左右。

1974 年

展开“批林批孔”运动

1 月上旬，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四川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谢家祥、徐驰、鲁大东、张英才、茹夫一在北京开会，研究“批林整风”问题。1 月 30 日～2 月 15 日，中共四川省委举行了“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省级机关、各地、市、州、成都地区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工人、干部、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共 270 人参加学习。之后，省委还多次发出指示和召开会议，要求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大是大非问题开展“批林批孔”。省委还抽调了 700 多名干部，组成 8 个农村批林批孔宣传队，分赴部分县协助工作。

“批林批孔”运动展开后，形势出现新的反复，一度沉寂的造反派又活跃起来，他们大造舆论，攻击四川中共各级组织是“儒家班子”、“复辟班子”，要搞垮、砸烂；给反对他们的干部、群众，扣上“复辟势力”、“走资派”、“投降派”、“儒家”等帽子。在成都，层层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冲击中共四川

省委、成都市委机关，企图搞垮省、市委各级组织。在重庆，组织所谓的“民办‘十大’宣传队”，搞串连，发展组织，煽动层层夺权。广元县帮派头目拉起一帮人建立所谓“河街政府”，与县委、县政府分庭抗礼。合川县帮派头目拉起一帮人篡夺了部分单位的领导权。“批林批孔”使全省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影响，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下降，有些主要工业品下降的幅度较大；交通运输不畅，重庆、成都的交通枢纽一度严重堵塞；刚刚出现转机的一批重点企业生产又陷于瘫痪和停顿状态；各学校批教师，停课搞批判，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

打击拐骗贩卖妇女的罪恶活动

3 月 29 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打击拐骗贩卖妇女罪恶活动的通知。一个时期以来，省内拐骗贩卖妇女的罪恶活动猖獗。据 9 个地、市，108 个县（区）初步调查，有 90 个县（区）存在拐骗贩卖妇女问题，其中严重的县有 47 个。遂宁、苍溪、万县、云阳 4 个县，被拐骗的妇女竟达 1 万余人。各地

根据省委通知精神,立即开展了打击人贩子的活动,一批长期从事拐卖妇女活动的刑事犯罪分子受到严厉制裁,使拐骗贩卖妇女的大为减少。

柬埔寨政府代表团访问四川

4月14日,以柬埔寨王国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兼国防大臣、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为团长,副首相特别顾问英·萨利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一行17人,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抵达成都访问。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及省、市党政军领导到机场迎送。乔森潘一行参观了成都红旗机器厂、峨眉机械厂。4月15日,代表团抵重庆参观访问,参观建设机床厂等单位。17日乘船离渝赴武汉访问。

都江堰渠首工程外江闸竣工放水

4月26日,都江堰渠首工程外江闸竣工放水。该闸按可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设计。全长104米,共分8孔,孔宽12米。钢闸门为先进的新型升降闸门,门高4米,从基础到工作台顶总高16米,是渠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于1973年9月由四川省水利局设计。11月,都江堰水利工程指挥部成立后,调集水利电力局水利工程

处的3个工程队,1个汽车队,又集中了27个县、市的民工3000人,进行施工。外江闸位于鱼嘴堤的西面,该处原有一道古索桥,沟通东西岸交通。为保存历史遗迹,将索道迁建。

豆坝电厂全部建成

1月初,豆坝电厂最后一台机组投产,电厂全部建成。该电厂位于金沙江下游宜宾县豆坝场,临近川南煤田,为当时西南地区兴建的最大火电厂,安装两台10万千瓦的机组和两台5万千瓦机组,总容量30万千瓦,就近利用川南无烟煤发电。该工程由水电部西南电力工程设计院设计,东北电力建设第三安装公司承担安装任务。1966年4月正式开工,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工期拖延3年。1970年3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豆坝电厂工程“七一”投产发电的指示下达后,工程进度加快。第一号机组1970年7月1日,第二、三号机组分别于1970年12月31日、1973年12月底投入运行。

此前,1970年5月1日,豆坝电厂至乐山龚嘴电站137.4公里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建成投入运行,实现了豆坝、龚嘴两大电站联网。1972年5月1日,又建成243公里的豆坝至重庆凉亭工程,实现了龚嘴、豆坝电站向重庆送电。

四川省第三届运动会举行

6月2~10日,四川省第三届运动会分别在成都、重庆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首次省运会,全省各地区及部队、铁路、省直机关的22个代表团,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体操等38个项目的比赛。在田径比赛中,有28名运动员,42次打破16项省纪录,其中21名少年运动员,34次打破12项省少年纪录。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体育战线受到严重破坏,群众体育工作和运动训练基本停顿,一批有发展前途的运动员被耽误了运动青春,不少体育设施和器材被破坏。运动成绩明显下降。这次运动会后,各地训练工作逐渐恢复,运动成绩逐渐回升。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上,女排夺得冠军,男、女篮分别获得第六名和第七名。

南江县发生特大滑坡和泥石流

9月14日,南江县白梅垭发生特大滑坡,长约100米,宽350米,体积700万立方米的泥灰岩表面下滑5公里多。滑坡体迅速在槽水沟内演变为泥石流,6个生产队遭到毁灭性破坏,830亩耕地全部被推向下游冲埋,117间房屋被深埋,最深达60米,153人失踪。

四川运动员首次获亚洲冠军

9月,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洲运动会上,四川运动员宁小琳、谢才明、朱华宇分别夺得跳水、体操、射击金牌各一枚。这是四川运动员首次获得亚洲冠军。

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建成

10月,东方汽轮机厂建成投产。该厂是我国研制和生产大型电站汽轮机、船用汽轮机的大型骨干企业,它的投产标志着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已经建成。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是我国三大电站设备公司之一,是以东方电机厂(德阳)、东方汽轮机厂(绵竹)、东方锅炉厂(自贡)和东风电机厂(乐山)为骨干,联合40多个军民用工业企业、设计、科研单位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总部设在成都市。在骨干企业中,除东方电机厂是1965年恢复建设外,其他都始建于1966年。70年代陆续建成投产后,形成年产80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公司能承担水、火、核电工程,对电站成套设备开发、成套设计、成套制造、成套供应、成套技术服务以及工程总承包,可生产大型船用动力及齿轮减速装置、燃汽轮机、热电联供成套设备、煤矸石沸腾锅炉成套设备、锅炉给水泵、电站辅机、透平机械、调相电机、牵引电机、分马力电机、微电机、加速器、高压电容、化工容器、高中压阀门、硅提炼设备、榨

糖成套设备、啤酒成套设备、高精度齿轮等机电产品。1985年生产电站设备137.8万千瓦,占全国三大电站设备制造集团总产量的34%。

梁兴初被免去省委、省革委的职

务

12月,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梁兴初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革委副主任职务,并增补赵苍璧、杨超、王黎之、唐克碧、汪友根为省委书记。

1975年

莫桑比克友好代表团来访

2月27日,由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率领的莫桑比克友好代表团在交通部长叶飞陪同下访问成都。省革委主任刘兴元、成都军区政委严政等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迎送。代表团参观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28日离蓉飞沪。

第二次重点企业汇报会召开

2月22日~4月3日,重点企业汇报会再次在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上次会议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在全国全面整顿的形势下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参加第一次会议的12个四川的企业外,又增加了山西的1个企业。4月7日,省委召开20万人大会,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5月25日~6月3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汇报会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要求各单位抓紧解决好领导班子的问

题,要抓好典型,以点带面。由于这次重点企业汇报会强调解决思想问题与组织措施结合,会议精神的贯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重点企业普遍有了较大的变化,停工停产的状况得到改善。

三岔水库动工兴建

3月,三岔水库动工兴建。该水库为东风渠第六期工程中的一座大型圆蓄水库,位于简阳县西绛溪河上源。1974年由四川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完成设计。水库采用粘土斜墙石渣坝,最大坝高39.2米,最大坝长1030米,坝顶宽8米,最大坝底宽251米;库区周围有附坝27处,最大坝高25米;水面3.6万亩,总库容2.29亿立方米,正常库容2.24亿立方米。可控灌简阳、资阳、资中3县农田60万亩。水库于1977年2月建成。

再次下放部分省属企业

5月27日,四川再次把88个省

属企业的人权、物权、财权下放给市。其中下放给重庆市的 49 个,下放给成都市的 24 个,下放给自贡市的 15 个。

宝成铁路电气化竣工

7月1日,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竣工,使宝成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干线。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由铁道部第三设计院担任总体设计,电气设计事务所担任通信信号的设计。电气化工程于1958年6月15日开工。由于隧道净空高度不够,需要加以改造。改造工程采取分段施工、分段交付运营的办法。全线共分五段,其中宝鸡至凤州段1961年8月15日建成;凤州到略阳段1972年完工;略阳至广元段1973年12月完工;广元至绵阳段1974年12月完工;绵阳至成都段1975年6月完工。

招收“社来社去”学生

7月19日,省革委召开1975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着重研究招收“社来社去”学生和有关政策问题。会议精神在本年度的招生工作中得到贯彻。这一年,全省13所高校的27个专业共招收9个地区“社来社去”学生16个班1810人。其中两所农业院校全部实行“社来社去”,9所医学、师范院校部分“社来社去”,工科院校和综合大学在个别专业实行“社来社去”制度。

“社来社去”制度是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强调教育实行教学“从农业需要出发”,围绕生产、科研课题组织教学;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阶段组织学生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邓小平接见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

7月11日,邓小平接见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他指出,四川没有肉吃,没有菜吃,到很远的地方去拉菜,就很不安定。他还要求加强管农业的领导班子,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包括养猪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8月2~8日,省委召开地、市、州、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邓小平讲话精神。入冬以后,全省农村上了100多万劳动力搞农田基本建设。当年,四川扭转了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农业总产值和粮食、生猪等产量均比1973年有所增长。

四川运动员在第三届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9月12~28日,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有295名运动员参加的四川代表团取得7个项目的第一名。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一期工程基

本建成

9月,攀枝花钢铁公司轨梁厂正式投产,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攀枝花钢铁公司于1965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建设。经过5年的艰苦奋战,在地形十分复杂的山坡上,开挖420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推成3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盖起165万平方米的工业建筑,安装14万吨的冶金设备。1970年一号高炉建成出铁,1971年出钢,1972年轧出钢坯,1974年轧出钢材,1975年轧出重型钢轧,完成了一期工程。1980年全面达到设计能力:年产铁170万吨,钢150万吨。

攀钢一期工程主要建成130平方米烧结机4台,36孔大容积焦炉4座,1000立方米高炉1座,120吨氧气顶吹转炉3座,1150毫米初轧机1套,951/800/850毫米轨梁轧机1套。形成焦化144万吨、烧结矿390万吨、炼铁170万吨、炼钢150万吨、开坯200万吨、轨梁110万吨的能力。以后作了必要的填平补齐,1978年新建120吨雾化提钒炉2座,1984年建成线材厂。攀钢的设备95%以上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其中一部分大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制造难度较大。国家组织了100多名设计人员,考察、研究了全国各大型钢铁企业的设备,综合各家的优点,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研制了一些具有我国特

色的设备,如5.5米的焦炉、重360吨的堆取煤机、130平方米的烧结机和120吨的转炉等。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0.08亿元,利税3.77亿元;生产铁193.4万吨,钢166.46万吨,钢材91.97万吨。从投产到1985年,共生产铁2037万吨,钢1488万吨,钢材800多万吨,钒渣44.56万吨;实现利润15亿元。产品销往全国,部分产品出口亚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的兰家火山、尖包包两矿于1965年相继开工建设,1970年2月建成投产。从施工到投产只用了4年时间,这在当时的全国露天煤矿中是时间最短的,投资最少的。1966年9月,选矿厂破土动工,4个月后主厂房和一、二系列同时建成投产。矿山和选矿厂投产后,达到采矿、选矿1350万吨的生产能力。

传达贯彻邓小平关于整顿企业的指示

9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会议,传达邓小平8月18日关于整顿企业的指示,讨论布置整顿企业的工作。会议要求在本年11、12两个月,集中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加强设备维修,为下一年的生产打好基础。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加强了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恢复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职工的劳动纪律也有所增强。由于抓了整顿,工业生产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75年

全省工业总产值 147.86 亿元,超过计划 9.6%,比 1974 年增长 29.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中央调整四川领导班子,赵紫阳调四川任职

10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主任,免去刘兴元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主任职务,书记李大章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谢家祥、何云峰回部队,调广东省委书记李子元任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26日,又增补许梦侠、杜心源为省委书记,杨万选、任明道任省革委副主任。

嘉陵江主航道全线通轮

12月,嘉陵江广元至南充 419 公里航道经过整治开通轮船。至此,广元至重庆 739 公里全线通轮。这次施工整治工作由省交通厅第二航道管理处负责,开始于 1966 年,1975 年基本结束,历时近 10 年。共整治险滩 129 个,炸礁 1.17 万立方米,疏浚 74.5 万立方米,筑坝 103.4 万立方米,共完成工程量 179 万余立方米,并新建了苍溪、阆中、南部、蓬安、武胜和广元塔山弯 6 座码头,14 个泊位。经过这次治理,嘉陵江航道水深普遍增加 0.3~0.6 米,河槽稳定,隐患基本消除,通过能力大为提高,结束了广元至重庆只能行木船,不能行轮船的历史。

1976 年

干部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次日起,全省各地广大群众自发地戴黑纱、设灵堂、扎花圈、写挽联。人民群众撰写的大量挽联、悼词和诗文,表达了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怀念,对“四人帮”的愤恨和蔑视。中共四川省委等省级机关干部,也不顾禁令,在省委礼堂举行追悼会,省委书记许梦侠、杜心

源等也参加了追悼会。宣传部门对人民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受命不予报导,但《四川日报》为避免冲淡悼念周恩来的气氛,把本应于 14 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的通讯推迟刊出。

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引起动乱

2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把邓小平决定并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各条战线展开“反击”。2月

10日，四川的派头头冲击省委机关，要求省委负责人接见，逼赵苍璧、许梦侠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表态。与此同时，在街头贴出致省委领导人的公开信，称1975年批资产阶级派性的学习是“有纲领的一次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案件”，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求省委领导检查交待。他们还贴出了大标语，称“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赵紫阳是否定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要‘炮轰邓小平’、‘火烧赵紫阳’”。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会议期间，江青、张春桥等到四川小组会上，点名批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并施加压力，要省委发展四川的一个派头入党。消息传到四川，几个派头头受到“鼓舞”，表示要好好干，要“为首长（‘四人帮’）争气”。原来对立的两派头目重新拉在一起，纠合一些人，进驻省委两天两夜，提出打倒“二赵（赵紫阳、赵苍璧）一许（许梦侠）”的口号。2月底至3月初，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贯彻这次中央会议的精神，布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派头头又大闹省委，声称“走资派是一层人”、“走资派各级都有”、“要揪出还乡团长和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要以他们为核心“解决”省、市委的问题。3月5

日，又借口成都市盐市口出现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在盐市口制造流血事件。4月，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决定公布后，派头头加快了在四川搞动乱、夺权的步伐。不少单位派头头公开伸手要“党票”、要“官票”。在这种形势下，省委要求各地在“造反派”头头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四川刚刚开始稳定的政治局势再次出现动乱。“反击右倾翻案风”使19个地、市、州委中的8个，207个县、市、区委中的30多个瘫痪，工业产值只完成计划的82.1%，农业产值下降5.2%。

成都发生“三·五”政治事件

3月4日，重庆钢铁厂技术员白智清在成都盐市口贴出大字报，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提出不同意见，并指名批评张春桥。他的一些观点在群众中引起共鸣，顿时成千上万人前往观看。5日，成都某单位“造反派”企图覆盖这份大字报，与在场的群众发生争执，并酿成武斗。“造反派”寡不敌众，遭到痛打，其中一人被打伤住进医院。“造反派”趁机闹事。他们先冲击中共成都市委，接着又进驻省委机关。3月12日，他们搞了个150人的“上京告状团”，以“省委包庇反张春桥的人”为借口，挟持省委书记段君毅、许梦侠上京“告状”，要求改组四川省委领导班子。事后，省市革委会领导到医院向伤员表示慰问，白智清也以“反革命”罪

被公安机关拘捕，并在成、渝两地 5 万人大会上受到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白智清于 1987 年 11 月被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钻成我国第一口超深井

3 月 27 日，四川石油管理局 7002 钻井队在武胜县龙女寺构造钻成我国第一口超深井。该井深 6011.6 米，钻透 6 个地质年代沉积岩层，进入盆地基岩后完钻，取得大量地球物理参数，并获得工业性天然气流。第二年 12 月 4 日，7001 钻井队又在梓潼县老关庙再创钻井全国纪录，打成 7175 米深的超深井。这两口井钻成，标志着四川的超深井钻探技术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升钟水库开始修建

4 月，四川最大的径流水库——升钟水库，在南部县升钟区碑垭庙嘉陵江右岸支流西河上动工兴建。该水库流域面积 1756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 5.69 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 177 立方米。建设规模为：坝高 79 米，最大坝长 420 米，开挖土石方 51.4 万立方米，填筑土石方和混凝土 355.5 万立方米，库容 13.39 亿立方米。电站装机 2×2000 千瓦，灌溉面积 132 万亩，总投资 8.99 亿元。水库由四川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承担。1973 年 3 月，国家计委批准修建。4 月，南充地区工

程指挥部成立后，集中了南充地区各县民工 2 万多人，按民兵建制进入工地，开始施工。主体工程于 1984 年完成。全部工程建成后可灌溉农田 208 万亩，对改善南充地区工农业用水条件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川粮食库存空虚

5 月 28~31 日，省委召开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会议。会议披露，上一年全省粮食销售 423 万吨，而征购仅 369 万吨，亏空 55 万吨，为保证供应，不仅挖了库存，还从省外调粮。本年度粮食征购加超购共计 385 万吨，而粮食销售将超过上年，收不抵支。会议要求力争当年收支平衡，除中央已调拨 25 万吨粮食外，本年不再吃外省粮。

尼泊尔国王访问成都

6 月 2 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及随行人员，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邀请，对四川、西藏进行友好访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普美、外交部长乔冠华、副总长韩念龙、中国驻尼大使曹痴等专程从北京到成都欢迎。省革委主任赵紫阳、成都军区司令员刘兴元等省、市有关方面领导亦到机场欢迎。6 月 2 日下午，华国锋与比兰德拉在成都举行会谈。当晚，华国锋举行盛大欢迎晚

宴。国王一行参观了都江堰、四川棉纺厂和成都业余体校，6月5日上午乘专机前往拉萨访问。

松潘、平武一带连续发生强烈地震

8月16日22时06分45秒，松潘、平武一带发生7.2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32^{\circ}36'$ ，东经 $101^{\circ}06'$ ，震中烈度为8度，震源深度为15公里。22日凌晨5时49分52秒，又发生6.7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32^{\circ}36'$ ，东经 $104^{\circ}24'$ ，震中烈度为7度，震源深度为10公里。23日11时30分05秒，再次发生7.2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32^{\circ}30'$ ，东经 $104^{\circ}18'$ ，震中烈度为8度，震源深度为22公里。三次连续地震的极震区内，山体崩塌，出现严重滑坡和泥石流，河流多处堵塞成湖；房屋80%倒塌，耕地毁坏80万亩，粮食损失1700余万斤；41人死亡，150余人重伤，600余人轻伤；损失牲畜2800余头；桥梁30多处、涵洞200多座受到破坏，交通通讯中断。全川大部分地区有感，破坏波及南坪、茂县、北川、青川、旺苍、广元以及甘肃省部分县。

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地震，在成都地区引起恐慌。松潘、平武发生地震后，成都也预报可能发生地震。中共四川省委抓紧了防震抗震工作，“造反派”头目攻击省委“以地震压革命”，还预谋要抓主管地震工作的省

委书记杨超。

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于0时10分在北京逝世。19日，四川省在成都市举行50万军民参加的隆重的追悼大会。19个地、市、州和191个县的追悼大会也在同一时间举行。

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0月17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消息。消息传开，人心大快，21日、22日，成、渝两地百余万人自发上街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省、市领导人及广大机关干部也同广大群众一起上街游行庆祝。23日，四川省、成都部队、成都市召开了有8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各地、市、州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群众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

开展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大揭发、大批判

10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省级机关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大会。25日，省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开展对“四人帮”的大揭发、大批判。四川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自此全面展开。

盐源发生地震

11月7日凌晨2时4分05秒，盐源和云南宁蒗一带发生6.7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27^{\circ}36'$ ，东经 $101^{\circ}06'$ 。震中烈度为9度，震源深度29公里。冕宁、渡口、西昌等地有震感。12日14时34分57秒，再次发生6.4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27^{\circ}24'$ ，东经 101° 。震中烈度为8度，震源深度15~20公里。两次地震，盐源135个乡、宁蒗11个乡受灾。农田毁坏393亩，渠堰毁坏86条(处)，公路塌方阻塞28公里，驿道破坏87公里，盐源河被堵塞形成8公里的地震湖，房屋倒塌413间，33人死亡，牲畜损失323头。

省委批准成立一批地区院校

12月，省委批准在原“社来社去”班或中等专业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绵阳农学院、西昌地区五·七农业大学、宜宾地区共产主义农业大学、万县农学院、南充地区农学院、达县农学院、达县六·二六医学院、达县师范学院、江津地区五·七大学共9所地区院校。1978年以后，这批院校陆续撤销。

金河磷矿基本建成

年底，金河磷矿岳家山矿区正式投产，至此金河磷矿基本建成。金河磷矿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龙门山区石亭江上游红白乡，1959年由四川省化

工厅抽调部分人员组成工作组开始筹建。1961年正式成立四川省金河磷矿，着手矿山开采建设。磷矿主要有马槽滩矿区和岳家山矿区。马槽滩矿区1963年由四川省地质局101地质队提出最终地质储量报告，随后化工部矿山设计研究院完成马槽滩矿区河东三坪矿段的设计任务。自此矿山开始大规模基本建设。12月，金河磷矿马槽滩矿区建成投产。马槽滩矿区投产后，年生产能力为50万吨。岳家山矿区仍由四川省地质局101地质队提供地质报告，化工部矿山设计研究院设计。1970年开工，1976年2月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进行试产。年底，木瓜坪—岳家山铁路通车后，岳家山矿区正式投产。金河磷矿共完成投资1238.28万元；矿石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年。1979年，生产过程实现机械化，成为全省最大的磷矿生产基地和全国六大磷矿之一。

四川仪表总厂建成投产

本年，四川仪表总厂建成投产。该厂是我国自动化仪表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骨干企业之一，由20个专业分厂、1个研究所组成，分布在重庆缙云山麓和嘉陵江畔。工程于1965年9月动工。已经生产的仪器仪表、仪表元器件、仪表材料有近1000个品种。1985年生产自动化仪表17万台、电工仪表33万台、成份分析仪600台、光学仪

器 2500 台、仪表原器件 2068 万件、仪 表材料 449 吨。

1977 年

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1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与成都市委联合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会，揭发批判“四人帮”搞分裂，搞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

从1976年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四川揭发批判“四人帮”大体上分为相互交叉的“三个战役”进行。1月5日的大会后，全省开展了第一个战役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2月开始，逐步深入到揭发“四人帮”在四川培植的亲信刘结挺、张西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把揭发批判推进到第二个战役即揭发批判和彻底清查刘结挺、张西挺及其帮派体系，同时开展“双打”（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和刑事犯罪分子）。3

月25日，省委召开四川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全省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各级干部一万多人参加。在会上，省委进一步动员全省干部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查清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求各地区、各

单位领导干部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排除干扰，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夺取这场斗争的全胜。10月以后，展开了第三个战役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从理论上、路线上分清是非，肃清流毒。各地区、各部门联系实际，针对“四人帮”极左路线在本地区、本部门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问题，逐个进行批判。各地区和经济部门、工交企业重点批判了“四人帮”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批唯生产力论”。教育战线重点批判了“四人帮”否定解放17年教育工作成绩的“两个估计”。文艺界重点批判了“四人帮”否定党对文艺工作正确领导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整个揭发批判一直到1978年。经过揭发批判，分清了大是大非，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消除了思想余悸，对促进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1月，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同时，在全省结合展开了群众性的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

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帮派骨干分子罪行的斗争。清查工作随着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深入而逐步深入，到 1978 年 6 月基本结束。清查中，共触及 14232 人，重点审查约 4000 人。这些人和事都基本查清，并区别不同情况，按照政策分别作了处理。对于大部分犯了一般政治错误的人，说清了问题，都及时予以解脱；对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经过批评教育，改正错误、转变较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一般也免于处分；对一般的帮派分子，经过彻底揭发，交代问题，老实认罪，都给予改造的机会，其中一些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人，一律清除出领导班子；对于那些在政治上搞动乱，打、砸、抢，在经济上搞破坏，进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罪恶大、民愤大而又触犯了刑律的帮派骨干分子，进行了坚决打击。在逐个查证清楚罪行的基础上，依法逮捕、法办了 38 人。从而粉碎了“四人帮”在四川的帮派体系。

在工业学大庆中整顿企业

2 月 1 日，省委、省革委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5 月 24 日、7 月 26 日和 1978 年 5 月 4 日，又先后召开了同样的会议。省委为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的生产秩序，从而尽快恢复工业生产，确定学大庆的中心内容就是全面整顿企业。学大庆会议主要就是部署和检查企业整顿情况，表

彰先进企业。1977 年 7 月，省工业主管部门分别抽调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干部，到各企业帮助进行整顿工作，加强领导班子。经过整顿，各企业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解决了产品质量、物资消耗、设备完好率、劳动生产率、企业积累等方面的问题，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协作关系，开始实行了奖金制度，使绝大多数工业企业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与工作秩序。由于整顿企业和开展以挖潜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较短时间内，工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 1978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 222.16 亿元，比 1976 年增长 64%（按 1970 年不变价格计算），高于全国工业增长幅度。

水稻生产要猛攻中稻

2 月 15 日，省革委决定，全省水稻生产要猛攻中稻。

自 50 年代以来，四川在水稻生产上不断地推广和扩大双季稻种植。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地方把双季稻称为“革命稻”、“路线稻”，进一步强行扩大种植面积。双季稻在四川许多地方由于气候等条件限制，产量很低，得不偿失，引起干部和农民的强烈不满。省委、省革委负责人在农村深入调查，充分听取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四川的自

然条件和农民多年的实践经验,四川水稻生产的优势不在双季稻而在中稻。1976年12月,赵紫阳在一次讨论如何把四川农业搞上去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改变过去对双季稻的提法,全省要猛攻中稻。省革委在部署1977年农业生产时,提出水稻生产要猛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双季稻,得到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普遍拥护,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7年中稻种植面积由1976年的3700多万亩扩大到4100多万亩,双季稻种植面积由1500多万亩减到700多万亩,总产量比1976年增加143万吨,亩产增加47公斤。猛攻中稻成了全省水稻大幅度增产的一个主要因素。

实行“休养生息”方针

1977年春,中共四川省委、省革委开始在农村实行“休养生息”方针,减轻农民负担,增加收入,发挥生产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早在1976年,省委、省革委就对川东、川北地区部份贫困县减少征购粮食25万吨。1977年规定了征购起点。对稻谷生产区人均口粮在280公斤以下、杂粮产区在210公斤以下的生产队,一律免购。从1978年起,又由省财政出钱,对超购任务之外多购的粮食,由原来加价30%,提高为大米加价一倍,小麦加价80%,玉米加价

65%。1977年到1979年3年之内全省粮食征购任务大致稳定在440万吨(贸易粮)左右,3年之内增产粮食819.5万吨,基本上留给了农民。在分配上,采取增产增收,多劳多得,分配兑现的措施;粮食分配采取“保两头,挤中间”的措施,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前提下,压缩社、队集体提留和储备,规定人均粮食不足180公斤的队不留储备粮。社员从集体分得的现金和粮食逐年增加。全省人均1976年分得53.60元,1977年增加到63.15元,1978年达71.95元;1977年分得粮食217.5公斤,1978年达246.5公斤,分别比1976年增长17.9%和33.6%。

开展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

3月,全省围绕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集中开展了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这次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了三次统一行动,到5月底告一段落。全省共逮捕、拘留、劳教了各类罪犯14153人,公判处理4895人,投案自首的近万人。还破获了一大批案件,查获了一批流窜作案的罪犯,缴获了一批反革命罪证和大量赃款赃物,对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整顿社会治安,实现安定的政治局面,起了重要的

作用。

四川乒乓球运动员首次获世界冠军

4月3日，在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四川运动员杨莹与朝鲜选手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这是四川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首次获世界冠军。

盐亭、剑阁遭受冰雹灾害

4月25日，盐亭县被冰雹和暴雨袭击，历时半小时，有12个乡、53个村、316个生产队受灾。受灾作物42750亩，损失粮食211万公斤，有1653间房屋垮塌或受严重损坏，51人受重伤，各种经济损失151万元。5月29日，剑阁县16个公社和镇的210个生产队受冰雹危害，并伴随8级以上暴风，受灾作物29362亩，伤31人，伤耕牛92头，损坏房屋274间。

全省普遍发生小麦条锈病和赤霉病

1977年小麦条锈病在全省范围普遍发生，造成损失的面积达799.5万亩，经防治后，仍损失产量13.65万吨。当年也是解放以来发生赤霉病最重的一年，发病面积达700多万亩，约占全省播种面积的1/4，一般病穗率15%~30%，小麦减产近20万吨。

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大办喷灌

7月28日，为了解决一些地方连年干旱和旱地用水的问题，省委确定农田水利建设分两步走：第一步，在两三年内主攻小型水利和喷灌，抗御普通旱灾。对现有的水利设施挖潜配套，兴修各种小型水利工程；旱地灌溉，主要是发展喷灌。第二步，再修一批大型骨干工程，抗御较大的旱灾。省革委在大足县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和小春生产会议，提出两三年内，要主攻喷灌，争取3年左右解决60%~70%土地的灌溉问题。1978年1月6日在资中县召开了喷灌建设流动现场会议，24日在奉节县结束。5月4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加快喷灌建设的速度。全省农村兴起大办喷灌热潮。但是，在发展旱地喷灌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一哄而起，全面铺开。由于输水以陶管为主，经受不起较高的内压力，破裂严重；高地势的水池无水或蓄水少而蒸发量大，春灌季节水池干涸，有些喷灌机具又缺乏动力，致使许多地方投入不少的物资和资金，成效甚小，造成浪费，走了弯路。

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罪行

9月6日，省委召开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罪行大会。揭发批判了刘、张投靠“四人帮”，残酷迫害干部，鼓吹“文攻武卫”，煽动“全面内战”，大

搞武斗,以及他们上靠“四人帮”,下结帮兄弟,阴谋在四川篡党夺权的罪行。批判大会主会场在成都,全省各地、市、州、县及大专院校、厂矿企业和部队等共设分会场 641 个,参加大会的达 1000 多万人。

1978 年 6 月 24 日,省委再次召开全省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罪行的大会。会上,依法逮捕了刘、张二人。

1982 年 3 月 6~20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判“四人帮”在四川培植的亲信、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一案。3 月 24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依法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江北县、金堂和双流县、潼南县分别划归重庆市、成都市和江津地区管辖

9 月 24 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江津地区江北县划归重庆市管辖。温江地区金堂、双流两县划归成都市管辖。绵阳地区潼南县划归江津地区管辖。

电影《十月的风云》上映

10 月 1 日,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十月的风云》在全省和全国各地上映。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形象地反映党和人民与“四人帮”进行斗争

的第一部故事片,得到了好评。

推广“水路不通走旱路”的抗旱经验

10 月 24 日,省委召开抗旱夺丰收电话会,向全省推广南充地区先发制旱,“水路不通走旱路”的经验。

1977 年地处丘陵的南充地区夏旱之后又遭秋旱。全区计划蓄冬水 240 万亩,只有 70 万亩蓄了水。秋旱发生后,省委和南充地委领导人深入农村调查,发现一些生产队在前两年把一些没有水利保证灌溉的冬水田改种小春粮食作物,连年增产。他们把这个先发制旱争得抗旱夺丰收主动权的办法叫作“水路不通走旱路”,并在广安县召开现场会向全地区推广。“水路不通走旱路”的经验,对于全省广大的丘陵地区和部分山区具有普遍意义。接着,省委又在全省推广这一经验。1977 年南充地区“走旱路”,扩种了小春作物 104 万亩,1978 年小春粮食增产 7200 多万公斤,增长 15.2%。当年全省也因干旱,冬水田减少 500 多万亩,小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 398 万亩,使全省小春粮食获得较大幅度的增产。

政协四川省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12 月 13~22 日,政协四川省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人民政协被迫停止工作，组织机构陷于瘫痪。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政协工作的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 820 人。会议听取了任景龙所作的《关于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选举杜心源为主席，杨超、张秀熟、童少生、谷志标、张呼晨、彭迪先、石础、王定一、任景龙、罗承烈、徐崇林、果基木古、赵孟明、乔钟灵、田一平、刘星垣、降央伯姆为副主席，选出常委委员 111 人。

省人大第五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赵紫阳任省革委主任

12 月 15~20 日，省人大第五届第一次会议召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人民代表大会被迫中断。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代表 1990 名，实到 1943 名。会议听取并审议了赵紫阳代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选举赵紫阳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徐驰、鲁大东、李子元、何郝炬、任明道、钱敏、刘海泉、茹夫一、李林枝、乔志敏、管学思、杨汝岱、吴希海等 13 人为副主任。1977 年 12 月至 1979 年 12 月，先后增补副主任有：杜星垣、牟海秀、孟东波。会议选举产生的省革命委员会，改变了上届由与各派群众组织协

商产生的“三结合”革委会临时权力机构的性质。同时，恢复了人民检察院，加强了省人民法院。

全省中草药资源普查

1977 年，四川省科委组织省中药研究所等 17 个单位，对全省中草药资源进行了普查。到 1980 年，共调查 139 个县、1946 个公社，采集标本 67 万份，中草药 3595 种（包括藏药 300 种）；收集民间秘方、验方、单方 7083 个，编撰为《四川中草药名录》。经过普查，基本上摸清了四川中草药的种类、分布规律，发现和订正具有经济价值和学术意义的新资源 34 种；提出了开发、利用、保护和发展四川省中草药资源的初步建议。

农业全面丰收

1977 年，全省农业全面丰收。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川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十年徘徊不前。1976 年粮食减产，全省有半数生产队人均分粮在 180 公斤以下，其中 25% 的生产队人均分粮不足 150 公斤，全省粮食购销差额大，为安排人民生活，不得不从省外净调进 50.2 万吨粮食。1 月 5 日，在传达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大会上，省委要求各级领导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集中精力，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在经济政策和耕作制度上采取了

一系列重要措施,也由于过去兴建的水利工程发挥作用,以及支农工业的发展,化肥使用量普遍增加,1977年农业获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2923万吨,比1976年净增381万吨,扭转了自1971年以来在2500万吨上下徘徊的局面。当年增产的粮食,有84.6%留在农村,农民人均增加粮食36公斤,解决了连续两年购不足销的问题,年末库存也有增加,当年就甩掉吃“调进粮”的帽子。1978年粮食继续增产达到3196.5万吨,比1976年净增654.5万吨,增长25.7%,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12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000万吨。林、牧、副业和棉、麻、丝、茶、糖等项,项项增产。连续两年农业全面丰收,为各行各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展奠定了基础,对全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盆地东部发现大气田

1977年,盆地东部发现了石炭系地层蕴藏丰富的天然气。经过两年集中勘探,探明分布在盆地东部2万平方公里内的石炭系气层,是四川盆地内第三个区域性气层。从1980年起,盆地东部的天然气年产量占到全省总产量的40%以上。

高等院校恢复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底,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全省高等院校恢复统一考试招收新生,贯彻了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使招生工作广开才路,保证了新生的质量。

1978年

政策12条。

邓小平视察四川作重要指示
2月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视察四川,在成都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四川工作的汇报后,对四川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强调,要清理各方面的政策,要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

恢复农村经济政策

2月5日,省委制定了农村经济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批唯生产力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中许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遭到严重破坏,社、队经营管理十分混乱。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清理。经过清理,对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为广大群众所欢迎

的政策、规定、制度,都予以肯定和恢复;对一些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加以改正,在此基础上确定了 12 条具体政策,主要的是加强劳动管理;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保证社员增产增收、分配兑现等,对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加强耕牛饲养管理,鼓励社员养猪和经营少量自留地,兴办社队企业,等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政策尽管多是旧令重申,但在当时条件下,确是农业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初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明显的作用。比如,在鼓励社员养猪方面实行“斤猪斤粮”政策(收购一斤猪,奖售一斤饲料粮),调动了社员养猪积极性,生猪得到了发展,到 1978 年底,全省生猪存栏数达到 4263 万头,比 1977 年增长 15.1%。

省级文艺团体重新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各文艺团体被迫停止活动,机构瘫痪。1978 年 2 月 20 日,省委书记杜心源代表省委在成渝两地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宣布,成立省文联筹备组和各协会筹备小组。1980 年 6 月 16 日,四川省第二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选出了以马识途为主席的新的领导机构。省文代会期间,省剧协、音协、美协、舞

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等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同时新成立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四川分会、曲艺家协会四川分会、摄影家协会四川分会。1982 年 10 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四川分会成立。1987 年 4 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四川分会成立。继 1977 年 5 月《四川音乐》复刊后,一批文艺刊物先后复刊或创刊。1979 年 1 月,《四川文艺》改名为《四川文学》;3 月 9 日,《科学文艺》创刊;9 月,《红岩》季刊创刊;10 月,《星星》诗刊复刊。1980 年 1 月,《戏剧与电影》创刊。文艺创作也取得可喜成果。如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特级警报 333》、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等等。

整顿各级领导班子

2 月开始,省委用了 2~3 个月时间对县级以上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思想整顿。

“四人帮”制造和煽动起来的派性,对许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使得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长期不团结,直接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思想整顿就是进行坚持党性,清除派性的教育。在整顿一开始,省委明确提出,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派的大方向都是错误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坚持闹派性更是错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按照中国

共产党的组织和纪律原则办事；受派性影响的干部都要坚决克服派性，各自总结经验和教训，增强党性。经过组织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多数干部提高了认识，派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同时，对派性特别严重的个别单位，采取了调离、撤换有关人员的组织措施，调整和充实了领导班子成员。把恢复工作的一大批老干部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把表现好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从1977年到1978年两年中，有730多名干部被提升担任中共县委副书记以上的职务；对12个市、地、州，130多个县（市、区），14所大专院校，30多个大型厂矿企业的领导班子，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部分调整、充实，特别是配备好了一、二把手。

川剧优秀传统剧目重新上演

2月，邓小平在四川视察，于1978年春节看了三场川剧传统折子戏，并上台祝贺，接见演员。他高兴地说，这些节目可以挑一批拿去电视台播放嘛！由此，川剧传统戏在各地先后上演。被封闭了15年的传统戏在四川率先开放，震动了全国。

恢复与整顿教育

4月27日，省委决定整顿教育，恢复学校教育的正常秩序。继在1977年11月撤出进驻学校的工人宣传队

和撤销各级学校的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之后，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调整与加强了学校领导班子。重点办好国务院确定的四川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和省确定的重点中小学8所及中等师范学校1所。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审查的教师平反，迫害致死的进行了昭雪；提升了一批政治上、业务上都较为突出的有一定影响的教师为教授、副教授，第一批提升了106人；着手解决教师中夫妻分居两地、住房和子女就业等问题；组织已经调出教育部门的骨干教师“归队”和收回一部分因工作需要、虽已退休而学有专长、本人能坚持工作的骨干教师回校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克服困难逐步改善教学条件，整顿教学秩序，恢复和健全了各项制度，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使学校教育逐步走上正轨。

22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建成

4月3日，一条22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建成。这条线路从自贡市至重庆市綦江县，全长204公里，是本省西电东送的主干工程，也是联结省内电网的一条重要纽带。

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省委立即布置省委中心学习组、省级机关和部分市、地委的中心学习组进行了学习。8月开始,社会科学界先后召开了3次全省性的理论讨论会。11月2日,省委宣传部按照省委的部署召开了各市、地、州委宣传部部长参加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要求深入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在省与市、地、州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中开展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1979年8月,省委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各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学习。到1979年底,总计参加学习的约100万人次,其中,属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占同级干部的78.5%;属厂矿、公社党委一级的基层干部占同级干部的75%左右。这对于冲破“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推进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相继建立

6月3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1983年4月14日,更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此开始,相继建立一大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学术研究逐步活跃。1980年2月,成都市社会科学院成立。1982年3月,重庆

社会科学院成立。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四川财经学院等高等院校,共建有社会科学研究所(室)108个。省级党政部门、党校系统建有研究所(室)20多个。到1985年,全省公开发行的学术理论刊物有44种。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1979年6月开始筹备,1981年12月正式成立,并发展了一批各类学科的学会、协会和研究会。1984年,根据省委的决定,组织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83年底5年中的全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的第一次评奖,从申报的4000多项科研成果中,评选出10多个大学科和分支学科中的优秀成果758项。如杨超的《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刘诗白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蒙文通(蒙默整理)的《越史丛考》、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叶谦吉的《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及林凌、郭元晞的《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等。各类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先后召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1978年8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就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何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了研讨。1979年2月“全省第一次价值规律讨论会”,通过对计划与市场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等问题的讨论,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相对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社

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竞争等传统观点,提出了要高度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新观点。1983年6月“四川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讨论会”,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含义、内容及其与改革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撤销乾宁、邓柯、义敦3县建制

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甘孜藏族自治州乾宁、邓柯、义敦三县建制。将乾宁县的协德区、扎坝区共10个公社划归道孚县;乾宁县扎麦区两个公社划归雅江县。将邓柯县奔达区3个公社和麻呷区的洛须、麻呷两个公社划归石渠县;将邓柯县的温拖区、阿须区和麻呷区的峨支等8个公社划归德格县。将义敦县的濯拉区4个公社及热柯区波密公社划归巴塘县,将义敦县热柯区的永红、东方红等3个公社划归理塘县。

全省科学大会召开

7月20日,召开了四川省科学大会。

1977年《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出后,九十月,省委先后组织科技界人士学习,研究贯彻措施。10月,省委作出了认真贯彻中央通知的决定。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7月,四川省科学大会

召开。省委向全省科技工作者提出,要结合四川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与生产紧密结合,围绕四川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农业和工业科技研究,为建立高产稳产的农业基础和工业技术改造服务,同时进行重要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大会奖励了由一机部成都工具研究所黄潼年等研究的“齿轮动态整体误差测量新技术”、由攀枝花钢铁公司雾化提钒试验组研究的“雾化提钒技术”、由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室等单位联合研究的“松平、盐源、宁蒗、黑水地震预报”、由四川农学院农学系小麦研究室研究的“小麦良种繁六、繁七的选育”等等,共1961项;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科学工作者。在贯彻科学大会精神的过程中,四川省科协和近40个自然科学学会(协会)陆续恢复或新建立。从1978年5月~1979年2月,有17360名科技人员按专业对口调整了工作,占应调整“归队”人数的95.9%。恢复了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晋升为工程师以上的共13281人,晋升面为10.6%,其中晋升为高级职称的1172人。到1978年10月,国家下达四川的和四川本省的重点科研项目,90%以上已按进度完成了计划。

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向何运刚学习

7月29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

十大筹委会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少年向何运刚学习。何运刚是梁平县梁平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1月15日晚,他为保护集体财产、维护社会治安与坏人搏斗,英勇牺牲。中共四川省委授予何运刚“少年英雄”光荣称号。

罗马尼亚、尼泊尔、澳大利亚贵宾来访

9月10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马尼亚·曼内斯库一行4人,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陪同来成都访问。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省革委副主任鲁大东等到机场迎送,曼内斯库一行参观了成都量具刃具厂、新都机械厂,9月17日离蓉赴杭州。

10月2日,尼泊尔王国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夫及夫人等一行20人,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尼大使彭光伟陪同到成都访问。省革委主任赵紫阳等省、市党政领导到机场迎送。3日下午离蓉飞广州。

10月29~30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贸易资源部长约翰·道格拉斯·安东尼和夫人一行27人到成都访问。

加速发展社队企业^①

9月25日,省委作出了加速发展社队企业的决定,并从方针、政策、组

织上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扶持社队企业。

在9月全省地、县委书记会议期间,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率领各地、市、州、县委书记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共300多人,到江苏、上海考察社队企业,学习经验。参照无锡县和苏州地区的办法,结合四川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创造条件,积极兴办。省建立了社队企业局,由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鲁大东兼任局长,各地、市、州、县也建立了社队企业局,由政府第一把手兼任局长。省计委、经委、农业、财政、物资等省级26个有关部委厅局成立了社队企业处;县以下的粮、油加工企业,开始逐步地由国家粮食部门下放给社队经营;二轻工业在农村的5375个企业划归公社管理。1978~1980年,财政部门扶持社队企业无偿投资1.65亿元,计划、物资部门也分配调拨了一批钢材、木材和其他物资,银行、信用社向社队企业发放贷款6.2亿元,税收部门实行优惠政策,减免了一些税金。从而,使社队企业快速起步,迅猛发展。1980年全省社队企业总产值达30.2亿元,比1978年增长41.8%;实现利润3.15亿元,比1978年增长62.8%;上缴国家税金5890万元,比1978年增长105%。

^① 198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将社队企业统一更名为乡镇企业。

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针

10月3日,省委、省革委在总结少数民族地区20多年来处理农、林、牧三者关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畜牧业和林业的发展,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确定了生产方针:宜牧地区实行以牧为主,多种经济;宜林地区实行以林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1980年又实行特殊的、符合三州情况的灵活政策,省里的规定,凡不符合三州情况的,可以变通执行或报告上级不执行。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从1978年到1984年,共减免粮食征购任务11万吨;对宜林的荒山荒坡,让农民承包造林,规定山权不变,谁造谁有,并有继承权;集体所有的牧畜全部折价归户,实行私有私养。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林牧副业得到全面发展,不仅粮食增产,林牧业的比重也逐年增大。阿坝州在相继退耕还林还牧11.3万亩耕地的情况下,1985年粮食总产量仍达到2.29亿公斤,比1980年增长9.3%;1985年末牲畜存栏303.5万头,与1980年相比,草食牲畜增加96万个羊单位,增长11.6%,生猪增长11.5%,猪牛羊肉产量增长41%,牛奶产量增长1.7倍,牛羊皮张增长39%,畜牧业产值达1.22亿元,比

1980年增长37.3%;新植苹果、梨树面积7.5万亩,苹果保存数达400多万株,比1980年增长1.3倍,产量达1460公斤,比1980年增长2.5倍。甘孜州1985年社会粮食总产量达1.99亿公斤,比1980年增长9.4%;牲畜存栏数达474万头(只),比1980年增长1.07%;造林面积5.78万亩,比1980年增长181.5%。凉山州1985年粮食总产量达12.2亿公斤,比1980年增长7.9%;年末牲畜存栏数达648.9万头,增长25.4%,猪牛羊肉产量达7.17万吨,增长74.5%;造林面积100.5万亩,增长82.4%。

撤销西昌地区建制

10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西昌地区建制。将西昌地区的西昌、德昌、冕宁、会理、宁南、会东县和盐源彝族自治县、木里藏族自治县等合并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将西昌地区的米易、盐边两县划归渡口市领导,仍保留县的建制。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由昭觉县迁驻西昌县。

开始进行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

10月,中共四川省委确定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6个企业开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粉碎“四人帮”后，四川的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但是，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吃大锅饭”的工业管理体制，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进行改革。工业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开始有各种主张。有的主张从改革计划体制入手，有的主张从改革所有制结构入手，有的主张从组织专业化协作入手，等等。归纳起来，实际上就是自下而上从企业改革入手还是自上而下从政府改革入手。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多次同工业企业干部和专家、学者讨论研究，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源泉在企业。要解放整个社会生产力，首先要解放企业的生产力，而解放企业生产力，必然涉及到改革政府管理企业的各种体制和规章制度。这样，企业改革必然会反过来推动政府的改革。因此，选择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认为这样的改革路子，既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又可自下而上地推动各个工业管理部门的改革，作起来比较顺当，改革的方向也比较明确；只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不致于影响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首先选定了 6 个企业进行试点。

试点的办法很简单，只是给这些企业定了一个增产增收的目标，允许它们在年终实现目标后提留少量利

润，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试行 3 个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978 年底，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总结了这 6 个企业的试点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新的办法，扩大试点范围。这批试点尽管时间短，范围小，办法还不完善，但是，对于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具有首创意义，为进一步改革开了一个好头。

省政府嘉奖四川省女子排球队

11月2日，省政府召开大会，宣布四川省女子排球队命名为“刻苦训练，顽强战斗运动队”，并给予奖励。在此之前，四川省女子排球队在 1978 年全国排球甲级队联赛中获得女子排球冠军。这是四川女排第六次获得全国冠军。

四川省文艺调演大会

11月28日，四川省文艺调演大会举行。参加调演的节目分两批，第一批话剧、川剧、京剧；第二批歌剧、音乐舞蹈、曲艺。经过四轮演出，历时 42 天。其中有大型话剧 9 个、川剧 3 个、歌剧 1 个，舞蹈 30 个，声乐节目 32 个，器乐节目 18 个，曲艺节目 27 个，还有大量小型戏剧节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省第一次综合性的文艺调演。大会推选舞蹈《欢灯》、《为了永远的纪念》、《喜雨》、《新华报童》等节目参加全国演出。

农村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

11月，省委在全省推行“包产到组”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在农业生产上实行的是生产资料集中使用，社员集中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不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粉碎“四人帮”以后，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省上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试验。先是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大寨工分”，实行“定额包工”、“以产定工”等多种形式，1977年底试行了包工到组的联产计酬责任制，1978年后“包产到组”责任制在全省推行。

最早试行“包产到组”的是广汉县金鱼公社。1977年秋，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西高公社作调查，发现有一个生产队实行作业组超奖短赔的办法，粮食连年增产，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他向省委工作组汇报后，决定在县内试点。1977年秋，广汉县委确定在金鱼公社进行试点。1978年，全公社粮食产量猛增到250万公斤，比1977年增长22.5%，比全县平均增产比例高出1.5倍；亩产750公斤，每亩增产近150公斤。1978年10月，省委工作组总结金鱼公社的经验，概括为三句话：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

10月27日，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批示：“金鱼公社建立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和奖励制的经验，是运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具体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使社员的劳动同自己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看来，这种办法是可行的。各地县委可以选择有条件的社队，参照金鱼公社十一大队九队的办法，进行试点，摸索经验，不要一轰而起……。”金鱼公社试点经验材料及赵紫阳的批示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印发各地县委。10月30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把金鱼公社经验向各地委作了通报。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草案），“金鱼经验”以“联产计酬”的形式记入，后正式印发全国。1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汉县在金鱼公社搞分组作业、定产定工生产责任制的试点经验。此后，“包产到组”责任制在全省迅速推广开来。到1980年8月，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到全省57.1万个生产队的65.5%。“包产到组”突破了长时间内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禁区”，在农村改革中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恢复与增设高等院校

1978年内，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四川第一批恢复和办好的重点院校有8所，即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成都电

讯工程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四川矿业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医学院和西南政法学院。同时，先后增设了渝州大学、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成都气象学院、四川畜牧兽医学院、成都大学、绵阳农业专科学校、西昌农业专科学校、绵阳师范专科学校、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宜宾师范专科学校、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万县师范专科学校、达县师范专科学校、西昌师范专科学校、阿坝师范专科学校、成都师范专科学校、乐山师范专科学校、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江津师范专科学校、自贡师范专科学校、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恢复了重庆交通学院。一部分专科学校的设立，使四川在发展本科教育的同时，扩大了专科教育的规模，改善了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和在全省的布局。到 1985 年，四川已有专科学校 24 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 41%，除遂宁、广元两个新建市外，其余 18 个市、地、州都设有普通高等学校。当年招收专科生 1.8 万余人，占当年高等学校招生总数的 45.3%；在校专科生达 3.5 万余人，占在校生总数的 30.4%，与本科生比例

为 1：2.3。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978 年上半年在文教、科委、宣传、统战等系统，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在继续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作了一些工作。1982 年 5 月，进一步解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专业不对口、夫妻两地分居、住房困难等具体问题。到 1982 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知识分子 36227 人，已全部进行了复查、纠正。从 1978 年 5 月至 1979 年 2 月，全省共组织了 17360 名科技人员“归队”，占应“归队”人数 18109 人的 95.9%；为 39314 名专业人员解决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普遍得到恢复。到 1983 年，全省已为 36 万多名专业技术干部评定了技术职称。从 1980 年到 1982 年初，经县（市、区）人代会选出的正副县（市、区）长 1283 人中，知识分子占 24%。

1979 年

为李井泉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

1 月 20 日，在中共四川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大会郑重宣布，经中央批准，给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廷、郭林祥

等被错误地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会后,进一步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为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任白戈和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许梦侠、杨超等陆续平了反。为李伏伽、徐中舒、卿希泰、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陈伯林、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赵力等平了反。为被迫害致死的刘植岩、张韶方、郑思群、庄顷、孙毅华等 47 名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2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通知,为四川地下党彻底公开平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三老会”和“二月兵变”等“四人帮”炮制的假案中受审查的干部,一律彻底平反。先后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或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的 97000 多名干部,进行了复查、平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 16 万件各类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改判纠正了 4.6 万余件,其中所谓的“反革命案件”都已平反纠正。

中共四川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1月20日,中共四川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23日结束。会议学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8年11~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赵紫阳在会上作了《坚决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为加快四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报告,强调要在中央

的路线指引下,组织领导好工作重点的转移,自始至终突出抓住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两条,做好一系列工作。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25 名,候补委员 45 名。三届一次委员会选出常委 18 名。赵紫阳当选为第一书记,鲁大东为常务书记,李子元、许梦侠、杜星垣、杜心源、杨超、王黎之、杨万选等为书记;许梦侠当选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从 1979 年 8 月 ~1982 年 12 月,先后任过省委副书记的还有刘西尧、何郝炬、天宝、王谦。

省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2月6日,四川省工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李唐基作了《全省工人阶级紧急动员起来,为加快四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工会第六届委员会,选举李唐基为主席。

工业企业扩权试点改进办法扩大范围

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在总结 1978 年开始扩权试点的 6 个企业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规定了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经济权利,实行计划利润留成加超计划利润分成,或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

润分成,使企业基金的留成同实现利润挂钩,企业能在增产增收的条件下,增提留成资金,用于生产发展以及职工的奖励和福利。具体办法是,在实现利润中,先按核定的利润计划(或上年实现利润基数)的 5% 提留企业基金,超过计划利润或超基数增长部份按 15%~25% 提留;企业折旧基金留用比例从原来的 40% 增至 60%;用企业基金进行挖潜、改造而新增的利润,自投产之日起,两年内全部留给企业。此外,规定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自行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企业有权自销国有商业、物资企业不收购的产品和展销新产品;企业可自行掌握企业的内部职工奖金的发放。这一办法从 1979 年起,在 100 个工业企业、40 个商业企业试行。经过试行,初步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结合起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成效。100 个试点企业中的 84 个地方工业企业,1979 年比 1978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 14.9%,实现利润增长 33%,上缴利润增长 24.2%,均高于非试点企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扩大给企业的自主权比较小;发生了“鞭打快牛”(即先进企业的利润增长潜力相对地比后进企业要小,提取留利的比例也要小些);在确定计划利润时“讨价还价”等。

在进一步调查研究基础上,12 月

22 日,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搞好地方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在利润分成上实行全额分成。按照核定的固定分成比例,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利润;分成比例一般参照各企业 1979 年实际所得来核定,核定后三年不变。并从 1980 年起,在 100 个扩权试点工业企业中的 54 个企业试行。这种办法把企业留利直接同企业实现利润的总额联系起来,“水涨船高”,使企业能着眼于较长时期的发展计划,经营好的企业有更多的留利。同时,按规定实行这个办法后国家不对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和福利、奖励等支出拨款,对企业有更大的激励作用。1980 年实行金额分成试点的 54 个企业平均分成比例中,企业得 18.67%,比 1979 年实行的计划或基数分成比例高。全额利润分成办法虽然对企业订计划时“讨价还价”、“鞭打快牛”等弊病有所克服,但又产生了企业与主管部门争分成比例高低,企业不承担亏损责任等问题。

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2 月 18 日,四川省妇联召开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23 日结束。在会上,戴克宇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选举戴克宇为主主任。

为邓自力等和“文化大革命”前的重大案件甄别平反

2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通知，为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省委对邓自力、崔璋、陈怀堂进行错误的批判斗争和处分，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此外，先后对225人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被处分的错案，全部改正；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除21人情况不明以外，其余全属错案，已全部改正。还有40余人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在1962年7月以后，按照省委规定，有的“取消”帽子，有的“摘掉”帽子，有的不再称“反社会主义分子”，对这些案件又进一步作了清理和改正；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处分的错案，1962年已作了甄别，当时留有“尾巴”的，又作了彻底纠正；在“四清”运动中，错案率高达66.5%，对这部分错案也作了纠正。

与此同时，还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复查。截至1985年底，对提出申诉的32万件刑事案件复查了31万件，从中平反了10多万人。对错判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台胞台属，高级知识分子，宗教上层人士，侨眷等约2万人的案件进行了改判纠正。

对“恐‘右’症”问题的讨论

2月，在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期间，部分市、地、县委领导干部对“恐‘右’症”问题进行了几次座谈讨论。在过去，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在日常工作中总是怕犯“右”的错误，因而，“凡事‘左’三分”，宁“左”勿右，“‘左’比右好”。人们把这种心态叫做“恐‘右’症”。通过讨论，与会干部认识到，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人们所怕的“右”，往往并非真的右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被他们当作“右倾”来批判的东西，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是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座谈会列举了“恐‘右’症”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产生的复杂原因。大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是讲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右倾就反右倾，有“左”倾就要反“左”倾。无论是反右反“左”，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次座谈会及时在报纸上进行了公开报道，对于清除干部中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共青团四川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3月3日，共青团四川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9日结束。王振江作工作报告。大会选出了共青团四川省第六届委员会，王振江当选为书记。

把全党和全省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5月4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三届第二次全体会议，13日结束。会上，省委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错误思潮，明确提出把全党和全省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推进了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进程。但是，还有一部分干部对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赞成的，一接触到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和平反冤假错案等重大问题，思想不通；少数干部错误地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要否定解放思想。这是一种“左”的思潮。与此同时，社会上特别是一部分青年中，出现了一股右的思潮。有些人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灵了，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收’”，主张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不该有正确的界限。这两种思潮都是同三中全会基本方针相背离的。省委三届二次全会和11月10日召开的市、地、州、县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对两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分析讨论。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两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坚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流毒；另一方面，要同怀疑和否定四项

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当前既要着重纠正打着“高举”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错误思潮；同时也要警惕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因为主要是批判极左路线，就不注意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右的东西划清界限；也不要等到这种错误的东西发展成为严重的倾向再去纠正。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根据省委的部署，各地各部门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了大量的引导和教育工作，特别是组织广大干部进一步学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发展轻纺工业

6月25日，为贯彻中央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省革委批转省计委《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中，鉴于四川轻工业太“轻”，发展速度太慢，提出轻纺工业要坚决上。1980年1月22日全省计划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轻纺工业。

为加快发展轻纺工业首先加大了投资。轻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省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12.2%逐步提高到1985年的15.1%。同时，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对轻工业实行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技术改造、基本建设、利用外资

和引进技术、交通运输等“六个优先”。并且从四川的自然资源优势出发,积极发展丝绸、皮革、食品加工、造纸等多种轻纺工业,扶持城乡集体所有制工业,组织生产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消费品。纺织工业以发展化纤交织产品为重点调整产品结构,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纺织厂,共增加纱锭 28 万锭,是建国以来四川增加纱锭最多的一个时期。丝绸业于 1980 年前后,新建和扩建缫丝厂 100 家,1982 年全省缫丝能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丝绸工业开始由典型的原料型逐步向原料与成品结合型的方向发展,到 1985 年末,全省丝绸工业企业达到 209 家,丝织能力有了增强。食品加工业在 1980 年后得到全面发展,全省食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从 1980 年的 12 亿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15 亿元,建成了一批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机制纸产量到 1985 年达 63.03 万吨,比 1980 年增长 74%,产值 7.73 亿元,增长 62.4%。皮革产值 1985 年达 4.38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75.9%。全省轻工业产值 1985 年达 235.97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比 1980 年增长 67.6%。

设立西昌市(县级)

7 月 19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西昌市(县级),其行政区域包括西昌县的城关镇和西郊、马道、红旗三个公

社,喜德县的四合公社。西昌市由凉山彝族自治州领导。

四川运动员在第四届全运会取得优秀成绩

9 月,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四川省代表团获女子排球和 6 个单项的冠军,其中游泳运动员俞平独得 3 项女子自由泳冠军,并打破 4 项全国纪录 7 次。

设立华蓥、白沙、金口河三个工农区

10 月 5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华蓥山工农区(县级),归南充地区领导;设立白沙工农区(县级),归达县地区领导;设立金口河工农区(县级),归乐山地区领导。

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

10 月 17 日,省革委批转了省财贸组《关于扩大商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意见》,商业企业扩权试点全面展开。试点企业从 1978 年的 3 个企业(重庆百货商店、重庆饭店和成都人民商场)扩大到 40 个。1980 年又扩大到 241 个,其中,试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企业有 88 个。1981 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办法在面上推广。

扩权以后的商业、供销企业,有了按市场需求和自身的经营条件编制企

业计划的权利和自行选点进货、自愿联合、参与市场购销活动、发展多种经营的自主权，以及利润留成和发放奖金的自主权和部分商品定价权和部分劳动人事管理权。市场竞争开始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逐步兴起，商品流通也开始活跃起来。从 1981 年到 1983 年上半年，在实行利润留成办法基础上，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这种办法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得更紧密，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但在实施承包中也存在着企业在承包基数的确定、承包超收部分的分配办法等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弊病。从 1983 年下半年起，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商业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通过照章纳税来处理，经营责任制的重点转移到企业内部，并开始试行经理责任制，使商业企业的活力又有所增强。

生产资料进入市场

10 月，四川省物资局、省机械厅在温江联合召开 1980 年上半年机电产品预拨订货会，参加订货会的有中央在川的各企事业单位和各市、地、州供需双方代表。会上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当时持有预拨分配指标的单位由于经济调整，缩减了生产任务，不愿订货；另一方面，一部分企业需要进货，又因为预拨分配指标少或者没有计划指标，不能订货。生产厂家也因为产品订不出货而发愁。会议上对生产

厂家未订出的产品，采取了由供需双方自由订货，不受预拨指标限制的办法，打破了僵局。这次订货会通过市场形式使产销直接见面，敞开订货，开展竞争，开创了 50 年代以来生产资料自由交易的先例，把物资统分统配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

设立乐山市(县级)，撤销绵阳县

11 月 16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乐山市(县级)，将乐山县和五通桥区划归乐山市，撤销乐山县建制。乐山市归乐山地区领导。撤销绵阳县，将原绵阳县的行政区域划归绵阳市管辖。

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为搞活农村经济，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11 月 19 日，中共四川省委制定并开始施行了若干具体政策。如切实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扩大自留地和增划少量包产地；发展社队企业；逐步调整农作物布局，建立生产责任制；允许“五匠”串乡经营等等，解决了当时发展农业生产中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按照规定，扩大自留地和增划小块包产地两项合计每个生产队可以达到本队耕地面积的 15%（过去规定自留地占耕地面积为 7%）。全省共划出耕地 330 万亩。这项政策的施行，促使农村家庭副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活跃了农村集市贸易，增加了农民收入。

恢复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

12月15日,经中央批准,恢复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从1980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印章。1980年恢复了各市及阿坝、甘孜、凉山3个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撤销其革命委员会;各地区也先后撤销了地区革命委员会,改设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地区行政公署。

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召开,鲁大东任省长

12月20~25日,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革委副主任鲁大东关于《同心同德,鼓足干劲,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战役》的工作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选举杜心源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林枝、张秀熟、刘子毅、童少生、李中一、谷志标、裴昌会、伍精华、马识途、刘云波为副主任;常委会委员66人。选举鲁大东为省长,刘西尧、杨汝岱、何郝炬、彭迪先、杨岭多吉(藏)、杨钟、孟东波、牟海秀、刘海泉、乔志敏、管学思、吴希海为副省长。1979年12月~1983年4月,先后增补副省长杨析综、刘星、天宝(藏)、丁长河、顾金池、康振黄。

省政协第四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12月19日,政协四川省第四届第二次委员会召开,26日结束。会议选举任白戈为主席,追认第四届政协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增补的刘披云、周钦岳、赵欲樵、白认、李振、王腾波、柯召、刘云波为副主席,增选曹钟梁、刘文珍、罗志敏为副主席。1982年2月,增选骆是愚、潘大逵为副主席。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组织与活动

12月,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员会及四川省工商联合会分别在成都召开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民盟主任委员为彭迪先、民建主任委员为童少生、农工民主党主任委员为刘云波、工商联主任委员为童少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于1980年1月召开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裴昌会为主任委员,1982年3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省委员会、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员会分别开始筹组省级组织机构,并于1984年2月分别召开代表大会,选出领导机构,民进主任委员刘西林、九三主任委员柯召。1984年4月,中国致公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地方组织机构也相继恢复。组织机构和成员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到1985年底,四川省7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机构为

116 个,比 1978 年增加两倍多;基层组织 841 个,比 1978 年增加了 3 倍;成员总数达 14437 人,比 1978 年增加近两倍。工商联地方组织恢复了 57 个。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都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担任省、市、县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广开渠道,开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作与海外联谊活动。

恢复与发展成人高等教育

1979 年内,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全省成人高等教育经过调整、整顿,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有三种办学形式:一是各厂矿、企业在整顿原有的教育机构的基础上,继续举办职工大学;二是由普通高等学校举办或恢复过去的函授教育、夜大学;三是由省举办广播电视台。到 1981 年,全省共办有职工大学 64 所,在校学生 4761 人,有教职工 949 人;函授学校 11 所,学生 12169 人,专职教师 41 人;夜大学 3 所,在校学生 433 人,专职教职工 8 人;广播电视台 1 所,在校学生 17958 人,教职工 79 人。电大已毕业 1 届近万人。

落实宗教政策

1979 年开始,全省积极开展落实

宗教政策的工作。到 1980 年,先后开放教堂寺观 59 座。政府拨款 120 多万元对一部分重点教堂寺观进行了维修。到 1985 年,全省已逐步恢复各种宗教活动场所 900 多处,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要。15 座全国佛道教的重点寺观,全部移交给了僧道管理。国务院和四川省有关单位先后拨专款近 100 万元,对喇嘛教寺庙进行了维修。1982 年底,四川省伊斯兰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了四川省伊斯兰教协会。相继恢复了四川省佛教协会、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四川省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四川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四川省基督教协会等 5 个宗教团体。各市、州、县也恢复和建立了 68 个爱国宗教组织。同时,各教为培养年轻的宗教职业人员,先后开办了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基督教神学院、尼众佛学院和藏语佛学院等 4 所宗教院校,1985 年,共有在校学员 195 名。宗教界代表人物有 400 多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或担任政协委员,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在甘孜、阿坝两州,有 8 名宗教人士担任了副市长、副县长。

青少年儿童体质调查

1979 年内,省教育局、卫生局和体委等部门组成四川青少年儿童体质调查组,调查了成都市 80 多所大、中、小学校及部分中等专业学校中的(城

区 7~15 岁、乡村 7~17 岁)身体健康的汉族男女学生 11758 人。调查结果与 1958 年调查资料相比较:20 年来,7~17 岁青少年儿童,男平均身高增长 5.94 厘米,女平均增长 5.84 厘米,增高率男女各为 4.32% 和 4.31%; 体重男平均增长 3.25 公斤,女增长 2.57 公斤,增长率男女各为 10.26% 和 7.78%; 胸围男平均增长 3.48 厘米,女平均增长 3.83 厘米,增长率男女各为 5.38% 和 6.02%。

全省流脑暴发流行

1979 年内,四川流脑暴发流行,全省共发病 41138 人,发病率 42.48/10 万,死亡 1910 人,病死率为 4.64%。发病地区主要集中在绵阳、南充、达县、江津、涪陵等地的一些县(区)。

调整社会关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1979 年,摘掉了全省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改变成分,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

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经过认真清理、查证,为 104145 人颁发了《起义人员证书》;为 16575 人复查后落实了有关政策。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人被重新安置了适当工作,享受离退休待遇和国家定期给予的生活补助。

落实台胞、台属的政策。四川有台胞 326 户、667 人;台属 7.15 万户、27 万多人。不少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他们中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从 1979 年开始进行认真清理、查证,到 1983 年,他们中的 3775 件冤假错案已得到平反纠正,共落实了 17645 件政策问题,基本上完成了落实政策的任务。

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部宽大释放了过去参加武装叛乱的在押犯,连同所有原地主、封建主、农奴主、奴隶主一起摘掉帽子,享受公民权。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在阿坝州和凉山州发生的所谓新“叛乱”和“杀黑彝”错案,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政治平反,经济上也适当赔偿了损失。1983 年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批示,在充分肯定民主改革和平叛成绩的前提下,对 1958 年以前在藏、彝地区平息叛乱中,误伤和错整的群众进行了妥善处理。

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如华尔功臣烈、索观瀛、夏克刀登、罗大英等公开平反,恢复名誉,举行追悼会,肯定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家属。

1980 年

科研单位扩大自主权

1月3日,在1979年开始的部分科研单位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基础上,省人民政府批发了《关于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的试行意见》,在全省科研单位普遍试行。科研单位在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和条件,通过承接外单位委托的科研、试验、试制和技术加工,开展技术服务、出售小试、中试产品等手段,组织经济收入。科研单位组织的纯收入,全部归本单位支配,用于建立本单位的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科研单位加强经济核算,建立岗位责任制和其他必要的管理制度。

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全省自然科学研究单位普遍推广了成都市电子技术研究所的经验,实行以课题承包、课题核算和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科研经济责任制,还在部分科研单位试行由所长“组阁”的所长负责制。同时,对技术开发研究单位实行技术合同制,逐步减少事业经费;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单位实行基金制;对农业科研和科技情报等服务性单位实行经费包干制。到1985年底,全省实行技

术合同制的地属以上科研单位已达42个,其中全部取消事业费的单位14个,分别占地属以上科研单位总数的48.3%和16.1%。全省科研单位已基本上实行了所长负责制。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也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地方科技基金,全省有80%市(地、州)和70%的县(市、区)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

随着科研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技术市场开始出现,并日趋活跃。仅1985年,全省共举办各种技术交易会140多次,成交项目6600多个,总成交额达9.3亿多元。1985年,在四川省秋季成果交易会上,首批提出10项科研项目公开招标,打破了传统的科技计划管理体制,给科技发展注入了活力。

宜宾地区探明大型无烟煤田

1月3日,《四川日报》报道,四川省煤田地质公司在宜宾地区探明一个大型无烟煤煤田。在这个矿区的280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可采煤层3~5层,可采煤层总厚度5~7米,无烟煤储量达16.9亿多吨。

高等院校扩大自主权

1月16日,在1979年进行的扩大高等院校自主权的基础上,省人民政府批准各高等院校在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科研计划,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前提下,自力更生,挖掘潜力,建立院校基金,用于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和师生员工的集体福利与设施,以及发给教职工的奖金等,解决各院校一些急迫问题。各院校开办了函授、夜大学和各种短期培训班,接受委托培训,招收部分专业的自费生。

1984年,进一步扩大了招生、毕业生分配、教育、科研,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自主权,在7所高等院校开始试行校(院)长负责制,使学校领导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各高等院校本着“加强基础,注重实践,培养能力”的原则,进行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的改革。修订了教学计划,更新了部分内容,进行了课程结构的调整;注意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教学方法,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普遍实行了教师工作量制、教学检查制、教师考核和业务档案制,一些学校还试行了学分制。1985年起,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完善了扩权措施。

《彝文规范方案》在凉山州推行

1月17日,《四川日报》报道,《彝

文规范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这个方案是从1974年开始,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经有关部门和语文专家共同努力,对原有彝文反复比较、整理和规范后制定的,经过四、五年的试行,深受彝族群众的欢迎。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规范方案,作为彝族的文字正式使用。凉山州用《彝文规范方案》扫盲,很快使40%的彝族文盲脱盲。一部分中小学已采用彝语文统编教材上课,还开办几所彝文中等专业学校,部分中师和民族学院开设了彝文班。《彝文规范方案》还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

1月22日,全省计划会议根据1979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第三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对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所作的部署,决定机械、冶金等重工业部门的调整方向是逐步转到为农业、轻纺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上来。

在调整中,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工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86.3%,逐步下降到1982年的81.3%。机械工业在调整服务方向中,开始改变了过去重速度轻效益的状况,出现产值、利润和税利同步增长;改变过去主要为重工业、基本建设服务,注重为重点建设、农村经济和各部

门技术改造服务；改变过去以基本建设为主的外延扩大再生产，注重以技术改造、发挥现有设备的作用为主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开发一批具有四川特色的优势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电子工业在调整中注重面向市场，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以广播产品为主攻方向，带动基础产品，大力发展消费类电子产品，不断开拓投资类电子产品，提高了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经济效益。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企业，都加强了企业管理，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

在调整初期，一些重工业企业由于生产任务不足，因而导致 1980 年和 1981 年重工业总产值有所下降。到 1982 年扭转了下降趋势，生产大幅度回升。全省重工业产值达到 156.89 亿元，超过调整前的水平。

改革统分统配的物资体制

1 月，省人民政府为扩大市场调节，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逐步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决定改革单一指令性统分统配物资（工业品生产资料的专称）的体制，由省计委、省物资局联合发出《关于改进物资分配和供应方法的试行意见》，在国家物资体制全面改革之前，根据四川的实际情况，将原计划分配的 356 种物资划分为三类，在分配

和供应方法上进行了调整：一类属于指令性计划的品种 56 种，由省计委、省物资局按计划分配；二类属于指导性计划的品种 255 种，由物资部门与生产企业签订合同；三类市场自由购销的品种，即除了以上两类以外的产品，以及企业完成计划分配（汽车、轮胎、橡胶等 14 种物资除外）和合同订购以后的多余产品，短线物资超产后按比例留给企业的产品，都可以由企业自行销售或进入市场自由购销。这样，四川就较早地实现了物资供应的多种形式，部分地开放了生产资料市场。

在以后几年中，又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品种，到 1985 年仅保留 45 种。与此同时，全省先后建立的物资贸易中心和物资商场有 28 个，其中综合性的 13 个，专业性的 1 个。贸易中心实行开放式经营，价格灵活，经营对象不受限制，经营方式多种。全省还建立了物资经营网点 1357 个，初步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多层次生产资料市场。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1 月，四川省人民银行经总行批准，开始进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

长期以来，银行信贷资金的管理，采取统收统支办法，银行在信贷资金的来源和运用上“吃大锅饭”，减弱了

银行组织分配资金、调节经济生活的作用。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改统收统支办法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只要不突破上级行批准的存贷款之间总的包干差额,各级银行多收存款可以多放贷款,贷款项目之间也可调剂使用。这个办法在强调集中的同时,适当分散了一部分资金计划管理权限,有利于调动各级银行组织存款,用好贷款,加速资金周转的积极性。在四川试点的基础上,从1981年到1984年,全国统一实行了这个办法。1984年中央银行体制建立,与之相适应,在“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基础上,于1985年1月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的新办法,在各专业银行内部仍然实行分级管理、差额包干;在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各专业银行之间则实行实存实贷,相互融通。

工业企业进行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2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决定在川棉一厂、成都电线厂、重庆钟表工业公司、重庆印制三厂和西南电工厂共5个企业进行国家征税、企业自负盈亏的试点。

早在1979年12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搞好地方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实行利润全额分成之后,为

了探索新的运行机制,使企业的责、权、利更加紧密结合,就决定选择少数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国家征税、企业自负盈亏的试点。主要的办法是把过去的上交利润全部改为国家征税,征收3种税,即工商税、按固定资产原值每月依率征收的固定资产税和对5户分别确定税率的利润所得税,同时,把职工工资从成本中挖出来,在企业的税后利润中开支,使职工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的经营好坏挂钩。这种办法在实施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它使企业之间由于客观的原因而造成了“苦乐不均”;按一户一率征收所得税,又不利于税收体制的改革。

省委、省政府针对5个企业试点中的问题,于1980年8月,又在宁江机床厂、内江棉纺厂、自贡铸钢厂、宜宾化工厂和南充织绸厂共5个企业进行新的试点,试行所得税统一税率并征收调节税的办法。企业向国家交纳“三税两费”,即按规定税率征收的工商税、按企业产品销售利润率分别计征的差额收入调节税和税率统一为70%的利润所得税,同时,征收固定资产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职工工资总额不再从税后留利中开支,仍然进入成本,实行按利润总额增减与工资总额挂钩的奖惩办法。自负盈亏的试点,提高了试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效果。这10户试点企业工业总产值1980年比1979

年增长 32.5%，1981 年又比 1980 年增长 10.8%；扣除后的利润总额两年间分别增长 57.8% 和 18.1%；上交国家收入分别增长 46.5% 和 17%。但是，自负盈亏的试点中，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使企业既负盈又负亏，如何进一步解决“鞭打快牛”的弊病，等等。自负盈亏的试点于 1982 年结束。从 1983 年开始，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国营企业分两步实行利改税。四川的各国营企业通过利改税，把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实行统一税率，并征收一户一率的调节税，从而在前一段时间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扶持集体商业的发展

2月20日，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集体商业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积极扶持集体商业的发展。

四川的集体商业（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是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的。1958 年以后几经波折，从业人员减少，有相当部分的集体商业改为国营商业。1979 年，省革委经过调查，肯定集体商业的性质，改变按国营商业管理的办法，恢复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办法。1980 年 2 月《关于集体商业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发布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扶持集体商业的措施。从 1979 年开始，放宽了集体商业的经营权，可以

自由进货，跨行业兼营，增设网点，扩大服务项目。1980 年起，对城镇集体商业所得税超基数（以 1980 年为基数）增长部分减半征收，一定 3 年不变。从 1981 年起，将上缴主管部门的联合公积金比例，由税收利润 70% 调减为 20%～30%，最高不得超过 40%。银行放宽了集体商业贷款限额，在季节性进货或市场需要扩大经营，银行给予贷款支持。集体商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建立退休制度，推广统筹退休金的办法。由此集体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到 1985 年，集体商业由 1979 年的 3.4 万个增加到 14.4 万个，增长 3.3 倍，从业人员由 20 万人增加到 50 万人，增长 1.5 倍，并且逐步形成了 4 种类型的集体商业组织：①50 年代成立并一直坚持下来的合作商店；②为安排机关企业职工子女就业而建立的劳动服务公司或商店；③在改革中，由企业之间联合举办的集体性质的供销公司、联营公司等；④由个体商业者联合组成的合作联营组织。

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2月，国务院决定从 1980 年起在四川等 15 个省（市）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

早在 1979 年，中共四川省委和省革委经过深入的调查分析和测算，向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改变原来的统收统支办法,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建议。1980年2月,国务院采纳上述建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中央批准的四川财政包干办法是,除地方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全部留归四川以外,调剂收入上解中央28%,留四川使用72%。这个办法执行了两年,由于当时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客观经济情况变化比较大,国家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对财政收支影响也较大,因而原定的包干基数不适应迅速变化的情况。从1982年开始,在分级包干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将原来划分固定收入和调剂收入的办法,改为中央与地方全额分成的办法,实行“总额分成,分级包干”,以地方全部收入的85%留省使用,15%上解中央。1983年又将中央向地方的借款改为固定比例上交,相应地调整了中央和省的全额分成比例。从1985年起,根据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体制。新体制是在总结“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原体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对划分收支的方法和范围等方面做了部分修改而形成的。

在中央对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以后,四川又根据各市、地、州的

情况先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试点:1981年在广汉、新都、邛崃三县进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试点;1982年,在涪陵、万县、雅安三个支大于收的地区实行财政包干、差额补助的办法;在温江地区实行以1982年收支预算为基础,全额分成的办法;在大多数市、地、县,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交替实行“收支挂钩、超收分成”或“收支挂钩、增收分成”的办法;在阿坝、甘孜、凉山三州实行财政包干后定额补助每年递增10%~12%、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到1983年,省对各市、地、县全面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在划分收支范围时,适当照顾了地方的利益。这一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财政体制上统收统支的局面,使各级政府的权、责、利较好地结合起来,调动了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全面实行包干的1983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3.5%,各市、地、州普遍超收,支出基本上保证了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赤水大桥建成通车

3月4日,赤水大桥建成通车。这是沟通川黔两省的第一座公路大桥。位于贵州赤水县与四川合江县间的赤水河上,全长243.7米。

谭启龙任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调国务院

3月,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

紫阳调国务院工作,谭启龙接任第一书记(1979年12月调任第二书记)。鲁大东任第二书记。

改革工业品统购包销体制

3月,省人民政府鉴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工业企业有了一定的自销权,商业企业也有了一定的自组货源的权力,决定改革工业消费品统购包销制度。改革的办法是把工业消费品划分为三类:一类是计划商品,即关系国计民生和市场紧缺的大宗的、重要的商品,由国家统一下达计划,商业部门按计划进行收购,这类商品由原来的135种缩减为42种;二类是平衡商品,即生产比较集中,对市场和人民生活影响较大的商品,国家下达参考指标,具体计划由工商企业协商衔接,签订订购合同,这类商品有86种;三类是选购商品,即除一、二类之外的商品,由商业部门根据市场需要同生产企业协商选购,签订合同。生产企业在完成一、二类商品收订购任务的多余部分及三类商品,可自行组织销售。

在以后几年里,继续缩小计划商品范围,不断扩大三类商品的范围并放开价格。到1984年三类商品的价格和各种差价已全部放开。到1985年,商业部门管理价格的商品只有68种,其中61种是浮动价格;68种以外的其他商品品种,一律实行企业定价和议价。这样,工业消费品统购包销的体

制已经改变为以指导性计划为主、多种计划形式与自由购销相结合的购销体制,工业消费品市场已基本形成。

扎伊尔总统来访

3月27日,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及随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等陪同下访问成都。副省长何郝炬等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迎送。何郝炬在金牛宾馆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蒙博托一行参观都江堰、簇桥公社,29日上午乘专机飞广州。

增建自然保护区

4月,省人民政府为加强对四川珍稀动植物的保护,决定新建8个自然保护区。加上原有的7个,全省自然保护区增加到15个,管理面积由原来的10万公顷增为51万公顷,占全省幅员面积的0.9%。这15个自然保护区分别为: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动物及其自然生态系为主的汶川县卧龙、宝兴县蜂桶寨、南坪县九寨沟、平武县王朗、青川县唐家河、北川县小寨子、松潘县黄龙寺、马边县、美姑县大风顶等8个;以保护金丝猴等及其自然生态系为主的南坪县白家河;以保护扭角羚等及其自然生态系为主的天全县喇叭河;以保护四川梅花鹿等及其自然生态系为主的若尔盖铁布;以保护亚热带植被为主的重庆市缙云山;以

保护银杉及其自然生态系的南川县金佛山；以保护成片原生苏铁的攀枝花苏铁自然保护区等。

银行信贷制度改革

5月19日，省人民政府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关于银行体制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改革银行的信贷制度，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

1979年扩权试点企业宜宾天原化工厂为提高烧碱生产能力，需要进行金属阳极电解槽的技术改造。资金除国家拨款和自己的利润留成数额外，还差300万元，遂向银行申请贷款。按照当时银行信贷制度规定，只能按计划向企业贷放流动资金，不贷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同意，由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作为特殊情况发放了这一笔贷款。这是在50年代以后全国由银行发放的第一笔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对于信贷资金进入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是一个突破。接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下达了中短期设备贷款指标，把这种贷款扩大到全国。从1980年起，四川正式向国营工商企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并成为银行的主要贷款项目之一。

银行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坚持择优扶持的原则，贷款期限一般为1~2年，最长不超过3年，由企业以贷款项目投产后所增加的全部利润和固

定资产折旧来归还贷款本息。从1979年宜宾天原化工厂第一笔贷款起，到1981年末，全省共对2900个项目累计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8亿元，用于生产市场急需的轻工、民用产品。据银行统计，这2900个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为：新增产值12亿元，新增利润1.58亿元，税金1.14亿元；除收回贷款2亿元外，还给财政增加收入7000万元以上。同时，建设银行也选项试点，把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随着中短期设备贷款的开办，银行信贷业务也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大到旅游、科技、文化等行业；贷款对象从主要是国营企业和农村社队，扩大到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形式，试点开办了居民购买商品住宅等消费性贷款。这些改革，扩大了银行的信贷范围，进一步发挥了银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

重庆、成都设立海关

5月，国家在重庆恢复设立海关（直属海关总署）。8月28日，四川省外贸运输港口重庆港正式开港通航。10月成立重庆海关成都分关，1985年3月，改称成都海关。四川的进出口货物可在重庆、成都两地报关。

卧龙建立“世界大熊猫研究中心”和“特区”

6月，国家有关部门与世界野生

生物基金会达成协议,在卧龙创建了“世界大熊猫研究中心”。

卧龙自然保护区建立于 1962 年,面积 2 万公顷,以保护大熊猫为主,属汶川县领导。1975 年,经国务院批准扩大为以保护高山生态和珍贵动、植物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同时,建立了“五一棚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英雄沟大熊猫养繁殖场。1979 年,加入了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改属林业部直接领导。“世界大熊猫研究中心”建立后,中外科学家云集于此,共同开展对大熊猫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已从野外观察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出版了《卧龙大熊猫》一书。

1983 年 3 月 18 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卧龙建立特别行政区——卧龙特区。这是全国 105 个自然保护区中的第一个特区。

鲁班水库建成

6 月,位于三台县的人民渠第七期工程的大型囤蓄水库——鲁班水库建成。该水库于 1976 年 3 月,由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完成初步设计,1977 年 1 月进行施工。水库总库容 2.73 亿立方米,可控灌三台、射洪、蓬溪 3 县耕地 62.7 万亩。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6 月 6 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阿坝、甘孜、凉山自治州工作会议

议,7 月 21 日,省人民政府又召开了 3 州畜牧工作会议,对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采取了重大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实行休养生息的方针,决定从 1980 年起到 1990 年止,3 州的牧业税减半征收,农业税减征三分之一。从 1984 年起,除麝香、统配木材和部分定购粮食之外,少数民族地区所有农、牧、林、土特产品均取消派购,实行议购议销,加上农畜土特产品多次调价,广大农牧民从中获得不少的利益。在不破坏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可以开发矿产资源。实行国家兴办、群众自办和民办公助的办法,修筑区乡公路或部分县城公路,并由省交通部门每年拨出专款 500 万元予以资助。省水电部门按每台机组的投资补助 15%~20% 的比例,扶持兴办水电站。

在广大农村牧区逐步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凉山州于 1980 年初,不仅在 7 个汉族比重大的县,而且在 11 个少数民族聚居县普遍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到 1981 年底全州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已达 90.5%。1980~1982 年 3 年间,凉山州农业总产值以每年 8% 以上的增长率持续发展,多数彝族农民长期未解决的温饱问题,两三年就解决了。甘孜、阿坝两州也先后把包产到户责任制普遍推开。包产到户责任制在牧区推行时,采取了冬春草场划片承包到户或联户,夏秋草场联户经营的办法。1984 年,四川省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考察团赴长江三角洲考察、挂钩,逐步发展了横向经济联系,到1985年底,从上海、江苏、北京、武汉、浙江、广东等14个省市,共引进资金3亿元。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扶持,从1980年起,每年资助1650万元,1984年增加到3000万元。还定向派遣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支援(成都、重庆、自贡、乐山、宜宾等13个市、地、县),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组织重庆、成都、自贡、攀枝花4个城市,对口支援甘孜、阿坝、凉山3个自治州。

在国家的帮助下,经过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努力,从1981~1985年,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都超过了解放以来的任何时期。1980~1985年,少数民族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6.4%,1985年达31亿多元,人均占有粮食近350公斤,牧民人均纯收入达289元,比1980年增长1倍多。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6月21日,全省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继续清理在建项目,压缩建设规模,调整投资方向,保证重点项目。

全省从1979年开始,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对省属以下基本建设在建项目逐个进行排队、清理,经过研究、审核

确定对不具备或暂时不具备建设条件、或者不属于当前经济建设急需的222个项目,实行停建和缓建。其中,停建99个,压缩未完工程投资6.5亿元。1980年4月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后,又停缓建了73个项目,其中,停建项目16个,压缩未完工程投资3.85亿元。从1979年到1982年,全省停缓建项目共403个,压缩未完工程投资11.78亿元,基本建设拨款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82年的12.2%。1983年,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再一次对基本建设项目进行清理,停、缓建或缩小规模、放慢进度的项目共667个,压缩投资1.69亿元。

与此同时,调整了投资方向,适当增加了轻纺工业的投资;注重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新工艺、新技术和节能项目的投资;适当增加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城市职工的住宅建设的投资。1981年和1982年两年,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均占当年年度投资总额的50%以上,1982年,全省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5.27亿元,其中,住宅建设投资即达9亿元左右。从1978~1983年6年间,全省住宅建设投资共达9.1亿元(其中60%以上是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相当于前28年全省住宅建设投资的1.8倍,建成住宅358万平方米,为前28年全

省住宅总面积的 1.1 倍。同时,对全省文教、科研、卫生、商业网点以及城市公用设施的投资,也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重庆长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

7月1日,重庆长江公路大桥主体工程建成通车。大桥全长 1121 米,桥面车行通宽 15 米,两边人行道各宽 3 米。整个大桥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可通行 20 吨载重汽车。主航道跨径 174 米。

成昆铁路铁西站滑坡

7月3日 15 时 30 分,成昆铁路铁西车站附近山坡突然发生滑坡。滑舌从 40~50 米高的采石场边坡下部剪出,滑体落在采石场平台和铁路路基面上,厚约 14 米,越过路基 25~30 米,掩埋铁路长 160 米,中断行车 40 天,仅运输费直接损失就达 1000 万元以上。这次滑坡是我国铁路有史以来运营线上最大的一次滑坡灾害。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7月13日,省委在全省推广什邡县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经验。1978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提出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1979 年四川首先在什邡县进行试点,取得了经验,并于当年下半年在全省推广。1980 年 7 月 13 日,省委书

记谭启龙在省委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提出:要继续大力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把思想工作做细,技术措施搞好。谭启龙向来川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计划生育时,邓小平指出,计划生育提倡每对夫妇生一胎,一定要坚持这个不能让步,这个杠杠冲破了,四化就没有希望了,它对国民经济关系很大。8月4日,省政府重新颁布《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对 1979 年的规定作了补充修改,强调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少生上,要奖励和推行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进一步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除省级机关召开了 1000 多干部参加的会议,各市、地、州、县直到基层也分别召开会议进行动员,贯彻《公开信》精神,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省政府先后制定和逐步完善了若干具体规定,从保健、医疗、入托、住房、招工、招生等等方面给予优待,运用经济手段来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由于中央关于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的逐步落实,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采取多种措施,抓紧工作,全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取得了显著成绩。1980 年全省人口 9819.6 万人,自然增长率已由 1979 年的 8.33‰ 下降到 6.23‰,成为当年

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省。

把错定为私营工商业者的劳动者区别出来

7月，中共四川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把在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被错定为私营工商业者的“三小劳动者”（即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区别出来的“三小劳动者”共54475人，他们此后同企业职工享受同样待遇。

开展农村扶贫工作

9月17日，中共四川省委就进一步做好农村扶贫工作发出指示。要求认真贯彻自力更生为主，社队和国家帮助为辅的方针，采取措施，积极帮助严重困难户。

全省先后对1130万贫困农民赊销价值3亿多元的棉花、棉布，基本上解决了贫困农民缺衣少被的问题。对1742万收入在120元以下的农民减免了农业税。1984年以后，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运用中央扶持的物资、资金和省的机动财力，加强了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逐步实现了扶贫工作由单纯救济向经济开发的转变。同时，动用价值3.9亿元的粮、棉、布和省、地、县的配套资金1.1亿元，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在贫困县安排修建公路、桥梁、整治内河航道、修建人

畜饮水工程等，既为发展贫困县的经济创造基本条件，又增加当地贫困户的收入。全省贫困地区面大人多，主要分布在边远贫瘠山区和内地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长期生产落后的穷队，扶贫工作任务还比较艰巨。

工业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9月20日，全省工交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在竞争中促进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联合起来适应竞争。并就贯彻执行7月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提出了具体办法。10月7日，省人民政府就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发了通知。10月21日，省人民政府发出文件，对推进经济联合的政策原则、组织形式等作了具体规定。

全省工业企业的经济联合迅速发展，形式多样。如重庆嘉陵摩托车联合体、重庆三峡牌电扇生产联合企业等，以产品为中心组织“一条龙”的生产协作和经济联合；四川纺织工业总公司、重庆造纸工业公司等按行业组织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重庆市的热处理、电镀、铸造等相同工艺组织的加工协作中心；四川化工厂和成都磷肥厂合资生产经营液体磷氨复合肥料；生产企业与科研单位组成技术上的联合；有的工业企业投资到其他企业搞联合经营，等等。到1981年底，已组建各种联合体400多个参加的企业1500家（包

括企业性公司和总厂 92 个),1981 年实现的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15.8%,上缴利润占全省地方工业企业上缴利润的 28%,税收占全省工业企业税收总额的 50.4%。

挪威首相来访

9月26日,挪威王国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利及夫人一行 28 人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克华及夫人陪同下来访抵成都。省长鲁大东及夫人和省、市有关方面领导前往机场迎送。努尔利一行参观了成都金银制品厂、簇桥公社及新都宝光寺、桂湖,27 日飞往桂林。

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改公社为乡

11月初,广汉县向阳公社,经过批准,摘掉了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挂起了中共向阳乡委员会、乡人民政府、乡农工商联合公司的牌子。

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组的改革后,又在社队工业中进行改革探索。1979 年 9 月,中共广汉县委将新丰公社一砖厂试行的“定、包、奖”(人人定岗位、包任务、超奖短赔)岗位责任制在向阳公社推广。向阳公社成立了公社工业公司,进行了 3 项较大的改革,即改社办企业为社队集资联办;改任命干部为选举、聘请干部;改“吃大锅饭”为“定、包、奖”责任制。1980 年 5 月,向阳公社又相继成立了商业公司和农业技术服务公司。

同时还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负责领导和协调全乡农工商各业。由于社员和企业干部都有了责任制,而公社、大队干部没有责任制,工作好坏无法考核,群众很有意见。7 月,中共向阳公社委员会决定将公社的 18 名干部分成党务、行政、企业 3 个班子办公,同时也制定了“定、包、奖”责任制。这样,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11 月初,向阳公社党委向广汉县委报告,要求变革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得到了中共温江地委和广汉县委的支持。11 月 11 日,中共四川省委接到中共广汉县《关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请示报告》。13 日,省委领导在听取了温江地委书记汇报后,决定派出联合调查组。11 月 30 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到广汉县了解改革情况,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后,肯定了向阳公社的经验,指出变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向阳公社继续试点,很好总结经验,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逐步扩大试点,然后再扩大施行。接着,向阳乡继续进行了大队改村、生产队改为农业合作社的改革。村建立中共村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全村的行政管理工作;生产队改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本社所有土地和承包合同,同时也独立经营或同其他经营组织或个人联合经营其他产业。到 1980 年底,向阳乡的改革试点基本

结束。从 1980 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广汉县委将向阳的改革经验逐步在全县扩大。到 1981 年 8 月,广汉县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向阳公社的试点经验,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1 年 4 月《经济管理》杂志第四期发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改革“政社合一”体制的调查》的署名文章后,国外有的报刊反映,现在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开始了变革。国内各地也纷纷派人到广汉参观、调查。

向阳公社的经验通过扩大试点逐步在全省推广。1981 年,在新都县石板滩公社、邛崃县桑园公社、新民公社进行试点。1982 年,每个地区、市、州都在一个县选择 3 个人民公社试点。198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到 1984 年底,全省 8559 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全部实现了建乡、建村的改革。

调整普通中学教育结构

11 月 7 日,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发展职业教育,办好重点中学。从 1978 年开始,全省区别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状况,对中学的设点布局进行了整顿,压缩了一些师资、设备等办学条件很差,无法达到中学应有的教

学质量(包括小学“戴帽初中”的学校。到 1985 年,全省共整顿减少中学校点 20638 所(其中,单设中学减少 4231 所,小学“戴帽初中”减少 16407 所)。全省共有普通中学(包括职业中学)12066 所(单设中学 6322 所,小学“戴帽初中”5744 所),设点布局趋于合理。同时,有计划地压缩中学招生任务,从宏观控制中学的总体发展规模。经过三年压缩,五年稳定的工作,到 1985 年,初中招生人数从 1977 年的 242.6 万人,减少为 114 万人。高中(包括职业高中)招生由 45.2 万减少为 24.4 万。压缩招生后,全省中学的总体规模基本保持相对稳定。与此同时,改革了普通中学学制,采取先初中后高中,先城市后农村,先重点后一般的步骤,分期分批进行。到 1980 年全省初中学制也由原来的二年制全部改为三年制。在这基础上,逐步开展了高中改制工作。到 1985 年,全省绝大多数的重点中学、城镇高中和近半数农村高中已改为三年制。

职业教育除了发展和办好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外,主要是在处理好普通高中规模与高等学校招生比例关系的前提下,压缩普通高中,发展职业高中,改革普通高中的课程,增设职业技术教育课。。

全省先后确定了一批重点中学,加强了对这些学校的领导和建设。到 1985 年,全省有重点中学 307 所,在

校学生 36.9 万人,占全省普通中学学生总数的 9.5%;重点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 6.3 万人,占全省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 40.8%,为高等学校提供了足够数量的合格生源。

开展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的重点建设

1980 年,根据 1979 年卫生部提出在全国整顿建设三分之一县卫生事业的任务,四川计划到 1985 年分期分批先抓好 50 个县左右。

1980 年 2 月 26 日全省卫生工作会议研究了三分之一试点县卫生事业的建设问题后,经各地选择报送和审定的首批重点县建设的有什邡、合川、米易、汶川、甘孜等 18 个县。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整顿的前提下,由省地县三级财政和建设单位分层投资,做到房屋、设备、人员三配套,实现工作制度化,技术操作规范化,基本设备规范化;发挥对区乡村的业务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中心的作用;试点县在建设过程中兼及区乡,特别把区中心卫生院纳入整体建设。到 1982 年底,对第一批 18 个县按上级统一标准进行了检查,验收合格。随即开始了第二批试

点县资中、巴中、合江、奉节、理塘等 21 个县的建设,到 1985 年完成。两批重点县建设,省、地、县共投资 9000 多万元,新建工作和生活用房 160 多万平方米,配套主要设备 14788 台(件),培训人员 32448 人,形成了县医疗卫生技术指导中心、基层卫生人员培训基地,使这些县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

1980 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制度,解决基本建设资金管理中“敞开花钱”和“吃大锅饭”的问题。从当年起,四川开始实行这种制度,国家投资项目,按照资金有偿使用原则,普遍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从 1980~1985 年底,全省有 3098 个基建项目实行了“拨改贷”,贷款总额达 30.77 亿元,其中,1985 年“拨改贷”项目就有 3000 个,资金达 23 亿元。这一改革,促进建设单位在缩短建设工期、节约资金、加强管理、提高投资效益和便利建设银行在批准总投资范围内调剂资金余缺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1981 年

道孚地震

1 月 24 日,道孚县西南于 5 时 13 分 47 秒发生 6.9 级地震。至 2 月 25

日止,发生余震 657 次。震中烈度 8 度强。震中区在尼果拖、沟普、道孚、下亚路甲一带,面积 20 多平方公里。地震破坏区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这一次地震造成 123 人死亡,74 人伤残,还死亡牲畜 5000 头,倒塌房屋 5361 间,经济损失达 3228 万元。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派出了慰问团到灾区慰问。

赵紫阳谈包产到户不涉及所有制问题

2月3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四川视察工作时,同中共四川省委、中共温江地委和新都县、广汉县县委负责人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赵紫阳讲,生产责任制对发展生产具有重要作用,搞责任制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包产到户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涉及所有制问题。我在离开四川时曾经说过“到此为止”,可能束缚了你们,现在不要受这个束缚了。

四川省绝大多数地区于 1978 年以后,在农业生产上推广广汉县金鱼公社实行的包产到组的经验,在农村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上推广新都县实行的包工包产包成本到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的“四专”责任制。1980 年 2 月 9 日,赵紫阳于离任去中央工作前,在全省地、市、州委工业、农业、财贸书记座谈会上说,大田

作业包产到作业组,多种经营实行“四专”责任制,都到边了,到此为止。从这以后一直到 1981 年初,尽管省内有的地方自发地出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但省委在全省一般地区仍然推广的责任制是包产到组、水(田)统旱(地)包、小段包工等。

1981 年初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市、州委农业书记会议,对推广责任制重新作了安排,要求各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搞一刀切,不硬套一个模式。各个生产队采取什么办法,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由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在全省迅速发展。到 1981 年 11 月,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 46.4%,包干到户的占 31.4%,包产到组的占 7.2%,其他还有水统旱包、五定小包工、包口粮田等形式。1982 年初,全省各地共抽调 7.5 万多名干部到农村,宣传“一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两不变”(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帮助生产队建立和完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把集体的耕地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多少发包给农户,所不同的是包产到户还坚持工分核算和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包干到户只是把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的数量落实到户,实行定额包干上交,剩余归己。包干到户

的办法简单，利益直接，责任具体。农民说它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多余都是自己的”。它的吸引力又大于包产到户。许多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又纷纷改行这种责任制。到 1983 年，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 94.3%，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开展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3 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批准广汉、邛崃、新都 3 县为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县。

在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变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以后，为探索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路子，作为在一定地域内总揽农村经济全局的县，必须进行全面的综合改革。这种改革的试验，从 1979 年起在广汉县开始，以后又扩展到邛崃、新都两县。3 县正式定为试点县后，1982 年 1 月，又决定扩大试点范围，要求每个地、市都搞一个试点县，进行多点、多模式的试验和对比，试点县增加到 28 个。

各试点县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把农村的改革经验用于城镇工商企业，结合工商企业的特点，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2. 实行“三大包干”，并改革县、乡两级财政体制。“三大包干”即省对

试点县实行财政、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任务包干，使县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前提下有一定的自主权。它是县级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随着农业连年丰收和粮食、农副产品收购政策的改变，“三大包干”后来只剩下财政包干有实际意义了。试点县又先后建立了乡财政，县对乡也实行财政包干。

3. 改党政企不分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领导体制。撤销了县委管理经济工作的农工、工交、财贸等部门，县委对经济工作主要通过方针、政策进行领导，经济工作由县政府统一管理。精简县政府专业经济的部门，加强综合管理机构。同时，县的经济管理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而是通过计划、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间接调控企业的活动。

4. 按品种、按行业组织经济联合，加强企业间的联系。

5.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从单一的种植业转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单一的农业转到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综合经营上来。

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促进了县级经济的稳步发展。据省、市、地管理的广汉、新都、邛崃、洪雅、奉节、古蔺、合川等 7 个县总计，1984 年与 1978 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111%；粮食总产量增长 34.4%；乡镇企业产值

增长 4.7 倍;财政收入增长 70.4%。

奥中友好代表团来访

4月 19~22 日,由奥地利副总理兼教育艺术部长弗雷德·西诺瓦茨率领的奥中友好代表团一行 17 人,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谢定邦陪同下抵达成都访问。副省长何郝炬会见并宴请。外宾参观了都江堰及部分工厂、农村公社,游览了市内名胜地。

在经济调整中发展社队企业

6月 10 日,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社队企业在经济调整中稳步健康发展的课题。

全省社队企业从 1978 年到 1980 年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从 1980 年下半年起,在调整国民经济中,社队企业受到“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落后挤先进”等种种非难,各方面对社队企业的支持减少,社队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社队企业工作会议针对这些情况,指出社队企业在调整时期首先是要“上”,而不是“下马”,要整顿提高,稳步发展。并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措施。各社队企业,加强了经营管理,实行联办,搞好供销工作,加之从 1982 年到 1983 年,限制逐步减少,这个期间,社队企业仍然得到缓慢发展。社队企业总个数 1983 年 10.43 万个,

比 1980 年的 11.93 万个有所减少,但固定资产和总产值均有所增加。固定资产 1983 年为 27.16 亿元,比 1980 年的 20.65 亿元增长 31.52%;总产值 1983 年为 50.71 亿元,比 1980 年的 30.20 亿元增长 67.91%。

四川与外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6月 22 日,法国蒙彼利埃市与成都市正式签署友好城市协议书,成为四川与外国建立的第一对友好城市。1982 年 10 月 11 日,美国华盛顿州与四川省签署缔结友好省、州协议书,为四川省与外国缔结的第一对省级友好省州关系。与外国建立友好关系是四川省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标志和渠道,促进了友好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截至 1985 年底,四川省与外国建立省级友好关系 5 对:四川省—美国华盛顿州(1982 年 10 月);四川省—美国密执安州(1982 年 11 月);四川省—日本广岛县(1984 年 9 月);四川省—日本山梨县(1985 年 6 月);四川省—朝鲜平安南道(1985 年 10 月)。市级友好城市 7 对:成都市—法国蒙彼利埃(1981 年 6 月);成都市—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市(1981 年 10 月);成都市—奥地利林茨市(1983 年 7 月);成都市—日本甲府市(1984 年 9 月);重庆市—法国图卢兹市(1982 年

12月);重庆市—美国西雅图市(1983年6月);乐山市—日本市川市(1981年10月)。省级友好经济合作区1对:四川省—法国郎格多克—鲁西荣大区(1985年7月)。

建立工业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6月25日,省人民政府召开各地经委主任会议,讨论整顿工交企业,落实经济责任制的工作。7月4日,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在搞好企业扩权的同时,切实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四川的国营工业企业改革,一开始就汲取了农业上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验,在企业内部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把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落实到企业内部的车间、班组和个人。以后,不少企业推行了以首钢经验为代表的“包、保、核经济责任制”,即由下而上层层包指标、包任务;由上而下保证完成任务所需的条件;按指标、任务进行考核,使岗位有责任,工作有标准,考核有指标,功过有奖惩。不少企业在这种改革实践中,又创造了多种适合自己企业特点的责任制形式。一些大中型企业在内部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使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担,利益层层得,在企业内部贯彻责、权、利结合的原则。有的企业突出以质量、消耗为重点的考核指标,促进企业职工提高产品质

量,降低物质消耗;突出第一线工人尤其是第一线特殊工种工人和其他职工的差别,以加强生产第一线工作。一些企业改固定工资为结构工资、浮动工资,增强工资、奖金的弹性。等等。

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建立,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对国家的贡献结合起来,对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经济效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它还有待逐步健全和完善,诸如在科室和科室内部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制度,考核不严格,统计考核资料不健全,奖惩无严格的制度,等等。

发掘自贡市大山铺恐龙化石群

6月,四川省大山铺恐龙化石发掘队成立,开始对自贡市大山铺的恐龙化石进行较为科学系统的发掘。

1972年9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杨钟健去自贡考察,指出大山铺含恐龙化石的地层层位很重要,说不定会有重大发现。1977年,四川省文化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保护古脊椎动物化石干部训练班,在大山铺实习时挖得完整的蜥脚恐龙化石一具。大山铺恐龙化石的发掘由此开始。以后,1979年和1980年又发掘、采集了大量恐龙化石。1981年2月,四川省科委和省文化局组织的专家现场考察会,提出成立发掘队。发掘工作到1984年6月

告一段落,共发掘了 2800 平方米面积,出土 100 多个恐龙、翼龙、蛇颈龙、似哺乳爬行动物及鳄龟、两栖类、鱼类等化石个体材料,是世界恐龙发掘史上罕见的、埋藏丰富的、距今约 1.5 亿年的中侏罗纪恐龙化石群。它填补了研究恐龙演化史上的一段空白,并为研究我国恐龙及古爬行动物的分类学、生态学、骨骼学、演化规律、埋藏学以及四川盆地古地理、古气候与中生代地层学等,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和依据。

特大洪灾

6 月下旬到 9 月初,全省部分地区先后遭受 6 次百年未遇的暴雨、洪水袭击。受灾县(市、区)共 135 个,被淹县城 57 座,场镇 776 个。受灾生产队 22.24 万多个,受灾人口 2000 万人。受灾农田达 1756 万亩,占全省农田的 17.8%,估计因灾减产粮食 150 万吨以上,农民储粮损失 25 万多吨。被淹没房屋 237 万多间(其中倒塌 153.4 万间),使 113 多万人无家可归。因灾死亡 1358 人,受伤 14509 人。因灾停产的工交企业 3115 个。成渝、宝成、成昆铁路有 40 多处路基被毁,县以上公路断道 523 条。370 所中小学校被毁,影响 130 万学生上学。全省直接经济损失达 25 亿元以上。

灾情发生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来了慰问电,派慰问团来川慰问灾

区人民,并从财力和物力上给予支援。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积极组织和领导群众抗洪救灾。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成都军区司令员尤太忠、省长鲁大东等赶赴洪水现场,了解情况,指挥抢险。各地各级主要负责人都战斗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派出指战员、飞机、汽车、舟船等抢救遇难群众和各种物资。广大群众发扬舍己救人、互助互救的崇高精神,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和财物。洪水过后,各级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安排好生活,重建家园,整治被毁耕地,受灾中小学恢复上课,及时开展了灾区的防病治病和消毒工作。灾区人心稳定,社会安定,抗洪救灾取得了重大胜利。10 月 14 日,省委、省政府在成都召开了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表彰抗洪救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受表彰的达万余人。

江津地区更名为永川地区

7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江津地区更名为永川地区,原辖区无变动。

甘洛县利子依达沟暴发巨大泥石流

7 月 9 日,成昆铁路甘洛县利子依达沟段线路因洪水暴发泥石流灾害,为我国铁路史上所罕见。利子依达

大桥被毁,运行中的 442 次客车至此遇难,机车及三节车厢坠入河谷,死伤 300 多人,中断行车 372 小时,损失 2000 多万元。泥石流冲出沟口,堵断大渡河,形成“拦河坝”,导致沟口对岸汉乌公路水毁 800 米。

学习宣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 月 16 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定。20 日,省委作出决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联系实际,带头学好《决议》。各级党委纷纷举办学习班,仅重庆市委举办的学习班和 18 个单位的套班(即统一听报告,分开学习讨论),参加学习的各级干部达 1300 多人。到 10 月,全省参加小集中学习的县以上领导干部有 2.1 万人,占同级干部的 90%;基层干部参加小集中学习的达 58 万人。与此同时,还在全省群众中普遍开展了宣讲《决议》。《决议》的学习、宣传,深化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增强了团结。

大竹县恢复农村供销社“三性”

7 月,大竹县开展了恢复基层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恢复“三性”(即

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的试点工作。

农村供销合作社创建于 1950 年末,属集体性质的合作商业。1958 年后“升级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大竹县恢复供销社“三性”,即把供销社由国营商业恢复为合作商业。为此,清理了社员股金,落实了股权,换发了股证。逐户核对股权,补发了历年漏发股红 8.6 万元,发放了股红 5.8 万元;落实股权后,又根据“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原则,吸收一批新股,4 个月内新入股农民有 1.5 万户,入股金额 7.7 万元;恢复了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干部和决定供销社的重大问题,同时,由社员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出席县联社的社员代表大会,恢复了供销合作社县联合社。大竹县恢复供销社“三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1981 年全县超额 29% 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农副产品收购计划。1982 年 9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关于在大竹县改革供销社体制的三个材料上批示:“加快农村商业改革的进程,以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改进农村商业工作,人们的呼声甚高,必须加以重视。”9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大竹县供销社改革经验的调查报告,并发表了社论《改革农村商业的尝试》。

1981 年 11 月,中共四川省委、省

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推广大竹县的经验。到 1983 年底,全省农村供销社基本上完成了恢复“三性”和建立县联社的工作。1983 年 9 月,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省供销社联合社的通知》,决定省供销合作社改为群众性经济组织,是经济实体,不再列为政府序列。

农村供销社恢复集体商业性质后,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为农民做好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上来,采取各种形式,为农民开展信息、技术、供销、加工、运输、储藏、维修、租赁、资金、文化等多种服务,逐步向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方向发展。

四川省优秀文艺作品评奖

8月20日,四川省优秀文艺作品授奖大会在成都举行。获奖的各类作品 552 件。其中文学作品 95 件,音乐作品 91 件,美术作品 84 件,戏剧作品 51 件,舞蹈作品 43 件,电影电视作品 36 件,曲艺作品 47 件,民族民间文艺作品 39 件,摄影作品 76 件。这是由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省文化局、省文联和各协会共同参加与组织的全省综合性文艺评奖,对繁荣文艺创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

9月3日,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

林业会议,集中研究解决稳定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问题。14 日,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林业厅就贯彻会议精神提出的意见和规定。随即在全省开展了稳定山林权属、划定自留山、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到 1985 年,全省先后给 1542 万农户划定自留山 7170 万亩;给 1603 万户农户落实了房前屋后经营竹木面积 632 万亩;给 1801 万户农户颁发了林权证,占应发农户的 93%。新增林业专业户 3063 户、经济联合体 93 个,全省林业专业户达 47 万多户。通过稳定山林权属,林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集体、个人 3 种林业经济所有制的比例关系,由 1981 年的 70 : 30 : 0,发展为 1985 年的 50 : 32 : 18。

对国营林场推行了联产承包、专业承包、工序承包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有的林场还将荒山承包给社员造林。社队林场逐步过渡为自愿联合,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合作经济。造林、护林由过去以国家、集体为主转变为以户营为主,家庭承包造林、护林成为普遍形式。1985 年与 1980 年相比,国营、集体造林面积分别由 5.7% 和 84.2% 下降为 3.5% 和 18.8%;国社合营、个人造林面积分别由 2.5% 和 7.6% 上升为 4% 和 73.7%。

瑞典国王来访

9月19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亚一行21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和外交部长助理宋之光等陪同,抵成都访问。省长鲁大东及夫人和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迎送。古斯塔夫一行参观了都江堰、簇桥公社,游览了青城山。21日乘专机飞上海。

恢复地方志编修工作

10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同意省社科院党组《关于编纂四川省地方志实施方案的请示》,决定成立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负责全省地方志编修工作。1983年7月15日,省政府转发《全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纪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自此全面恢复。至1985年,先后由任白戈、何郝炬、顾金池任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开展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

1981年,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根据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全国除少数山高林深、人口特别稀少的地区外,在80年代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作了部署并立即组织实施。

省委、省政府从四川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和文化教育基础差异很大的

实际情况出发,将全省划分为四类地区,确定不同的普及标准,提出了分步实现普及的时间:占全省人口70%的约120个内地县(市、区),力争到1987年基本普及;有条件的盆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50多个县,在1990年或稍后一点时间基本普及;少数条件太差的高寒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30多个县,力争在本世纪末基本普及。

在制定普及小学教育规划的同时,积极筹集经费,改善办学条件。1982年在全省推广了温江地区采取“地方财政多拿一点,厂矿企业、社队企业、勤工俭学和群众都出一点”,两年内筹集资金2000万元的经验。1983年11月4日,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的试行办法》和《关于厂矿、企业办学经费问题的试行办法》,从政策上为集资办学作了明确规定。从1983~1985年,全省社会集资总额达4.83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小学教育的基建投资的4.5倍。1985年起,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有关规定,各级地方财政逐年增加了教育经费。

为推进小学教育的普及,提高教育质量,各地恢复和加强了乡中心小学的建设,以加强对村小的辅导和管理。到1985年,全省乡中心小学已基本上全部恢复,有60%以上的乡做到了将中心小学和初中分别单独建校或

实行分部管理。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对小学教师进行分类培训,对民办学校教师在进行全面考核的基础上进行了整顿。到1985年,有1.2万余名优秀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小学教师,8700多人到中师学习。从1983年起,分期分批进行了改革小学学制的工作。1985年,全省已有86%的班级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

经过多种措施,加快了全省普及小学教育的进程。1985年,已有占全省人口53%的85个县(市、区)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其余地区的普及工作也取得较大的进展。全省平均,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4.9%,在校学生的年巩固率为97.3%,毕业生的学业合格率为80%左右。

县、社人民代表实行直接选举

1981年,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根据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把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作出了《关于全面开展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的决议》,制定和通过了《四川省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决定县级直接选举是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是充分实行人民民主的重要措施。为具体指导选举工作,全省组织了70多万人的宣传队,普遍地深入地宣传《宪法》、《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选举过程中,坚持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酝酿协商,均按照民主程序和法律程序进行,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选举。全省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97.2%。这次普选,由于尚未摘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经过群众评议,依照法律手续摘掉帽子,获得了选举权。因而,没有选举权的人数占年满18周岁以上的公民总数的比例,从1958年的150‰,下降到5‰。

1984年的人大换届选举,是与政社分开、在农村普遍建立乡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结合进行的。经过半年多时间,全省211个(市、区),8555个乡和352个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和建乡工作全部顺利完成。这次选举享受选举权的面又扩大到包括正在服刑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被羁押的人员,从而使没有选举权的人数下降到1‰。参选率达到97.8%。新津、仁寿等58个县的参选率高达99%以上。全省共选出县级人民代表55355名(平均1814人产生1名),乡(镇)人民代表52505名(平均191人产生1名)。

1981年,全省共有人口9924万人。其中,男5103.9万人,女4820.1万人;城镇人口919.1万人,乡村人口9004.9万人。

1982 年

省委三届六次全会(扩大)召开

1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12日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1982年工作要点,选举杨汝岱为省委常务书记,增选杨析综、聂荣贵为省委副书记。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杨汝岱等人的任职。

发展城镇个体经济

2月1日,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发展城镇个体经济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扶持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发展,并对个体经济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货源和原材料供应、营业场地、价格、税收及其他费用负担作了具体规定,促进了个体经济的较快发展。

四川的个体经济从1979年开始恢复和发展,当年全省有个体工商业4.4万户,到1981年增加到10.9万户,从业人员12.1万人。从1982年起发展速度逐年加快。1982年达到15.1万户,17.1万人;1983年达到57.5万户,68.6万人;1985年达到128万户,163.5万人。个体经济的活动范围和规模大大扩展,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省从事工业、手工业、房屋修缮、运输、修理等行业的个体户就有37.5万多户,48万多人。他们有的为大工业服务,生产大工业不便生产的产品;有的运用各种特殊的劳动经验和技能,生产传统的民族手工艺品。全省有个体商业67.02万户,占全省商业零售机构总数88.7万个的75.5%。1985年,全省个体工商业商品零售额达281.21亿元,占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1.64%。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发展生产,活跃流通,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完善、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

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印发了《关于如何完善、稳定我省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座谈纪要》。1月初,在省委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后期,到会的地、市、州委负责人针对责任制建立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专题座谈了如何完善、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就工作重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从而形成了《座谈纪要》。根据《纪要》的精神,全省各地、市、州、县组织了大批干部深入基层,

进行工作。省委、省政府也从省级机关抽调 2000 多名干部,派到 16 个市、地、州协助工作。在完善、稳定工作中,先后采取了以下主要的措施:

一是建立和完善承包合同。一方面要求签订合同的双方都应承担义务,保证落实;一方面加强合同纠纷的调解、仲裁,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二是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加强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把服务内容明确为信息、科技、良种、饲料、植保防疫、生产资料供应、产品销售、加工、储藏、运输以及资金、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建立了一些新的服务体系。三是解决好土地承包问题。对于在承包时,土地好坏搭配、零碎分散等问题,在尊重群众意见基础上,由合作经济组织统一进行调剂或由农户之间协商调换;对于由于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以及承包户劳动力变化、人口迁移等原因出现的将承包地转给他人耕种的情况,予以承认,这有利于促使土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形成规模效益。没有明确延长承包期的,按照中央的规定延长承包期,并向群众宣布承包期为 15 年、20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四是减轻农民的额外负担。规定少数生产水平低、无力提留积累的地方,可以暂不提;除农业税外,各种统筹费用和提留,控制在农民上年纯收入的 3%~5% 的范围内。采取以上措施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稳定和完善,其优越性日益显示出

来。

省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召开

2月 22 日,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选举冀春光为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免去杨汝岱副省长职务。5月,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免去杨钟副省长职务。12月,省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接受鲁大东辞去省长职务,决定由杨析综代理省长。

释放、安置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以下的党政军特人员

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的党政军特人员。1975年3月,曾通过特赦释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同年9月,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为做好特赦、宽释人员的工作,四川省和成都市主要领导人接见了他们,针对他们忏悔、疑惧的复杂心理,向他们宣讲政策,介绍四川的建设成就,勉励他们为人民多作有益的事情。特赦的原国民党将级军官、官吏、特务 46 人连同此前此特赦和刑满释放的战争罪犯 33 人,均分别安排在省级、省辖市或有关县的人民政协、政府参事室、文史馆任职;宽大释放在押的与刑满后已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原国民

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1212 人,均按转业安置,本着有工作能力的安置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养起来的精神,分别作了安置。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 4237 人,均按照转业安置的精神作了妥善安置。不少被安置的人异口同声感谢共产党的恩情,表示要珍惜晚年,立功赎罪,为人民事业献余生。

航模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

4 月,四川省航空模型运动员赵济和参加在济南举行的全国航空模型比赛,以每小时 200.055 公里的成绩,打破线操纵横型飞机圆周竞速飞行的世界纪录。

甘孜地震

6 月 16 日,甘孜县西北于 7 时 24 分 29 秒发生 6 级地震,震源深度 17 公里。主震后至 7 月 25 日止,共发生余震 1133 次。震中区在麦玉弄、波德、瑞达一带,震中烈度 7 度强。震中面积约 176 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甘孜、德格、白玉、色达 5 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 5000 平方公里,其中破坏区约 100 平方公里。这次地震使 56 个生产队受灾,11 人死亡,13 人受伤,48 头牲畜毙命,经济损失折款近 300 万元。

跳伞运动员创世界纪录

6 月 22 日,四川跳伞运动员张建

中参加在郑州举行的三国跳伞友谊赛,以 5.6 秒的成绩打破男子 2000 米个人特技的世界纪录。

振兴川剧

7 月 23 日,中共四川省委转发省文化局党组的报告,提出了“振兴川剧”的口号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成立了省委直接领导的川剧小组,制订了振兴规划,得到了文艺界的热烈响应。9 月 6 日,四川省川剧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与会者达 170 余人,围绕如何落实振兴川剧的“八字方针”及川剧艺术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83 年 5 月 23 日~6 月 12 日,在成都分两轮进行了全省川剧调演大会,演出了《王熙凤》、《芙蓉花仙》等 12 台戏 15 个剧目。9 月 9 日~11 月,四川省“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团”在北京演出了新创作的和传统的剧目,《巴山秀才》、《禹门关》、《丑公公》、《易胆大》等,受到欢迎。1984 年 9 月 22 日~10 月 7 日,四川省振兴川剧第二届会演在成都举行,有 16 台戏 27 个剧目参加演出。与此同时,先后录制了 66 名老艺人的优秀保留剧目 114 出,出版了一部分老艺人的专著。许多戏剧家进行了川剧的创新尝试。如自贡市魏明伦创作的《巴山秀才》、《潘金莲》,音乐家沙梅创作的钢琴伴奏高腔戏《红梅赠君家》、新都川剧团的清歌曼舞剧《芙蓉花仙》、成都市川

剧院把布莱希特剧作和表演体系移植于川剧的《四川好人》，等等，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各地川剧院团创作出了一批具有高质量的各具特色的新编剧目，如川南地区新编的历史人物剧，绵阳市的唐代宫廷戏，乐山市的传奇戏，遂宁、德阳市的现代戏，南充地区的灯戏系列等，出现了“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演员，如中青年演员晓艇、刘芸、古小琴、沈铁梅、陈巧茹、田曼莎等均获得全国表演奖（梅花奖）。

朱德故居纪念馆举行开馆典礼

8月1日，朱德故居纪念馆举行开馆典礼。邓小平题写了馆名。

纪念馆坐落在朱德的家乡仪陇县城南35公里的马鞍场朱家塝。馆内陈列朱德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实物400多件。

《四川省土地管理暂行条例》开始施行

8月11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四川省土地管理暂行条例》，并自即日起施行。

为管好用好土地，制止土地浪费和乱占耕地，省人大常委会从1980年起，对全省土地使用、耕地保护进行调查，并着手起草本省土地管理的地方法规。《四川省土地管理暂行条例》的制定是省人大常委会对地方立法的尝

试，不仅对管好用好土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此后立法积累了经验。

金日成来四川访问

9月19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由邓小平陪同到达成都，对四川进行访问。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举行欢迎会。金日成一行在成都参观访问了132厂和附近的县、公社，并游览了名胜古迹。21日离开成都。

冕宁县浑水沟暴发泥石流

9月21日，冕宁县浑水沟暴发泥石流，淤埋渠道500余米，60万立方米固体物资被推入安宁河，堆成8~17米高的天然坝，致使安宁河一度断流。堵坝溃决又致使沟口下600米的安宁河水文站段河床上涨2.2米，下游10里的解放桥、红星电站和渠道遭受危害，经济损失达数十万元。

泸州长江深水大跨径公路桥建成通车

10月1日，泸州长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桥长1252.5米，南北两岸引道长7.6公里，桥面行车道宽12米，两边人行道各宽2米。这座大桥的建成，为我国建设深水大跨径桥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女子国际象棋运动员获特级大师称号

10月10日，四川省女子国际象棋运动员刘适兰，参加在苏联第比利斯市举行的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候选人区际选拔赛，获得女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

共青团四川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10月18日，共青团四川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四川省第七届委员会，杨崇汇当选为书记。

李白纪念馆建成开馆

10月23日，江油县李白纪念馆建成开馆。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太白故居”匾额。

纪念馆坐落在江油县城西北昌明河两岸，主要建筑有太白堂、太白书屋、李杜亭、青莲池、临江仙馆、醉仙楼、珍藏室、陈列室等，布局错落有致，风格古朴典雅。馆藏文物和资料3400多件，其中不少珍品与精品。

全省第三次人口普查

11月1日，省统计局发布全省第三次人口普查公报：全省18个市、地、州总人口为99713310人，其中，男性51446784人，占总人口的51.6%，女性48266526人，占48.4%；汉族

96052033人，占总人口的96.3%，少数民族3661277人，占3.7%。这次人口普查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1982年7月1日进行的。从7月1日起，全省50多万经过培训的普查人员进入工作岗位，全面开始普查登记，7月底，普查登记完毕。

省级机关进行机构改革

11月，省级机关机构改革开始，重点是调整领导班子和精简机构，至1983年3月下旬基本完成。省级部委厅局由原来的79个裁并为47个，精简40.6%，部委厅局内的处室机构精简了23%。新组建的47个部委厅局领导干部由原来的508人减少到172人；平均年龄由60.6岁下降为52.4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干部由16.8%上升为34.8%。从1983年3月开始，全省市、地、州进行机构改革工作，到当年9月基本完成，市、地、州的党政机关工作部门减少三分之一左右。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获茅盾文学奖

12月15日，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6部作品获奖。周克芹赴京参加了授奖仪式。

中共中央批准省委领导班子调整方案

12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四川省委根据领导班子“四化”的要求提出的重大调整方案,不设第一、第二书记,

只设书记、副书记;杨汝岱任书记,杨析综、聂荣贵、冯元蔚任副书记。

1983年

中共四川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杨汝岱任省委书记

1月30日,中共四川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2月4日结束。出席大会的代表1201人。大会听取和审议了杨汝岱所作的《坚决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四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选出了中共四川省第四届委员会、省顾问委员会和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届省委委员78名,候补委员22名,第一次全委会选出省委常委16名。杨汝岱任省委书记,杨析综、聂荣贵、冯元蔚、蒋民宽任副书记。1985年4月,杨析综调河南工作。这次代表大会省委主要领导人谭启龙、鲁大东等主动退出省委领导岗位,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受到中共中央的赞扬。省顾问委员会选举谭启龙为主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许梦侠为书记。

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开始城市综合改革。重庆市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实行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成为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城市。重庆市在不改变省辖市的行政关系的前提下,对涉及国家计划安排的所有指标,都把重庆视同省一级计划单位,直接纳入国家计划进行平衡,而且赋予“以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力”。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在部署各有关部委参加重庆改革试点时指出:重庆综合改革试点的目的是,通过改革,合理组织重庆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外地、外省的经济联合,打通与海外的经济联系,使重庆真正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型的经济中心,为四川、为西南、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务院28个部委,会同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府共同制定了具体改革方案,已批准利改税、劳动工资、物资、外贸、银行等14

个单项方案并开始试行。

同时,省人民政府把省属在重庆的 67 个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下放给重庆市管理,由重庆市按专业化协作原则,进行改组联合,发挥中心城市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的综合功能。在试点中,开始打破了多年以来城市工作的沉滞局面,经济效益连年大幅度上升。试点的第一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 1982 年增长 11%,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7.69%,工业总产值增长 12.1%,实现利润增长 22.7%,上缴税利增长 18.1%,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6.4%。工业总产值从 1983 年到 1985 年的 3 年间,年递增率超过 14%,其中军工企业总产值年递增 38%。1985 年全市有 73 个各类贸易中心,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的辐射面遍及 24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00 多家企业,成交额达 7.2 亿元。

从 1984 年起,省人民政府因地制宜地推广重庆市的改革经验。在成都市,除计划单列一项以外,原则上把省所具有的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下放给成都市或由市代行。1984 年执行的有:总投资在 300 万元以下、引进技术设备包括利用外资用汇在 100 万美元以下的技术项目审批权;设备贷款在 50 万元以下的审批权;减免工商税的审批权;城市建设征用土地的审批权。同时,在其他省辖市,除计划单列和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两项外,试行

重庆市的其他改革办法。

富顺县划归自贡市管辖

3 月 3 日,经国务院批准,宜宾地区的富顺县划归自贡市管辖。

撤销永川、温江等地区,泸州、乐山、内江等市升为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3 月 3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永川地区,原永川地区各县划归重庆市管辖。撤销温江地区,原温江地区各县划归成都市管辖。泸州市升为地级市,将宜宾地区的泸县、纳溪、合江、古蔺、叙永县划归泸州市管辖(9 月 9 日,国务院通知,古蔺、叙永县划归宜宾地区管辖)。8 月 18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德阳市(地级),将绵阳地区的德阳、中江、绵竹县和成都市的广汉、什邡县划归德阳市管辖。

1985 年 2 月 8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绵阳地区,将原绵阳市升为地级市,原绵阳市为市中区,将绵阳地区的江油、三台、盐亭、安县、梓潼、北川、平武县划归绵阳市管辖。撤销广元县,设立广元市(地级),将原绵阳地区的旺苍、青川、剑阁县划归广元市管辖。撤销遂宁县,设遂宁市(地级),将原绵阳地区的蓬溪、射洪县划归遂宁市管辖。2 月 11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乐山地区,乐山市升为地级市,设市中区、五通桥区、沙湾区、金口河区,将原

乐山地区的仁寿、眉山、犍为、井研、峨眉、夹江、洪雅、彭山、沐川、青神、丹棱县和峨边、马边彝族自治县划归乐山市管辖。撤销内江地区，内江市升为地级市，原内江市为市中心，将原内江地区的内江、乐至、安岳、威远、资中、资阳、简阳、隆昌县划归内江市管辖。

到1985年底，全省省辖市增加为11个（包括自贡市、渡口市）。为了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化功能作用，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发挥城乡优势，建立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这11个省辖市先后实行了市领导县的管理体制，所领导的县、区（县级）共102个（其中县71个），占全省县、区总数的48%（其中县占全省总数的39%）。

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后，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城乡经济也开始出现共同发展的趋势。一些市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不仅在行政上“管”，还要在经济上“带”；不只重视工业，还要工农并举，城乡并重；在经济计划上由城乡分割，转变为城乡一体，统筹安排；不只讲县（区）为城市服务，城市也要为县（区）服务。新体制促进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流通网络的发展。城市普遍建立了农贸中心、农副产品和工业品批发市场，实行产销联营，为县（区）提供窗口、信息和服务设施等。各中心城市运用各自一定的科学技术优势，帮助县（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同时组织和支持城乡企业围绕优质、名

牌和适销对路的产品，从产品扩散，发展到合资办厂、联合经营、行业协作，以及组建以“龙头”厂、“龙头”产品为主的企业联合群体。据11个市的统计，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48.28亿元，比上年增长14.94%，比全省平均增长水平高1.7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总产值359.74亿元，比上年增长16.85%，比全省高0.66个百分点；农业总产值188.54亿元，比上年增长11.44%，比全省高2.41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80%。在新体制的推动下，11个市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1985年乡镇企业已发展658210个，比上年增长51.4%；工业总产值为106.39亿元，比上年增长62.18%；总收入达到95.24亿元，比上年增长73.92%；上交国家税金4.59亿元，占全省乡镇企业上交税金的76.4%。

撤销秀山、酉阳县，设立秀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秀山县、酉阳县，设立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扶持农村专业户发展

4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转发《四川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座谈会纪要》，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大力扶持专业户（重点户），充分发挥他

们在发展商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1984年3月2日,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保护和发展农村专业户的决议》。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在生产经营上有了自主权,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外的某些生产资料。特别是那些懂技术、善经营的能工巧匠、“土专家”,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在发展某项专业生产或开发多种经营方面大显身手,首先成为专业户。专业户一出现就受到省与各级领导的重视,鼓励发展,在政策上予以扶持。1983年以后发展加快。到1985年6月底,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四条标准统计,全省专业户发展到250375户,占农户总数的1.2%。这些专业户按专业划分有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工、副、商业和服务业等。专业户广开生产门路,开发农村自然资源,还对其他农民实行技术服务,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出路,加快了农村治穷致富的步伐。

政协四川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4月17日,政协四川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29日结束,共有委员963人。会议听取了潘大逵所作的《关于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会议选出常务委员140人,选举杨超为主席,周颐、余洪远、周钦岳、潘大逵、王定一、罗承烈、徐崇林、任景龙、李振、骆是愚、柯召、田一平、李培根、果基木古、降央伯姆、邓自力为副主席。1984年6月省政协五届二次全会时,由于副主席余洪远辞职、果基木古已病故,补选王黎之、杨代蒂为副主席。

省人大第六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杨析综任省长

4月19日,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28日结束。本届代表总数1476人。大会听取和审议杨析综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设立各委员会的规定》、《关于议案的若干规定》,通过了《关于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宪法活动的决议》。会议选举杜心源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秦传厚、张秀熟、裴昌会、刘子毅、童少生、彭迪先、马识途、冀春光、孟东波、刘云波、刘海泉、刘西林、扎西泽仁(藏)为副主任和委员71人;选举杨析综为省长,何郝炬、蒋民宽、刘纯夫、顾金池、罗通达、康振黄为副省长;选举任凌云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高振中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4月28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完成了合练任务，发射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发射中心是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建造的一座体制合理、设备配套、技术先进、具有较强试验能力的综合新型航天靶场，也是当时国内唯一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航天基地。1984年4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从这里发射进行通信、广播和电视的传输。

跳水运动员获世界冠军

4月，12岁的女子跳水运动员高敏，在成都举行的全国跳水冠军赛上夺得跳板跳水冠军。8月，在新西兰的第四届世界分龄跳水锦标赛上夺得3米跳板和1米跳板两项冠军。

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

5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在全省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的请示报告，参照50年代初期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成功经验，针对干部群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

为使宣传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首先召开了不同规模的理论讨

论会，进行调查研究，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省委宣传部编发了宣传提纲和学习资料，并以成都机车车辆厂和新津县作为在工厂、农村进行宣传教育的试点；要求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采用多种形式多层次地广泛进行宣传教育。这一学习由点到面，由干部到群众逐步展开。从1983年7月到11月，全省有90%以上的干部共100多万人参加学习，听宣讲的群众2500多万人，参加宣讲的县以上领导干部2650多人，培训宣讲骨干47万多人。全省各地共召开了理论讨论会548次，有12万多人参加，共撰写论文1397篇。经过宣传学习，初步消除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这一次宣传教育活动受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肯定，并在1983年11月20日全国干部培训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专题介绍。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揭幕

5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于红军强渡大渡河48周年之际，在石棉县安顺场落成揭幕。

安顺场位于石棉县城西北11公里松林河注入大渡河的洪积扇面上，南依马鞍山，地势险要。历史上，安顺场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全军覆没的地方，又是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成功的地方，故以“翼王悲剧

地,红军胜利场”而闻名。1935年5月25日,红军先遣队红一团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在红军长征途中打开了一个重要的通道。解放后,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国家对有关遗址进行了妥善的保护,对文物进行了收集、整理和保存,设置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陈列室,展出革命文物127件。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碑身高6.26米,宽3.7米,厚3.2米,全部由灰色花岗石雕刻而成。纪念碑构图严谨,正面上方呈半圆形,塑红军战士头像;下半身是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激烈场面的浮雕图。碑背面正中刻有邓小平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鎏金大字。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宋任穷、张爱萍为纪念碑落成题词;现驻广东汕头的原“红一团”和“大渡河连”的代表,被邀请来石棉参加了纪念碑揭幕典礼。

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

6月3日,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发出文件,要求各国营企业坚决迅速地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办法实行利改税。于当月开始进行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7月28日,省人民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从10月1日起实行全省第二步利改税工作。

利改税是在总结几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缴纳税金代替上缴利润的办法,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问题的改革。全省除亏损企业和少数微利企业外,都纳入了利改税轨道。6月开始的第一步利改税,对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按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再通过多种办法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分配。1984年7月后实行的第二步利改税,主要内容是将原来的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对某些采掘企业开征资源税;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维修建设税(其中前三项为保留税种,暂缓开征);对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其中大中型企业按55%的比例税率,小型企业按新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对大中型企业征收所得税后,税后利润超过合理留利的部分征收调节税。通过改革,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税制体系,并通过税收杠杆缓解了价格不合理所带来的矛盾,摆脱“条块”对企业的束缚,使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日趋合理。

武警部队四川省总队成立

7月4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四川省总队奉命成立,省市党政负责人和驻蓉部队负责人等出席了成立大会。

省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7月18日,四川省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25日结束。出席

大会代表 1200 多人。大会选出了第七届委员会 120 人和出席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13 人。选举王振江为省总工会主席。

省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8月8日,四川省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14日结束。出席代表共 1205 名。大会选出了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130 名,选举车毅英为主主任。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8月15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文件,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按照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作出具体部署。全省先后进行了 8 次集中行动,以七个方面的犯罪分子为重点进行了严厉打击。共查获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7.77 万多人,摧毁犯罪团伙 1 万多个。依法捕判了一批,劳教一批,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的罪犯。同时,办理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2.22 万多件,依法惩罚了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 6300 多人,挽回经济损失 2648 万元。

撤销涪陵、雅安县,设立涪陵、雅安市(县级)

9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涪陵县,设立涪陵市(县级),以涪陵县的行政区域为涪陵市的行政区域;撤销

雅安县,设立雅安市(县级),以雅安县的行政区域为雅安市的行政区域。

省体育代表团在五届全运会取得好成绩

9月16~30日,由 182 名运动员组成的四川省体育代表团,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女子排球、女子网球、女子射箭三项集体、一个单项冠军,其中,射箭选手夺得六项金牌。

省科技顾问团成立

9月29日,四川省科学技术顾问团成立。顾问团是由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聘请的 541 名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作为省委、省政府进行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等重大决策的参谋和助手,也是省委、省政府联系广大科技人员的纽带。顾问团分设能源、交通、材料、计算机应用、通讯、广播电视、农业、轻工、纺织、食品、资源、生态平衡、城乡建设、医药卫生、计划生育、军民结合、人才开发、科学管理、综合分析等 17 个专业组,根据需要分别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顾问团成立后的 3 年间,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议、意见和专题研究报告 300 多件,为省里的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顾问团成员还深入生产第一线,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省科技顾问团成立后,先后有 17 个市、地、州和 7 个县也成立了科技顾问团,共聘请科技顾问 2700 多人。

县级机构改革开始进行

9 月,全省县级机构改革全面展开。经过 3 个多月的工作,全省 211 个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工作全部完成。经过调整,县(市、区)领导班子成员由原来的 2907 人,减少为 2394 人,平均年龄由 49 岁下降到 43 岁,其中党政一把手由 50 岁下降为 44.4 岁。班子成员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 49% 上升为 71%,其中大专文化程度由 10.8% 上升到 38.2%,具有各种专业技术职称的 344 人,占 14.3%。

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

11 月初,全省 211 个县、市、区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举行换届选举。选举工作于 1984 年 5 月全部完成。全省 8500 多个乡和 7.5 万多个村建立乡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完成。

1983 年,全省共有人口 10075.5 万人。其中,男 5198.7 万人,女 4876.8 万人;城镇人口 984 万人,乡村人口 9091.5 万人。

撤销黔江、彭水、石柱县,分别设立土家族苗族、苗族土家族和土家族

自治县

11 月 14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黔江县,设立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原黔江县的行政区域为自治县的行政区域;撤销彭水县,设立彭水苗族土族自治县,原彭水县的行政区域为自治县的行政区域;撤销石柱县,设立石柱土族自治县,原石柱县的行政区域为自治县的行政区域。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12 月 3 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按照国务院提出的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对三线企事业进行调整改造。鲁大东任办公室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由国家计委代管,办公地址设在成都市。1984 年 2 月 28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设立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9 月 13 日成立了四川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

四川的三线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早在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国防科委曾经根据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进行调整。1979 年初,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为三线建设的调整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央对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也

为以战备为主要内容的三线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从1979年到1983年,三线建设着手进行了初步调整。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调整了投资方向;一些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开始转向民品生产;对极少数的因选址不当、难以维持生产,或者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工厂和科研所,实行关、停、并、转、迁。经过初步调整,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调整改造没有有计划地全面展开,许多矛盾还来不及研究和解决。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成立后,1984年2月起,四川即对三线企事业进行调查研究,拟定调整改造规划。1985年6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四川省三线企事业第一批调整方案,随即开始组织实施。四川进行调整的项目共38个,主要是对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或无产品方向,生产无法维持的三线企事业,分别采取三种办法进行调整:即就地改善条件,就地调整产品方向;地址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到中心城市建立技术开发部;在原址无法生存的企业,采取迁并或迁建的办法,依托中心城市。为了支持三线企事业的调整,国务院和四川省政府都制定了特殊政策和措施,调整单位坚持改革,以调整促生产、促科研,积极自筹资金,加快调整步伐。

四川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整产品结构、服务方向,进行技术改造和必要的技术引进。三线企业中的民用工业的作用一般都发挥得比较好,特别是交通、能源、原材料工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为国防建设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四化”建设的需要,国防工业以军为主的状况必须改变。1984年8月,国务院提出三线企业的很大一部分要搞成军民结合型的工厂,要选一批军工企业加以充实,承担“七五”、“八五”的建设任务。四川也提出要发挥军工在振兴四川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把发挥军工优势与研制国家急需的重大技术装备结合起来。1985年军工企业开始参与研制30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承担了宝钢2050热连轧机和大型立弯板坯连铸机的研制任务,为生产100万千瓦级核电站成套设备和研制60万千瓦级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并将船舶工业的重庆重型锻钢厂改造转产铁路敞车。到1985年,四川的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整个调整改造尚处在初始阶段,以后的调整改造任务还十分艰巨,工作还在继续进行。调整中涉及到的体制、政策、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规划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1984 年

民盟四川省第六次盟员代表大会召开

2月6~14日,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第六次盟员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委员会,潘大逵当选为主任委员。

发挥高等院校科技力量在振兴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2月7日,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组织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经济决策研究,围绕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攻关,开展院校科技协作,推动技术革新改造,在振兴经济中发挥高等院校科技优势。

1978年以后,特别是全国和省的科学大会后,根据大会的精神,各高等院校即开始制定科研发展规划,组织科研力量,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结合起来,在完成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科研任务的同时,先后还从生产实际中选定一批研究课题。

到1985年,各院校与62个工矿企业签订技术合同,落实研究项目738个,推广项目610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南农业大学教授侯光炯发明的“水稻自然免耕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推广55.5万亩,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常规作法产量高70.5公斤,净增稻谷3.8万多吨,增加经济效益达983万元,受到国内外农业科技界的重视。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科技大学参加的四川攀西地区钒钛磁铁共生矿物质成分和成矿预测及冶炼技术的研究,西南农业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校参加的川东旱粮作物综合技术的推广应用研究,四川农业大学对小麦优良品种“繁6”、“繁7”的选育和家禽家畜育种养殖技术等项研究的成果对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1985年四川省秋季科技成果交易会上,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31所高等院校,推出241项适合中小型企业、乡镇企业的“短、平、快”项目参加展出转让,成交454项次,成交合同总额达3701万元。省委、省政府还邀请高等院校大批专家、教授参加省政府科学技术顾问团,参与了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和一些重大经济发展项目的决策研究,对四川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军工企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

2月19~25日,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军民结合”工作会议,落实1984年军工企业民品生产、科研和技术转

让任务。

早在 50 年代中期,四川军工贯彻执行“军需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原则,曾经生产了产值达 8 亿多元的各种民用产品。从 60 年代初期开始,又重新回到单一的军用品生产。从 80 年代初到 1985 年贯彻“军民结合”方针,逐步改变了单一产品结构,发展了民用品生产,并且注意军工与民用工业的结合,发展横向联系,实行内联外引。先后围绕生产摩托车、自行车、照相机、电冰箱、光学眼镜、汽车、火车货车车皮等结成了 24 个军工与民用工业企业的联合体;军工为省内外民用工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 170 种 2000 台(套)专用设备,包建了酿酒、制革、制烟、洗衣机、烤漆、收音机装配、中长纤维烘干等 16 条生产线;采取签订长期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扩散产品零部件,以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入股联合办厂等多种方式扶持地方企业和乡镇企业;直接向民用工业转让了无屑丝锥、无机粘接、钢喷塑料、电液压清砂、机床微位移、超声波无损探伤等 200 多项技术与科研成果;以检测、试验、计量、计算等设备仪器对外协作;进行技术咨询服务。

到 1985 年底,军工已有 82.2% 的企业拥有自己的“支柱”民品或稳定的配套产品,有 61% 的企业基本上转向了民品生产,共试制生产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民用船

舶、轻纺机械、仪器仪表、化工产品等 500 多种主要民品,其中有 112 种获得了国家金质银质奖、“金龙”奖或被评为省、部优产品。

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市举行经济协调会

2 月 23 日,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三省四方”初步达成协议建立经济协调会。4 月 15~19 日,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省(区)五方”第一次经济协调会在贵阳举行,共同探讨搞活与开发、建设大西南的新路子。会议商定先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南宁等中心城市相互提供设备、场地和服务,开设展销门市部和推销网点,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中心城市。在经济协作、物资协作、技术协作、人才培训和交流等方面达成了 228 项协议,其中,四川(不含重庆)与兄弟省区达成 43 项。会议还商定在重庆设立常设机构,每年轮流依次在各省、区召开一次会议。

1985 年 4 月 23~28 日,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重庆市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应邀参加会议的有湖南、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地的代表。会议制定了“自力更生,多方联合,国家支持,共谋振兴”的指导方针,商讨了“七五”期间共同关心的重大建设项目规划,洽谈了经济技术合作和物资协作。会议通过了

关于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若干原则、关于联合开发工业重点项目、关于加强流通领域协作、关于加强科技与人才协作、关于经济技术协作互惠、关于加强与沿海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关于发展四省(区)五方交通邮电、关于加强蓉、昆、筑、邕、渝五市经济联系与合作等八个办法和意见。会议期间签订了各种协议 361 项,其中,经济协作 117 项,人才培训协作 7 项,物资协作 58 项。还提出了 740 多项意向性合作项目与上海、天津、广州的代表进行了初步洽商。

新龙、道孚等县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2月下旬,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新龙、道孚等县发生特大森林火灾。中共甘孜州委、州人民政府和军分区组织了 3 万多军民上山灭火,保护了国家大片森林资源。这场火灾,烧毁森林 9 万亩,灌木、草场 40 多万亩。

省工商联和省民建代表大会召开

3月 7~12 日,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同时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四川省工商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和民建四川省第二届委员会。四川省工商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推选童少生任主任委员。同年 3 月,童少生病逝,推选王彦

立代理主任委员。民建四川省第二届委员会推选童少生任主任委员,3 月,童少生病逝,由徐崇林代理主任委员。1985 年 5 月,民建四川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选举徐崇林任主任委员。

振兴四川中医

3月 27 日,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振兴四川中医事业的决定》。要求坚决克服忽视祖国医药宝库的现象,“七五”期间四川中医中药事业要有一个较大发展,使中医中药在医疗、教学、科研和中西医结合等方面协调发展,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后,四川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的指示,在中医机构建设、队伍建设、中医教育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在这之前遗留下来的领导认识、管理体制、中医人员待遇等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983 年 3 月 7 日,成都医学院附属医院名老中医李仲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写信,反映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等问题,以及成都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不适应教学和病人治病需要,存在的种种困难。彭真看信后,即批示给卫生部长崔月犁,指示按《宪法》规定,要努力“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卫生部将信和指示发至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看到彭真的指示和李仲愚的信后,指示卫生厅党组认真研究,调查全省中医状况,提出具体意见。卫生厅党组及时向省委报送了书面报告,经省委讨论后,作出两项决定,同意成立四川中医药研究院,先把筹备组组织起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全省中医工作会议,着重就解决认识、领导、队伍、阵地等问题,提出有力措施。接着成立了由副省长康振黄任组长、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四川振兴中医领导小组”。

1984年2月召开了四川省振兴中医会议,会上宣布成都中医学院1名副教授出任省卫生厅副厅长。3月,发布了振兴中医事业的决定。接着,各市、地、州相继成立了振兴中医领导小组,配备中医担任领导职务,设立专管中医工作的办事机构。中医工作出现了新的起色,得到较快发展。到1985年底,省及各地共拨出中医事业专项补助经费3000多万元,重点扶持了36个县以上中医院的建设;中医院发展到164个,中医药研究所由3个增加到6个,中西医结合医院由1个增加到4个,中医床位由8000多张增加到10600张。藏医有州医院1所、县医院7所,并在甘孜、阿坝两个州医院和23个县医院设立了藏医科;失传50多年的藏药“仁青佐塔”发掘研究成功;总计27万多块木刻版、成书82部

的藏医书籍的整理工作于1986年完成。甘孜、阿坝州卫校开设了藏医班。成都中医学院恢复了针灸专业,泸州医学院开设了中医系,成都体育学院创办了中医学运动保健专业;全省有中医和针灸中专7所。全省学校中医药专业每年招生近千名,在校生达3000多人;培训在职中医医生一万多。成都中医学院举办的中医函授教育,1985年毕业946人,举办了两年制西医学习中医班3期,招收中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00多名,57名硕士研究生已毕业。国家和省还联合投资约3000万元扩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全省中医药科研成果有127项获得国家、省级科学大会奖或科技成果奖。同时,为一批名老中医研制出计算机诊断程序。1985年6月,四川获得了卫生部授予的“振兴中医事业的先声”奖旗。

撤销马边、峨边县,分别设立马边、峨边彝族自治县

4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马边县和峨边县,设立马边彝族自治县和峨边彝族自治县。

民革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4月14~1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民革四川省委员会,裴昌会当选为主任委员。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4月15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大会贯彻新老结合原则,调整了部分领导成员,刘云波连任主任委员。

改革计划体制

4月,省计经委提出《关于调整计划经济管理权限的意见》,确定了十条放权办法,全省计划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了以下放计划管理权限为特征的新阶段。

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企业扩权试点的深入发展,过去那种层层下达一系列指令性指标到企业和生产队的计划管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必须进行改革。省计划部门从1981年开始对计划管理方法和指标体系作了一些适应性改进,适当减少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增加了指导性计划指标。对城市扩权试点的企业逐步放开了部分生产计划权、原料采购权和产品销售权。在基建、技改、外贸、物资等方面也作了一些调整和放权。这种适应性的改进,放权措施不配套,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84年4月起,开始从各个方面下放计划管理权限。

首先,把工农业生产计划划分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

三种计划管理形式。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下放产品计划管理权。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从原来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调整为指导性计划管理,省管指标从46个减少为19个;农产品收购除粮、棉、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品种继续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其他的或改为指导性计划,或实行市场调节。工业生产计划指标从186个减为145个,其中指令性计划指标只保留43个。国内商品收购指标从86个减少为40个(其中指令性指标22个)。外贸收购指令性指标从111个减为28个。其次是扩大市、地、州和省级各部门对基建、技改、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项目的审批权。规定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下的自筹生产性基建项目、300万元以下的自筹非生产性基建项目,下放到有关部门和市、地、州审批;省级部门审批1000万元以下的技改项目,市、地、州审批500万元以下的技改项目。第三是下放物资计划管理权,省只保留20多种统配物资计划,其余物资一次安排下达给各地区、部门。与此同时,改变了过去计划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管得过细过死的方式,大量简化了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放开对企业内部产、供、销的计划管理。此外,还将所有的省属企业(除少数确需省上统一平衡调度的企事业单位外)都下放到各个中心城市和市、地、州管理。

加强小集镇建设

5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强小集镇建设发出通知,全省小集镇建设由自发状态转入有领导、有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发展的轨道。全省20个市、地、州和172个县(区)先后建立了集镇建设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干部674人。到1985年,各地主要依靠本地技术力量,完成了集镇的总体规划编制任务的集镇占全省集镇总数的49%。主要依靠集体和个人集资18亿元,建成公用建筑1100万平方米,住宅300万平方米,街道1500万平方米,市场50万平方米,自来水站829个。全省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兴办饮食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的农民有10万余户、40万人,自筹资金约10亿元,新建厂房、商店、饭馆和住宅等建筑1000万平方米。已经出现一批规划比较合理、建设初具规模的小集镇。

加快乡镇企业发展

5月17日,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文件,对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提出了具体意见,强调要因地制宜,加快社队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社队企业统一更名为乡镇企业。8月25日,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

议,进一步研究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有关问题。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有关部门和各地都要给予积极指导和扶持,并且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战略措施之一,实行“加强领导,积极扶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的方针,采取乡办、村办、队办、联户办和户办“五个轮子一齐转”的措施,动员各行各业加强对乡镇企业的扶持。乡镇企业也普遍推行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引进资金技术,重视科技,推广广汉“三背靠”(背靠国营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经验。全省乡镇企业在经历了1981~1983年的缓慢发展,从1984年开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1985年,全省乡镇企业发展到112.23万个,完成总产值144.16亿元,比1983年增长184.3%,实现总收入128.63亿元,增长209%。1985年是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当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到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1.8%,所获得的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达470.1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1.2%。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四川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办经济技术协作邀请会

6月10~20日,四川省经济技术协作邀请会在成都举行。参加这次邀请会的有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国防科工委和27个省、市、自治区及深圳、沈阳、广州、武汉等市,四川省18个市、地、州和省级36个部门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共1500多人。省长杨析综在会上介绍了四川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的优惠条件。会议期间初步达成经济、技术、科研、商贸、物资协作887项协议,总金额5亿多元。到1985年,又同28个省、市、自治区达成经济协作项目2500项,协进资金5亿元,协进协出各种物资总金额13亿元。并与上海、江苏、辽宁等省市签署了长期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协作。

圭亚那、匈牙利、坦桑尼亚贵宾来访

6月13~15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胡布斯·桑普森·伯那姆一行42人,由轻工部长杨波、外交部长助理朱启祯陪同抵成都访问。省长杨析综等迎送并陪同参观。

8月27~28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马尔亚伊·纪瑟夫一行15人,由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和外交部苏欧司司长马叙生陪同抵成都访问,副省长顾金池陪同参观。

9月20日,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理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一行20

人,由中国司法部长邹瑜、中国驻坦大使何功楷等陪同到成都访问。

省级国家银行机构改革

6月28日,四川省工商银行宣告成立,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和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正式分设。此前,四川的银行体系是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足鼎立,1981年成立了四川省保险公司,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同时挂出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分局的牌子。当时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业务于一身,加之各专业银行都自成体系,人民银行基本上起不到中央银行应有的职能作用。1983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根据人民银行总行的要求,四川省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的分设要在全国先走一步。四川省人民银行拟订了两行分设的实施方案,于1984年6月正式实施。这样,省一级的国家银行机构改革基本完成,新的国家银行体系正式形成。

1985年一季度,四川省人民银行颁发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1985年2月,第一家城市信用社性质的民间金融机构——汇通金融公司成立。到1985年底,全省共成立了各种性质的城市信用合作社39个,存

款余额和贷款余额都达到 1000 万元左右。农村信用合作社也进行了改“官办”为“民办”的体制改革。此外,经人民银行批准,先后成立了四川省长江国际信托公司、重庆市渝中财务公司、中国投资银行四川省分行、阿坝州民族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和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 5 个国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至此,在四川已开始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新型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建成揭幕

7月1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建成揭幕。参加揭幕典礼的有四川、陕西两省的负责人和重返故地的老红军、老干部以及原属川陕苏区的各县派出的代表共 600 多人。博物馆坐落在巴中市南龛公园内。

南坪县境内暴发灾害性泥石流

7月18日,南坪县城区降雨 37.3 毫米,未经综合治理的关庙沟、叭啦沟、撮箕沟暴发灾害性泥石流,镇上 326 户、1782 人受灾,毁房 960 间,死亡 35 人,冲、淹土地 81 公顷,冲倒通讯杆 95 处,3 个水电站不能正常运转,8 处提灌站损坏,经济损失 1494 万元。

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

7月中旬,四川根据 5 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正式提出的在国有企业中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要求,开始在 118 户工业企业首批试行厂长负责制。1985 年 5 月,省人民政府又批准 65 个企业进行试点,到 1985 年底,试点企业已逐步扩大到占全省预算内大中型企业的三分之一。重庆和成都两市比较普遍地实行了厂长负责制。11 月 10~14 日,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厂长负责制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了四川从 7 月中旬开始试点的 118 个企业的情况和经验。在试点过程中,曾在一些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建立厂长主持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使厂长目标明确,在行使职权时得到职工和领导集体的支持和监督。各试点企业,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民办公助凉山大学开学

7月23日,凉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1983 年 7 月,民盟四川省委组织智力支边小组,与凉山州联合筹办大学。后由费孝通、楚图南、潘大逵、钱伟长等 80 多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起,经省人民政府同意,于 1984 年 3 月创办。凉山大学属于民办公助性质,招收学生正式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

改革集镇管理体制

7月31日,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设置镇建制的试行意见》,决定改革集镇管理体制,实行“乡镇(或区、乡、镇)合并,撤乡(或区)建镇,以镇管村”的体制。同时,对农村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改革,普遍建立乡、镇一级财政。到1985年,全省集镇发展到687个,比1978年增长1.23倍,其中实行镇管村体制的有453个,占镇总数的65.9%。集镇管理体制改革后,初步的有了良好效果,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加强了集镇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快了集镇建设。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

8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文件,强调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加快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并对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在此之前的5月11日,省人民政府在成都市电子研究所召开了全省科研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推广该所“科研经济承包责任制”。

全省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普遍推行了成都电子研究所的经验,实行以课题承包、课题核算和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科研经济责任制,并在部分科研单位试行所长负责制;对技术开发研究单位实行技术合同制,逐步减少事业费;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单位实行基金制;对从事社会公益及服务的单位实行经济包干制。相应地在科研单位内部,改革分配制度,把个人物质利益同完成任务的好坏挂起钩来,打破“大锅饭”,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还不同程度地扩大了科研单位在计划、人事、财务、收入分配等方面自主权,促使上级主管部门对科研单位的管理逐步从直接管理到宏观管理过渡。由于各类科研单位不同程度地实行横向经营服务,有些科研单位开始出现经费自给和部分自给的情况。到1985年底,全省实行技术合同制的地属以上科研单位已达42个,其中全部取消了事业费的14个,分别占地属以上科研单位的48.3%和16.1%。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也进行了改革,制定了地方科技基金的管理办法,有80%的市、地、州和70%的县(市、区)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增强了地方科技开发实力。

航模运动员再创世界纪录

8月22日,四川省第五届运动会创纪录赛在成都举行。航空模型运动员赵济和以每小时251.66公里的成绩,打破线操纵模型飞机圆周竞速飞行的世界纪录。

女子排球、射箭运动员在奥运会获优秀成绩

8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

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四川省8名运动员加入国家队参赛,张蓉芳、梁艳、朱玲为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大赛“三连冠”立功;李玲娟获女子射箭个人全能亚军并破五项奥运会纪录。

首次评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9月18日,四川省首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授奖大会在成都举行。这次评奖活动对1978年12月至1983年5月公开发表的全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了奖。从申报的1000多项科研成果中,评选出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语言文学等10多个大学科和分支学科中的优秀科研成果758项,并对优秀科研著作的作者发了奖。

“中国环流器1号”建成并启动

9月21日,我国最大的受控热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1号”在西南物理研究所建成并顺利启动。这个环流器是我国科学家在全国100多个单位的通力协助下,自行设计制造的,并在运转中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科研数据,有的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环流器1号”的研制成功和实验结果,标志着中国在世界重大科研课题之一的受控核聚变科研领域的装置和实验手段,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四川省第五届运动会闭幕

9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运动会,历时半年,在重庆市闭幕。这次运动会规模空前。从2月起,来自18个市、地、州和解放军驻川部队、四川铁路等20个代表团共5286名男女运动员,分别在28个赛区进行了18个运动项目的角逐。有一项航空模型超世界纪录,有16个队116人共211次打破了108项各年龄组的省纪录。大会评选出61个精神文明运动队,500多名精神文明运动员和近百名精神文明裁判员。

民营民生轮船公司成立

10月1日,大型民办航运企业——民生轮船公司在重庆重新建立。由卢作孚创办的原民生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和“老民生”其他老职工重新组建了这个公司。新建的民生轮船公司经营长江全线、广州至香港及海洋货物运输,开展江海联运、江海陆空联运和一票到底的“门到门”运输及中转业务,实行优质服务,业务不断扩大,已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业务关系,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

10月4日,省人民政府批转商业

厅关于贯彻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报告的意见》的通知,为了合理配置多种商业经济形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拓服务领域,灵活经营,方便人民生活,决定进一步放开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分别实行“改、转、租”。规定省辖市的商业零售企业 1983 年实际利润在 15 万~20 万元以下的,省内其他地区的商业零售企业 1983 年实际利润在 8 万~10 万元以下的,均属于小型企业。分别实行:改,即一部分企业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独立核算,照章纳税,自负盈亏;转,即一部分企业直接转为集体所有制;租,即一部分企业,特别是以劳务为主的饮食、服务、修理、修配等店铺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按租赁合同交纳租赁费,按规定向国家纳税。实行“改、转、租”的企业,执行八级超额累进税,执行集体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经过 1984 年到 1985 年两年的工作,国营商业、饮食、服务业的 4656 个小型企业,已实行了初步改革。其中,实行“改”的,有 4092 个,占 87.8%;实行“转”的,有 54 个,占 1.2%;实行“租”的,有 510 个,占 11%。实行“改、转、租”后,企业的留利,猛增至 60% 左右,企业活力大为增强。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四川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抓住搞活企业这个中心,带动各项改革。一是继续下放企业,到 1985 年,省属企业除中央规定不下放和不具备下放条件的少数企业外,大部分已下放。二是为解决各级行政部门截留企业权力问题,要求把企业应该享有的权力,坚决放给企业,经济主管部门从直接管理企业转变为抓行业管理、行业规划和为企业服务。三是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允许企业自销 5%~20% 的产品。以工业为例,纳入省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的产品由 127 种减少为 54 种。四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开始建立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国营小型企业实行集体或个人承包、租赁经营的办法。全省 90% 以上的工业企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五是大力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推广重庆嘉陵摩托车联合体和成都工程机构总帮的经验,横向经济联合和协作有了新的发展。六是加快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到 1985 年底,全省预算内大中型企业已有三分之一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七是从 1984 年第四季度起,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

进一步搞活流通领域,继续调整购销政策,缩小统配物资的范围,扩大

市场调节的范围。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改革所有制结构。1985年与1980年相比,集体商业由21.2万人发展到33.17万人,个体商业由3.98万人发展到84.58万人,分别增长56.5%和20.3倍。把小型国营商业企业转为集体经营、集体所有或租赁给个人经营。改革批发体制,推广重庆、成都建立工业品贸易中心、农副产品贸易中心的经验,到1985年底,全省已建立各具特色的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600多个。

在物价方面,按照放调结合、小步前进的方针,缩小了农副产品省管价

格的范围。价格放开后,零售物价指数有所上升,但基本保持在国务院给四川省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内,市场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在工资改革方面,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企业实行了不同类型企业干部职务工资标准和工人套级工资制。在96个大中型企业试行了职工工资总额同上缴利润挂钩浮动的办法。煤炭部门试行了吨煤工资含量包干的办法。运输部门试行了吨公里工资含量包干的办法。

1985年

重庆八家文艺团体改革尝试

1月16日,重庆市话剧团、歌舞团等8家文艺团体进行体制改革新尝试,剧团与工厂建立经济文化联合体。文化部为此发来贺电。

铜街子水电站开始施工

1月23日,大渡河铜街子水电站主体工程正式开始施工。铜街子电站位于三峨山麓,是国家能源建设的重要配套工程,大渡河梯级开发的最后一级大型水电站。设计装机总容量为60万千瓦,年发电约31.2亿度,坝顶

相对高度为80米,长1082米,最大水头41米,是一个以发电为主,兼顾漂木、灌溉和改善通航条件的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铜街子电站建成后,可对龚嘴电站进行反调节,发挥水能的最大作用。

撤销华蓥工农区,设立华蓥市(县级)

2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华蓥工农区,设华蓥市(县级)。

物价改革

3月1~5日,省人民政府召开全

省市长、州长、专员会议,传达贯彻 2 月中旬的全国省长会议精神,对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

四川从 1979 年到 1984 年,根据全国的统一部署结合本省的实际,在价格结构体系方面进行了 6 次大的调整,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 8 种副食品销价、提高矿产品和煤炭价格、提高烟酒价格、有升有降调整纺织品价格、调整铁路、公路和水运价格;进行了 4 个方面的放开,即小商品、多种农副产品、乡镇企业产品和超计划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放开。

1985 年的价格改革,按照中央确定的“放调结合,小步前进”,“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方针,从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两个方面进行。

价格体制改革,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重点是农产品、煤炭、木材以及铁路运价等价格结构的调整。1984 年将粮食征购价与超购加价并存的办法,综合为“倒三七”比例的统一收购价后,粮食平均收购价格略有提高。1985 年,城市粮食销价(职工计划供应部分)保持不动,农村粮食销价提到与“倒三七”比例折算的新的收购价持平,实行购销同价,基本上解决了多年积存下来的农村粮价购销倒挂的矛盾。从 1985 年 4 月 1 日起放开猪肉购销价格,实行议购议销和多渠道经营,国家对经营单位实行指导性价格,对

农民和消费者实行保护性价格,全省平均活猪议购价格上升 11% 左右。每头猪提价收入在 12 元左右,全省农民增加收入 2.76 亿元。市场销价上升 15%~20%。价格调整后,到 1985 年底全省生猪出栏数比 1984 年增加 595 万头,增长 13.1%。放开蔬菜购销价格,改革蔬菜的生产经营体制,1985 年蔬菜上市量增加到 5222 万斤,细菜比重上升,淡旺季之间的时间缩短,国营菜店的菜价降到年平均每斤 9 分左右。放开集体林的木材价格,实行指导性议价和市场调节;森工木材的市场销价平均每立方米由 127 元上升到 177 元,提高 39.4%,促进了生产发展,缓和了市场供应。原煤价格按照中央的调价方案,部属煤矿从 3 月 25 日开始、省属煤矿从 4 月 25 日开始调整价格,地、县也相继进行调整。原煤出厂价格全省平均每吨提高 4.5 元。当年下半年全省原煤产量比上半年增加 590 万吨,增长 11.9%,对减少企业亏损起了一定作用。从 5 月 15 日起,执行铁路短途运价调价方案,提高了短途运价,促进了公路为铁路分流。

由于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进行局部性的价格结构调整,扩大了市场调节,致使市场零售价格水平有较大上升。经过改善宏观控制,针对价格上涨采取了调节措施,全省 1985 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升 6.8%,其中城市上升 9.6%,农村

上升4.9%，未超过中央确定的控制线。

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农产品方面，从1月28日起，扩大农村供销社的价格管理权；从7月1日起，中药材（除麝香、甘草、杜仲、厚朴等四种药材统一由中药材公司进行议购议销外）放开，实行多渠道议购议销，由省主管部门规定最高综合加价率，对议价进行指导和控制；从7月15日起，对生猪、大路蔬菜、茶叶、细羊毛等12种品种，实行水平指导价格制度，由有关部门制订分品种的指导价格水平，即议价的控制幅度和具体的政策界限，进行议购议销。此外，随着城市农副土特产品批发市场和贸易中心的建立，相应地取消了旧的调拨作价制度，实行了开放式议购议销体制和多渠道少环节的直线流通，1985年城乡农贸成交额达58.8亿元，比上年增长26.3%，全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比上年上升6.7%。在工业品方面，从3月1日起，除煤、电、气外，其余的工业生产资料属企业自销和超产部分，出厂价格由企业决定。对钢材、生铁市场价格实行定期挂牌的协调指导制度，限制与整顿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有效地控制了计划外钢材的市场价格盲目上涨。改革了单一的电价和计划内外用电一个价的办法，实行了丰枯季节差价、高峰低谷差价和指令性、指导性、市场调节3种电价，促进了合理分

配和使用电力。从4月15日起，对国家统一定价的缝纫机、国产手表、收音机、电风扇等4种产品下放由企业定价。大部分轻工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国家对主要品种规定浮动的上下限。小商品价格已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在改革中，加强了物价的检查监督，实行统一商品标价签的价格管理办法。

工资改革

3月1~5日，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市长、州长、专员会议后，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全省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工资改革，企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开始起步。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来实行的工资制度，是50年代制订的。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客观情况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致工资制度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其他一些不合理的问题。1985年开始实行的新的工资制度是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由4个部分组成：即基础工资，用以保障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不分职务高低，都领取相同的数额；职务工资，按工作人员的职务高低、责任大小、工作繁简和业务技术水平评定，并随职务变动而变动；工龄津贴，随工作人员的工作年限增加而增加。幼儿、小学、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教师和护士长期从事本职业，除

按规定发给工龄津贴外,还发给教龄和护士工龄津贴;奖励工资,用于奖励履行岗位职责、成绩优秀的工作人员。全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从1985年8月开始进行,到12月底基本完成。通过改革,工作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数量,简化统一了工资标准,初步解决了一些多年积存的矛盾,为进一步理顺工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制度也是50年代制订的,长期未能调整和改革,问题也很多。工资管理体制上集中过多,平均主义现象严重,工资标准复杂混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对工资改革进行了一些探索。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在川棉一厂、自贡铸钢厂、重庆印制三厂等6个企业用企业留成资金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的试验;在成都电线厂、南充织绸厂、四川化工厂等19个企业试行了20%职工定期浮动升级的办法。1984年以后,成都、重庆的建筑企业试行了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责任制;重庆先后对重钢、长寿化工厂等34个企业试行了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挂钩浮动的办法,有的企业还试行其他的一些办法。这些试验,为企业工资改革积累了经验。

1985年,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四川国营企业进行了工资改革,执行国务院的规定,奖励基金按第二步利

改税核定的比例提取,随企业经济效益浮动。将奖金的起点由两个半月提到4个月;对少数企业试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办法。全省有3种类型企业试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即大多数统配煤矿实行吨煤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省属和成都、重庆等地的市属建筑施工企业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少数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试行工资总额同上交税利挂钩浮动的办法,经国务院工改办批准全省有126户、职工20多万人,其中省属96户。据96户统计,1985年实际完成上交税利比1984年提高25.32%;职工个人人均上浮新增工资143.49元。在企业内部的工资改革,按照全国统一部署,主要是简化统一工资标准和进行浮动升级。全省国营企业对职工进行了套改新工资标准和浮动升级。1985年全省工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1980年增长38.7%,建筑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1980年增长47.4%,商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1980年增长37.5%。

宝珠寺水电站全面开工

3月4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位于广元县境内的宝珠寺水电站全面开工。这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漂木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装机4台,总容量64万千瓦,年发电量23亿度。总投资9亿多元,

总工期 10 年,施工的第八年一台机组投产发电。

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3月14日,省人民政府同意省粮食局《关于1985年粮食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主要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四川从1977年开始即着手调整统购任务。1978年实行稳定粮食征购基数、多购多加价的办法,鼓励农民把增产的粮食自愿卖给国家,当年全省就增购粮食25万吨,农民也增加了收入。后来由于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提高或开放,增购粮食加价偏低,经过在资阳县试点,1984年8月在全省实行了粮食统购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办法,即70%按超购价、30%按统购价,全省农民当年为此增加收入1亿多元。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的办法是,根据四川粮食的产需情况,参照1984年的收购情况,同各地协商确定收购数量,按“倒三七”的比例计价与农民签订定购合同。

在取消粮食统购的同时,对其他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油菜籽仍按照“倒四六”比例计价(即四成按原统购价,六成按原超购价)敞开收购。生猪取消派购后,适当提高了收购价和奖售饲料粮的数量,实行合同定购和多渠道经营。蔬菜和

中药材(除麝香、黄柏、杜仲、厚朴四种外)、红黄麻等都放开价格,自由交易。国营经济部门和商品主管部门参与市场管理。经过改革,农村经济进一步活了。1985年,全省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112.62亿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长58%;农副产品商品率达45%,比1978年提高3.1个百分点。

举行四川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洽谈会

4月2~10日,四川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洽谈会在成都举行。应邀到会的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人。共签订经济技术合同170项,成交额2.6亿美元,其中利用外资8000多万美元,出口贸易成交额4500万美元。

加快发展畜牧业

4月24日,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决定》,要求提高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重点抓好猪禽的生产,坚持一般饲养户与专业户相结合,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商品基地等。省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决议》,把加快畜牧业的发展作为全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重点之一。

畜牧业一直是四川的传统优势产业。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四川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从本省实际出发,先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主要的如:取消一切禁止、限制农民饲养家畜家禽的规定;牧区牲畜实行私有私养,自主经营;肉猪实行多渠道经营,取消派购、放开猪价,等等。同时,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在平坝和丘陵地区主要发展养猪业,同时发展小家禽家畜;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半农半牧区实行以牧为主,大山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则以发展草食牲畜为主。促进了畜牧业的持续发展。

生猪饲养是四川畜牧业的大头,养猪产值长期占全省畜牧业产值的70%以上。在养猪数量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全省又把提高出栏率和发展瘦肉型猪作为主攻方向,推广科学养猪技术,提高养猪生产水平。生猪品种改良面由1980年的10%左右提高到40%以上。

为促使畜牧业由传统性生产向规模性商品生产转化,全省坚持走群众饲养与专业户饲养相结合的路子,支持畜禽专业户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批商品猪、牛、半细毛羊和板皮山羊生产基地县。其中瘦肉型商品猪生产基地县已有44个列入全国计划,首批试点建设的郫县、简阳、威远等11个县已初见成效。这11个县1985年同1984年比较,出栏肉猪由413万头增加到514万头,增长

24.5%;出栏率由78%上升到85%。在发展专业户、建立商品基地的同时,建立健全了服务体系,发展牧工商联合经营。全省先后建立起畜牧兽医站、改良站、草原站、冻精站、液氮站、种畜场、交通检疫站、兽药厂、科研所、畜牧服务公司、配合饲料厂等企业事业单位1.2万个,职工6万人;办了各种类型的牧工商企业等120个。

1985年全省畜牧业产值达68.02亿元,比1984年增加7.78亿元,增长12.9%,比1978年增长1.47倍;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6.2%上升到22.3%。主要畜产品产量大幅度上升。全省猪、牛、羊肉总产量达283.8万吨,比1984年增长17.6%;牛奶产量21.9万吨,增长10.3%;绵羊毛产量0.2万吨,增长2.4%。大牲畜年末头数986.8万头,增长1.5%,其中牛939.6万头。全省出栏肉猪4469万头,比1984年增加595万头,创历史最高水平;年末生猪存栏5916.3万头,比1984年增加246万头;生猪饲养量首次突破1亿头大关,实现了多年前提出的“一人一头猪,一亩一头猪”的奋斗目标。猪肉除满足省内需要外,还大量进入国内外市场,为27个省、市、自治区提供猪肉33万吨。

乒乓球运动员在世界锦标赛夺得冠军

4月，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第三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四川运动员陈龙灿代表中国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单打亚军。

省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召开，蒋民宽任省长

5月6日，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开，14日结束。会议接受杜心源等23人辞去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接受杨析综辞去省长、何郝炬辞去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大会选举何郝炬为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王赦、邓自力、王彦立为副主任；选举蒋民宽为省长，增补马麟、蒲海清为副省长。

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召开

5月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五届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接受杨超等因年事已高或工作变动提出辞职的请求，选举冯元蔚为主席，补选黄启璪、李维嘉、冯达仕、张广钦为副主席。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动工兴建

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纪

念碑”动工兴建。泸定铁索桥坐落于泸定县城西的大渡河上，为川藏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在此飞夺泸定，建立了英雄业绩。1961年月4日，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0年国家在东桥头建成了泸定桥革命文物陈列馆，展出实物、图片、资料240余件。“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于红军飞夺泸定桥50周年兴建，由邓小平题写了碑名，聂荣臻撰写碑文。以碑为中心规划了一座小巧玲珑的城市公园。纪念碑占地720平方米，碑体高30.25米，由主体、底座铜像和底部梯式平面组成。^①

三线地区与一线地区进行经济技术合作

6月7日，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召开的全国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筹备会历时7天在成都结束。8月20~26日在兰州正式召开一、三线地区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有17个省、市、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和企业的代表1200多人参加。会议期间洽商签订合同、协议和意向书1391个，金额达10亿多元。四川为参加两次会议就资源开发、技术交流和军民结合等方面提出并汇编了四川与一、三线地区联合协作项目937项，

^① 1986年10月，碑体落成。

其中经济协作项目 441 项,技术协作项目 496 项。在洽谈会上,四川介绍了与兄弟省、市、自治区开展横向联合协作的广阔前景,发布了 10 条优惠政策。经过洽谈,四川与一、三线地区签订了正式协作项目 51 项,达成意向性协议 159 项,协进协出资金(主要是协进)2 亿元。这次洽谈会,实际上是第一次举行的促进东西部经济技术合作的会议。

杨必纯获南丁格尔奖章

6 月 26 日,省红十字会、省护理学会在成都集会,祝贺泸州市红十字医院护士杨必纯获得护士国际荣誉奖——南丁格尔奖章。会上,省人民政府授予杨必纯劳动模范称号。

小麦新品种“绵阳 11 号”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6 月 29 日,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定,四川省绵阳地区农科所冯仕达、刘碧贵等培育的小麦新品种“绵阳 11 号”获国家发明一等奖。这个小麦良种,从 1980~1984 年在全省推广种植后,获经济效益 8 亿多元。

省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7 月 3 日,中共四川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成都召

开。会议推选出四川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 13 人;同意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谭启龙、鲁大东、刘西尧等 26 位老同志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省顾委的职务;补选了省顾委委员 10 人,选举许梦侠为主主任。

改革科技干部管理制度

7 月 6 日,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干部管理,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的若干规定》。这是在 3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后,4 月 20~25 日四川省科技工作会议就贯彻《决定》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到 1985 年底止,全省从事自然科学方面工作的省属系统科技人员约有 40 万人,科研机构 500 多个。从 1980 年开始,逐步对科技人员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在各级党委领导和各级组织部门统管下,由各级科委分级管理的制度,把科技干部的管理和使用结合起来。从 1984 年起,实行了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和社会科学专业人员统一管理。先后就发挥科技人员作用,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有组织有领导地按照合理流向的原则开展人才流动,并给用非所学、闲置不用、单位拒不调整的科技人员辞职的权利。在 1978 年开始的组织科技人员“归队”的基础上,继续调整积压浪费、用非所学、使用不当的科技人员到专业对口

的技术工作单位，并选拔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和开拓精神的科技人员到领导岗位。从1984年到1985年，全省正式调整的科技人员达4000多人。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支援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1985年全省动员组织科技人员达1.5万多人次，受援企业3000多个。提倡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有组织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活动；允许科技人员在不影响本单位技术权益的情况下从事业余智力劳动。这些措施对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加快发展丘陵地区经济

7月10~14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南充召开丘陵地区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加速发展丘陵地区经济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针。

全省有84个县（市、区）处于丘陵地区，是全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在全省农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1983年以后经济发展缓慢，1984年农业总产值，粮、油、猪的增长幅度和农民收入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为了加快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省委决定把丘陵地区作为对农村经济工作分类指导的重点，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抓紧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加快以养猪为重点的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非耕地发展

林果业；办好乡镇企业；开发劳动力资源，抓好劳务输出；发展能源，办好交通。当年拨出9000多万元资金专门扶持丘陵大县。首批扶持的仁寿、简阳等11个县，共投入扶持资金4050万元。经过努力，丘陵地区农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发展的势头。1985年与1984年相比，84个县（市、区）农业总产值增长8%，其中畜牧业产值增长15%，生猪出栏头数增长15%，猪肉产量增长18%，林业产值增长10%，柑桔产量增长25%。

进一步推行基建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

7月11日，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计经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推行基建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的报告》，决定从当年起，所有重点建设项目都必须实行投资包干责任制。

1980年以后，四川在部分建筑施工企业进行了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试点，采取按建设项目“五包”（即包投资，包工期，包材料，包工程质量，包投产时间）、按住宅小区包干和住宅按平方米造价包干等办法。从1985年起，这些办法又进一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行。到1985年底止，全省实行投资包干的项目达2219个，占在建项目的37%；续建的25个大中型项目中，实行投资包干的项目20个，占80%。住宅建设大部分实行了平方米造价或小

区综合造价包干。实行投资包干的项目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敞开花钱的状况有所改变,投资有所控制,一些包干项目的工期缩短,造价降低,投资效益较好。

开拓科技市场

7月23日,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开拓科技市场的意见》,要求积极开办技术市场,采用多种形式开展技术交流、交易活动,疏通技术成果流向生产的渠道。

从科技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四川的技术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活跃,1985年有了较快发展。当年全省共举办各种技术交易会140多次,成交项目6600多项,总成交额达9.3亿多元。在省秋季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成交的项目和金额,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占三分之一。一些科研、设计、高等院校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技术联营等形式,同生产单位结成了多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使企业改变了面貌。全省已有78个科研机构、16所高等院校与400多个企业建立了240多个科研生产联合体。据93个科研生产联合体的统计,已开发新产品75种,推广应用新技术1399项,新增产值7000多万元,新增税利2000多万元。1985年组织了四川省科技开发交流网,以增强省同各地、市、州的科技交流。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8月6~12日,全省农业生产会议召开,初步总结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经验。

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部署,开始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指导思想是,一手抓近1亿亩耕地的集约经营;一手抓林地、草原、水面等非耕地的开发经营。本着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注重经济效益的原则,在确保全省粮食总产量每年有所增长的前提下,搞好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布局,重点发展畜牧业、林果业和乡镇企业。调整工作分三个层次进行。

一是在种植业内部调整。进入80年代后,每年都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了局部调整,逐步降低了粮食作物面积的比重,发展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从1981年到1984年的4年间,共调减粮食面积1121万亩,扩大经济作物面积265万亩,增加饲料、绿肥、蔬菜面积481万亩,使粮食面积比重由87.8%下降为83.3%,经济作物比重由8.2%上升为9.8%。虽然每年平均减少粮食面积280万亩,单产却年年有提高,总产量每年平均增加160万吨,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也得到全面发展。1985年调整结构的步伐加快,全省粮食面积减少614万亩,经济作物面积扩大548万亩,粮食作物占总

面积的比重下降为 79.7%，经济作物上升到 12.9%，其他作物也有较大发展。粮食作物中主粮减少，但小杂粮、小杂豆面积和产量增加；经济作物中，除对棉花有计划控制外，油料扩大面积 447 万亩，麻类扩大 80 万亩，糖料扩大 10 万亩，烟叶扩大 37 万亩，蔬菜、绿肥面积扩大 46 万亩，均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增值。种植业内部结构逐步趋于合理。

二是在农业内部调整。重点发展畜牧业，加快发展林业、渔业。平坝和丘陵地区主要发展养猪业，带动鸡、鸭、鹅、兔等小家禽家畜的发展；山区和高原地区着重发展牛、羊；进一步落实国家有关林业政策、法规，扶持专业户承包绿化荒山，鼓励农民利用“四旁”植树种草，发展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各地还利用江、河、湖、库、塘发展水产业，推广网箱养鱼和稻田养鱼。1985 年，在农业产值中，种植业比重由上年的 60.4% 下降为 55%，林、牧、副、渔比重由上年的 39.6% 上升到 45%。

三是在整个农村经济结构中调整。主要是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①。随着乡镇企业中的加工业、建筑建材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各种服务行业的发展，一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据对 55 个县的

165 个乡的抽样调查，1985 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 61.9%，比上年下降 5.6%；从事工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的占 8.5%，比上年上升 2.6%；从事运输、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占 2%。这 165 个乡输出劳动力达 3.03 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 2.8%。据这 55 个县的 5500 户农户的抽样调查，1985 年农户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 271.41 元，其中来自第一产业的 227.38 元，比上年增加 8.1%，所占比重比上年下降 2.3%；来自第二产业的 8.08 元，比上年增加 38.8%，所占比重上升 0.6%；来自第三产业的 35.95 元，比上年增加 25.8%，所占比重上升 1.7%。

全省农业生产会议提出，总结经验，搞好调查，务必确保粮食稳定增长，并确定了继续保证粮食增长和发展经济作物的对策和措施。

清理整顿“公司”、“中心”企业

8 月 16 日，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清理整顿“公司”、“中心”企业的意见》。

到 1984 年底，全省已有各种公司 1.48 万家，各种“中心”近 600 家。其中有些“公司”、“中心”名不符实，经营项目与名称不符，有的经营范围过宽；有些资金虚报，人员、场地、设备与经

^① 参见 1984 年“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5 月 17 日）。

营范围不相适应；还有少数“皮包公司”，有少数“公司”骗买骗卖，投机违法，非法牟利，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按照国务院的指示，从1985年8月至1986年6月，全省对28662个“公司”、“中心”进行了整顿。在已清理的28137个“公司”、“中心”中，问题比较多的占10%~15%，问题严重的占5%。经过清理，查处违法企业787户，吊销和注销营业执照3735份，罚款、没收这些企业的非法所得208万元；问题严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有47件、68人。

庆祝第一个教师节

9月10日，四川省和成都市负责人与部分教师在成都市隆重集会庆祝我国第一个教师节。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负责人向604名优秀教师和50个单位授予“四川省劳动模范”和“尊师重教先进单位”奖章、证书、锦旗和纪念册，表彰他们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奥地利总统来访

9月16~17日，奥地利共和国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夫妇一行59人，由航天工业部长李绪鄂、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夫妇、中国驻奥大使王殊夫妇陪同抵蓉访问。副省长顾金池等省、市有关领导到机场迎送并陪同参观。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四川视察

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四川视察。他沿着红军长征的部分路段，视察了四川的甘孜、阿坝和甘肃陇南地区10多个县。他在视察中指出：领导群众劳动致富是地方党组织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要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的作用，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开辟生产致富的新门路。

射击运动员获世界锦标赛冠军

9月，四川省射击运动员刘玲，在意大利蒙特卡迪尼举行的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上夺得女子双向飞碟射击团体冠军和个人亚军。

成昆铁路新技术获特等奖

10月7日，以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为主勘测设计的“在复杂地质、险峻山区修建成昆铁路新技术”，获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

成昆铁路所经过的地区，地质情况十分复杂，有“地质博物馆”之称，地形地势险峻，气候异常多变。工程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采用和发展新技术。1964年，会战指挥部作出了《关于成昆线采用和发展新技术的决定》，确定在牵引动力、通信信号、线路上部建筑、桥隧和施工等方面要采用新结构、新工艺、新的施工方法，并组织了来自全国许多科研、设计、工程、运营单位

和大专院校的科技人员 1200 多人,组成 40 多个组,分别对 65 个新技术项目进行联合攻关,取得较好的效果。其中采用铰接悬臂梁结构形式,用悬臂灌注法施工,跨径为 $32.6 + 64.6 + 32.3$ 米的孙水河五桥,1978 年已经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成昆铁路技术成就出色,比西南地区原来修的几条铁路干线标准高、能力大,1985 年再获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

巫山县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10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率领的长江考察队,在巫山县大庙区龙坪村发现古人类下颌骨和臼齿化石,后经古地磁法测定,其生活年代在 200 万年以前,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开馆

10 月 16 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开馆。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和夫人专程来成都参加开馆仪式。四川省副省长顾金池代表省人民政府出席开馆仪式。布什与顾金池分别致词。

志愿军特等功臣柴云振在朝鲜受勋

10 月 23 日,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堂,接受了由朝鲜国家

主席金日成签署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柴云振是志愿军某部班长,四川省岳池县人。1951 年 5 月在朝鲜朴达峰战斗中,他奉命带领几名战士出击,和战友一起歼敌 200 多人,对巩固志愿军主阵地起了关键作用。第二年,他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功一次,可是奖章和证书无人领取。原来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昏迷过去,被友邻部队送往医院,与他所在部队失去联系。伤愈后,他复员回乡,先后担任社队和区的干部,埋头苦干,默默无闻。1984 年,原部队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才将这位老英雄找到。1985 年 10 月,柴云振作为访朝战斗英雄代表团成员,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并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发展山区经济

11 月 21~25 日,中共四川省委在达县召开全省山区工作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工作,交流经验,提出了进一步落实有关政策,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以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步伐。

四川有两片贫困山区,一片是川西北、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另一片是盆周山区,包括秦巴山脉、武陵山脉和乌蒙山区的四川部分,涉及 11 个市、地、州共 43 个县。这类地区是全省后劲最大、潜力最大的部分地区。早在

1980年,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对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多次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具体解决这些地区的特殊问题,拿出18万吨粮食,适当减轻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一些长期低产、缺粮队的粮食负担,使这些地方的农民进一步得到休养生息,从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村粮食又购又销问题。1981年6月和7月,相继召开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工作会议,又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下放大牲畜给个人饲养;调整山区生产方针,采取以林为主,农牧并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

1984年7月31日~8月3日,召开了山区经济座谈会,进一步解决山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采取的措施主要有:①调整山区的产业结构,发挥山区的优势,扩大了适宜在山区发展、市场适销对路的油料、麻类、烟叶、中药材、酿酒原料等作物的面积,使经济作物比重上升。从1984年起,对800米以上高山地区免去粮食征购任务,以利于退耕还林还牧。据43个县统计,到1985年,已退耕124万亩,其中种草46万亩,植树46万亩。②利用山区的条件,发展乡镇企业,对新办乡镇企业减免所得税一年、工商税一年,许多县选准起步产业,发展拳头产品,以开采原煤、木材、大理石和其他矿石为主的资源开发,以桐油、麻类、食用菌、竹木制品为主的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以水泥及其制品和劳务输出为主的建筑

建材业,共占乡镇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二,1985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4亿多元,比上年增长47%。③建设交通、饮水工程,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动用国家库存粮食、棉布折合人民币3.8亿元的实物,并从省财政和交通事业费中挤出9000万元配套资金,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帮助贫困山区发展交通、修建人畜饮水工程,据43个县的统计,到1985年共建成公路1500多公里,直接受益人口500万,综合经济效益达9000多万元。④加快智力开发,从1984年起每年拿出500万元,委托大专院校向山区定向招生,培养人才,到1985年,两年已定向招生1100多人;每年还拿出200万元,补助职工技术教育,已办职业高中校(点)109个,在校学生1.2万人。⑤加强扶贫工作,对1130万贫困农民赊销价值3亿多元的棉花、棉布,基本上解决了山区农民缺衣少被的问题;对1742万收入在120元以下的农民减免农业税3年。⑥为加强贫困山区的工作,1984年10月省人民政府成立了边远山区工作领导小组。1985年8月30日,中共四川省委从省级机关抽调500名中青年干部到边远山区县和少数民族县工作,帮助山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据43个县的统计,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4年增长17.8%,超过全省平均增长水平。贫困山区的面貌开始有了改变。

重庆江北大型民用机场动工兴建

11月30日,重庆江北大型民用机场经国务院批准动工兴建,于1990年初建成投入使用。该机场属国家一级机场,净空良好,通讯导航设施先进,国内现有的大型客机都可以在此升降。空港服务设施齐备,航站规模年旅客吞吐量200万人次,货物吞吐量5.3万吨。

成渝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建成并交付营运

12月30日,国家“六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成渝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成都至重庆西站),建成通车,正式交付营运。改造工程由成都铁路局进行总体设计,施工从1978年3月开始,1983年加快了工程进度,先后参加施工有6500人,共完成投资3.55亿元。改造后,年运送能力提高一倍,列车运行密度显著增大。如成都至资阳间上行货流密度,1983年为588万吨公里/公里,1987年增加到917万吨公里/公里,增长56%。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12月11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川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规划和实施意见》。

四川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恢复。1980年,成

都、重庆、自贡三市率先进行普通中学改办职业中学的试点。1981年,全省有13个地、市的57个县、区试办了农业、职业中学或班,1982年扩大到15个地、市的137个县、区。1982年7月,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对各地举办职业学校的工作作了分类安排。为了改善职业中学的办学条件,省人民政府要求各级政府逐年增加投资。从1982年到1985年的4年中,对全省职业技术教育的专项财政补助经费共1690万元(其中省财政拨款1060万元),加上其他渠道投入的经费,共计近6000万元。从1983年至1985年,通过纳入大专院校招生计划或委培等多种渠道,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了19个专业2564名教师。到1985年底,全省职业高中校点已发展到809个(其中单设411所,普通中学附设职高班398所)、2507个班,在校学生10.7万人。开设了农学、电子技术、财会等153个专业。职业高中在校生占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18%。此外,还有175个职业初中校点(其中单设的89所)、491个班,在校学生约2.4万人。从1980年到1985年的6年间,城乡职业高、初级中学共有4万学生毕业,向社会输送了一批中初级技术管理人才。与此同时,全省还组织了青年职工的文化、技术补课教育,已有120多万职工初中文化补课合格,100多万职工初级技术补课合格,技术工

教育依靠大中型企业,采取多种办学形式,也得到较快发展。到 1985 年,全省共有技工学校 344 所,设置工科专业 300 多个,有在校学生 6.3 万多人。

《四川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规划和实施意见》提出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发挥现有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潜力,扩大招生。并且有计划地将一批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或增设职业班,在“七五”期间,实现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略高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

基本实现全面自营出口贸易

1985 年,四川基本上实现了出口贸易由省自营。

从 1977 年开始,四川进行自营出口的试点,逐步扩大了自营出口权,直接出口占出口收购额的比重,1981 年为 23%,1983 年为 25%,1984 年为 50%。1985 年改为全面自营出口后,除国家统一经营的商品和政府间贸易的商品由有关总公司对外成交后分合同给四川执行外,其余的商品各外贸分公司均可直接对外谈判、成交、出运、结汇。仅有少量的商品由于经营手段不足仍与沿海口岸公司维持调拨关系。过去只能由沿海口岸出口的大宗商品如厂丝、罐头、冻猪肉、柑桔、红茶、棉布、棉纱、山羊板皮等,都改由省内各外贸公司出口。与四川建立经济贸易往来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有 80 多个,客户 3000 多家,出口市场从港

澳地区扩展到日本和东南亚、欧洲、北美、澳洲的一些国家。全面自营出口的第一年出口商品 600 种左右,完成出口总值 34939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长 61.2%。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香港、日本、瑞士、联邦德国、苏联等,这 5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 23426 万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67%。

“六五”计划胜利完成

1985 年,是“六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六五”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已经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1985 年实现社会总产值 1046.17 亿元,国民收入 491.3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 1980 年增长 65.5%、58.4%。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759.85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比 1980 年增长 59.8%。其中,工业总产值 493.66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74.8%;农业总产值 265.92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38.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74.30 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 1980 年增长 57.5%。财政总收入 58.76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69.7%;财政总支出 64.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9%,支大于收,赤字 5.47 亿元。全省零售物价总指数(以 1950 年价格为 100,下同),比上年增加了 12.7,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增加

了 18.4。

据抽样调查,198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315 元,比 1980 年增加 127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平均增长 9.3%;城镇居民人均可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为 644 元,比 1980 年增加 260 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收入增长

50.6%。

1985 年末,全省人口总数为 10187.5 万人,比 1980 年增加 367.9 万人。当年,人口出生率为 15.39‰,死亡率为 7.21‰,自然增长率率为 8.18‰。

编 后 记

《四川省志·大事纪述》(1950~1985)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以时为序(年份为单元),以事为条目的方法,记述 1950~1985 年四川省社会发展中的大事、要事,力求如实反映历史的面貌。

本志于 1988 年开始组织编写,至 1997 年 2 月完成,先后分为两个工作阶段。

1988 年夏,省地方志编委会聘请李崇仁、刘志铭、黄季康、郭臣、高立岗 5 位同志编写《四川省志·大事纪述》(1950~1985)。编者按经省志编委审核后的编写大纲于 1990 年 11 月完成初稿,由省志编委分送安法孝、周颐、

肖菊人、辛文、林超、章玉钩、张凤山等同志及有关专家、学者审阅,并组织了专门的讨论。编者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于 1993 年底完成送审稿(第一稿)。责任总编曹希之对送审稿作了部分文字修改,加了条目标题,于 1994 年底提交省志审核委员会审查。第一稿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曾得到四川省档案馆、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档案室、四川省图书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图书馆、西南财大图书馆、“四川省军区政治部”以及省志不少分志编写组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1995 年 6 月 19 日,根据省志审核委员会负责人何郝炬同志意见,省志审核委员会在都江堰市召开全体会议,审议送审稿(第一稿)。会议由何郝炬同志主持,到会人员有王于、周颐、张戟、彭雨、岳忠、冯举、肖菊人、隗瀛涛、秦安禄、秦宜雅、王治国、曹希之、

黄友良等同志。会议对送审稿进行了认真评审，一致认为：总的是好的，但也须作相当大的修改。何郝炬同志在会议总结时对此予以确认，并要求省地方志编委会负责修改稿的组织工作。

都江堰会议之后，省地方志编委会委托曹希之同志向第一稿作者转达会议精神并征求修改方案。根据曹希之同志向省地方志编委会领导反馈的意见（原编者不再参加修改工作），并请示有关领导同意，省地方志编委会聘请王治国、黄一龙、吴畏、陈德言4同志承担《四川省志·大事纪述》（1950~1985）的第二稿编写任务。

第二稿编写人员从1995年9月开始重新拟订提纲，经省地方志编委会审查同意，于1996年上半年开始编写送审稿，1997年2月编写完成，历时一年半。第二稿的资料搜集工作得到了四川省档案馆、省计委档案室、省统计局和省委办公厅、省科委、省教育

委、省民委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编写中参考了《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当代中国的四川》、《当代四川简史》、《当代四川》丛书有关卷和《四川年鉴》等，特此表示感谢。

第一稿编写人员工作分工如下：高立岗（1949~1952年、1966~1967年、1983~1985年条目）、黄季康（1953~1956年、1973~1974年、1981~1982年条目）、郭臣（1957~1958、1968~1969年、1977~1978年条目）、李崇仁、刘志铭（1959~1965年、1970~1976年、1979~1980年条目），由李崇仁统稿。第二稿编写人员工作分工如下：王治国（1977~1985年条目）、黄一龙（1958~1965年条目）、吴畏（1949~1957年条目）、陈德言（1966~1976年条目）。由王治国统稿。

由于编写者的水平有限，疏漏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1997年3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省志·大事纪述//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2

ISBN 7-5364-4455-9

I . 四... II . 四... III . ①地方志 - 四川②大事记 -
四川—1840 ~ 1985 IV . 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55349号

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上、中、下)

编著者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 任维丽 喻瑞卿 陶利辉(特约)
设计 蒋钟灵
责任校对 熊倩 赵桂芳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号610012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60.5 字数 1000千
印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版次 1999年12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1999年12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定价 240.00元
ISBN 7-5364-4455-9/Z·207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610012

